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44 ·

文化 · 教育 · 體育類

新教育大綱
教育通論

李浩吾編
舒新城著

上海書店

序 言

這是一本通俗的教育書，預備給初中畢業及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閱讀的。

在我的心目中，我是拿這一類的青年做對象，要向他們講些關於教育的話；所以這不能是本專門的著作，也不能是本極有體系的‘教育學’，而只能是有如底下緒論中所說，選出幾個要點，加以闡明解剖，讓讀者可以獲得一個對教育的正確認識。

同時，在我心目中的這樣的青年讀者，還該是個有志於社會變革的工作，而希望獲得新興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期能把握理論鬥爭上的武器，以應用於實踐中的。

自然，我這本教育書，特別是拿有志於教育戰

線的青年鬥士爲目標，要向他們解釋教育的本質，說明教育的作用，并闢除對教育的迷信，糾正對教育的誤解的。

所以凡有初中畢業及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無論是在學的或失學的，是就業的或是無業的，是有志於教育工作的或不是的，特別是高中師範科學生，小學教師，一部分的大學教育系學生及中學教師，我都希望他們來讀一讀這本通俗的教育書。

我敢告訴讀者：這是本通俗的教育書，但決不是本充塞着腐詞濫調的教育書；這兒，至少有些未經中國人道過的新說，未經中國人指摘過的事實；你若已在或有志於在教育陣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便可從這兒得到一點新武器；即使你並不一定志願在教育陣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也可以由此得到不少新見解。我敢保證，我決不使你失望，假使你把這本書讀了。

即在一般的青年學生，我也希望他們一讀本書，因爲他們可以由此覺悟他們現在所受的教育究竟是種什麼性質的。

目 錄

緒論..... (1)

本書的內容:1,教育的本質;2,教育的進化;3,
教育的概觀。——時下‘教育概論’內容之檢討。
——教育是“宣傳”,是工具。——“新”字的意義。
——問題

第一章 教育的本質..... (9)

第一節 教育是什麼..... (11)

教育是觀念形態的勞動領域之一。——觀念形
態與現實基礎。——教育的起源。——科學與實
用。——教育的實用性。——教育學者的妙用。
——教育跟社會經濟的變遷以變遷的事實。——

教育和其他觀念形態的關係。——問題。

第二節 教育的本質及其變質…………… (23)

社會階級的發生與教育意義的變遷。——原始

共產時代與教育。——私有財產與教育。——國家

制度與教育。——學問的階級性。——階級性教育

之五大特徵：1,學問與勞動分家；2,教育權跟着所

有權走；3,專為支配階級的利益；4,兩重教育的對

立；5,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問題。

第三節 對於教育的幾種曲解…………… (69)

教育神聖說。——教育清高說。——教育中正

說。——教育獨立說。——問題。

第四節 教育的效能…………… (104)

教育的可能性。——評三種錯誤的教育效能觀：

1,教育萬能論；2,教育救國論；3,先教育後革命

論。——問題。

第二章 教育的進化…………… (121)

第五節 原始共產社會的教育…………… (123)

原始共產社會的概觀。——‘實用教育’與‘宗教

教育’——有‘學’而無‘教’。——三種教育形式。——

模仿與暗示。——訓練。——加入式。——原始社會教育的特徵。——奴隸社會與教育。——問題。

第六節 封建社會的教育…………… (161)

封建社會的概觀。——歐洲封建社會的教育。——基督教支配下的教育。——武士教育。——大學教育。——市民教育。——特徵。——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貴族專享的教育。——重禮儀的教育。——造就統治人材的教育。——教育上的封建觀念與反封建勢力的鬥爭。——問題。

第七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 (183)

資本主義社會的概觀。——與封建社會教育的比較。——所謂新教育的特徵：1,勞動化；2,科學化；3,社會化；4,中立化；5,國際化。——我們的批判。——兩大變質：1,獨占化，2,商品化。——三大矛盾：1,個性化與商品化的；2,勞動與教育的；3,自由研究與支配思想的。——問題。

第八節 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 (227)

社會主義社會的概觀。——馬克思的教育觀：1,從宣言上；2,從哥達綱領批判上。——過渡期內教育的性質：仍是階級的，但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不

司。——過渡期內教育的要項，——問題。

第三章 教育的概觀…………… (249)

第九節 教育與經濟…………… (251)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一般關係。——教育與經濟的相互作用。——教育商品化的數種特徵。——資本主義末期的經濟運動與教化運動。——問題。

第十節 教育與政治…………… (269)

教育的政治化。——歷史上從沒有過超越政治的教育。——近代政治支配教育的實例。——文化鬥爭為政治鬥爭的媒介。——政治教育及準備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問題。

第十一節 教師…………… (293)

教師在現階段的責任。——教師結社的必然性，可能性，等等。——蘇聯教育勞動者聯盟的組織和職能。——問題。

第十二節 學生…………… (317)

從政治的立場上論學生。——中國最近學生生活狀況。——學生的悲哀。——學生運動的復興。

——對學生運動的錯誤見解與幻想。——學生運動的任務與綱領。——蘇聯的學生組織。——問題。

第十三節 勞動階級的教育運動…… (339)

勞動教育與勞動運動。——支配階級的勞動教育與勞動階級的獨立勞動教育。——英國勞動教育的分派：右傾的，勞動者教育協會與拉斯金大學；左傾的，平民同盟與勞動者大學。——德國勞動階級的理論與實際。——美國的勞動學校。——問題。

第十四節 教育勞動者的國際組織… (363)

兩種性質的教育國際：資產階級的國際和平教育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解放運動。——教員團體的國際事務局。——教育者國際的成立。——教育協會的世界聯盟。——教育勞動者國際。——英國教育勞動同盟。——問題。

第十五節 美國的教育…………… (399)

特講美國教育的理由。——辛克萊研究美國教育的兩本書：“The Goose-step”與“The Goslings”。——哥倫比亞大學的財閥教育。——哈佛

大學的“自由主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武裝教育。”——普通教育的一般情況。——全國教育會的偉大作用——問題。

第十六節 蘇聯的教育…………… (449)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教育。——教育的理論根據。
——教育的組織概況。——文化事業建設。——十年間的文化發達。——蘇聯中央對於教育的決議。
問題。——

參考書…………… (491)

新教育大綱

緒論

本書的內容：1.教育的本質；2.教育的進化；3.教育的概觀。——時下‘教育概論’內容之檢討。——教育是“宣傳”，是工具。——“新”字的意義。——問題。

根據我在“序言”中所說的旨趣，我來開始寫這本新教育大綱的“緒論”。

這兒我所要說的，是本書內容的梗概以及所以選這些內容的理由。

教育這兩個字所包含的內容，原是非常廣汎。
舉最顯的例子，則有教育原理，教育哲學，教育心

理，教育史，教育行政，課程研究，等等；講到專門，就令畢生單攻一種，也未見得定能徹底；但若說到涉獵，那麼一本教育概論就夠網羅以盡了。

現在這本新教育大綱，要說它的性質，既不是教育學，也不是教育史，更不是其他教育上的專著，却是所謂教育概論的一類。

因之，本書的內容大致要分爲以下三項：第一，是教育的本質，主要在說明教育的起源，教育的作用及其變態，教育的效能，并糾正對於教育的幾種曲解；使讀者由此可以認識教育的真面目，不致再受‘腐儒’和‘御用學者’的欺騙。第二，是教育的進化，歷敘自原始共產社會以迄正在開始實現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教育意義的變遷，教育制度的更易之事實及其理由；使讀者由此可以明瞭教育是受他種根本要素的支配的。第三，是教育的概觀，將和教育有關的幾項社會現象——政治經濟等——說明它們中間的關係；將在教育上占重要地位的教育者及被教育者，重新估定他們的性質；將教育上的兩大事業，就是勞動階級的教育運動及教育勞動者的國際組織，敘述它們的歷史和現狀；

最後將美國的教育當作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的實例，將蘇聯的教育當作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的實例，援引事實來證明兩種社會的兩種教育的根本差別。

正因為教育的內容複雜，門類繁多，我們既不能完全講到，自然只好就其中的重要者選擇幾端，加以解剖闡明。

但是為什麼獨選這幾端呢？

這兒，我有正確的理由，不是隨便亂選的。

現在讓我先來檢討一下國內已經出版的教育概論或教育入門一類的書。

它們的內容雖然不盡相同，但可以說大同小異；而且這所謂異者僅僅是章節文句之異，而所謂同者却是根本立場之同。

它們就是這樣的：先把教育二字的字義解釋一下，引用說文的（註一）拉丁文的（註二）乃至各家的（註三）定義；其次講些心理與教學，課程與教材；其次講些學校制度，講些教育經費；再其次講些教育學說，教育研究；這樣，就完了，就算是本教科書，要供給一般師範生及教育者去學習，去應用

了。

然而對於教育意義的變遷，制度的變遷，其理由何在，其作用何在，它們是不講到的。有許多兒童受不到教育，有許多畢業生做了遊民，其理由何在，其解決法何在，它們是不講到的。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如何，與經濟的關係如何，它們沒有說明。教育這架機器被賊偷了去，當作鴉片來毒害人，它們沒有曉得。反之，它們要說教育如何神聖，如何清高，如何獨立，如何公平，如何科學化，如何民衆化，乃至教育可以救國，教育可以解決民生……一大堆的對教育歌功頌德的麗字美句。

這便是通行的做教科書或參攷書用的教育書，這便是數萬師範生及教師在研究應用的教育書，這便是一般人所承認的教育書！

現在我這本新教育大綱，就是要一反乎這樣的‘腐詞濫調’，要大聲警告讀者：教育這架機器早被強盜偷去了；強盜爲了自己的利益，不爲了受教育者的利益，在占有着它，運用着它；強盜“細心地而且故意地，不教你智慧而教你愚蠢，不教你正義而教你貪慾，不教你自由而教你隸屬，不教你友愛

而教你憎惡；”——引用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鵝步（The Goose-step）的序言中語——教育只是一個工具，只是一種“宣傳”，只是一項副產物，只是一批衛士隊；教育是商品化了；教育是魔術，也是毒藥；簡單言之——用社會科學的術語——教育是階級的，是階級鬭爭中的武器；從文明開始以來，只有階級的教育，沒有人類的教育；只有對立的教育，沒有統一的教育。

爲什麼我敢如此說？

我有理由。

正因爲要說明這些理由，我才選擇上述的幾端，而把其他許多在一般教育通論或教育入門書上所講到的完全撇開不談。無論在第一部分講教育的本質的，在第二部分講教育的進化的，在第三部分講教育的概觀的，都有着這樣的說明。

又因爲本書是要解剖并說明這些新的見地，新的事實的，所以標題上就用得着加上一個“新”字。——請讀者注意：這不是趕時髦的“新”，這乃是說新義的“新。”

（註一）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教也；育，養子使作善也。——

段注：育不從子而從倒子者，正謂不賢者可使作善也。

(註二)拉丁文 Educare，意爲引出。

(註三)從“教育養成道德習慣使人信天……。”“世界上各物皆隨一應永久律而生活……教育是在使人認識此永久律。”“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在使人學聖。”起，到“教育是製造人之經驗，使經驗增加意義及具指導後繼經驗之能力”止，不管前者是非凡的籠統含混，後者算是比較開明；但這種樣的定義，都和字義的解釋一樣全未說到教育的真義；反之，只有使讀者得到模糊的觀念，而終於爲支配階級的教育觀念所迷。所以這種解釋“教育”的作用，類乎假裝的遮眼法，是掩飾支配階級的階級的偏見與私利的。——參看第一章第二節‘教育的本質及其變質’。

問 題

- 一。試比較幾家大書店所出的教育通論或教育入門一類的書的內容，——假若你能看到那些書的話——問問你自己：“它究竟告訴我些什麼？”
- 二。我說“教育是宣傳”，這話是什麼意思？請

第 一 節

教育是什麼

教育是觀念形態的勞動領域之一。——觀念形態與現實基礎。——教育的起源。——科學與實用。——教育的實用性。——教育學者的妙用。——教育跟社會經濟的變遷以變遷的事實。——教育和其他觀念形態的關係。——問題。

我不引用說文上或拉丁文語源上的字面解釋，也不引用教育名家的定義，我只直接了當地作如此的說明：就是，教育為‘觀念形態的勞動領域之一’（one of the fields of ideological labour），

即社會的上層建築之一。

什麼叫做上層建築或觀念形態？這在本叢書的另外幾種書籍上，我相信一定是有詳細的說明的。所以這兒不妨說得簡單一點。

照唯物史觀來說，社會的經濟構造是現實的基礎，而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以及哲學上——簡言之，就是觀念上——的各種形態（即所謂觀念形態）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教育就是這樣的上層建築之一，也就是這樣的觀念形態之一；上層建築對下部基礎的依存關係是這樣：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法（即經濟構造）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即上層構造）；“因為經濟的基礎發生變動，所以巨大的上層建築全體，也徐徐地或急速地發生變革。”

這是新興社會科學已經確定了的學說 我們可以拿來說明教育在這一點上的性質，實為我們最先所應放在心頭的一個根本概念。

至教育是‘觀念形態的勞動領域之一’的解釋，正可就教育之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學校來考察。一般的學校，無論是高級，是中等，是小學，都是社會

的勞動之領域，爲賦與勞動力以特種的資格的地方，就是使單純的勞動力轉變到特殊的勞動力的地方。有的人要在這兒學成一個醫生，有的人要在這兒學成一個律師，更有些人要在這兒學成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等等。所以養成技師的工業學校與養成僧侶的宗教學校，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因爲它們都是賦與人們以特殊的勞動力，完成多少專門化的勞動機能之場所。從而學校的構造與學校的分科（商業，工業，師範，醫學等等）都是對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熟練勞動力之表現。

這一個教育的定義，就是根據唯物史觀所下的。爲使讀者格外明瞭起見，不妨再爲引伸。

這就該從教育的起源說起。

教育怎樣起源的？是根據於什麼人性嗎？是根據於教育者的意識嗎？或是根據於什麼天命嗎？——即所謂“作之君，作之師。”都不是的。教育的起源並不在於這樣玄妙的處所。教育只是一件‘日用品’，是與社會的生活過程，物質的生產關係有密接聯繫的；而且是以這種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

爲基礎，只要是現實的經濟關係變了，它是必然地跟着變的。若說教育是與現實的經濟生活無關心地單憑某個人頭腦中的思索所得決定，從來就沒這樣一回事。

淺言之，教育的發生就只根於當時當地的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它是幫助人營社會生活的一種手段。這所謂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的充分獲得，他方面是知識才能的自由發展；還有，這種生活是集體的社會底的，決不是孤立的個人底的；所以教育的定義應是社會所需要的勞動之一領域，是給與社會的勞動力以一種特殊的資格的。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爲自有人生，便有實際生活的需要，不過人生的需要，隨時隨地有不同；教育的資料與方法也跟着需要有變遷。這種變遷的根源，就存於社會的經濟構造的轉易。故在原始社會是一種教育方式，在封建社會是一種教育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又是一種教育方式。——詳細見第二章“教育的進化”。

說到教育起源由於實用這樣的話，有人或許要視爲輕視了教育，甚至侮蔑了教育。其實大大地

不然。一切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沒有一種是不由實用而產生，不跟着實用以進步的。譬如號稱‘純粹思維之學’的數學，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和實用離開得很遠，但在最初也是起源於實用的，那就是由於計算東西這一種非常實際的需要而產生。又如天文學，是太古人類爲在廣大的平原及沙漠中有定方位的必要，爲在農業上有知氣候及年月日時的必要而產生的。自然這些學問，在人類的野蠻時代，尙未形成爲嚴格意味的學問；當初不過有點科學的萌芽罷了，至其長成而成立爲學問，乃是人類生活上多少有了餘裕之後才有的事；即在生產力逐漸進步，人類對於外物能有充分觀察及研究的餘暇才可辦到。所以科學這樣東西，最初是當作生產力進步的結果以發生，其後直接地或間接地伴着生產力的進步以進步。換言之，科學的內容，是以該社會之技術的階段即經濟的階段爲基礎的。

這樣，各種科學完全是由實用以生，伴着實用以進步；教育這件事業，本是以傳達各種科學的內容爲職責，它之不能離開實用，自是當然的事。

但或者也有人說：在學問的發達上，難道沒有全離實用以進行的時候嗎？就是難道沒有所謂‘爲學問而學問’，這樣純粹爲滿足智識慾的學問，或把什麼實利或應用全不放在眼中，而只以純粹的學問純粹的智識相追求的嗎？這話可分兩層來解答。第一，一切科學上的理論自然不一定是直接爲實用的；個個的理論不是全然有它的應用方面的。但是無論怎樣純粹的科學理論，在間接方面，一定是充分有實用的意義的。一切的科學知識，就全體言，是社會的有用物；它的局部，雖不一定直接地有用；但在把它視作全部科學知識這把鎖鑰之一環時，就間接有用了。人類社會的工具及機械，有一件無用無益；同樣，在人類社會中的學問，也決沒有無用無益的。但何以間接有用，而不是直接有用呢？這是由於這樣起於實用的學問，到了後來因爲逐漸分化的結果，分成為非常專門的各種部類；在這種部類裏面又細細地分成若干小部，於是從事於一個專門部類的學者，除出自己的專門之外，竟可連什麼都不知道。他自身活動的整個範圍和他研究的範圍適相一致，而在實際上應用他的

研究的，却不是他自己而是別的專門家。譬如化學這種學問，就有理論化學乃至應用化學的分別。因此，專門家自己竟會設想自己的研究是和實用無關的；殊不知實際上，他的研究結果，還是因為別的專門家的利用或因為廣汎的社會的利用，經過了某種徑路而成為實際必要的產物；而且他的研究本身，在實際上也須以這種實際的必要當作究極的目的，而後才能成立。

第二，我們要知道等到學問成形的時候，凡從事學問——如法制，宗教，藝術，哲學以及科學——的人都是屬於社會的上層階級，就是屬於支配階級——因為不是這樣，他們就沒有餘暇來從事；因之，當他們研究以至說明這種學問的時候，必然地反映出在社會階級上的立場。他們自己承認對於實際從事勞動，實際維持社會經濟構成的人們（古代的奴隸，中世的農奴，近代社會的工人）完全享受不同的教養和稟賦，所以他們以為自己從事的事業，和從事勞動的人們的工作，完全在不同的軌道上發展。這兒我們可舉哲學上觀念論的代表人物柏拉圖的見解為例。在他老先生看來，祇有真正

的哲人才能認識一種所謂崇高的實在；職匠和工人的子弟是不能達到這種精神鍛鍊的階段的。所以他明白地主張哲人政治，以爲祇有具有政治的科學的美學的教養的家庭，才能供給一種天才，在受過注意的訓練之後，可以充任最高的官吏。柏拉圖的這種見解，後來跟了階級社會的發達而益加展開。就是，階級社會愈加發達，這種觀念上的事業愈加專門化而愈落於社會上層階級的一部分人之手。因此，連這種學問的本質也愈加被視爲和社會的基礎構造，社會的實際必要相遠離的相分開的部類了。

教育爲幫助人營社會生活的一種手段，顯然是實用的；教育的歷次進展，也適於各時代社會的經濟的需要（雖不是全人類的需要）；但自有了所謂教育學者講什麼教育哲學，說什麼教育原理之後，竟把本來人人能解的接近實際生活的教育，變成爲了不得的精深，了不得的高貴，彷彿惟有哲人才可從事似的。

這批屬於上層階級的教育理論家或教育哲學家，自以爲具有高深的理論，懂得玄妙的哲學，所

以在他們所‘編製’的教育學上的命意措詞，必求其高深玄妙，凡平凡通俗的見解字樣，都要避去。他們先把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從一般生物區別出來；再把教育事實限制在學校門牆之內，而學校却是‘重地，閑人莫入’的；——其實照學校兩字的拉丁語源來說，它正是惟閑人才能進去的場所。——然後他們安坐在這一‘無風帶’中，來吟味教育的哲學，推敲教育的理論；更令人可佩的還熱望把教育學‘化成’科學，務必把他們所‘編製’的教育學的地位抬高。可是獨獨對於有許多兒童進不得‘學校重地’，有許多窮人永遠嘗不到‘教育妙味’，更有許多人雖已領得畢業執照，被送往勞動市場，然而找不到出路；像這一類遍地存在的事實，我們的教育學者是可以全不關心，不，是可以全不看到的。

以上說明教育這種社會現象的實用性及其所以被視爲遠離實用的由來。以下更要簡單地就事實來證明教育之實用性及其跟社會的經濟的變遷以變遷的情形。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是宗教異常發達的社會。因之中世紀的學校都帶有極濃重的宗教意味。

宗教的學校自不待言，就是其他大學生活及課業等等，也都有僧侶的色彩。神學的精神；除出醫學法學等二三個分科大學以外其他一切教育機關，不問其爲小學或是大學，莫不以僧侶的教養爲第一目的。但到了中世紀末葉，因爲都市發達，跟着有商業資產階級的發達，於是以養成商人爲目的的專門學校就建立起來；以後工業資本主義發達，相應地就有工業專門學校發生；且爲了大工業的發達，技師監督及計畫者的需要，更可看出各種的高級專門學校及大學增設起來。

這是由學校的內容的變遷，可以看出教育的性質。

再看自來擔任教師的人物，最初或可說是母親是長老（可決不是正式的嚴格意味的教師），以後是僧侶學者，再後來便是以教育爲職業的教員及官吏等等；這也是隨着實際的需要來的。現代國家之所以創辦師範學校，對師範生特定優待辦法，就是根於國家獨占教育事業及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之需要來的。

說到這兒，我們對於教育是什麼這個問題，當

可有個明白的概念了。就是：教育是社會上層建築之一，是觀念形態的勞動領域之一，是以社會的經濟階段為基礎的。

不過，在這兒，可以順便說明一句。教育雖是和法制，宗教，道德，藝術，哲學，科學等等同為社會的上層建築，但它有一點特別的地方，就是它不像別的精神生產各有各的內容，而是以其他的各項精神生產的內容為內容的。譬如學校裏面的課程，無論是科學，是哲學，是藝術，這種種學科的內容，沒有不和當代社會的一般科學的內容，一般哲學的內容，一般藝術的內容相同的；換言之，學校科目所教授的樣式，傾向等等，都是以當代一般的樣式傾向等等做根據——但要注意：這所謂一般，自是指着一時代占支配的地位者而言；而“支配一時代的思想終只是那時代支配階級的思想。”——因此，在新興社會科學上解釋各種精神生產即上層建築時，往往不列入教育一門，就為了教育只是一種動作，是一種技巧，以講究怎樣實施‘支配思想’為務的。教育之不成為獨立，不僅為了在旨趣及實施上受制於經濟及政治；也為了在資料與

方法上受制於其他各項精神生產的緣故。

問 題

- 一．什麼叫做觀念形態？
- 二．你對於教育，原來是具有何種概念的？
- 三．你的教育學教師對教育所下的定義是些什麼？
- 四．教育有實用性，為什麼現在的教育竟無實用的效果呢？
- 五．教育的實用性和所謂實用主義教育或職業教育是不同的。你能說出它們的不同處嗎？

第 二 節

教育的本質及其變質

社會階級的發生與教育意義的變遷。——原始共產時代的教育。——私有財產與教育。——國家制度與教育。——學問的階級性。——階級性教育之五大特徵：1，學問與勞動分家。——分家是社會分成階級的結果。——御用學者的分業論。——文雅教育與職業教育，是現代教育的分家現象。——2，教育權跟著所有權走。——教育成為有產者的私有物。——中國有多少人沒有教育權？——“窮人不得受教育！”——貧富與壓力。——3，專為支配階級的利益。——教育成為支配階級的工具。——國民教育的兩種職務。——高等教育的三種職務。——4，兩重教育的

對立。——教育制度與教育行動。——但原始社會的和諧
級社會的有不同。——近代社會中兩重教育機的對抗。
——5,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差別的開端。——文明社
會的女子觀。——解決女子教育問題的前提。——問題。

教育的本質，已在上節說過，是社會所需要的
勞動之一領域，是給與勞動力以一種特殊的資格
的；換句通俗的話，教育便是幫助人營社會生活
的一種手段。但是這樣一種起於人類實際生活需
要的教育，並不是終古如斯的；它的意義和它的
內容是常常變的。

“在原始社會，教育是全人類都得享受，也是
都常享受的。到了社會分成階級，於是教育也
帶上階級的色彩。在支配階級方面，有儼然
的教育制度，有釐然的教育規則，有專供本
階級適用的教育材料，至於被支配階級，不
是全被擯在這種教育制度之外，便被施以欺
瞞的教育。

“因為這個緣故，自社會有了階級的對立
和鬥爭以來，在教育上就也不斷地發生對立
和鬥爭。

爭。在真正教育史上教育意義的歷次變遷，便是在社會階級關係的歷史變動期中所表現的形態，便也成為階級鬥爭之一個部門，一個階段。”——引用友人公樸君語。

這個轉變的關頭是在社會的分成階級。在社會未有階級即在原始共產社會時代，教育是全人類的，也是統一的；等社會分成階級，即在所謂文明時代，教育就變成階級的，且是對立的。

階級的和對立的教育，是人類有文明期歷史以來的教育的特質；這在教育の本質上言，却是變質。

試就歷史來檢討教育意義變遷的大概。

人類的過去，約有十之九的大部分是可稱為氏族制度之時代——假定人類的全歷史為五萬年，那麼怕有四萬五千年是屬於這個時代——即原始共產生活時代。在氏族制度的社會，生產以社會之必要為目標，消費以滿足各人之需要為原則。即生產不以買賣賺錢為目的，消費以人人滿足為理想。換言之，就是大家勞動，大家消費。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中而有不勞而獲與勞而還餓的兩種人

並存的事實，在這個氏族制度時代的人看來，簡直是絕對不可理解的謎，說他們的子孫要為這個謎而遍嘗苦痛，甚至走頭無路，是連夢想都不會有。這種共動共樂的社會之道德，是怎樣地與今日的社會之道德有別，自然不難想像。

至於他們的教育，無待言，自不外於所謂‘種族保存’之生物學的目的，即是適應實際生活需要的目的。在氏族制度時代，除由這一代向下一代傳授社會的遺產之外，別無何種意味；即除‘種族保存’（‘個體保存’包括在內）之目的以外，更無他種教育目的。當代的人一面利用由前代所傳下的精神的及物質的之遺產，一面更加上新的經驗與發明，以傳授給後一代。所以這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社會的事情；這又不是支配的事情，而是平等的事情。

然自人類社會中有私有財產發生并且逐漸發達之後，於是人類全體之生活，遂現出根本的差異。

因為私有制既經發生而且發達，勢必有擁護這個私有財產之道德跟着發生發達。從來除單純

的生物學目的以外不另有目的的教育，一到這兒，也便將擁護私有財產之新道德加入，要把這傳授給後代，叫他們負擔這一項新的任務。至於這種新道德是否與人類全體之幸福或利益相一致，是與教育不相關的。由是為教育本來任務的‘種族保存’，即全社會的生產需要，就漸次喪失其意義。

在氏族制度社會，各人在才能上雖有差異，但在生存上之權利是平等的。自私有財產發生以後，遂生出各人私有財產之差別。私有多者與私有少者，在生存上的權利也不相平等。一方是“朱門酒肉臭”，他方是“路有凍死人”。這樣所有少者或全然沒有者，不得不屈服於所有多者。後者就握有前者的“生殺與奪之權”。在這種社會中，適於所有多者之道德逐漸發達，教育就成為向下代傳授這種新道德的工具。

私有財產之差異終於破壞了和平的原始社會之組織；即單一平等的社會由是分裂成富者與貧者。這一分裂引起了從來的‘秩序’之破壞，因此發生了不斷的擾攘。支配階級——即握有經濟上支配權的階級——為要在表面上掩飾這一擾攘，緩

和貧富間的衝突，以便財產得有合法的保障，自有造成新的‘秩序’之必要；國家制度就由此建立起來。

說句比喻，國家是建立在原始共產社會之廢墟上的迴旋舞台。這個迴旋舞台是不過在四千多年前才造成的，到了今日却已有幾度的迴旋了。但在任何個舞台面上，台柱子終是‘所有多者’，‘跑龍套’終是‘所有少者’及‘無所有者’。而所謂‘教育’這條鞭，終被握在台柱子手裏，以之驅策指揮‘跑龍套’用的。

試看西洋史。古代——舞台面爲希臘及羅馬之時代，台柱子是貴族，‘跑龍套’是奴隸。這一時代的教育，在確證并讚美爲台柱子的貴族之優越與使做‘跑龍套’的奴隸感到自己的卑微與暴棄。貴族們相信自己來得特別高貴。視奴隸爲非相同的人類。他們榨取奴隸的勞動以築成自己豪奢的生活。而教育的任務便在使這事實爲合法化。

中世——舞台迴轉而至中世紀，台柱子是封建諸侯與僧侶，‘跑龍套’則爲農奴。諸侯與僧侶高居農奴之上，教育任務在使農奴永不醒目，過土撥

鼠的生活。基督教利用上帝的名義說善良的土撥鼠死後可升天國。

近代——舞台更週轉而至近代，這裏資本家做了台柱子，工農及貧民成爲‘跑龍套’。在這個舞台上，自然一切的背景，服式乃至說白等等，全爲台柱子而設置。所謂教育者自也不外使台柱子的表演愈加有聲有色而已。

故若注意在人類進化歷程上的教育之歷史，可知最初教育的起源，實爲幫助生活；其作用只是一種用以維持生活之手段；但因歷史的進展，教育意義乃大有變遷；這個變遷的大概可說如下：

第一，在氏族制度時代之教育，是爲種族之維持發展，由一代向次代傳下物質的及精神的之社會的遺產，完全是生物學的目的。

第二，當私有財產制勃興時代，社會分裂，從而教育於生物學的目的之外，加上當作支配工具的目的。

第三，當私有財產制已經發達之後，教育之目的遂變爲忽視第一義而重視第二義。

從希臘羅馬開始的教育史，已經是變質了的

教育之歷史。這種教育一直到如今還未告終。故一般教育學者之不信教育目的在乎‘保持種族’，在乎適應實際生活需要，而必要裝成其他冠冕堂皇的門面，使一般人迷信教育事業爲神聖爲高貴，也正不失爲‘御用學者’的本色。

教育的階級性本是顯然的事實；但爲使讀者格外明瞭起見，我可就一般學問的階級性略加解說。

一切學問全由社會的實際要求而生，已如前述；等到社會中有了階級，一個社會分成了幾個階級，於是可以叫做單純的社會要求者已經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乃爲某一階級的要求。自是而後，學問這樣東西，終是由於這種階級的要求以發生，以發達的。從而無論何種學問，必然地帶有多少階級的性質，階級的色彩。雖或有人要說科學是探求純粹真理的，故可以沒有這種階級的性質；但要知道科學既然不離實用，那麼在階級社會中，就決不能有全離階級的實用之事。這在社會科學上尤其已甚，如有產者經濟學與無產者經濟學儼然對抗，

可以爲證。至在自然科學上，也是有階級的意義存在或潛伏着的，不過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間接之不同罷了。

拿天文學爲例。天文學初起的時候，確是爲了社會全體的利益；但後來原始生產社會漸漸變遷，有所謂族長制度這類私有的（或半私有的）階級制度漸漸發生，於是天文學由爲了全社會的利益的學問變而爲爲少數人（即族長階級，治者階級）的利益的學問；就是天文學（其他學問也復一樣）的知識，成爲僧侶神官等所獨占的祕密，以擁護治者階級的利益與權勢爲主。如埃及及巴比倫的天文學，都多少具備宗教的（及祭祀的）意義形態，就是爲此。到了希臘時代，天文學雖離開僧侶之手，對宗教宣告獨立；但這回，它却被哲學所隸屬了。在希臘，一切學問都是哲學，所以天文學也成了哲學的一部；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等大哲學家之唯心哲學，就影響到天文學。到了羅馬，脫拉米完成了古代的天文學，這雖是頗有價值的事，但在他所主張的天動說的背景裏，一面有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一面有了基督教的聖經。所以脫拉

米的天文學，是與聖經上所寫宇宙的構造大體相同，又是以二大哲學家的玄妙哲學爲基礎的。在中世紀，他的天文學實具有絕對的權威。猶之乎任何人不得懷疑聖經，任何人不得反抗亞里士多德哲學，任何人也不得對脫拉米的天文學持異議。如斯羅馬以後的天文學，當作哲學宗教的天動說，成爲擁護支配權，擁護支配階級的學問；在一千年間，天文學看不出絲一毫的進步。

然至十五世紀前後，這個繼續至千年以上的社會的黑暗，開始露出曙光來了。所謂文藝復興的新時代，宗教改革的新運動，新的發見和發明，都續續發生，新的科學研究也勃興了。這種變化從哪兒起？自然不外於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崩壞，而新的資本主義制度發達之結果。在爲領主與教會所支配的農奴的村落之間，漸漸地發生了商工業的都市。商工階級即資產階級反抗貴族階級，以自由思想，科學思想做他們的武器。向來所謂學問，完全爲僧侶所獨占。如今資產階級却要求科學，把住科學了。科學就離了教會侍女的地位而獨立，科學竟向教會叛逆。而資產階級便是科學的援軍。商工

業都市成爲新的文明之中心，新的學問之中心。資產階級爲要發達產業，爲要便利交通，實以各種科學爲必要。同時又爲推倒舊制度，進攻舊勢力，更要求科學爲思想上的武器。所謂文藝復興，就是適應這種要求的社會現象。所謂宗教改革，也不過是把那和封建貴族相結托的羅馬教會改變爲資產階級的御用宗教而已。從而新時代產生了，新學問發達了，而我們的天文學也有了大變化，發現了大進步。這時候，天文學上的地動說，就是新階級的新學問。但在資本家社會確立了的現代，各種學術固然完成了急速的進步，而學問這樣東西仍然不免爲支配階級的御用學問。所謂‘學問的自由’這種說法，也只限於不妨害資本家支配的範圍以內。至於歷史與社會科學，都明白地成爲資本家的學問，都表示保守的，反動的，壓迫的，支配的態度。不僅如此，就在號稱自由獨立的自然科學，尙且以懷疑的或者阿諛的態度招致動搖，逐漸地趨於反動哲學，唯心哲學的傾向。在我們的天文學上，就大大地表現着間接擁護支配權的作用。如說研究天文學，可以擴大胸襟，探知宇宙的神祕，因以傳播‘安心立

命’的，‘看破紅塵’的思想於一般人心中。當這個階級鬥爭的形勢愈趨尖銳，支配階級不絕地感到不安的時候，利用對於天文學的通俗講演及電影說明這類的事情，以圖轉移民衆的視線，正是全世界流行的風尚；它的作用，就在和宗教藝術一樣，可以有慰安的，催眠的，麻醉的效果。然而一般學者，教育家乃至新聞記者，正對這類事情表示贊同，表示努力，於不知不覺之中——自然也有完全意識到，或者一半意識到的，——盡了間接地維護支配階級的能事。

學問的階級性既然如此，以各種學問的資料爲資料的教育事業，它之不能沒有階級性，自是非常顯明的事了。

從階級性的教育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教育的五大特徵。

第一個特徵是教育與勞動分家。在原始共產社會，大家勞動，大家即就勞動所需要的知能，隨時隨地學習，或受長老的指導；所以學問也是大家共享，且和勞動相聯繫的。但到了階級社會，有治

者與治於人者的兩種階級出現，前者變成所謂‘勞心者’，後者變成所謂‘勞力者’。在政治上，‘勞心者’與‘勞力者’是支配與隸屬的關係；在教育上，便是‘學問’與‘勞動’的關係。治者階級一味從事‘學問’（自然，有很多是不從事‘學問’而只荒淫過日的）而絕不從事‘勞動’，被治者階級則一味從事‘勞動’而絕不從事‘學問’；換句話，腦與手拆了伙，求知與做工離了婚。兩者形成儼然對抗的陣勢，直不許越雷池一步似的。看上引希臘哲人柏拉圖的見解可以為證。

這種教育的結果，在個人方面，是讀書人弄成‘手無縛雞之力’，弄成‘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做工人弄成‘目不識丁’，弄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社會方面，是讀書人高居‘四民之首’，視勞動為微賤；做工人居於下流，視學問為無用。一個人的身分職業，馴且變為因襲的，無理的，如士之子恆為士，木匠的兒子也就永遠做木匠。這中間彷彿隔着一條鴻溝，絕難通融。——不過這種情態的發生，直接的原因自要歸於社會的分成階級；而階級的教育却有助長的作用。於是讀書人變成必然地這

離生產事業之人，變成必然地靠支配階級（或本身就是支配階級）過活之人；而做工人只好從生到死，從早到晚，爲養活一般坐食者而從事生產勞動之人。由是兩種人有了不同的利害關係，且須採取敵對的態度了。

這種現象本是一種變態，決不是有種人生成是只配讀書不做工，而有種人生成是只配做工不讀書的。不料這種變態的社會現象因爲傳習得久了，居然有科學家起而證明人類這樣的分業是當然的。他有什麼證據？他就引用生物界中如蜂蟻之類，是有分工的現象的；譬如雌蜂只做王，雄蜂只行交尾，工蜂只事跑花蜜釀蜜等等；於是我們的科學家就推論到人類社會中，有些人做資本家，有些人做勞動者，正是‘天經地義’，非常合理。好一位支配階級的御用科學家，你真乖巧啦！——日本有名的理學博士丘淺次郎。

教育與勞動的分家，不祇是從前如此，就在現代還是如此。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羅斯，“舉國大部分都是無教育的。”——庫爾普斯卡耶（列寧夫人）說。能

受教育的恩惠的，只有占人口一小部分的特殊階級的子弟，其他淪於下層的工人及農人的子弟，實在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與可能。就是名義上算受教育的，在小學校修業三年，還是教會用語，教會唱歌，祈禱，以及其他宗教的儀式占居授業時間的半數，而俄羅斯語，算術以及書法，僅有形式；歷史一科除出灌輸一種盡忠於‘沙’（Zar，俄皇）的精神之外，就無別的。至於中學，亞力山大三世時的教育總長台爾耶諾夫曾說：“中學中沒有廚役兒子的地位。”那麼得入中學校的，自然只有地主，貴族及富豪的子弟了。中學的功課，以拉丁語，希臘語及帝王的歷史為主；所以造就出來的學生，都是和實際生活相隔絕，只配做當時制度下的小官僚——這本是當時中學的目的。又如成人教育，除了許可教授加減乘除四則以外，不許教授分數；如果違背這個禁令，學校就得封閉。

這是在二十世紀時代教育與勞動分家之一實例。

再舉一例，就是文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與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的爭論，普通

科與職業科的對立。但是在這兒，我不想對這個問題多所批判；我以為不問是分別主張者，或是融合主張者，要之，教育上面有這種相對待的名稱與事實，就夠證明教育與勞動分家這件事，雖在這個號稱教育發達而且普及的資本主義時代，還是依然存在；即所謂教育，依然是階級的，不是全人類的。

這樣的分家，難道在社會進化歷程上，全然無進步的作用嗎？也許有人會提出這個疑問。是的，這種分家，我們不否認是有它的進步的方面。希臘的那樣光輝燦爛的文明，可以說是全靠奴隸造成的。假使當時沒有三十六萬奴隸，用他們的肉體勞動來供養九萬自由民，且使在自由民中少數的聰明人沒有充分思索的餘裕，那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恐怕沒有成立的可能。柏拉圖主張奴隸不可少；亞里士多德說哲學要以必要的餘暇為前提；這倒都是真心話，都是‘經驗有得’之言。

然而這兒有個區別。古代文明——就是近代文明也然——靠奴隸造成，原是一件事實。但因為有奴隸勞動者之豐富不斷的輸入，才使雅典人民

有專心於政治，藝術，哲學，體育及其他一切文雅事業之可能；從而承認當時的雅典自由市民確應以奴隸爲犧牲，做自己享樂的工具；且從而主張人類社會中，確應有奴隸存在，讓他們永遠過非人的生活；或者雖不是這樣明白地主張，而承認這種分業爲必要爲當然，那就錯了。

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觀念論哲學）之反動的方面，就在對於奴隸制度的關係上表現出來的。因爲這種哲學是立脚於奴隸勞動的奴隸所有社會之哲學。當時的社會已經發現了許多矛盾，只是找不到出路；於是在支配階級中間產生出觀念論哲學來。這種觀念論所具的社會的目的，就在把既存的社會狀態理想化，永久化；把理性支配，就是賢人政治的思想一般化；照這種見地，民衆是不明道理的；能明道理，具理性的，只有少數的支配階級。這種理性支配萬物的觀念論哲學之思想，經過以後幾千百年，就成爲對於支配階級一般主張之最有力的論據。

我們不看別的，單看當時希臘社會所陷的矛盾，舉出二種來看，就能明白了。在立脚於奴隸勞

動的社會中，必然地發生了自由民蔑視職業勞動的觀念，他們對勞動加上卑賤的污名，視勞動只是奴隸的事情。結果，當許許多多的無產自由民要靠國家的費用來過活，換句話說，變為國家的食客，這樣，國家只好為搜集供養無產自由民的生活資料而從事戰爭，社會的不安就因此加甚。再有一點，是起於經濟領域上的重要矛盾。就是奴隸勞動閉塞了技術的進步，停止了生產力的發達。因為奴隸只受強制的勞動，在奴隸勞動上，只能使用粗率的工具。所以在古代奴隸經濟達於最高點時，我們就見到了技術的停滯和對於自然科學（在小亞細亞殖民地已經盛行的）的興味的停滯。

故在現在，如仍有人主張賢人政治主張教育應重文雅，博大，‘自由’，那準是反動的見解，準是擁護支配權的見解，在我們的新教育上，是應該竭力攻擊的。

第二個特徵是教育權跟着所有權走。

教育的分配，主要是受所有的多寡以決定；就

是所有的特權連結到教養的特權；從而有產階級成爲有識階級，無產階級成爲無識階級。這樣的教育，根本是少數有錢人的專有品，無產者自可不必享受，也且不容享受。譬如日本帝國主義，它的教育當然說得上是普及的了，政府之厲行教育可說是盡心竭力的了；但在小學校令中，竟公然規定保護者貧困時，得使兒童延遲就學或免除就學。這不是教育權跟所有權走的證據嗎？（註一）

然在無階級的社會中，你相信會有這樣不公平的事嗎？

中國最近全國學齡兒童數共有四千三百六十六萬餘人，已入學者六百四十一萬餘人，尙有三千七百十九萬餘學童未曾入學——數字據教育部實施義務教育初步計畫，在十八年十月底發表。——這三千七百十九萬餘的失學兒童，就爲了所有少或者竟無所有而生。

全國應受補習學校教育者（即不識字者）之數目，據教育部實施成年補習教育初步計畫草案所列，達一萬九千五百十五萬餘人之多，即近二萬萬人。這個約占全國人口之半（全國人口以四萬三千

六百餘萬計算)的不識字者,也是由於所有少或者竟無所有而生。

據中華教育改進社於民國十二年調查學校人數統計的結果:各省區初等學校學生數爲六百六十萬餘人,中等學校學生數爲十八萬二千餘人,高等學校學生數爲三萬四千八百餘人。在這兒,有許多未能在初等學校畢業或畢業而未能升入中等學校的,以及許多未能在中等學校畢業或畢業而未能升入高等學校的,除了死亡疾病的理由之外,也是由於所有少所生的。

你有所有權,你便有教育權。

即使是個低能兒,只要他的父兄是個地主,富豪,買辦,官僚,或是軍閥,不怕沒有教育權,他不特可升入任何學校,還可留學外國。

但要是個窮人的子弟,那麼儘管他是怎樣聰穎的天才兒——不過沒有機會發見出來。因爲智力測驗這種所謂科學的利器,是應用不到窮兒身上的。——也莫妄想有個識字讀書的天日。照日本的例,他是‘奉旨’免除就學義務(1)的;若照俄國(帝俄時代)的例,“中學校中沒有廚役兒子的地

位。”

這是命定的：窮人不得受教育！

試想：窮人的子弟，有許多從會說話走路起，就須幫助父兄謀生了。你若強迫他求學，反而剝奪了他謀生的機會；除非你能給他求學津貼，否則這種義務教育怎會實施得來？一個中學生每年要費二百元，一個大學生每年要費四百元。全國人裏面，有多少家庭能擔負得起這樣高價的中等教育費和高等教育費呢？

因為窮人本來不得受教育，於是‘鑿壁偷光’，‘掛角讀書’都要傳為美談了。

因為窮人本來不得受教育，於是倘有一個窮人忽然得着富人的資助，居然學成業就，就要“感奮乃至無地”了。（註二）

也許有人會說貧富的原因，根本就起於腦力的差異；故富人有機會求學，窮人沒機會求學，正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但是這個說法，顯然是很大的錯誤。日本人仲宗根源和著的教育讀本中曾說：富人見了窮人，就說他沒有才幹，所以窮了；窮人見了富人，也以爲他是偉大，所以有錢。其實在

學校裏很多窮人之子的成績遠勝於富人之子。窮人子女若有機會和富人子女同在一種環境裏，則在腦力方面，實是平等的。

他又引用一個有趣的例，說是若取社會上有用的分子九千人，即在任何人都覺得其有能幹的九千人，如：

每年有二千元(美金)收入的學校教員

一五〇〇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醫生

一五〇〇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農業者

一五〇〇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大工人

一五〇〇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音樂師

一五〇〇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鑛山技師 一五〇〇人

這九千人，其中大部分曾經費去長期的光陰，以獲得其訓練及經驗，然後又在社會上做有用的事業；惟其每年所得的報酬不過二千元。繼續做了四十年，在這四十年間九千人所得的錢總計是七萬二千萬元。然而拿這個數目和美國富豪洛克菲勒一人在一九一五年度之財產相比，尚短少二萬八千萬元。若貧富之分由於腦力，那麼這九千人合計起

來，他們的腦髓難道還遠不及一個洛克菲勒嗎？

又美國第一流的政治家及教育家八千零七十九人的俸給，總計有二千零四十五萬六千五百元；但拿這與洛克菲勒一年所得的相比，尚少一千萬元以上。

又世界上最高俸給的一百個大學校長的平均俸給，每年不過六千元。但洛克菲勒所得，比這些大學校長一百人全部俸給的總額，至少還多五十倍。試問洛克菲勒的腦髓，果有這些大學校長一百人的腦髓總計的價值嗎？

所以腦力是不能以貧富來測量的。因此我們就不能說窮人的兒子沒有聰明，就不能說窮人的兒子不應當和富人的兒子一樣的受教育。

故在現代如有人說興教育是爲人類普及文化，辦學校是爲社會造就人材，而獨不注意絕大多數無衣無食的貧民，不注意大多數失教失養的窮兒，那準是粉飾門面的欺人語罷了。

(註一)因所育多寡而使教育機會大受制限的例子，本來就在眼前，用不着多所說明；但供參考計，不妨引用一個實例。——以下引自公樸君的現代新教育之特徵——病憊

這個實例是日本東京帝大助教授青木誠四郎在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與另一位岡田眞一就日本山形縣一地方調查受中等教育者與富之程度之關係所提供的。

富之階級	全戶數	男		女		計		大級階別	就學者	%	與省之全就學%
		數	%	數	%	數	%				
500圓以下	3539	72	2,04	220	6,62	94	2,735	30	94	2,737,1	
500—1000	381	49	12,83	32	5,75	71	18,6	381	71	18,623,8	
1000—1500	129	30	23,3	12	9,3	42	32,6				
1500—2000	50	12	24,0	8	16,0	20	40,0	222	91	41,137,4	
2000—3000	43	17	39,6	12	27,9	29	67,5				
3000—4000	13	3	23,0	8	23,0	9	46,1	3)	24	89,0	8,3
4000—6000	17	8	47,1	10	58,9	18	1060				
6000—8000	12	8	66,7	2	16,7	10	83,4	16	13	81,3	5,4
8000—12000	4	1	25,0	2	50,0	3	75,0				
12000—16000	3	1	33,3	2	66,7	3	100				
16000—20000	1	2	200,0			2	2000	7	6	85,7	2,3
20000—40000	2					0					
40000以上	1	1	100,0			1	1000				
計	4186	204		95		299		4186	299	7,12	10

試看這一個表，便可知受中等教育的機會是如何的爲富力所影響。詳言之，富之程度最高即每年收入在三〇〇〇圓以上的子弟，每百戶可有八〇人以上受中等教育；然富之程

重愈降，這個受中等教育的機會便愈少，即每百戶只有四一・一人，更下則爲一八・六人。到了最低的富之階級，不管它的絕對數雖是最多，但能受中等教育者不過每百戶中有二・七人而已。我們當然知道在低的富之階級中，子弟的人數決不致特別的少，故可推說低的富力實是大大地限制子弟受中等教育的機會的。而且因富之程度之低下，而受中等教育者的人數也順次低下，更可見這一推定之確實。

(註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報載有某銀行總理于志華，及會計師潘序倫發起慕恩源助學基金宣言，特錄全文如下，使讀者知道，這兩位窮人子弟——此刻已是‘富翁’了——是怎樣地對資本家‘感激涕零’！

“志華生寒素之家，幼年孤露，賴母氏劬勞鞠養，僅獲就學，其間辛苦艱難，迄今思之，猶爲泣下。序倫亦早孤，家不遠中人，勉完普通學業。吾二人者各幾幾苦學矣，顧年少氣盛，立志向上，間復執役，情願金以充學費，而前程遙遠，心無足適，無所爲計。天鑒孤寒，乃有素未深識之廈門李昭北先生，以志華爲可與有爲也，慨然郵匯三千元，供國外留學費，過此意外之賁餉，屏常成行，感奮乃至無地。同時復有南屏兄弟烟草公司總理簡照南先生，以寒素家而宅心慈善，念青年業學之可憐，手斥巨金，聯袂考慮，序倫因承錄取，

送美留學，時逾三年，費逾萬金。微簡先生，以序倫之力，豈能辦此。今者，志莘序倫雖所學媿無心得，幸荷社會不棄，亦既執掌一分業務，勉行所志。清夜追思，不禁相與泫然曰，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師長，而資我以有成者。其惟二先生乎？客說魏公子無忌：‘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若人有德於公子，不可忘也。’今二先生施而能忘矣，曾受者而遂忘之乎？

不忘奈何？如所受以璧返二先生，二先生不納也，抑亦非二先生意也。二先生何意乎？亦惟擊壤有志無力之青年，而欲助以有成耳。盡承二先生之意，廣二先生之德。志莘序倫力雖未逮，其勉爲之。相顧議定。志莘出三千元，序倫出一萬元，合組助學基金，名曰，‘思源。’既飲我矣，而勿思之乎？既飲且思矣，而勿遽以飲人乎？志莘所出，命曰昭北基金。序倫所出，命曰昭南基金。各以思其人也。亦使飲此者還復思之也，一切組織，具如簡程。他日志莘序倫而力有加也，固不敢以此淺衷自量也。

嗟乎，人知欲善，誰不如我，其始也簡，其畢也鉅，人有同於志莘序倫之所遇而有所思也，他日受此金者，勉焉成其所學，而有所思也。風雨雞鳴，盍興乎來。志莘序倫其虛席以待。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發起人王志莘潘序倫。”

你也想得他們的資助以完成學業嗎？且請看他們所定的資格：

“第五條，凡受本基金資助之青年以備具下列資格為限：甲，家境貧寒；乙，品學優秀，旨趣正大；丙，身體健康。”

那麼，第一，你若吃不到滋養品以致身體虛弱；或者因為刻苦求學以致身體受害的，就休想受資助；第二，你若在他們看來——因為並無客觀的標準——是品學不優良，旨趣不正大的；換言之，你若是個革命青年，就休想受資助；最後，更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些生下來沒機會受‘學’的，就根本沒有受資助的可能。這正同科學的智力測驗一樣好，對於窮兒，根本是‘絕交’的。

‘嗚呼！’窮兒！你既受不到風家的教養，又受不到資本家的資助，■你這樣的‘雙寒’——‘天寒孤寒’，(?)可是不變‘雙寒’——究竟往那兒去好呢？

第三個特徵是專爲了支配階級的利益。

階級的教育，對於被支配階級，既不是適應他們的利益，也不是適應全社會的要求，主要乃是施行對支配階級有方便的教育，以俘虜被壓迫者的心意，且使之成爲對支配階級服役的工具。

古代及中世的教育之爲貴族的教育，事實顯著，可無待於說明。

近代雖有所謂機會均等，教育普及的口號，但近代教育的實質還是由極不合理的標準所支配，其結局仍然離不掉以所有的特權爲根基而處處表現出教養的特權。

試就現代的教育來解剖一下。

國民教育終算是通行一般國民的教育，在分量上言，尚可說得不以支配階級爲本位；但若進而檢核所與於無產大眾的這樣貧弱而最小限度的性質，我們仍可看出支配階級的色調，而且是更濃厚的支配階級的色調。凡在支配階級的支配下的國民教育，無論何處，總是在表現着兩種職務。這兩種職務，一是當作政治的支配手段的，一是當作維持并促進經濟的榨取手段的。在小學校所施的教育，自然不能沒有這種職務的特徵。

先說當作政治的支配手段之職務。那就是在學校中教訓兒童：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及國家秩序是一切自然的不變的社會秩序中之最善最美者；代表這種社會秩序的支配階級是最有慈愛，正

義，聰明，威力的天生的指導者；從而國民大眾的義務是在視現存秩序爲神聖的而尊重之擁護之，在視支配階級爲良師爲慈父而敬崇之推戴之；同時更教以凡反於此的一切思想學說，都是異端邪說，應該與以排擊。

再說當作維持并促進經濟的榨取手段之職務，那是這樣的：給兒童受過四年或六年甚至更多年的小學教育以後，就增高了無產大眾的勞動能力，可以馴致爲順從的工銀奴隸。在修身科或公民科上，盡力地灌輸勤勉努力和省儉質樸的道德——同時在社會設施方面就有儲蓄銀行和郵政貯金的制度，又有在工廠中強制工人儲蓄一部分工資的辦法。支配階級所希望於無產大眾者，是盡量地多做工作，盡量地少耗費生產結果；換言之，就是盡量地要以低工資爲滿足，盡量地要留下更多的剩餘供榨取階級利用。小學教育之所以特別注重這種意味的‘勤勉力行’，就爲這個緣故。還有支配階級所希望於無產大眾者，是做工銀奴隸的要對主人盡忠，要對上司聽命。爲此，學校教育就要努力於涵養‘信實’‘服從’‘守規則’‘尚協同’的習慣

了。——同時基督教更實殘它的社會教育的使命，宣傳福音，說現世受苦，來世可升天堂，切莫罷工！

由此可見小學校的社會任務，是在馴服無產階級的子弟，養成他們爲順從而有能率的產業軍及真正的士兵。

難道你還能說國民教育是爲一般國民的自利謀利益的嗎？只有支配階級的走卒才會有這種信仰。

小學如此，高級的學校怎麼樣呢？

高級各學校的社會任務大體可歸於如下的三點。

(1)是在養成服從支配階級的中間階級。凡有固定的思想及具備一定的專門知識之官吏（在國家及公共機關中服務者），職員（在資本家的經營中服務者）及獨立經營者（自耕農，小商人，上層手工業者及自由職業者）這種種階層，都是在高級學校中受教育的。他們或當作直接的服務者，或當作間接的支持者，都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及國家之存在維持上所絕對不可缺少的要素。

(2)是在培植適於站在支配地位的支配階級

中人。他們爲要鞏固支配階級的地位，一方面應具有關於支配及榨取的基本知識，他方面還須有確信自己所代表的社會爲自然的且是最善美的秩序之必要；於是就有今日這樣高級的學校，特別是大學，主要是爲供給這種必要的知識與確信而存在。其次這些學校，對於支配階級者更與以人間的教養。這種教養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原則上，將只有支配階級才得享受的特權，就是鑑賞并享受現代文化的結果——如音樂，文學，歌舞，繪畫，以至電氣利用，動力利用等等——之特權確保起來；他方面是當作副作用，使支配階級在由於嘗到了一點文化的氣味與教養的光輝之後，反映到無產階級的眼中，就現出他們真是天生的高貴風雅，而自己真是卑微不足道，從而以爲誠心地奉伺他們真是‘天公地道’，十二萬分應該的。

(3)是在促進那維持及發展支配階級的秩序所必需的學術技藝之研究。資本主義爲要維持增大了的生產力，及更謀發展起見，就有更多更確實地支配自然及自然力之必要。於是對於研究自然科學的獎勵，非常用力。這樣獎勵的結果，關於新

理論與新技術的發見與應用，資本主義就得表現一個極大的功績，即把人類幸福之物質的可能性，準備到向所未有的豐富。但這是在自然科學上如此而已，在社會科學上就不如此，當現代的支配階級（即資產階級）自己為革命階級的時代，爲了要擊破封建的思想與傳統，爲了要確立自己的支配權及充實支配的組織，的確一方面獎勵自然科學，他方面同樣地獎勵社會科學。可是一旦這種必要被充實了之後，加以學問的研究到了以他們所建立的資本主義自身為對象的時候，支配階級就不喜歡那種徹底批判支配階級的社會科學之研究，不惟不予獎勵，反而要積極地壓迫了。所以如日本的例，在今日高等各學校中的學術研究，凡是關於社會科學的，原則上，都只以立於支配階級立場的，即直接間接有助於維持并促進支配階級利益的，才許研究，且才得獎勵，至如學生自己發動的新興社會科學研究運動，就要受禁止，研究的人還須受開除逮捕的處分。

這樣的高等教育，難道還有人相信是純粹研究高深學理，無關於階級不階級的嗎？只有是支配

階級的信徒，才會抱這樣的迷信。

第四個特徵是兩重教育權的對立。

這所謂兩重教育權，就是階級社會中相並存甚至相對抗的兩種的教育。即教育制度之組成與教育行動之存在是相對立而不相統一的。

兩種教育的形式在原始人中固也有存在的。

如在南洋的野蠻部落中，有爲訓育青年所設之大家屋——西洋之研究者，稱之爲 Club house——所定之割禮及 initiation (加入式)：這種體制也可說是稍稍有組織的教育制度；同時在這社會中，雖未隨時隨地組成此種制度，而於日常生活之間自有種種社會的生活行動在非正式地互相傳習：這就叫做教育之實質的存在。而且這種實質的教育，實爲原始人社會主要的教育形態。——參看第五節“原始共產社會的教育。”不過在這兒我們要有深切的注意：原始人的兩種教育，不是兩種教育權，不是兩種相對抗的教育權；無論是教育的制度或是教育的行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即爲全社會的生活需要，而不爲某種特殊階級的利益。他們

的兩種教育實和階級社會的兩種教育，有本質上的不同，萬不可混視。

那麼在階級社會中的兩種教育究是怎樣？在階級社會，即所謂文明社會中，就有一種教育制度專供支配階級的利用，被支配階級是被擯在這種教育制度之外的，所靠者只有不成爲制度的一種實質的行動。

中世紀之前，當作實質行動之教育還比當作組織制度之教育更占重要的部分；國家階級及教會階級以外的最大多數人之教育，完全是由實質的行動的；徒弟制度或者是有組織的惟一制度，但這種組織實也未嘗改變教育行動之實質，不過有如學校的規則，却並不影響到學科之內容。因之在徒弟制度上，教育的實質仍屬於行動而未被組織，且即由此得以產生精巧的中世工藝品。又如在此以前的希臘社會，是由自由市民和數倍於市民的奴隸所成；而一切社會的生活資料之生產以至一切工藝技術，凡屬生產意味之肉體的乃至精神的勞動，莫不由奴隸坦負。故實際上除了普通教育史所記載的完成希臘國家階級之軍事的文事的支配

生活或市民的閑暇生活之教育制度以外，尚有‘無意識的’行於奴隸之間以完成‘社會’所必要的生產上之肉體的乃至精神的勞動生活之教育行動。那具體地發揮希臘人審美感之建築彫刻等等，全為奴隸之‘教育’所產生者。這種教育自以實質的效果為目的，為當時‘社會’生活所要求。——祇不過那種效果已不是純粹的‘生物學’的要求，那個社會也不為奴隸們所有而已。

通常寫教育史的，只留意到支配階級的教育制度，而全不顧慮到這種被支配階級的教育行動。所以西洋教育史上當作希臘教育所記載之事實，僅止於市民國家的階級之教育。這個原因，一方面固然也許由於文獻的資料之缺少，但他方面實由於編者站在支配者之立場，誤認——或者故意地認——有組織的教育制度即特定的為國家機關所統制的教育是教育，而把完成那支持社會生活——非支配生活——的人間行動之教育忘記或被掩飾之故。原來自有歷史——社會分成階級的所謂文明時代的歷史——以來，支配者視自己的階級即為社會全體；雖說社會生活，實乃自己階級的

生活；雖說社會教育或文化，實乃自己階級的教育或文化，文明愈進步，這種外套蓋得愈厚，甚至說壓迫還是爲了被壓迫者之幸福。而‘御用學者’常常是認支配者的觀念，又哪得不把支配者的教育卽當作全人類社會的教育呢？

以上是說在階級社會中，有支配階級的教育制度和被支配階級的教育行動——原因是在他們被擯於教育制度之外——之同時並存，但兩者尚不一定是相排斥相鬥爭的。如在歐洲的中世，對於支配階級的教育，而有工人及農人的教育；他們間的教育狀態固然各別，却無什麼交涉；換句話說，二種教育相並立，却不相反抗。

但自近代的階級制度——資本家與無產者——發達以來，卽自近代的革命——資產階級的革命——以來，階級不單是自然的對立關係，而爲意識的對立關係；這一關係的改變，同時就發生了教化上的意識的對立關係。猛烈的近代的教化，是意識地對付舊國家的教化以起的。卽市民階級的教化，和軍國國家的教化立於對抗的地位，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

如此，當作近代的現象，教化（包括教育）是一定對抗的；近代國家的教化是雖然要對軍國國家的教化取攻擊的態度。換言之，近代的特徵是：階級的教化決不是‘並行不悖’，而是‘不容並存。’

這種近代國家初期的歷史，跟着市民國家的發達，由現代的階級對立的歷史繼續着。今日所謂教育之不得為一般的社會的，而為在市民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對立上，各具有一方的性質者，自是當然之事。而且這種互相對立的教育，是必有互相排擊之性質，而以打倒對方為目的的。

正因為有這種性質，所以站在十八九世紀的近代國家者之立場，那麼一定會主張在‘教化競爭’上也以自由競爭為最良的方法；然若站在資本主義進於獨占過程，自由主義國家進於帝國主義國家這樣的國家者之立場，那麼在教化上也必然地要主張‘獨占’與‘帝國主義’了。

原來這樣進化了今日的國家，早已喪失了它的革命的實踐性，也早已喪失了它的科學的進步性。現在在歷史過程上負擔革命的任務，在文化上繼承十八世紀以來科學的發達之系統者，只有

無產階級。自十九世紀開始至二十世紀之初已經走上窮途的社會科學，全靠從無產階級的視角把它再生產起來，以說明資本主義組織的崩壞過程。這種無產階級的文化，無論在方法上，在內容上，都有着科學的成長。這便使得資產階級看了發抖，寒心；於是只好加以排斥，壓迫。然而我們要知道從今日無產階級的教化上排除科學之爲不可能，也正和百年前資產階級建設自己的新組織時，寺院方面要干涉他們的教化，排除他們的科學之爲不可能，完全無異。

在這個帝國主義的時代，正是支配階級力謀教育獨占的時代；可是和這種獨占的教育相對立的，不僅有被支配階級之實質的行動的教育，且漸而有組織的制度化的教育。這種的兩重教育權，現在正存在着，也正相鬥爭着。——參照底下第十三節。

這個時候，如有人還說現代國家的普及教育已是全人類（或全民）的教育，是統一的教育，更主張除國家的教育或經過國家許可的教育以外，不許有其他的教育行動或教育組織，那麼又準是布爾喬亞教育學者的宣傳作用了。

最後，第五個特徵是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如前所述，原始共產時代，大家共同勞動，共同消費，也共同受教。在這時代，當然是男女同有受教育的機會的。雖然在野蠻時代，女權特別優越；未開化時代，女子地位仍然極高；但男子方面並不因此有在教育上的差別待遇；因為民族社會實是自由平等友愛之社會，並無階級分裂的。

可是等到牧畜與農業逐漸發達，男子的努力逐漸高過了女子的，終於連妻所有的家屋也併為己有，更為獲得可遺傳財產的‘自己的兒子’起見，開始要求妻之絕對的貞操。於是父系制度代母系制度而起。在父權之下的女子地位，與家畜農地家屋同為男子財產之一部分。這個就是私有財產制之文明時代，在男子奴隸存在以前，女子先已陷入奴隸狀態了。

人類歷史自母權制度消滅，即氏族制度崩壞，進入於文明期，在教育歷史上也發生了大變革。那就是女子不惟從此不得與男子‘同學’，須受差別的教育；簡直要趨於‘絕學’，而與教育離緣。

“在家從父，出家從夫，夫死從子”，是中國女子的社會地位。“女子無才便是德”是中國女子的教育方針。

基督教更把婦女看成僕婢和家畜一樣，又把婦女看成污穢不潔之物。

上帝造了亞當這個男子，而女子夏娃是由亞當的一根肋骨造成的。歷代的基督徒除了蔑視婦女以外，在紀元六世紀的基督教會議上，竟還提出‘女子是不是人’這樣的一個問題！

宗教改革是新興資產階級對教會國家及社會中封建制度的反抗；但資產階級雖得到了結婚的自由，而婦女之隸屬於男子的特權之下，並無什麼變異。

也許在表面上看，西洋女子是比男子受到更多的尊敬。“Ladies”總是放在“gentlemen”之前；電車中，女子有受男子讓位的特權。但是我們要問實際。就教育上來舉例，試問有多少西洋女子能受到大學教育？（美國在一九二四年度的大學及專門學校女生人數，也不過占學生總數的約三分之一。）准許男女同學的男子大學裏，女生占百分之幾？女

子之不能和男子同受高等教育，不是顯然的事嗎？

日本的例更來得明白。日本有七個國立大學（東京，京都，九州，東北，北海道，京城，台北），在法令上都沒規定可收女生；而另外也不會設立國立女子大學。收女子的中學校叫做高等女學校，名義上似較堂皇，實質上乃是輕視女子，故意說得好聽，以助長女子的虛榮心。

說到中國自更不如。據中國教育統計概覽所載，從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四月，除天主教辦的學校外，全國共有學生六百八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八人。這裏邊有多少女學生？僅有四十一萬五千三百九十八人（教會學生在外）！女子大學生總共還不到五百人！

國民政府的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中等學校男女分設的議案，當時的浙江代表劉大白聲明這要摧殘浙江女學生求學的機會，不能遵照。（見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乙編六十四頁）實在中國的女子教育機會已經小得不成樣了，再摧殘下去，不是要完全閉塞了嗎？

但爲什麼女子不能有和男子同等的教育機會

呢？‘重男輕女’固可說是直接的原因。但‘重男輕女’這種‘社會道德’之所以產生，不是偶然的。凡是社會的隸屬與壓制皆由被壓制者對壓制者之經濟的隸屬而起。父權制度之確立，即為所有階級對於無所有階級的支配權之掌握；而母權制度之顛覆，實為人類史上最初的社會革命。自後——在私有財產存在之限度內——世界一切的歷史是屬於同型的種種樣樣之階級支配的歷史。所以女子在經濟上未能獨立以前，是無法得以脫離男子的支配的。不獨女子，即一般勞苦羣衆在少數人握有經濟支配權以前，也是不能脫離隸屬的地位的。婦女問題與勞動問題相關之處在此。要解決女子教育問題，便不可不以解決婦女經濟問題為前提。實在說一句，婦女參政和女子教育，還是次要問題。

以上我把教育的本質及其變質已說了不少。現在綜結幾句。

教育的本質，是為‘保存種族’（包括保存個體在內）的生物學的目的，即為幫助人營社會生活之一手段；這種教育是全社會的，是統一的。但自私

有財產制度發生，社會分成階級：支配者與被支配者，支配者處處以維持并鞏固自己的利益爲出發點，所創的法制，所定的道德，所主張的哲學等等，莫不以擁護支配權爲標的；即其所設施的教育，也以專供支配者的方便爲主；所以這種教育顯然是階級的。

在階級社會中的階級教育便發現上述的五種變態：第一是教育與勞動分家；第二是教育權跟着所有權走；第三是專爲支配階級的利益；第四是兩重教育權的存在（及對抗）；第五是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這些現象，在原始共產社會，即無階級的社會中，是不能有的。所以這都是教育的變質。這種變質了的教育，又因階級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變革而有不同；其詳細情形，當於第二章“教育的進化”中述之。

明明是這樣變質的教育，明明是這樣階級性的教育，可是，仍有許多教育學者硬說教育是公平的，是獨立的，這只好說是他們的‘自欺欺人’了。

關於教育上的許多曲解和迷信，我們不可不

加以糾正和解釋。現在就請讀者來看下一節“對於教育的幾種曲解。”

問 題

- 一。教育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 二。教育的意義是怎樣地變遷的？
- 三。讀了這一節，你該已明白教育的實用性是怎樣地被變質了。現在請你自行說明一下。
- 四。什麼叫做“階級的實用？”你能舉例嗎？
- 五。教育的階級性，據你所知道，是表現在何種地方？請詳細說明。
- 六。現代的教育講什麼生活和適應，究應適應了些何種生活，又是怎麼樣適應的？
- 七。教育和勞動的分家是怎樣起源的？
- 八。你覺得以受富人的資助為可榮耀可慶幸嗎？你有沒有想受富人資助的意思？如真的，為什麼？沒有的，為什麼？
- 九。在你住着的區域裏，你知道有多少兒童、青年及成人被剝奪了教育權？他們是為

了什麼被奪的？

十。你以為現在你所受的教育畢竟爲了誰？
爲什麼？

十一。如果你是個小學或中學的教師，你確
相信你是爲了一般貧苦的勞動大眾的
子女在工作嗎？你是怎樣爲他們工作的？

十二。如果你是個女學生或女教師，你對男
女教育作何種感想？

十三。中國現在也有兩重教育權嗎？如其有
的，是怎樣的兩重教育權？

十四。試批評御用學者的分業論。

十五。你想有什麼法子可以恢復教育原來的
機能，就是恢復爲全人類的生活需要的
教育？

第 三 節

對於教育的幾種曲解

教育神聖說。——教育清高說。——教育中正說。——
教育獨立說。——問題。

教育在人類生活進程上，自是一個重要的作用。但必要給教育說些不相干的漂亮話，添上些冠冕堂皇的假面具；那不特牽鑿附會，且是假飾欺騙。

像這樣的曲解，舉最流行即最被人迷信的來說，共有四端：第一是教育神聖說，第二是教育清高說，第三是教育中正說，第四是教育獨立說。

這四端都是掩蔽教育的本來面目，而有欺蒙麻醉的作用的；所以我們必須加以揭穿，並說明其由來。

第一，關教育神聖說。

他們怎樣把教育看作神聖呢？他們說教育是覺世牖民的事業，教育是精神修養的事業，教育是清苦廉潔的事業，教育是高貴超俗的事業。其他或更有把教育抬高到神聖地位的理由。

但我們知道：‘覺世牖民’並不是教育的專貴，‘精神修養’也不是教育的能事。政治方針，文藝政策等等，都是有關於‘覺世牖民’的；經濟制度，社會秩序等等，都是有補於‘精神修養’的。未聽說政治神聖，文藝神聖，或經濟神聖，社會神聖，而獨說教育神聖，究竟有何根據，是何理由？沒有確實的根據，正當的理由，而偏認教育為神聖，非武斷迷信而何？

何況說教育是覺世牖民的事業，這話雖說‘自古有之’，而且當現在高唱‘普及教育’‘民衆教育’的時候，又真是‘像煞有介事’的；然若從實際上一加考察，就知‘大謬不然’。試說明如下：

自從漢武尊崇儒術，歷受‘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的崇拜，即在今日猶得享受‘紀念日’待遇的孔子，固然說過“有教無類”的名論，但他不是又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嗎？這還‘覺’什麼‘世’；‘屬’什麼‘民’呢？承孔子道統而興的孟子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試問非‘英才’的‘民’從何處可得教育的機會？我的這個疑問，決不含有誹謗‘先賢’的意思；反之，我却可替‘先賢’說明他們的‘理論的背景’。

原來在封建時代，支配階級對庶民是不施教育的，而且當時的所謂教育，也只限於道德教育。其理由如下：

第一，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是閉鎖的自然的農業經濟，是生產技術很幼稚的農業經濟。在這種農業經濟上，祇消跟着年長的人出入田畝，凡種植，施肥，除草，收穫等等生產上必需的事情，通統可由經驗以學會。當時的經濟又是自給自足，以小地方為單位的。故在以農業生產為社會主要產業的封建時代，庶民其實無研究學問的必要。即使‘目不識丁’，還是能充分地從事生產事業的。第二，

封建制度是講究禮儀的制度——“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無禮，即算“犯上作亂”在封建制度中又以自由競爭爲絕對的禁物；“揖讓而爭”，更是君子的一種品格。故封建時代的教育，差不多就以‘道德’教育占它的全內容；使人人‘安分守己’，是這種教育的主目的。由此可見封建時代的教育，只有‘愚民’沒有‘牖民’；只有‘囿世’沒有‘覺世’。

然則資本主義時代何如？在這個時代，自然大改觀了：對全國民要施教育，且是義務的，強迫的；教育的内容更擴大範圍，要傳達日常生活上的智識技能；除此以外，尚有什麼‘國際和平教育’，‘世界教育會議’等等包括全世界‘全人類’的教育行動。這真好像‘覺世牖民’有了實際了。但請不要性急，容我來說明何以資本主義社會中獨有與封建社會大不相同的教育理由。

這個理由也極簡單，就因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基礎是大工場生產與國際通商。這時代小地方的自給自足已是不可能了，它的理想乃在龐大的商品生產與獲得國際市場。我們就從這兩方面來看教育的關係。在工場生產上，不學無術的人與多

少會讀寫的人，他們的能率是迥乎不同的。單說要記住一種機器的名字，在不會讀寫的人，就不知是怎樣繁難的一件苦事。故當今日，讀寫的能力，乃是工作本身的要求。又若在自足自給的時代，搬運貨物，祇要用手或馬車等等就行；但在資本主義時代，運貨需用汽車，火車，輪船以外，還更需用文字。你想做個汽車夫或是茶房，不識字就休妄想。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自身，是要求文字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施義務的強迫的教育理由，決非為了國民自身的幸福，而是為準備國民的勞動力可以適用於它的經濟組織，而且表示它的最低限度為義務教育年限。有些人道主義者不究底細，竟說‘普及教育’為人類的福音，即使不是故作宣傳，也畢竟是愚昧可嗤了。假使‘教育普及’果如他們所說是人道主義的設施，那麼為什麼窮人的子女不能跟富人的子女一樣升學？為什麼要有雙軌的學制，以限制求學的機會？又為什麼國家要對教育事業多方的監察審定呢？‘一言以蔽之’，國民義務教育的本身，其結局只替資本主義制度的主人公（資本家階級）服務而已。

在這個社會中，一切好聽好看的新設施，新計劃，也莫不爲了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譬如拿勞動教育來說：“工場煤礦等經營者之設置教育機關，（或修養機關）其始多爲收攬勞動者的心之一種政策的行動。……三池礦業所的鑛工主任深川正夫氏，爲非常熱心於鑛工教育之一人，用種種的教育設施努力指導。距今三四年前三池煤鑛曾起爭議，但其時在十幾組鑛工團體中，僅有一組未參加爭議，那就是氏所指導的一組。這當是由於平日氏的指導方法來得好，所以不輕舉妄動了。氏因被視爲有這種本領，遂任爲鑛工全體的指導者。”這是日本文部省社會教育課長小尾範治寫的文章（登在昭和四年二月廿三日的教育週報），不是我故意杜撰出來的。資本家爲什麼要興辦勞動教育，他是這樣老老實實的告訴了我們。曾有人論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學校教育，說有如下的三大任務：第一，對於未來時代的勞動者，灌輸向資本主義制度之歸依與尊敬；第二，從支配階級的青少年中來養成有‘教養’的管理勞動民衆之人；第三，由於科學之技術的應用，使幫助資本主義生產，以增加資本家的

利潤——參閱第七節“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從我以上所說明的理由及引用的實例來看，我們對於‘學校教育三大任務論’，就決不能說是‘無稽之談’了。然則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又何嘗有所謂‘覺世牖民’的教育？

至於說‘精神修養’，也非事實。像上段所講，教育只是一種造成供支配階級利用的工具之手段，絕沒有什麼‘精神修養’可言。不錯，有是有的，如‘正心誠意’，如‘忠孝節義’，乃至為‘愛護祖國’，‘遵守法律’等等，着實不少。但那不是很明顯的，以麻醉和誘騙為旨而成為一種階級的作用麼？即使讓了步，承認‘精神修養’是對‘物質’‘肉體’而言，為哲理的心靈的意味。這也不免為太不‘科學’。試看現在的教育，有哪一點離得開物質？沒有校舍，沒有桌椅，沒有圖書，沒有實驗室，沒有運動場……，會有教育嗎？高等教育最稱發達的‘金元共和國’，不是以金錢的多寡定教育的價值麼？我們自然不欣羨‘黃金萬能’，但我們相信教育是對付人生的，不是掉弄玄虛的，是關係實際問題的，不是空講‘道義’的；人間只是人間，不是‘天國’，說教育因‘精神修

養’而值得‘神聖’，豈不是自欺欺人？是的，精神修養，也可指思想的解放，意識的改造而言。如果真是這樣，當然表示贊成。但在過去歷史上，我們只見束縛思想，或是注入一定的思想，蒙蔽被壓迫階級的意識，或者強制灌輸壓迫者的意識，是有的。何以見得？據古來思想的歷史所表示，精神的生產是跟物質的生產同時變質；支配一時代的思想，不拘何時，終是當時代支配階級的思想。真要希望文化的繁榮，人類精神的自由，那麼必須有如下述的前提：廢棄一切文化的獨占，而使文化成為萬人的財產，使階級意識讓位於科學的唯物的世界觀；又必須造成世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縮短物質生產上所需的時間而有餘裕從事於思索及創作。人間不僅要得法律上的自由，更須能得物質上的完全自由，而後才有精神上的完全自由，可以從宗教思想，偶像崇拜中解放出自己來，然而這豈是過去的封建社會乃至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所能實現的？

對於教育是清廉的事業，是高超的事業的意見，我將在下面另加批評。但此地不妨先述我的結

論：教育事業決不是清廉的，也不是高超的，說它爲‘神聖’，只是迷信罷了。反之，我們親眼見過‘神聖’的教育界裏，却出過做強盜的模範訓導，騙取演講費的‘思想善導’者，——都是一九二九年日本發生的事實——以及種種把持地盤，開‘子曰店’賺錢的人，這些難道不是已把‘神聖’的假面具撕碎了麼？

但認教育爲神聖，在別一方面，也非全無根據，絕無理由的。這原是空想的產物，可是一切空想，一切虛構，也自有它們的一定的經驗基礎。

這個一定的經驗基礎是什麼呢？

原來‘神聖’這個觀念，最易聯想到宗教，彷彿宗教是‘神聖’的根據地似的；我就從宗教說起，反正這個說明可以移用。

‘神聖’的含義是莊嚴，是不可思議，甚至是不可侵犯。宗教的所以成爲神聖，祕奧在此。我們試來窺破這個祕奧。

爲明瞭宗教的本質起見，我可以舉一個實例。這個實例是把宗教與科學來對比的。譬如就雨的這種自然現象考察一下。雨在人間的物質生活上

是非常重要的現象。在營農業的民族，它的住民的運命是大受降雨之度數，雨之分量，及其地理的分布的影響的。然而雨這種東西，是人力所不及之現象：不能隨便使雨下降，也不能隨便使雨停止。現在看宗教怎樣對付呢？原始的鄉民怎樣對付呢？他們這樣想像：雨這種現象，是一種空想的具有人格的雨神所產生的，人間用犧牲，祈禱或威嚇等的儀式，可以左右神之意志，因以達到人的願望。但科學對付雨的態度完全不同。科學中有氣象學的一種特殊學問，它觀測雨之現象，求出其原因結果。故宗教與科學之本質大不相同：宗教立脚於信仰，科學立脚於知識；宗教由空想來裝飾它的經驗基礎，科學則由實驗由思索來整理它的經驗基礎。

宗教的主要的起源有二：一是由於人間對自然的關係，一是由於社會的諸種關係。最初的人類因為受自然的支配非常強大，故對一切的自然現象，有戴宗教的空想之眼鏡以觀取之傾向；這是第一個宗教的見解之起源。其次在原始時代，整個社會對各個入發生極大的影響。道德，法律，習慣，風俗，一般社會之規律等等，都有對各個人強制命令

之作用。本來原始社會自身也是一種的自然體，故社會之規律習慣等所及於個人之影響，正同自然力一樣偉大。個人不能識透也不能理解此等一切的意義與目的，便以為必由精靈或惡魔發布是項命令，制定是項規律，以強制人們遵守。故從社會關係之此項性質中，就自然發生了附以理由并加以認可的宗教之見解。如祖先崇拜，即由血族制度以生。換言之，社會秩序賴宗教以確保。此外又有一個根源足以使宗教的見解強大的，是當社會內部發生階級之對立時所起的。因在那個時候，宗教的觀念成為支配階級將被壓迫階級置於隸屬地位之手段的原故。更因階級對立，社會分業之結果，有專司宗教事務的一個特殊階級即僧侶發生，宗教的觀念對於僧侶，也便變為築成并維持他們本身占有社會優越地位——即脫離直接的生產勞動而食於他人勞動之剩餘生產物——之一手段。

由此觀之，宗教之具有‘神聖’的意味，是因人們對於自然及社會——都及影響於本身生活的——的關係未能明瞭，思藉宗教以表畏敬及期待；又因支配階級與僧侶階級之各自利用宗教以謀本

身利益，於是宗教便像真具大力了。

視教育爲神聖的理由，便也如此。自宗教之舉行儀式爲可以感動神明，奇妙無比一樣，人們視教育可以啓發知能，‘開通民智’，也以爲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存在。再，支配階級的利用教育以愚民，與‘讀書人’之重視教育以自高聲價，也復與宗教之情形相同。何況最初的教師本由僧侶担任，最初的教育有許多地方與宗教發生密切關係——如教材及應用等——故教育之被視爲‘神聖’也正有其不確實的根據。不正當的理由，——從科學的見地來看。

大家知道宗教見解之爲信仰與空想的產物，而不知教育神聖見解之也爲信仰與空想的產物。對於宗教之迷信，有人知道不合理，要打破；而對於教育神聖之迷信，似尚未有人揭破。反還諄諄樂道：這豈不是一個重大謬誤？

支配階級不是‘全知全能’他們非有御用學者畫策打算盤，是不容易維持統制勢力的。所以自古以來的支配階級，不能不利用利祿聲名以籠絡聰穎之士，叫他們替自己効勞獻功，以防止臣民之“犯上作亂”。同時這批御用學者爲感恩圖報起見，

也就假造種種說法，如“作之君，作之師；”“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一方替支配者造出權力之學理的根據，一方也為自身築成‘四民之首’之事實的基礎。故教育之被視為‘神聖’，實有這種階級支配之妙用在內。

現在我們可以說：認教育為神聖者，頌揚教育之神聖者，不特表明他之無知與迷信，也是證明他的‘學者良心’之受階級支配的利用與麻醉。

不打破‘教育神聖’這一個迷信，教育將終於同宗教一樣，永為支配階級‘愚民’的工具，永不能成為人生需要的教育。

惟要消滅宗教的觀念及其根源，既非如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哲學家用合理主義——即採用理智的立場，以與宗教及教會相鬥爭；這個立場是非歷史的，因為他們祇認宗教是不合理性的，是一種迷妄；而這種迷妄是可由啓蒙以掃除。——所得成功；也非如數年前的僅靠宣傳——如反基督教——及最近的祇憑蠻力——如搗毀廟神——所能奏效。這種啓蒙事業在準備革命的階段上，固然有它們的功用；但真想剷除宗教必須在產生宗教觀

念的社會的根源與社會的地盤完全推翻，即現社會組織被根本變更時，才做得到。同樣，要消滅教育神聖的觀念，也必在產生這種觀念的社會根據被顛覆時，才做得到。

第二，關教育清高說。

清高的含義，一方面是說清苦，一方面是說高貴。

爲什麼說教育事業是清苦呢？他們說，第一是因它不像經商的孜孜爲利，或做官的刮地皮行賄賂，是很廉潔的。第二是因它要坐冷板凳，做‘教書匠’又辛苦得很。

說高貴呢，當然是爲了它是‘百年樹人’的大業，是‘爲國育材’的要務，又是惟一的‘上品’，奉至聖先師孔子爲法，雖‘九五之尊’也不敢輕視的。更有一點是它的超然的立場，不涉政治，不爲金錢，真是‘孤高絕世’，真是‘名貴可風’。

這是一般人相信教育事業爲清高的幾項理由，現在讓我們把這些理由檢討一下。

教育事業之‘苦’，確是事實，但‘清’則未必。許多做教員的，硬撐了股骨，才保住一只養家活命的

飯碗，這種被動的廉潔，我們實在未忍加以稱許；而如做教育行政官吏的，做校長的，或做高級學校教師的，他們的把持地盤，排斥異己，以及兼差兼課的情形，又何嘗與一般被認為齷齪腐敗的政界及卑鄙狡猾的商界有所差異？老實說，它的‘清’未必勝于‘清道夫’，它的‘苦’直遠不及‘苦力’。只因為社會是這樣的限制了一部分人；在一時之間，他們別無可以營謀，可以騰達的捷徑，於是以學校為傳舍，執教鞭以度日，也被逼得似乎心甘情願，甚有願奉為終身事業的了。其實如果到了‘生財有道’的時候，那麼交易所可去，軍隊可去，衙門更可以去，何嘗還保得住所謂廉潔？這樣，在可以得意的時候，便可掉頭不顧，而在不得意時，却可藉為托身之所，一方面過着不得不清苦的生活，一方面意外地獲得‘廉潔’的美名。為一般人所承認的最清苦的小學教師生活，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

至於說是高貴，據我想，無非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的一種看法。如上段所說，教育之所以儼然高貴起來，無非由於支配階級的利用手段與御用學者之自高聲價。我們可看不出教育與其他事

業——如軍事，交通，衛生等等——之間，有什麼高低貴賤之不同；若從行政各部之位次上講，教育還落在外交，內務，軍政之下。試問教育事業究有什麼特權敢自竊取‘高貴’的尊號？

若使教育因以育人為對象，關係重大，故須特別看重；那自然該得‘高貴’起來。無如這種見解，是以教育為萬能，或以奇蹟相期待，畢竟是奢望過當的一種迷信。因為‘育人’的責任，不是教育所能單獨負擔；至少衛生部要分担一部分，而生產分配的規制更屬根本要圖。試看現社會中，窮人的頭腦儘管比富人的聰明萬倍，但如本書上節所說，因他們的錢袋太小，或者竟是兩手空空，終於不得走入“學校重地”。足見教育的育人能力是非常有限制的。在這裏，我們可以說唯有財產確比教育為‘萬能’；更唯有私有財產才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在財產前面才有教育的分兒，它自己是永遠獨立不住，抬頭不得的，怎配得上說‘高貴’？故在金融資本稱雄的現代，教育真不過是卑賤的事業，除吃了飯沒事做的人拿來裝璜門面，或沒飯吃的人啃碎骨頭般藉以苟延殘喘外，誰高興去理睬它？軍費

不夠，可以隨時隨地印公債票，抽特別捐以補足之。有時更老實不客氣地挪用教育費；教育費不夠，甚或被挪用時，憑你做老師的伸着喉嚨叫屈，痛哭流涕地‘請願’，有誰個要人來憐恤你？在這當兒，還空喊着教育神聖，教育高貴，究竟說得過去否？

以前因為歷代帝王尊重孔子，奉為至聖先師；孩童未讀大學論語先得拜孔；春秋二祭，更是國家重典。教育之得號稱高貴與神聖，至少這當是個要因。但至最近，崇聖尊孔的熱度，似乎遠不及從前之高。拿民國十七年事為例：除出湖南的魯滌平將軍，何鍵將軍力爭恢復孔子祀典，並於孔子誕日躬行三跪九叩首的古禮以外，（上海時報的記載）國民政府却祇令“所擬以孔子誕日定為紀念日，事屬可行，無庸規定儀式”；後經教育部“酌定”也不過說“嗣後孔子誕日，全國學校應各停止二小時，講演孔子事蹟以作紀念。”這樣一來，國民政府對於孔子的禮典，似已差不多宣告廢止；‘崇聖’之舉，從此似已成為‘往事’。由崇聖祀孔而來的教育的神聖與教育的高貴觀念不是沒有根據了麼？撕

下了教育的‘高貴’面皮或者也竟不算得丟臉麼？

“子罕言利”，孟子勸梁惠王“何必曰利”；教育之不爲利，似乎由來已久。但到今日，情形顯然大變。不特不諱言利，也且高唱職業教育，力闢生產門路；教者因爲利而出賣口舌，學者也爲利而學習知能。教育的價值竟要以能收入多少來決定。然則以不爲利而博得‘高貴’稱號的教育見解，不將又因大被利用而剝奪以去麼？

至於不涉政治與採取超然立場之高貴性，也只是掩飾欺瞞的話，其理由且待到下段來說明。如今單看事實。你不見在軍閥時代也頗有聲有色的學閥嗎？他們還算是全國教育界的新人物，但他們却最會得阿諛軍閥，勾結財閥！你又不曾注意到主張教育救國論的國家主義派的先生們麼？他們是躲在軍閥旗幟底下謀活動。既認政治運動爲醜陋，那麼像這種樣的教育，到底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它的高貴性來？

以上把認教育爲清高的理由已經檢討過了。以下且再研究這種見解能有何種影響，并再研究這種見解之歷史的由來。

視教育事業爲清高之影響，至少有如下幾項可說。

第一是隔絕了政治。在他們想，政界是功名之路，是藏垢納污的所在；清高的教育界中人，是不當接近政治的。於是政治的清明與否，不成爲教育上的問題。政治愈腐敗，教育愈與之隔絕。雖是孔子也說過“學而優則仕”，未嘗阻止教育者之從政；然另一方面，他又說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更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因之教育者不特自身不欲與聞政事，且叫學者也莫顧問政事。所謂“明哲保身”也無非是對政治的“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當初，支配階級原不希望人民去顧問政事；自有了這種‘教育哲學’遂彷彿在理論上，給教育以遠離政治的根據；到後來因政界之實在腐敗，於是使自高聲價的教育者愈想隔絕政治。教育上既不顧問政治，一般從政的人，愈可肆無忌憚，‘誤國殃民’了。

第二是隔絕了勞動。既以不事生產爲高尚，那麼教育事業自然變成空談坐食的事業。雖然古代也重‘洒掃’，但那不過是一種禮節，不是生產的勞

動。何況高居‘四民之首’的士，自以爲天生是‘治人者’而又‘食於人者’，倘要用勞力以獲食，不特體面有關，且根本何必入學。勞力是微賤，用心才算高貴；生利是下流，讀書才算上乘；於是‘手無縛雞之力’與肺癆病型女子的‘弱不禁風’同被讚美，社會上平添了一大批只分產而不生產的人，游民之愈高等者乃愈屬於高等階級之所謂‘士’：這便是教育高貴性所生的流弊。

第三是給不得志於政治舞台的政客以一個暫時安身的機會。因爲在表面上，教育是不牽涉政治的，於是政客搖身一變而爲學客，借辦理教育之名，廣爲結納，徧植黨與，使外人看來，他是在熱心學務，不惜加以頌讚。這樣的人，在我們不是屢見不鮮麼？

然所以使教育帶有高貴的屬性者，也是有它的歷史性的。自人類社會分成階級，支配階級占有國家這個權力機關以後，它最怕民衆的反抗，不得不想種種方法以防止；或用武力的強制，或用法律的威嚇，或用禮教的範圍，或用教育的‘懷柔’，以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個愚民政策之澈底

厲行。國家一方面既以名利祿位攫住士人之心，使他們替統治者盡忠効力；他方面復以‘希聖希賢’‘正心誠意’爲教，使受過教的個個成爲‘不辨粟麥’‘不問理亂’的超人——高等游民。故愈受清高的教育，當愈是‘潔身自好’，愈可使統治階級高枕無憂。

更有一種使教育具高貴性的理由，是如本書前面所說，階級的教育，使教育與勞動分家；換句話說，是因人類社會入於文明期以來，一向沒有過普及人人的教育，教育一向被一部分人所專有獨享。同奢侈品一樣，教育是被貴族及所有階級玩弄點綴消遣之物，平民與無所有者只配供獻勞力以作活命的代價，像教育那樣的奢侈品決無容許貧賤人染指之餘地，於是教育居然戴起金冠來了。

實則今日的教育事業，它的‘清高’已經不攻自破：要爭經費，要討積欠，要與職業教育，凡向所認爲有清高性的種種特徵，俱已一掃而盡。只有一點‘苦’至少在一部分的教師們是無法免避；且因沒有如苦力們的那種團結力量，還只好欣羨他們的英勇而自嘆落後！——或要悔受清高之毒太深了！

第三，闢教育中正說。

這種迷信是如此的：教育站在公正的立場，採取中和的態度，不偏私，不極端。如對於主義派別，在教育之本分上以為是不許有所執着的；對政治問題以為是不容有所主張的；同樣對於各家學說的研究也要無‘我見’，而最稱特色的是把理論與實踐‘分家’。譬如日本京都帝大的教授河上肇氏被強制辭職（一九二八年）的理由之一，便是當總選舉時，他去替候補人大山郁夫氏作應援演說。這彷彿說：學問是中立的，大學教授而作實際運動，那就有傷學問之尊嚴了。因之河上肇非去職不可。近來有許多號稱學者的，就是這種‘中正教’的信徒。如某一經濟學者對什麼工廠法規發表意見時，先便聲明自己既不擁護資方，也不偏袒勞方，只是站在經濟原理的立場來說公平話。又如當五卅事件在上海發生的時候，學生們有的已被英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槍斃，有的罷了課奔走活動實行反帝的工作。教育者怎麼樣呢？他們也曾開過會，要議善後辦法要想對學生家屬‘負責’；但其能事只盡於此。至如高等華人的學者如丁文江輩竟主張‘公平調查’，這可謂把‘中正教’澈底實行了。

再有一點可作‘教育是中正’的根據的，是孔子說的‘有教無類’。是的在一個學校中，有富家子，有貧家子，有聰明的，有愚魯的，低級學校畢業，一樣可以升入高級。把教育機會平等地給與人民，再中正也沒有了。

但事實上怎麼樣？先看教育機會均等說的實際。研究過教育概論的，當知道學制上有所謂雙軌制，即富家子與窮家子從受教育的第一天起，便須分道揚鑣。無論張三的兒子學業成績怎樣優良，但爲了張三是個木匠，他的兒子就只好受國民教育，但張三的兒子還算有幸氣，像那李四的兒子從學會走路，就要自己用手吃飯，可憐他連書包都不能備一個。反之，趙家的小兒子雖然未至蠢如木牛，却要三年落兩回第；現在居然出洋留學去了。再看：小學教師奉教科書之命獎勵學生勤儉；但對於隣家刮地皮的鄉紳，甚至本校抽大烟的校董，却可以熟視無睹；學校裏講人類應和平博愛，然對於軍閥之割據地盤，帝國主義各國之擴張軍備却都可以置之不問。階級鬭爭太殘酷了，教育上必須宣講勞資協調；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太偏激

了，教育上必須鼓勵他們研究學術；說到研究學術，似乎什麼學術都無不可了；但馬克思主義要除外。集會言論當然自由；但須先經認可，并且不得“連抗中央決議”。教育者說：“我們要以學者態度作詳密的研究，以獲得公正的結論，但以不違反△△主義者爲限。”

試看這樣不偏袒，不過激的教育的中正面目。

這樣中正的教育，究竟中正到怎樣一個程度呢？我可以拿現代文明國所標榜的司法獨立爲例。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麼在法庭之前自是無冤不伸了。然而一方有互稱保障人權的律師，無論替原告被告俱可接引法律以辯護；他方又有私刑的拷訊與監獄的虐待；另外執政權者却可隨時制定什麼刑法而命令司法官依法辦理，譬如一九二八年日本的田中內閣覺得治安維持法還不足以禁壓勞農的運動，於是可製定改正治安維持的緊急勅令，而號稱獨立司法機關，就得馬上照辦。你看這種樣的‘階級裁判’竟算是文明國的進步的制度呢！也許你以爲我們的中正的教育，或不致如此欺人嗎？那麼且看：號稱行中正教育的各文明國

的教育制度是把持國家權力的人制定的，教育經費是由他們規定的，教育書要經審定，教師要經檢定，課程也要經編定；只要你明白現代國家的本質，懂得這些手續的用意，你該不致懷疑‘階級教育’的定名吧？然而不識羞恥的學者還敢對人稱說‘教育是中正的’，‘教育該中正的’；只要“有奶便是娘”，好不笑煞人！更有些自由主義者，以為政府干涉講學自由，有傷大學自治的威嚴。這却彷彿獄囚批評用手拷腳鐐之不當，何異癡人夢囈。

這個教育迷信，可以發生三種毛病：一是不作主張；因為標榜‘中正’，只好什麼事推開不管，至多也只模糊影響，不著邊際。一是沒有是非，因為不作主張，自不必講究是非，甚或明知是非，也因受制於‘中正’之招牌，只好開口不響。但有時也會發主張，辨是非，不過其動因不在自己，而在有權勢者；故在軍閥時代竭力反對‘黨化教育’者，一到國民黨時代，居然會得高喊三民主義教育，或者做官，或者立說，活像個‘忠實信徒’。但我相信他即使在這時候，怕還抱着‘教育是中正’的見解的。因為以上二個結果的影響，便生出第三個結果來。那便

是中正其名，偏私其實；換句話說，它只是有利於支配階級的中正教育；不許反抗支配階級的中正教育；無論如何，它總不肯公開地說明自己是階級的，總要設法掩飾其階級的事實。

不破除這個迷信，教育將不能跳出‘人搾取人的社會關係’，而只成為少數支配階級的工具。然真要澈底破除這個迷信，除非先廢止了‘人搾取人的社會關係’，否則‘中正’的金字招牌總是要掛在人們嘴脣邊的。——參閱第七節中論商品化一段。

第四，關教育獨立說。

‘教育獨立’的說法有幾方面。一種說法是教育應脫離政潮，不落入政治的漩渦；這是就事實上且是消極的主張；一種說法是教育以兒童為本位，應謀個人之圓滿發展，不當用一黨一派的主義來束縛個性；這是根據所謂教育原理的主張；這二種都是說教育要超絕於政治的關係而獨立的。此外有就教育行政的獨立說的，有就教育經費的獨立說的，有就不受宗教影響而說的。

這裏最重要的一個觀念，是教育離政治而獨立。我們且就這點加以檢核。

自有歷史以來，凡確立支配階級政權的地方，竟可以說沒有一項事情，不受政治的支配。教育一向是愚民的工具，支配階級爲鞏固政權起見，斷不容人民明白真理。它不是禁錮人民求知的機會，便是引誘人民去相信有利於支配階級的‘學說’。因孔子的教義講忠孝，講禮讓；這種封建社會的道德最於做皇帝的有利，所以自漢武帝‘定於一尊’以後，即爲歷代帝皇所寵用，直至二十世紀的第二十年代，尙爲軍閥們所‘垂青’。（如從前的北洋軍閥而兼狗肉將軍張宗昌就在山東大學行三跪九叩首，褚玉璞命令各校讀經。……）在西洋，以博愛屈伏爲教的耶穌教，無論在中世羅馬帝國時代，在現在帝國主義時代，也都被支配階級所採用，且不惜用武力，費金銀，以達傳教的目的：宗教教義更成爲教育全般的主要內容。這是政治積極地支配了教育。外如中國之‘焚書坑儒’與文字獄，西洋中世羅馬帝國之封閉雅典大學，最近美國某州之禁II教授進化論，日本政府之免除‘左傾教授’，則是政治消極地支配了教育。袁世凱皇帝規定小學生讀論孟，中學生讀學庸，上舉張緒二軍閥命令學校讀經，以及日

本小學生崇拜天皇，都是教育不能超絕政治勢力的實例。

無論是古代的中外各國以及近代的資本主義的文明諸國，教育之不能超脫政治影響有如上述；即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它的教育也是政治的，而且還是階級的——在它們自然是無產階級的。所不同者，蘇聯的教育，公然宣言是政治的階級的；（不過這種階級的教育與前面第二節所述階級的教育有不同，詳見後面第十六節）。而在別個文明國家必要稱作獨立的全民的教育，還要一方面竭力使大學只研究高深學術，使低級學校只傳授普通知識；他方面竭力諱言教育之政治的作用，不准教育界人從事實際運動——雖然‘愛國’或‘忠君’的訓條，軍事教練及實地演習都是非常注重。

在教育本質（指階級社會的）上及行政系統上，其所以不能獨立之理由，只因教育不過是維持政權的一個工具。尤其在金融資本稱霸的現代，一切教化事業，從學校教育，新聞雜誌，宗教，科學，藝術，廣播電話，以至影片體育等等，無不為布爾喬階級所獨占。（詳見後面第七節）現代文明國的

政權是布爾喬的政權；現代文明國的教育，也是布爾喬的教育。

這種教育最具體最露骨地表現的，是美國的教育，我將於後面另立專節來詳細敘述（看第十五節）此地姑先作簡單的一瞥。

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在所著鵝步 (Goose Step) 中發表了對於美國高等教育機關的觀察與結論。據他說，在北美的大學校裏，有六十萬青年受着組織的養成大資本的先鋒隊之教育。一切高級教育，無例外地從托辣司或銀行得到資金，公司的支配人或大資本的別個代理人都占有高級學校董事的地位。一切大托辣司或大金融俱樂部，莫不各有‘自己所有’的大學。大抵，高級學校很多額的財產，就當作該公司的股票以投資，藉此謀與資本家的寡頭政治作成鞏固的‘協同發展’。

洛克非勒摩爾根及別人的特別資金，對於美國的國民教育與科學，也具有重大的意義。那照規約“以增進人類幸福”為目的的洛克非勒資金，有許多投為股票，（在一九二〇年為一萬萬八千五百萬金元）獲得數百萬金元的利潤，因‘慈善’事業故

而得免稅。這筆錢的一部分用在科學的研究所，醫療事業，（在北京的協和醫院及洛克菲勒病院，是間接替美孚油之帝國主義的目的而服務的）傳道隊，（在遠處殖民地開拓投資之路）等。另一部分是用於秘密的‘軍事的’目的。更有不少金額投在鎮壓罷工破壞罷工之組織化上。還有另一宗上數萬萬的洛克菲勒基金‘普通教育基金’，是特別充國民教育用的；據它公布的宗旨看來，“爲使大衆滿足於他們的狀態而教育之……使他們仿其父母之例而教育之……”在許多地方，這筆基金對於下級的學校也發生大影響，即組織地教訓兒童去皈依洛克菲勒教與一般的資本教。科學的卡內其基金，也完全是同性質的；在表面上雖用於數千無意味的煩瑣的研究與偽善的牧師之養成，但在本質上，只爲追求那個供給基金的鋼鐵公司之利益而已。

教會也完全與一切教育團體及慈善團體相同，爲資本而服務。教會在某種領域上擁護資本家的利益，資本家則付教會以報酬。這只看基督教青年會（Y. M. C. A.）就可知道。它在世界各地設立支部，從大資本接受基金之供給，當作美國帝國

主義政策之先鋒隊而活動，又盡着經濟的密探的作用。有名的‘阿拉’（阿美利加救濟協會）也是表演類似的功能的。

在歐羅巴諸國，學校制度由國家規定，像上述的關係，多少是被粉飾過的。可惜我們在這裏不能詳述經過國家機關（是現代集中化的資本之助手）以間接及影響於教育之手段。我們只能舉出在德國當暴落期，科學的設施曾從托辣司接受直接的物質援助一事以作例證。

近代的科學，愈以需要巨額經費的研究所，實驗所及爲供研究的特種設施爲必要。在今日，大抵的發見是集團的協同作業之產物。技術的完成是在工場研究所或由托辣司維持的特殊設施中所做的。

科學在根本上，是循着追求資本家之利益這個方向而走，雖然學者自己或未曾意識到。但這一事實對於人類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不必講許多，祇要想及有如何多種的精力金錢與知識是耗費在無數的軍事的發見上，當不難爲之驚心怵目。

集中化的資本之影響，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御

用‘科學’上，也完全顯露。德國的經濟學講師與教授，無論爲誰，必以馬克思學說之‘反駁’開始他的經歷。

在此種設施之中，有一個基拉科學研究所，算是歐羅巴最大最有勢力者之一，它便是受大工業的維持，而着手於輸出市場及資本家的擴張方面的特殊研究爲職務。

以上單就集中化的資本所及於學校及科學的影響，以明現代教育之隸屬於政治——金融資本家統治手段；這裏又有二種含義：一是這種教育靠資本家來維持，一是這種教育只爲適應出資辦學的資本家之需要。（參看前面第二節所述）

若連新聞，影片，體育競技，無線電話所受於資本之影響言之，當更可明瞭今日人類精神文化之如何受人利用；若在信仰教育‘獨立’而且‘神聖’‘清高’‘中正’的人們聽了，怕一定會得羞恨無地，氣忿欲死！——如果他們是真的信仰者。

以上材料都在詳述教育之不能脫絕政治而獨立。至於教育行政獨立，至多也只有形式別致，精神依然‘附庸’。若離宗教而獨立，當作一種教育原

理來主張，未嘗不可；不過要知道在階級支配的社會，尚需用宗教爲‘思想支配’的時候，是無法將宗教的勢力排除出去的。就中國說，如果教會學校還繼續存在的話，誰相信教育是獨立呢？

以上四種迷信是互相聯繫的，因視爲‘神聖’就可連帶地視爲‘清高’而且‘中正’，‘獨立’；因是‘清高’，故成‘神聖’；因是‘中正’，故當‘獨立’，亦惟‘獨立’可以保‘中正’和‘神聖’。就現狀言之，一般人所迷信爲‘神聖’的不免有點‘卑鄙’；所迷信爲‘清高’的，不免有點‘污濁’；所迷信爲‘中正’的，乃是掩飾‘偏私’的假話；所迷信爲‘獨立’的，更如奴隸之輩，自媿丟臉，而故在大衆面前裝腔作勢說大話罷了。

我們敢再重言申明：人類自社會的內部分成階級以來，教育只是階級支配的工具；它只爲了支配者的利益，且惟少數特權階級能以享受。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普及教育’也僅爲了資本家的需要——替他們造成在平時的能動機器，在戰時的愛國健兒；——因資本的集中，更作生了所謂‘精神生產’之獨占，學校不過是‘觀念製造’之工場。

故教育之爲物，對待於‘神聖’我將以‘凡俗’名之；對待於‘清高’，我將以‘平庸’名之；對待於‘中正’，我將以‘階級的’名之，對待於‘獨立’，我將以‘隸屬的’名之。

同 題

- 一。說教育神聖的根據何在？
- 二。在教育清高說下，發生了多少種的惡影響？
- 三。在階級教育之下，果能實現中等的教育否？爲什麼？
- 四。在中國所唱的教育獨立說，據你所知道，約有幾派？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 五。關於教育的曲解，除本節所講的四種以外，你還能指出其他的嗎？試詳爲說明，加以批判。

第 四 節

教育的效能

教育的可能性。——評三種錯誤的教育效能觀。——
1,教育萬能論。——2,教育救國論。——3,先教育後革命
論。——問語。

在教育的本質上,若不說一說教育的效能,我是覺得有點不充分的。因此,現在特來說明教育的效能。

引起我所以要特地對教育的效能加以說明的動機,是因向來教育界乃至教育界以外的人,往往抱着一種不相應的過分的估量,以致發現許多錯

誤——在教育本身上，也在革命進程上。

這種錯誤的教育效能觀，大致有三方面：第一是教育萬能說，第二是教育救國（或建國）論，第三是先教育後革命說。——後兩說也可說是第一說的推衍。

在未批判這些錯誤的教育效能觀以前，我當使讀者先回顧一下上面所已講過的話。

最初，我們就說明教育是上層建築之一；是觀念形態的勞動領域之一，給人以特種的勞動力的；換言之，它是幫助人營社會生活之一手段。同時，我們知道教育不是什麼憑空生長，獨立存在的；它乃是受制於經濟的關係（同時就是政治制度）——底下在第九第十兩節更要詳說——而為某種經濟的社會的副產物，某種經濟的社會的形態之反映。不錯，我們可以補說一句，教育也有率先領導或者促進的功用；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前，有許多地方的學校已在宣傳革命思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行為儘可說是這種宣傳的產物；由這可知教育着實有作用，決不像是專做‘尾巴’的。不過就在這兒，我們要問在辛亥革命以前，何以會有那種革命

思想發生呢？是生於教育者之‘良知’嗎？是生於革命家之‘先覺’嗎？都不是的，它乃是生於一種客觀的刺激；說得具體一點，是生於帝國主義逐漸向中國加緊侵略，而滿清政府無力抵抗，致使民衆生活愈趨困難，迫得大家要找生路，然後才有那種革命思想發生的。所以就教育上的各種設施以及教學內容而言，都是和當時的經濟及政治狀態相適應的——不拘是反動的也好，是革命的也好。教育絕對不會也不能超絕了時代與環境而有特別新穎可喜的內容和方法，彷彿從天上降下來的。

要之，人絕不能在客觀上所不可能的範圍內創造什麼。人只能在客觀上所可能的範圍內有所推進利導。

教育的可能性自然也有這個限度。

說教育有非凡的本領，有超絕一切而獨立特行的存在，不是夢囈，也準是誇大狂。

現在就進而批判上述三種的教育效能觀。

第一是所謂教育萬能說。

容我先來敘述自己過去的經驗，現在確是覺

得有點赧然的。

當十五六年前，我剛畢業小學的時候，爲了家境貧寒，看來對於升學顯然是要失望的，所以只好走上糊口之路——說來慚愧，我是高小畢業生就做高小教員的，但半年之久，校長先生僅僅送了我十幾元薪水。——但是我的升學野心依然盤踞着不去，當時曾幾次發生過幻想：進工業學校去，考電報學生去，進留美預備班去（清華大學的前身），而且和父親商量過；但是父親責備了我一頓，說是“你還夢想究竟！”——我的父親是手工業者，爲了貧窮，自然相信窮兒是命定的不必（實際是金錢無能）受許多教育的。

夢想究竟！我竟夢想到了——是攷進了師範學校。進師範，一方面固然爲了師範免學費還免膳費（現在可不然了）；但他方面還爲了我是個‘教育萬能教’的信徒。

也許是一個人的自己安慰方法吧。爲了要進師範，爲了攷進了師範，所以就對師範抱了最多的希望。但不管這個，我當時確是相信教育萬能的，以爲教育可使人得知識，可使人得技能；更希奇

的，是可使啞子開口，瞎子讀書。還不僅此，教育事業是多麼清高，多麼純潔；在當時的學界中，師範生的確顯得比一般中學生要規矩些，要儉樸些。

經了五年的師範教育，愈加覺得教育事業真是國家一切事業的根本；在求學期內，記得袁世凱快要做皇帝時特頒教育宗旨，我們學生還都讀過，認為是‘教育福音’。到了畢業之後，雖未曾‘身執教鞭’，但對教育總還存着重視之心，以為教育辦得不好，其他什麼事業終是弄不好的。

可是，最近五六年來，我要自己慶幸，我居然從夢中醒覺了。我發見我過去確是‘夢想究竟’，確是迷言。

這不僅因為我‘小民無飯吃’，使得‘教育萬能教’不攻自破；實在是因為從事實上，從理論上，都證明了‘教育萬能教’的不足信。

理論上的說法，從本節開首的敘述，可以明瞭。

現在專從事實上來作證明。

相信教育萬能說者，除“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幼稚好笑的瞎說，凡稍有常識的都不置信

以外，獨對於號稱新教育的現代教育，仍還有不少人信爲是萬能的。他們的理由是：新教育是科學的教育，是民衆的教育；這種教育不是過去愚民的貴族的教育可比。天空有飛行機，海底有潛水艇，消熱有電扇，保暖有電爐；這許多文明利器，已使得世界比已往進步，也就可說是教育的產物；所以教育雖非萬能，也近於萬能了。

但是果真如此嗎？

“用所謂‘科學的教育’，以測驗兒童的智慧，考查兒童的學業，并舉行其他的調查統計等等，看來好像是很公平，很準確的利器，已在教育上應用了。

“用所謂‘全民的教育’以設立民衆學校，推廣補習教育，并出版供平民閱讀的書報，看來也好像教育上已在打破界域，大度包容的了。

“但是考之實際，是不是個個兒童得享受到‘科學的教育’之恩賜，個個平民得享受着‘平民的教育’之教訓呢？

“在教育上也同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社會上一樣，有着許多的不平等，許多的不真

實。

“科學的利器真多得很呢？在交通上，在建築上，在營養上，在娛樂上，在現代確比現代以前爲進步，爲新穎，爲有趣；但試問能享受到它的利益的究有多少人？舉淺例來說：夏有電扇以避暑，冬有暖爐以禦寒的在這現代占有全人口幾分之幾的人？同一情形，儘管教育上發明了多少利器，但就其極大限度的效用而言，也只限於能就學的人。然試問從教育門牆被除外的人究有多少？這批人是永不能見到‘科學的教育’之面貌的啊！

“再看‘全民的教育’。說叫‘全民’‘全民’，原是其妙無比的好名詞。但試問世界上的全民在那裏？爲民有民治民享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美國，莫非已臻於全民的境地嗎？我們知道世界上尚沒有所謂全民的政治，因爲掌握政治的國家機關，並不在全民手裏，而是在‘部民’手裏。這且置而不論。單就現代所謂‘平民的教育’來看，一則在數量上固未普遍，再則在內容上更多缺陷。譬如就現代富強國家

的教育訓誡而言，說‘奉公守法’，‘勤儉可以致富成家’等等，養成安分良民的話，其實在站在反資本主義立場的人看來，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用以欺騙平民，軟化平民，役使平民的口號。因為一般平民並未掌握政權，掌握政權的都是特殊階級的人；換言之，他們這種國家並不是平民的，只是特殊階級的；所以那種教育上的說教，適成其為特殊階級的教育罷了，與平民本身利益是無關係的。然則更那裏來的‘全民的教育’？——公樸的現代新教育之特徵——病徵。

這段引用的文章，可以證明教育上的許多主張，不管它是如何好聽，就教育本身言，它的效能是有限得很的。‘萬應書’式的教育，只在教育學家的嘴角邊，決不在事實上。

我再舉出一個實例，以證明教育上的好方法，並不一定發生效能。

盲啞教育，是盲啞者所應受的教育，誰也知道是該積極提倡的。但據十八年十月間申報載朱衡濤張維新二君為編製教育方案應增加盲啞教育呈

教育部文中說：

“查我國盲啞之衆……當在百萬以上。……又查我國盲啞教育已有二十餘年之歷史。但現時全國盲啞學校，據最近調查，啞校僅有南通，北平，烟台，上海，南京五校（內私立三，公立一，教會設立者一），啞生總數不滿三百；盲校約三十所，大半爲教會設立，學生總數亦僅千數百人。……”

本來一般的普通的教育尙未普及，像這種特殊的教育自然益發未能普及了。然我們由此不是可以懂得教育本身是很少效能的嗎？

有百萬以上之衆的盲啞，而只有千數百人受到盲啞教育，這簡直是宣告教育無能。

爲什麼教育這樣無能呢？便因教育受制於經濟，受制於政治。僅靠教育事業上想法，在教育範圍內活動，那麼無論怎樣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

相信教育萬能說者，至此又有何詞以對？

老實說，現代新教育的癥結，正有如公僕君所說，“是在於現代所特有之‘富’。我們知道現代的社

會是‘富’的社會，是‘富’集中於少數的社會，是占有經濟上支配地位的富者同時即為占有政治上支配地位的人的社會。同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社會上，富者享有特權一樣，在教育上也以富者為享有特權。換言之，握有財產權者享有教育權。因之，所謂‘科學的教育’根本不能對無財產者發生影響；所謂‘全民的教育’就本來沒有這回事。”

故不在‘富’的問題上謀解決的方法，不特教育對於本無所能的事情沒有效能，就是對於本有所能的事情如智力測驗，盲啞教育’也將歸於無效。

第二是所謂教育救國說。

這一說是可視為根據第一說而生的，既以教育為萬能，自以教育為能救國乃至建國了。

四五年前，國家主義派曾唱出教育建國論；但推崇教育，認為救國唯一法門者，固不自他門始；所認為救國的教育也不止國家主義教育一種。

如古老先生便竭力提倡道德教育，以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非用道德教育來救濟不可。有了道德教育，便是曹陸章等賣國賊的良心也可發現

了。殊不知到了民窮財盡，大家沒有飯吃，快要餓死的時代，還有什麼道德好講。何況我們已明白所謂道德這樣東西，也同法制一樣，是支配階級維護自己的利器，根本是沒有叫做社會道德或人類道德的。

再有提倡愛國教育的，以為中國之所以衰弱，原於人民沒有國家觀念；假使教育上努力宣傳愛國思想，便人人知道有國當愛，中國何患不能富強。這正是國家主義者認國家為社會進化最高形態應有的推論。愛國思想是資本主義勃興以後的產物，所以是資產階級的御用品。世界第一次大戰時，帝國主義者乃至第二國際以及其屬下的社會民主黨一致高喊‘擁護祖國’，其結果使得幾千萬條的生命活活地葬送在這個口號之下。這算是愛國教育極頂的成績，也是國家主義者所極頂心賞的吧？這樣的教育，自可効力資本家所有的國家，但與被榨取被壓迫的工農大眾無關。何況‘愛’這樣東西，也只有‘衣食無慮’的時候才保得住。做父母的，誰不愛自己的子女？然而當今陝西河南一帶，販賣子女已成為災民求而不得的機會。你可能訓斥這

般做父母的沒有愛心嗎？愛心本來是有的，但是餓死了。誰餓死他們的呢？……

還有比較切實一點的人，提倡職業教育，以為現在國家太窮，人民生計太苦，能使人民有獨立謀生的能力，使各種工商業發達，以抵抗外國貨，國家就可富強起來。他們不知道中國工商業為甚不發達，人民為甚多失業；說這是由於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結果，或者到現在，他們可以是認了；但進一步，說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是由於資本主義發達必然的結果，恐怕他們不曉得也不敢這樣設想了。不推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種種——不肅清封建勢力，還有不打倒那投降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的資產階級，中國就不能脫離現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民衆就不能改進現在貧困的生活。靠職業教育能救國，直是笑話！

至於什麼普法戰爭，德國大將毛奇歸功於小學教師，以及什麼日俄戰爭，日本伊藤博文說戰勝是小學教師之力；都不過是支配階級的催眠作用罷了。

教育固然不能救國，但教育也不是絕對不必‘救國’。‘爲教育而辦教育’這樣欺騙人，愚弄人的說法，我們早知是支配階級諱言階級教育的一種遮眼法，是御用學者製造出來以自欺欺人的鬼話。但同樣，主張教育救國，而輕視民衆的革命，這也是轉移革命民衆的視線，而讓他們走上錯誤道路的陰謀詭計。所以我們必須進而批判第三說。

第三說就是先教育後革命說。

這和第二說有相通處，就是說教育有單獨貢獻的效能。不過第二說認單靠教育便可救國，本說則尚不忘革命罷了。可是本說的錯誤也正不小，尤其在最近中國革命正成爲當前問題的時候，是值得從事教育工作者的嚴重注意的。

他們的意思，以爲要革命先得教育人民，人民不懂得革命，沒有能力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

照他們的說法，辛亥革命固然多事，就連二三年前的中國革命也嫌過早。因爲中國四萬萬人，大部分正有如國民黨所說，是‘阿斗’式的脚色，當然懂得不得革命，沒有革命能力的。

現在姑不說這個。單就本說批評一句：是‘俟河之清’，不知何年何月，才辦得到。老實說，是終於不可能的。

上面我們已敘述過教育的變質，即在階級社會中，教育只是支配階級的，是為支配階級的利益的。不能在這種階級教育中來推翻支配階級的教育，以實施革命的教育，普通地養成革命的人才，是比什麼都容易了解的事情。那麼請問主張先教育後革命說者，你有什麼魔術來辦理養成革命人才的教育呢？

不錯，對於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確是先在封建社會的內部，有它自己的文化的成熟，比支配階級的文化為優越；但同時我們該不忘記在封建社會的範圍內，它已是經濟生活上的支配者，所以儼然有它這個新階級的存在；而且它也未嘗忘記革命的行動。在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大革命之前，不是早有過文藝復興的新時代，宗教改革的新運動嗎？這樣的新時代與新運動，雖不能說是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但不能不說是剛勃興起來的資產階級對快要崩潰的封建制度之鬥爭，而且是

鬥爭的成功。

可是到了資本主義發達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情形大不相同了。前面已說過，在帝國主義時代，教化也必然地要趨於‘獨占’與‘帝國主義’的；古代及中世的教化，是兩重的‘並行不悖’，而現代的教化乃是兩重的對抗，兩重的‘火併’。所以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階級的地位是經濟上受擄取，政治上受壓迫，而且文化上受窒塞的階級；它絕對不能有如在封建社會內的資產階級那樣，在經濟上占支配的地位，在文化上又是自己的成熟了的。這一個階級如要有自己的文化的成熟，只有在過渡期，只有在它獲得了國家權力之後，只有靠破壞了教育之布爾喬的獨占而支配了全般的學問，只有在偉大的建設事業之經驗上，以改造自己的天性，成為新人類社會的組織者。

所以在現代主張先教育後革命，又是騙人的話。支配階級決不容許在它的統治下面發生了於它不利的教育；你既不主張立刻革命，你自然只好就它的範。這樣的主張是叫大家走上合法運動之路，走上取消主義之路；這不僅是‘後革命’，簡直是

‘不要革命’‘放棄革命’。

那麼怎樣才對？

我們承認教育在革命進程上自有它的地位，就是可以作為革命的武器之一。這個說法，不是認教育獨力可以革命，也不是認教育無關於革命，而是要在革命的總綱領總任務之下，盡它的一方面的作用。

大致，教育與革命的關係，可以這樣地說：

“在革命前，即在革命羣衆獲取政權以前，教育是個武器，用以破壞，煽動，宣傳，把統治階級的罪惡盡量揭布，把革命的政綱盡量散播，這與軍事的進攻固有相似的作用，而由此激起被壓迫民衆的革命情緒，培養成努力革命工作的新要素，則是於破壞之外，更有建設的功能。要之，在革命前，教育是用以鬥爭的，志在獲得政權的武器之一。在革命後，即在革命羣衆已經獲取了政權，這時教育的責任是在教養民衆，訓育民衆，以擁護這一政權，鞏固這一政權，保住民衆對政府的密切關係和對政策的一致信任；因為那時的政府就是民衆所

選出以行使政權的，它與民衆站在一起，再不與民衆相對抗。要之，在革命後，教育是防衛政權并促進政權的一種機能。”——公樸的教育者之政治的使命。

這是表明教育在對革命的關係上，不能離開革命而爲無關係的存在；只有在進行革命工作時，才能有（也需有）革命的教育。而且就是這種教育，我們也不當期望過奢，它的效力究竟是有限的。請從事教育工作的革命者，莫要爲此又於無形中投降了‘教育萬能說’與‘教育救國說’啦！

我們知道革命的教育這個名詞的含義，是把教育用作革命的武器，用作鬥爭的武器，也可以視爲對‘爲教育而教育’或‘在教言教’那種空想的論調而發的。在革命時期，一切的一切都要適應革命的總策略，協力並進，革命才會成功。現在中國的革命既然未算成功，故工作人員當與一般革命鬥士及革命民衆互通聲氣，齊一步驟，協力以謀革命總綱領的實現。換言之，要把教育視爲革命力量的一個方面軍，在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肅清封建勢力的革命任務之下，向着革命勝利的方向走去。

這是我們對於教育與革命關係之見解，也就是對於教育效能之見解。

問 題

- 一、舊教育書上怎樣講教育的效能？——如果你是受過或正在受師範教育的。
- 二、試說明教育與革命的關係。
- 三、一面倡教育救國論，一面却主張學生不應參加政治鬥爭及社會鬥爭；你可能知道這裏面的作用嗎？
- 四、教育爲什麼不是萬能？
- 五、我們反對先教育後革命說，是不是我們可以放棄教育工作？如不是的，又該怎樣？

第 五 節

原始共產社會的教育

原始共產社會的概觀。——‘實用教育’與‘宗教教育’
——有‘學’而無‘教’。——三種教育形式。——模仿與囑
示。——訓練。——加入式。——原始社會教育的特點
——原始社會與教育。——問題。

讀者看過上面第一章各節之後，當已知道教育原是以保存種族(包括保存個體)為目的，成為幫助人營社會生活之一手段；但後來因為私有財產的發達，國家的出現，教育遂不復以保存種族為目的，却以擁護私產，鞏固支配權力為主旨。這就

使教育變了質，變了階級支配的工具——但也成為階級鬥爭的武器。

在本章中，我就要敘述自原始共產社會起，經過種種的奴隸社會（即文明社會），以至最近才見萌芽的社會主義社會裏邊的教育變遷的種種形迹，籍使讀者明瞭教育意義和教育制度所以變遷的理由，也就是使讀者明瞭教育變質的樣態。

現在就從原始共產社會的教育說起。

關於原始共產社會（氏族制度社會）的情形，在上面第二節中固已說到一點；但此刻為要闡明在這個社會中的教育起見，仍然覺得有較詳細地敘述的必要。

原始社會是先史時代（即歷史以前）的社會。古代社會的著者摩爾根（Morgan）分先史時代為野蠻（Savagery）未開化（Barbarism）及文明（Civilization）之三大時期。前面二期為至第三期之過渡期。又依據生產力——生活資料獲得手段之發達程度，把前面二期各分為上中下三段：野蠻的下段為人類之嬰孩期，即為由動物到人類的過渡期，

明晰的言語在這期內形成；它的中段是始于火之使用；上段則始於弓矢之發明。未開化的下段由陶器術的應用開始，中段由家畜的馴養與食用植物的栽培開始，上段則起於鐵的鎔解，田野的耕作，文字的發明以及它的被利用爲文獻的記錄；也且由此以入于文明期。

要之，生產之技術決定人類征服自然界之程度：野蠻爲採取天然物之時代，未開化爲牧畜及耕作之時代，而文明則爲更進步的產業及技術之時代。人類自有牧畜及植物栽培之發明與鐵之發見，遂使勞動力逐漸增加，足以生產爲維持自身所必要以上的生產物，且所蓄之富不歸於團體而歸於個人，於是發生私有財產。故上面二件事成就了人類生活史上未曾有的大革命：由共產到私產；我們的教育之變質也以這爲關鍵。

氏族制度社會是文明的階級社會發生以前的社會，所以是原始共產社會。

這種社會的組織雖極幼稚而單純，但實爲至足驚異的組織：無軍隊也無警察，無國家也無貴族，無法庭也無監獄，然而一切事情都在秩序井然

地進行，在這個共產社會中，窮人不得有，奴隸也不得有；一切人皆表現極公正極威嚴極勇敢的人格。

這時期最堪注目者，爲女權的優越。野蠻時代是行的亂婚制——就大體說——父子關係未能明瞭，故社會必然地成爲母系制度，當作血族團體的氏族制度便是母系制度。未開化時代是行的偶婚制，卽一時的一夫一婦——也就大體說——父子關係雖得明瞭，但子仍屬母，故在未開化時代的氏族制，女子的地位還是非常之高。

這種氏族制度社會的生活狀態，就摩爾根所觀察的易洛魁人（塞奈卡族）觀之，是極可欣羨的。那就是這樣：這一種族由採用狼、熊、龜等動物名之八個氏族所成立。（一）各氏族選舉平時之酋長與戰時之軍長，選舉由於男女全體的投票行之；酋長的權力不過是家長的道德的權力，軍長僅對於戰爭有若干命令權。（二）氏族得自由罷免酋長及軍長，一旦被罷免之後，就不過是個私人，是個兵士。（三）任何人不許在氏族內結婚；這是氏族的基本原則。（四）男子死後，所遺財物歸他的兄弟姊妹及

母之兄弟分配；女子死後，由她的子女和姊妹繼承。夫婦不相繼承，子也不由父繼承。(五)氏族負相扶互助保護及對異族侵害之復仇予以援助之義務。(六)氏族有共同墓地。(七)氏族可收異族人爲養子。(八)氏族有評議會；評議會爲氏族之最高權力，是成年男女全體之民主的集會。要之，他們的氏族制度，是自由平等友愛之兄弟關係。當印第安人初被發見時，北美的全部還使行着母系制的氏族制，只有二三個種族已廢氏族制而行父系制。

在行母系制的社會，一切兒童就屬於母親所屬的氏族；他如土地，房屋，及食糧等等，皆爲全氏族所共有。故當時的母權雖說優越，但決不像文明社會的父權，有爲父者的一人壟斷一切，居上凌下的特權。氏族制度社會雖行母系，但財產歸氏族所有，不屬於女子個人所有：這是與文明社會私有財產制度大不相同之處。就男女的權利來講，在這個社會裏是平等的，大家從事生產勞動，大家也分享勞動的結果。氏族既是這樣一個密接的全體，所以氏族的成員，同沒有私有觀念一樣，也就沒有所謂離氏族而獨立的個人觀念。原來他們的團體與個

人是這樣一致合體的。從而爲氏族所驅除這件事，在他們看來，要與宣告死刑無異了。

漁與獵爲原始社會中的二大生產勞動。此外從野生植物採取果實及皮根，自然從古已知；但牧畜與農業，有如上述，都是後來才發現的。研究這樣原始共產制習俗的摩爾根還在著書中談過如下的話：

“差不多單以獸肉做食料的平野的種族，在其狩獵的習俗上，表示與共產制同樣的傾向。卽如布拉克·費特人，是由包括男女及小孩們的全部族所成的大羣，騎着馬在獵取水牛羣。

“當開始追逐水牛時，獵人把沿路打死的獸棄置不顧，而讓後來者拾去。他們的分配方法，以使各個人都能得到獲物才止。又在哥倫比亞河的漁獵期中，部族的全體皆在河邊營居，共同貯藏所捕得的魚類。每日按照男女的人數，把魚類平等地分配給各人。他們又將魚類破腹，晒在太陽中，等到乾了，再放在籠內，搬運至村內。”

原始社會的生產勞動，一切皆是這樣共同從事，而其結果又是共同分配的。在當時，個個人是勞動者；他們中間，沒有誰偷懶，也沒有誰獨占獲物。如非洲的布雪曼人，竟還有將獲物的大部分分配給同伴，而自己祇取僅少的一點兒的。又如福其安人，在海濱一看見鯨，就趕快召集同伴去捕捉，然後由同伴中的最年長者，在場行公平的分配。更有哀斯基摩人的美談，可以聽到：

“所有鄰人皆受招待，遊戲，合唱，饗宴，舞蹈，互數日不斷。在最後一晚，村中人皆疲極了。於是盛裝的主人夫婦，取出他們所喜歡的禮物送給所有友朋，這樣把鎗十支，夜服十件，珠數二百顆，還有狼十只，牝鹿五十只，海豹一百只，海狸二百只，羚羊五百只的毛皮與許多毛布，都分配完了。最後他們更把自己所著的衣服也脫下來送給朋友。這樣赤着身的主人夫妻，就作如下的演說，以終止宴會。

“諸位，我們的心地從此可以舒適了。現在我們比諸位中任何一位都要窮乏。但我們決不後悔。我們如今已一無所有，可是我們因此得

受到諸位的友情。”

在哀斯基摩人中間，即在現在，尚有一種習俗很通行的，就是具有某程度以上財產的人，要開宴會，將財產通統分配給全部族人。

以上所舉易洛魁人及哀斯基摩人的例，都是現存蠻人部落的例。他們間所行的習俗也許有與實際不相應的。但是共同勞動共有財產的精神乃至事實，都還有得存在。

我們如今在有這樣的物質環境做背景的社會中，來看他們的教育究竟如何。

就大體言，原始社會的教育之內容，不外兩方面：一是獲得生活資料的‘實用教育’，一是安慰精神的‘宗教教育’。屬於前者，是漁獵戰爭，製器的技能；屬於後者，是風習儀式的傳授。

這時候的教育顯然可以分爲兩種：第一種簡直不是教育，而只是學習；就是由於兒童自然而然的模仿，學得了種種對環境，對畜羣，對信仰，對習俗，以至對語言，舞蹈，唱歌的知能；這可以稱之爲有‘學’而無‘教’。第二種才是原始社會中的教育形

式，却可以別爲如下的三種：第一種是最原始的，取父母養育的形態，以身體方面爲主，且止於消極的保護。第二種是進一步的形態，成爲父母的教練，要積極的幫助兒童的發達，使學習父母的習慣，有意識的作用和精神的教訓含在裏邊。第三種是一般的社會的訓練（General social training），以謀內部團結的宗教教育與防禦外敵的軍事教育爲中心。這種社會的訓練又得分爲四項：（1）是試驗（Ordeal）；對於加入成人團體的少年，要與以肉體上艱苦的試驗，如斷食，或使離羣寂居等，以驗其是否有耐苦忍痛的意志。（2）是訓練（Drill）；在狩獵及戰爭的練習上，以技能實用爲中心；但同時也有培養服從心和協同習慣之任務。（3）是入盟儀式（Initiation）；是宗教上的，於嚴肅祕密之中舉行，由長老等教以關於神的事項及部屬的義務等等；在行過這種儀式之後，一個青年才成爲社會的一員，具有完成各方面的教育經驗之意味。（4）是傳說，信仰，‘法律’，習慣的教授，係由以上三種形式結合而成；以後由於此等傳統之增加與文字之發達，漸有專管教育的人如祭司等產生，‘學校’也

由是發達起來。

要之，原始時代的教育，其特色在於實用的，社會的；且是教育與勞動一致，女子與男子‘同學’的。所謂修養的自由的或個人的教育，在以氏族全體利益爲主旨的原始共產社會中，自然不得發生；擁護支配權力，尊重私有財產的‘教材’，自然也是不得有的了。

以上只敘述了些原始社會教育的大體，好叫讀者得到一個概念。以下再來較詳地敘述原始社會中教育的方式及其內容——根據美國人 Nathan Miller 的 “The Child in Primitive Society” 中第八章至第十章。

第一是由於模仿與暗示的教育。說得確當點，却不是‘教’而是‘學’。

原始社會中的兒童，一方面要對物質的環境求能適應，以便獲取生活的資料；他方面要對先輩經過無數次的努力所積成的經驗，當作遺產傳下來的，也求能適應，以便保持全羣的‘文化’。而這種

種生活活動 (Life-activities) 的學習，竟沒有不可從模仿以致的。他祇要有所睹，有所聞，有所接觸，就可於不知不覺之間，反應為適當的行為。據說在澳洲黑人，在馬來人，在玻里內西亞人 (Polynesi-ans) 及美拉尼西亞人 (Melanesians) 中間，簡直沒有正式的教育可說；差不多一切的一切都是從自然界學得的。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奴人，“他們的兒童就決不受學校或教師的麻煩。山陵河水，是他們的教室；需要是他們的教員；嗜好同氣候是惟一驅使他們工作的勢力。”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的兒童，“一旦到了他們能自己營生——那就是捕鼠與殺蛇——的時候，馬上停止教育。祇消加利福尼亞的少年一經獲得了從事這些事業的充分技巧與氣力，有沒有父母是不成問題的。在訓戒或教授上，他們的父母都無所作爲。”同樣，就南美奧利諾哥 (Arimoco) 區域，做父母的並不對子女教育，因為他們沒有東西可教；大人怎麼做，兒童也就照樣做，正猶小山羊在山中跳來跳去，一任自然地生長起來。

就在當兒童偶然向父母問起自然界中現象的

時候，他們也是無所得的。譬如卡斐（Kaffir）兒童“當他們白天看見月亮，不勝驚奇，就跑到父母那裏問爲什麼。父母的惟一答復，只是月在天空，因爲這是它的本分。這個解釋是最後的，也竟滿足了……”，因爲他們都說：“對這些事情懷疑有什麼用呢？我沒研究樹是怎樣生長，而樹自然會得生長。”或者又如“兒童如問父母：‘你說鬼喫肉是怎樣的？我們明明看見在鬼喫過之後，肉永遠還是那麼多，但是你說鬼喫肉。’於是老人就不許他們說話；他們邊笑邊說：‘啊，鬼是飲血的，或是嗅氣的；他們所關心的只是這些。’或者他們會這樣說：‘鬼已舐過肉了。’

要之，兒童的教育都是一任自然，不加指導的。兒童全靠自己獲得經驗，正同小雛學習啄食，不受幫助一樣。如在中部非洲，兒童所有的知識，像全是本能地得來的——因爲沒有人曾看見他們受教過。在金海邊（Gold Coast）上，兒童的感官一經接觸到實際的生活，他就參加到一切實際的行動中去了。

兒童不特對於自然環境的知識，學得非常之

快；對於種族生活的詳情，也學得非常之快。在和環境，家族及友侶經常的接觸中，他在和一個文明社會的兒童剛能就學的年紀，便已通曉自然界以及民族的一切事情了。

如在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兒童在大自然界中的觀察就供給他以極豐富的博物知識。他能知道附近所生長的各種動植物的名稱和習性。非洲的少年“研究畜羣中的每隻動物，它的形貌，習慣及足跡……”“大部分十四歲或十五歲的兒童能知道河中及溪間所生魚類的名稱，習慣乃至捕捉的方法。他們也知道叢林中所生動物的名稱和居處；鳥類，昆蟲，樹木，花草等等的名稱，也為他們所熟知，且極易識別。

兒童也由這樣自然觀察的方法，學知一切田野，森林及河流的事項。這種知識對於他們實是非凡必要，因為不如此便不足以適應。凡維持生活的方法——漁獵，畜牧，耕種等等——並未大規模地發展，也就僅靠模仿老輩的行為以獲得。如在婁安勾 (Loango) 海岸，兒童從很小的時候，就學會釣魚及造棕櫚酒的方法。在徹延內印第安人 (Cheyenne

Indians) 中間“孩兒從小就知道馬和它們的動作，到二三歲就常常跟母親同騎在馬上。這樣，他們學知了駕馭的方法，正和學會走路一樣。邁雅 (Maya) 的少女，由於觀察母親的做法，從小就學習燒菜，磨穀。

關於傳說及習俗方面，也大致用相同的方式以學得。那就是由於聽長老們的談論，逐漸學會了種族歷史的內容。兒童並沒有人教他以禮拜，他祇看着大人做，等長大時也照樣做。又從父老的講談中，他知道種族的敵人爲誰，因之存着憎惡的念頭。兒童由於混入到種族的及家族的評議會，就‘早熟地’通曉公衆的事項以及種族的法律。就是語言的學會，也是這樣不待指教的。跳舞及唱歌，也僅由觀察以學習。

種族中已形成的許多信仰及態度，都逐漸地影響到兒童身上，兒童因之構成爲行爲，終身不改。對於大人所說的話，他都‘本能地’聽從。

當兒童接觸這些文化的時候，也就是未被成見所拘束的時候；所以任何事情，他都不加選擇地模仿。試就遊戲生活上舉例。非洲的兒童會得將成

人所備全副武器模仿起來。如軍刀用銳利的植物幹製成；短槍用尖銳的木片製成；都做得非常合式。在北昆士蘭 (North Queensland)，大人們常常使用着楯，兒童們也就用幾片樹皮合成爲楯，施上一樣的裝飾。到四五歲，兒童帶着小型的槍，用以同別的兒童相打，也用以威嚇他的母親和狗。在錫蘭的味達 (Veddass) 人間，孩兒有着弓與箭，五歲兒更有着許多巧製的弓。在婆羅洲 (Borneo) 及吉爾伯特 (Gilbert) 島上，兒童們建築他們自己的房子和玩具獨木舟。在西伯利亞的察克赤 (Chukchee)，兒童有各種的玩具，大部分是模仿日常用品的，如小的船，橈，木製的狗與馴鹿，雪鞋，弓箭等等。巴西的印第安兒童除出小型的弓箭之外，更有他們自己的模範樂器。

這兒有可注意者，就是這類的遊戲很難與實際工作區別。如那些小型的木製的槍，就爲澳洲少年用以掘樹根；同樣，在巴西，兒童的玩具直和實物沒有什麼差異。

成年人的勞動與事業，都是構成兒童們的遊戲的資料。在這種遊戲上，實含有至高的教育價

值。原始兒童的學校即在他們的遊戲場中，而他們的遊戲場却是到處存在的。他們的遊戲又包含民族中一切的習慣，態度，與制度。在他們未正式參加實際生活以前，就在這樣的遊戲生活中過活。因之，他們的遊戲具有充分的準備與訓練之作用。

宗教的儀式，也為兒童所模仿；而表現於遊戲中。如在判和（Pangwe）人間，兒童模仿祖宗崇拜，一樣地跳舞，也一樣地祈禱，菲列濱的伊哥羅人（Igorot）兒童有一種叫做fug-fug-to的遊戲，是模仿每年豐收後大人舉行的祭典的。

不過到了後來，要學習的事物變成複雜，多樣而且遠隔；因之單靠模仿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遺傳。兒童所天賦的興趣，對於更抽象的進化的文物，如宗教信仰，民歌語言及傳說，不能一定瞭解。由是必須有某種的訓練方法，逐漸地創製出來，以便引導兒童。又因‘課程’不大投合兒童的嗜好，於是更須發生一種強制的或規律的制度，以便將後來發達的，更重大的，人為的民族風習灌注到兒童身上。現在且讓我們記住純粹模仿的能力之應用是原始社會兒童教育的基礎，由此進而攷察在原

始社會中比較正式的教育之要素。

第二，就來講由於訓練的教育。

原始社會中兒童的教育，原未嘗說是完全模仿的。在氏族中的長老，却意識的要向兒童注意，以準備他們來參與氏族的生活。只是原始社會的生活簡單，兒童很早就可臻於獨立生活的地位；所以雖是這樣有意識的訓練，也不算爲一種系統的或規律的教授。那只是用鎮壓用權威去叫兒童確實地適應民族生活罷了。最初是社會文化對兒童之自由的浸染與適應，供給兒童以經濟方面的成熟；現在則讓長老之社會的優越來影響兒童了。兒童由此，更可具有適當的情緒上的傾向以符合於他的經濟上的成熟。

訓練兒童之所以必要，也由於文化逐漸發展，變爲更精密些，更遒遠些，不是兒童自然的興趣所能接觸。這種樣的社會遺傳，就只有靠長老的指教才能傳達。這種社會是沒有確實的文獻的，所有全社會的文化業績，祇能存於後輩的心上及行爲上，故不特加訓練，是會使文化歸於湮滅的。

這種傳授社會生活的結果給年輕人的動機，也由當一民族同別個民族相接觸時所激起。在接觸的時候，才見出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特徵來。長老之所以要將民族風習以及訓戒等等告訴後輩，即爲了想保存這種民族的特徵。又不僅保存而已，更要他們去抵制別個民族的侵犯及破壞。

這種原始的‘課程’，大體包括兩種內容；職業的及道德的。本來如漁獵等的技巧，如上所述，差不多是全由兒童自行學習，未嘗有人特加訓練。不過這種謀生方法，到了後來，也就很快地趨於複雜，若不與以實際的教導，怕會不能很好地使用那種武器及工具。爲得使兒童從早達到經濟的獨立，從早具有運用工具的能力，所以有實施某種訓練之必要。由此可見這種訓練之發生，還是起於社會的逼迫——是文化演進的結果。

澳洲地方做父親的人，當他帶兒子一同出外的時候，總要利用機會給兒子一點教訓。“譬如他們到了一個有什麼傳說的地方，假使兒子已經長大能以理解的話，就把這個傳說告訴他。或者做父親的告訴他用什麼最簡便的方法去獲得這種或那

種動物，或者別的食物。”還有替兒子預備小件的武器，做父親的就表演它們的用法。這兒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就是這種訓練，顯然是以上述模仿的遊戲功用為根據，且是互相參合的。

在生活資料感到困難的時候，這也成為強制做父親的指教兒童，而不要等到兒童自行模仿之一機會。澳洲的兒童，往往受大人的指導以追尋野獸的行蹤，且能憑最微細的形迹以認識鳥類及爬蟲類的出現。對女孩則教以結繩及製籃的方法。日本的阿依奴人，必須教男孩子捉魚獵獸造弓箭，捕鹿，憑天色以預測氣候。布西曼（Bushman）的父親當兒子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他食物的來源以及獲得的方法。

當生活技巧脫離了最粗樸的階段而趨於進步的時候，一種初步的訓練實為必要。如交易，硝皮，製陶器等等，需要相當的教授。在兒童方面就必須趕快學得這些更精巧的營食及營生的方法。在大人方面，也不復以一任兒童的自然模仿為滿足。剛果（Congo）的兒童學習划獨木舟，使用他的父親所給的玩具橈來划。同時，他的父親告訴他如何倒

划，如何把舵，如何用槳。除此以外，關於划獨木舟又有五十種以上的語法，他也須由長老的教授以學習。兒童‘課程’的別部分，還包括一種訓練，“不僅是甲蟲的移動，且是雞的鳴聲，一種鳥的音調，和太陽的運轉。”

在東加羣島 (Tonga Islands)，女孩子的學裝飾，必須由婦人教授。阿帕赤人 (Apache) 的女孩，由祖母教授用玉加 (yucca) 葉造籃，從六歲起開始學習。布拉克福特 (Blackfoot) 的母親爲要教女兒硝皮及把皮轉成衣裳的技巧，非常辛苦；此外更教她認識牧草以反供食用及藥用的野生植物。

當種族有戰事練習時，更是一個強制訓練的機會。這兒必須有組織，有紀律，以期產生所需要的心身上的統制。在曼騰印第安人 (Mandan Indians) 中間，模擬的戰爭及模擬的割首級，是男孩教育的重要部分。那時候，由有經驗的戰士在一清早率領一隊自七歲至十五歲的兒童前往草地。他們都赤着身體，僅帶着弓與無害的草箭，木刀，用草做的假首級；他們把印第安人作戰時的動作——佯攻，退避，前進，然後混戰——全部操演出來。

阿帕赤的兒童，則由父親及祖母教以計算，跑路，跳入冷水中，競走等等方法，預備養成他爲一個勇壯的戰士。

關於男女性交的事項，尤其是那種已經變成不可理解的儀式和信條的，也要給兒童以指示。如在 D' Entre casteaux 羣島上，長老從很早的時候就引導兒童參加那“性的更深切的神祕。大人們將要有幾天工夫出去捕魚，或買檳榔子，或者僅不過在友朋家周遊。少年們跟着他們同去。到晚上靠火時，他們告訴兒童用何種根葉，同煙草或檳榔子磨在一起，並告訴他們唱魔法的歌，這樣當他們同愛人發生關係時，他們可以永遠博得愛人的‘垂青’了。”像這一類的事情，除出實地施教以外，是沒有法子學得的。

原始社會的生活是極其艱辛嚴酷的。非有堅強的體魄，將難以生存。所以某種身體的特徵，必須最先被發揮，以便在社會中占得獨立的地位。不列顛哥倫比亞的 Stseolis 的習俗，是強制兒童要每早每晚在河中洗浴。他們最初還用小鞭（是放在家內火鉢中的）抽打裸着的身體。“每天鞭打，而且有

了這副傢伙，他將成爲一個活潑的有精力的人，能獲得許多幸福。”後來，兒童的身體再用槍刺，用刀割，“讓污血出來。”晚上，他們赤着身體，躺在露天，使不致怕寒，在鄰近的種族中，少年們必須通夜臥在河邊或湖邊，而把手浸在水中。

那些不能忍受這樣嚴厲訓練的人，就被認爲不合，不能在民族中取得完全的獨立的地位，他們只好終身屈居奴役及羞恥的狀態中。實施這種嚴厲政策的方法常受制於環境的性質。在卡斐人中，兒童都被強制臥在地上，不得用蓆，目的是在鍛鍊他們的身體。有許多兒童就死於這種規律之下。然而這樣的死，在他們是不足介意的。女孩子也是要受刻苦耐痛的訓練的。

不僅身體而已，就是兒童們的情緒也須適合民族的定型，興趣也須適合民族的慣例。這種心態及情趣的培養，必須由意識的訓練，不能一任自然。因爲種種態度，習慣，乃至瑣細的禮貌，都是先代從試行錯誤（Trial and error）的過程所生的社會進化之結果，比較來得複雜而精微。安達曼（Andaman）的兒童常因疏忽魯莽而受申斥；反

之，却常被教授要大量，要克己，要休戚相關，要把食物分給別人。在阿依奴人，則教兒童尊敬先輩，伺候先輩，在先輩行時讓路，在先輩面前脫帽。在美洲印第安人間，年輕人從小就受禮貌的訓練。嚴禁直接招呼。“親族關係的稱號，或某種尊稱常為一般所使用，以代替人名……我們受過教訓要愛護貧苦人，要崇敬上天。”

沒有文字的地方，全靠口傳口誦以保存過去的文化。原始的科學及哲學，也同原始的民族史一樣，都是從講說中留存的。適當加上一種韻律，使說話變成詩歌，就更易叫兒童記誦。如剛果地方的波羅克 (Boloki)，沒有這樣歷史的文獻，因為種族中無人能寫；但由於口碑的相傳，也能把種族的起源，遷徙等等從父親傳給兒子。

講談的內容，是教訓的道德的。每種講談包含當地法律或習慣或儀式中之一點。有許多講談，自是不知來歷的文化產物之結晶，不過由社會的力量因襲下來。在馬達加斯加的好佛 (Hova) 人間，稱這種傳說的學問為“耳的遺產”。此外，還有寓言，成語等，構成為兒童的‘教科書’。如阿依奴人的

故事，我們可以發見其目的爲鼓勵勤勉，敬老，而禁止怠惰，貪慾。兒童對於這種道德的敘述，都喜歡聽，且能實踐。其結果，“他學唱前代的情歌及愛歌。沒有新的路給他走，他只循着舊來的路。”

由上所述，兒童的教育最先以‘自學’爲根據，後來略受父母及長老的訓練以養成社會生活所必需的身體上及精神上的傾向。到了發育完成的時候，他經過一種特殊的儀式，就算一切經驗達於頂點，由是兒童變爲社會上成熟的個人，即獨立的種族人（Tribesman）了。這個儀式就是加入成人式（Initiation Ceremony）。

第三，便來講由於加入式的教育。

加入式是表示兒童已經成人，已經社會化，因此給他取名字，招他入團體，引導他接近祖先的及保護人的神靈；要之，由此獲得公衆的承認。諸種“技巧上”的文化，如得食，製器，造房子等的方法，是逐漸由兒童天性的衝動以吸收的。但“道德上”的文化或風習，爲民族生活中思想和情感的原則或法式；由這種狀態中所吸取者，自然不算完全。

所以這些必須由團體更有意識地去灌注。現在所要講的加入式，把民族生活的大門向兒童開放，就有徹底完成這個目的的效用，那就是創造出社會的心理或人格。

到了青春期，兒童的生理上及感情上所發生的某種改變，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這種性慾上的成熟也含有青年的社會地位發生危機的意味，因為在青年期中及青春後，他已獲得了創造新的社會關係之可能性，且足以動搖現存的社會秩序。所以在許多地方，成人式的根本作用是在公認個人的這種生理變化的存在，預備讓他參加成人的地位，以享受公認的性交權利，並遵行種族的義務，但在別的地方，成人式並不和兒童的青春相應。這是由於當初以表示個人生理變化為作用的成人式，在不久之後，即變為引入種族的社會生活的象徵，故不僅完全依據生理的成熟。

視文化的性質如何，可以規定行加入式的年齡。在瑪賽 (Masai) 人間，兒童到配服軍役的時候，就舉行割禮 (Circumcision) 及成人儀式。在婆羅洲，兒童之獲得社會的地位，是當第二次他在戰爭

中擊中敵人之頭的時候。就年齡言，大概是在八歲至十五歲之間。所以實際上，儘有許多大孩子，因為多年間未曾奪得敵人的首級，仍然被視為兒童。在有些地方，如非支 (Fiji)，加入式可以延期舉行，作為對行為不善的一種受罰，於是他就只好處於兒童的地位，只好受人侮蔑。

成人式之脫離生理關係而依重社會關係，是為風習的勢力超過個人私事之證明。由是，在Kaonde的女子，成人式不舉行於青春期，却舉行於青春期之前。原因在認延遲到月經來時再舉行，是非常的危險。在Nanzola的Ila人間，也認女子若不從早舉行成人式，她們會得永不行月經。

與成人式最有密接關係者為割禮（割去男子生殖器的包皮，或女子生殖器的內陰唇）。這顯然表示適於行性的生活，因之和兒童的生理發育相關。惟後因文化演進，另有派生的意義附屬於這種習慣，且把它併合到一般的成人儀式中。這樣，它就變為少年進入社會的成熟之象徵，而不一定和生理的成熟相應。

未行過割禮的卡斐男子，將終身被視為兒童，

婦女們都要嘲笑他，輕蔑他，在社會的意義上竟當作已經死了的看待，因為他是不能參加評議會的。這樣的一個男子，不能有所有權，也不能成為兵士。婦人決不會想着要嫁這種可憐蟲的。

行割禮的年齡並不限定：“祇消行過割禮，即使他尚不過八歲的兒童，也算變為成人；他且是個戰士，有作戰的義務。”瑪賽人的兒童，到了能執槍持楯時，就給他行割禮。不過這種儀式雖已失却原始的生物學上的意義；而在舉行割禮的人民中間，仍然流行着一種信仰，就是認割禮為可以幫助生殖；假使不行割禮，將難免人口稀少的結果。自然，照上所述，完全缺少這種動機的民族，是存在着的；有如今日的猶太人及阿剌伯人，便只認這種慣習為具有成人資格之一種標徽。

由此可見成人儀式是表示少年由社會的孩提時期進於社會的成熟時期。這一社會化的過程原是漸進的，積聚的。但在原始人看來，所有這些主要的改變是確乎驟然的，突發的。舉行儀式的用意，是在斷絕少年的那種過去關係，把他看做在過去已經死亡，而今則重新活命，進到一個完全新穎

的世界而變爲成人。因此特地創出一種異常的環境，讓少年意識到這種重大的變遷。在舉行儀式期內，他覺得和舊的生活已經割斷，却被放在孤寂無侶的境遇中，以經歷新的生活。

例如在東非洲的南狄（Nandi）人間，男孩子同女孩子要服瀉藥，要剃光頭顱，藉以表示斷絕了兒童時代的關係，行將獲得全新的人格。在荷蘭的新基內亞（Dutch New Guinea），當男兒入大人屋內受教訓時，他們是被蒙了眼睛，不見什麼的。直到後來，他們才能看到放在那兒的各樣物件，作爲新境遇的表示，用 Lafitau 的說法：“這些可憐的孩子飲了那麼多的 Lethe 的水，所以他們已忘記一切事情，父母，朋友，自己的過去甚至自己的言語了。”也有用丟棄破舊的衣服以表示隔離的。如在洛諦西亞（Rhodesia）的女孩子，當舉行成人儀式時，就把舊衣丟在父母住的茅屋頂上，就算脫離了兒童的關係。

在舉行儀式期內，爲表示新的重大變革起見，特給受加入禮者以種種的特權。如竊盜穀物，殺害畜羣，甚至性的亂交，都可不受責罰。還有事物的

名稱，也要由長老數以新的。這種種無非表示舊的已去，而新者待來。

行儀式時，也需要與婦女隔離。這表示過去，他是屬於母親，現在則開始屬於男子和男子的社會。種族中的成年男子大都要出席，以表示將社會生活的習慣和風俗等等，由於這種儀式，傳給後輩。兒童從此獲得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且負起對全體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來。就是，他不得再一任自己所欲以行，却要適合慣習的要求，做一家之主，做食糧供給之有力分子，做祭禮之參與者，做祖先神靈之崇拜者。也就是由於儀式，使少年具有成人應負的責任心，具有服從老人，服從種族風習的感情，具有不僅供養家族，且須貢獻全社會的資格。

在儀式性質上之特別重要者，為加於少年身上的許多權利與義務。所謂權利，是由此變成戰士，獵人，選舉人，跳舞者，吸煙者以及其他諸種為一個獨立的成年男子或女子所應享的特權。但這種權利之獲得是須以嚴重的義務為前提的。這兒最有關係者，自是食物的義務。因此有絕食戒食之舉。其用意在“使每個新的社會成員具有食物之社

會的價值之意識……簡言之，是在使他體認食物屬於社會所有，個人所當感謝社會者，不僅是噬食的權力，也且是使用食物而無危險的權力；這種權力之賜與也就表示個人當接受相應的義務。”所以爲指示這種依存關係見起，兒童的食物必須依照儀式由已通過成人儀式的朋友或親族來給與。長老也由此把‘吃的權利’，給與受加入禮者。

其次授與衣服也爲社會的成熟之外表的特徵之一。有幾種享樂的活動，如飲酒吸煙等，也須到了這個時期才允許；而取得敵人的血，却爲正式加入種族的鄭重義務。

因爲加入禮是原始社會中個人生活上最嚴重的單一的禮節，所以對於受加入禮者予以嚴重的警告，即不得洩漏祕密，如果違犯，必將受最可怖的懲罰。外人自然更難參加。所以關於儀式中的進行事項，我們所能知道的非常之少，就是爲此。

在儀式期內，兒童是不許舒服過活的。他更須幽禁起來，甚至不許說話，發笑。也不得洗浴。有時所受的鞭打苦楚，簡直難以置信。如柏楚阿那（Bechuana）的男兒，每天早晨要裸着體排隊

“跳上的男人，帶着堅韌的長而薄的杖……作一種名叫‘Khoa’的跳舞，同時問兒童，‘你將盡力保護首領嗎？’‘你將盡力看守畜羣嗎？’當兒童們作肯定的答復時，那些男人就衝上去，用全力向每個兒童的背上打，……又揮軟杖在他的背上，讓鮮血直滾出來。跳舞終了時，男兒們的背上都是傷處和鞭痕，這種創痕且將終身不湮。”南狄男兒所受的試驗是：“每個男兒抱持在他前面者的腰部，且須屈身下去，讓他的頭蓋在前人的臀下。……在檻的入口與出口，都站着執刺針和大黃蜂的武士。他們用刺針連刺男兒的面部及私處，用大黃蜂落在男兒的背上”。

其他痛楚同試驗還有種種。如男兒稍有畏難之色，立刻受人輕蔑侮弄，結果只好自殺。巴蘇陀（Basuto）人要把企圖逃避的男兒弄死；在澳洲的Euablayi部落，要把胆怯的男兒退回他的母親，認為不配行加入禮，“不久之後，就會有毒的棍或骨置他於死地。”

最最重要的活動為每個男兒所必須貢獻者，是獲得食物。為加強這種印象起見，故如澳洲的男

兒，當參加成人式時，便須在相當的長時期內斷食，藉以鼓勵自制的感情。在帕普安人間，則教男兒要省吃。俄馬哈（Omaha）的少年必須斷食四晝夜，當在獨居受試期內不得使用他的父親所給的弓箭。

在這種苦行之下，自然有許多男兒因受不起磨折而喪命的。他們死了，也就被秘密地埋在附近處所，不得有什麼葬儀或哀聲。因為這種個人不算具有獨立人格的。

另外還用可怕的方法，讓受試者感覺到超自然的鬼神之魔力。長老們對於種種大力，恐怖，威嚇都附會上神祕的假說；對於奇怪的聲音及朦朧的預兆都解作祖先精靈之發作。這種種都是用以壓倒年輕人的意志，消除他們對於儀式進程中所發生的疑問。受過這種痛苦恐怖之後，他或她自然只好求助於長老，受制於習俗了。

在所傳授的知識裏邊，似乎常常含有衛生上，道德上，及日常職業上的教訓。試舉托列斯海峽（Torres Straits）的土人為例。他們向兒童所指示的是如此：“要是兩個男兒是朋友，他們便不可和

各人的姊妹結婚；否則是可羞愧的。要是有人需要食物或水或是他物，你要給他；要是你只有一點兒，你可不給，假若你有許多，你要給他一半。把你所有的魚，分一半給你的父母；決不可菲薄。對母親決不要說壞話。父同母像在胃中的食物一樣；他們死時，你會覺得饑餓。對於父母的兄弟及他們的子女也要留意。要是你的兄弟出去鬥爭，你要幫他，一起去；不要讓他先行。”由此可見勸告的內容都是要使少年負起對父母及親族的責任的。個人的私慾，在這兒必須犧牲。

女孩子所受的儀式，往往和男孩子的相似，且常是相模仿的，當女子初次來月經時，須離羣他去。在這期內，按照民族的習慣，教以做成年婦人應有的態度及行為。當行儀式時，她也須受試煉。如在亞馬孫河 (Amazon River) 區域，當女孩第一次行經時，所有她的親族及朋友都聚集在一起，“每人帶來彈性的藤條；然後將女孩全身赤裸裸地放在他們的中間，每個在場的人就用藤條在她的背部及腰部重重的打五六回，一直打到她昏了過去，有時候甚至打死了。”其他禁止吃鮮魚，強制掘

溝以練習苦工，做日常用品如籃，簾，繩之類。

要之，這種試鍊，苦行，教授，訓誡所彙成的力量，所及於年輕人品格上的影響，大至無比。這種過程所經過的時期，在有些地方須延長到幾個月。從受畢儀式回來，他真是個新人物了。他覺得一切都是新的，不認識什麼人，連父母也不認得。實際上，這位新人物確是受着盡優極美的待遇，一直到他已經和他的環境相稔熟時才止。他穿起新衣，剃光新頭，洗過新浴，大家都來慶賀一個新生命的出世。他如今已被視為成人，他的精神將要永存；當他死時，他的名字將送給家中另一成員襲用，由此表示他的人格在種族生活中獲得永遠的承認。所以成人儀式，是原始社會中個人非常重要的機會——是做得成人或做不成人的一個關頭。我們要說原始社會中惟一的正式的教育制度，就只有這個社會的一般的訓練——成人儀式——可舉。

以上就現存未開化種族間之原始的教育狀態，來供我們研究氏族制度社會之教育的補助。雖然這兒所述無多，但已足以證明原始社會的教育，

是沒有如第二節所敘那幾種變態的。這種教育，實是只有生物學的目的，就是以‘保存種族’爲目的。絕無支配的意味含在裏面。雖有尊重長老的教訓，可不是階級性；長老之值得尊重，是爲了代表全社會的利益；尊敬長老，就無異尊敬全社會，除此別無作用。

我們說過，教育的變質起於社會的分成階級，即起於私有財產制度與國家制度的勃興。因之，原始共產社會教育的特徵，就在無階級性，無尊重私產，擁護支配權的內容，教育與勞動不分，是每個人，無論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權利與義務的。

有這種共產制度的種族，很不容易根本消滅財產共有的觀念。例如美國南部黑人的竊盜，據說完全是由不能理解私有的觀念而來。教育史上，布爾喬學者記載斯巴達教育之使兒童學習偷竊，平時教以竊取生活上必需之物而不爲人所偵獲爲貴，視爲是鼓勵勇敢與機智的教育法。實則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說，這乃是原始共產制的遺習對於新興財產私有制之本能的反抗。

但人類歷史自氏族制度崩壞，進入於文明期，

在教育上也發生了大變革。第一個階級社會是奴隸所有者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支配階級有閑暇可受文雅的教育，奴隸們則只許勞動；由此把勞動與教育截然分途，即把實踐與理論開始隔離。本來有生存權者都可享受教育，如今則所有者獨占教育的特權，無所有者既無生活權也無教育權。爲所有者所獨占的教育，就帶有貴族性，是裝飾品而非必需品。即有對平民所施的教育，也非與平民自身實際生活的需要相應。故在教育目的上，不復是單純的生物學的目的，而是擁護私有財產。原來自氏族制度被財產私有制度崩壞以後，所有者的支配階級不能不要求一種適應新的經濟組織之新的政治形態。於是由地域與財產所聯繫的階級支配之國家制度應運而生，且須用強制與權力以統一社會。教育上自也不得不有相應的改變。這樣，在約四五千年以前，當世上人類之歷史初現曙光時，我們已有階級的國家，也就有階級的教育。

希臘羅馬的教育，就是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教育，這種教育的特徵，已在第二節中有所說及。惟我們爲便利計，將不特加敘述，即進而講封建社會

的教育；反正封建社會的農奴，其地位和奴隸差不了多少，只不過比奴隸略多一點人權罷了。

問 題

- 一、氏族制度社會的特徵何在？
- 二、在這個社會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如何？
- 三、原始社會兒童所學習的，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有何關係？
- 四、原始社會中教育的行動與教育的制度，在本質上有什麼差別？
- 五、這種教育，由誰實施？又爲了誰而實施？
- 六、階級的教育起於何時，根於何種原因？

第 六 節

封建社會的教育

封建社會的概觀。——歐洲封建社會的教育。——基督
教支配下的教育。——武士教育。——大學教育。——
市民教育。——特權。——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貴
族專享的教育。——重禮儀的教育。——造就統治人材的
教育。——教育上的封建觀念與反封建勢力的鬥爭。——
附錄。

封建社會是怎樣的社會？這個，我們須得先行
說明——自然是簡單的說明。

封建社會是以土地所有為中心要素的一種社

會。就歐洲言，是從第九世紀至中世末期即第十五世紀盛行於北歐及西歐的社會制度。封建制度的特徵，是土地屬於大領主——通稱為國王——所有；他把自己直轄地以外的土地分為封土或領土，以之分授於小領主——通稱為諸侯；諸侯又分土地於自己的家臣；家臣更細分之，以分配於農奴。大領主小領主及家臣等的關係，是君臣主從之絕對的命令關係，以服軍役為主要義務。農奴是當時唯一的生產者；他們從事農業，在全部生產之中，除自己生活最低限的資料以外，全被領主剝奪，甚至連遷居的自由都沒有的。當時的工業尚屬幼稚，即為手工業的時代；此等手工業者雇用徒弟做工，住於都市。他們雖也被領主所榨取，但經營獨立都市，似與領主相對抗。像這樣由土地所有者之各階級層所確立的社會秩序，就叫做封建制度。換句話說，封建制度是建於以土地為最主要生產機關的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社會制度。農奴即為這時代唯一的生產階級，一切上層階級都寄生在上面，靠他們來支持。

當西歐封建制度興盛時，西歐基督教的勢力

已很偉大。基督教，自與康斯坦丁帝勾結，成為羅馬帝國的御用宗教以後，因得政權的援助，竟得在歐洲廣為傳布；羅馬教會且成為羅馬文化的保護者。自日耳曼蠻族南侵，教會又與以教化，指導他們耕種製造的方法。故西羅馬帝國雖然滅亡，而神聖羅馬教會還居然保持着帝王般的支配勢力。

到日耳曼蠻族漸次住定時，基督教會更負有農村組織者的功用。原來當時的教會實為過去文化的唯一貯藏所，僧侶既能讀寫，又能醫療，更能知道播種及收穫的時期；因此教會的勢力深入於民衆生活的內部，馴致成為政治的組織者。

羅馬教會的領袖就是羅馬教皇，他和頂有勢力的王侯的兵力相結納，圖謀羅馬帝國之復興。到了十二世紀之末及十三世紀之初，教會的勢力且凌駕國王公侯之上，而使他們成為教會的附庸。因之教會得於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上造成更穩固的自己的地位；換句話說，教會具有統治全歐物質的及精神的生活之權威，使封建時代所有的思想都帶上宗教的色彩。

至於中國的封建制度，以周代為最盛，到春秋

戰國時期歸於分解。但自秦以來，封建的制度雖已不存在，而封建的勢力並未被消滅。原因在於爲封建制度之本質的農業經濟沒有發生變革；所以儘管改朝換代，依然不脫封建社會的積習。試就目下農村中封建地主的剝削方式而論，地主越小，他的剝削方法越厲害，越凶惡，他的出租田地的條件也越苛刻。雖有進步的（資產階級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却和落後的半封建式的剝削農民方式互相勾結。因之一般的農業經濟停滯而衰落，大多數的農民生產者羣衆顛於餓死的境地。所謂公地的地租，表面上說是公共機關的收入，其實都是豪紳的收入；而豪紳在經濟上就是地主。還有軍閥的課租也等於收租，軍閥且更實行一種封建式的軍事徭役。故若有人說中國農村現在已經沒有封建殘餘，已經沒有封建剝削，從而主張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已經長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是錯誤的。

封建制度的基礎爲廣大的封土，而廣大的封土是靠剝削農民以保持的。徭役與賦稅便占去農民大部分的時間和經濟。戰國時代農民困苦的情景，可由孟子所說的話以爲證。孟子說：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由這可見封建時代農民所受剝削的厲害。如今封建制度的殘餘，依然到處存在——因到處有地主豪紳軍閥——國際帝國主義還企圖與封建勢力勾結，故農民所受剝削爲尤甚。中國目前的革命，還不能不把肅清封建勢力爲任務之一，即爲了這個緣故。

以上約略說明歐洲及中國的封建社會的概況，現在繼續來講封建社會的教育，看它是怎樣變質，又怎樣和當時的社會階段相適應。

先說歐洲中世的教育。

歐洲中世的支配階級，一爲封建貴族，一爲羅馬教會；前者是世俗的國王諸侯及武士，後者是名義上非世俗而事實上也占有土地（寺院教堂的土地至少佔土地全部三分之一）也出有諸侯（主教僧正）和普通諸侯沒有多大分別的宗教帝國；這兩者互相結納，朋比爲奸；至八世紀之終，羅馬教皇利

用查理大帝幼稚的虛榮心，授以帝冠，使復興西羅馬帝國。由是基督教會之世俗的權威足以支配封建主義全盛期中歐羅巴諸國之王。教皇與封建君主之間雖也有爭鬥，却是屬於支配階級內部的衝突，至一般農奴及都市平民都是被壓迫的。

在這種社會環境中所設施的教育，一是基督教的教育，以養成僧侶或以傳播基督教的信仰爲目的；農民大眾雖不是完全沒有受教育，但鄙野終是十分普遍，而且所受教育，也以準備來世爲主，和現實生活無關。²一是武士教育，專教貴族子弟，是養成封建階級的衛隊的機關；不過是反基督教權的教育。以上二種雖說不相一致，然其爲由支配階級且替支配階級謀利益的教育是相同的；教育目的，前者在擁護教義，後者在盡忠國王，總之皆不出乎宗教的道德的範圍。

另有二種教育，一是大學教育，一是市民教育，其起源是含有反教會乃至反封建階級的意味的；然到了中世紀之終，仍未能完全擺脫教會的支配。

以下且依次作較詳的說明。

前已說過，歐洲中世紀的學校，是帶有極濃重的宗教性質的。故不惟修道院學校與寺院學校，顯然是教會的神學的；即其他學校生活與授業課程，也莫不同樣含有教會的神學的精神。這種基督教的教育，最初是用問答教授法——起於中世紀開始以前，以道德的修練為主；以後成為教父的教育，竭力排斥希臘思想，拒絕異教知識；學者如奧古斯丁甚至宣言“建設天國者是無學者。”所以迷信與無知的濃雲，在羅馬教會支配之下，層層籠罩；到第八世紀，黑暗達於極點，學問二字差不多已從全歐羅巴大陸消影滅迹。

自查理大帝從羅馬教皇戴上西羅馬皇帝之冠以後，雖設立所謂教育普及會，叫各僧院設立學校，教授唱歌，算術，文法；當時最有名的學者阿爾琴，且頗保護所謂自由七科；但教義仍以教義為本，因為宗教畢竟是吸收民心的工具。

當時由於查理及阿爾琴提倡教育的影響，大致形成了這樣三個階段的教育：（一）初等教育由教區的僧侶教授；（二）中等教育，與寺院連絡或在僧院教授；（三）高等教育，限於‘家庭教育。’

在羅馬教會的權力支配全歐羅巴時，一面有莊嚴的哥特寺院，到處高聳；一面有讚美神祕的迷信之詩歌，隨地吟唱；到了十一世紀，更有爲證明聖書奇蹟與天地開闢之御用學問卽煩瑣哲學發達起來。這種哲學企圖用論理或辯證法以作宗教上信仰之證明，企圖給以前種種神祕的遁世的僧侶之人生觀以合理的根據。因此，一方面固然呈現排斥教權而重視理性之傾向；但實際上，乃如第八世紀查理大帝之復興古學，爲教會而利用文法修詞；煩瑣哲學之研究神學，也爲教會問題而利用希臘哲學。原來這時候東方的回教已經着着進逼，基督教會立於防禦的地位，爲對抗計，不得已祇好向向來視爲妨礙信仰的文法、修詞、論理俯首，權請它們來做武器。煩瑣哲學就是應這個機運而產生的。

中世末葉興起的中世大學雖說起於社會生活的要求，具有獨立的學術機關之性質；但因當時的教會尙占有最高權力，故神學科不得不設；卽在大學以外，神學的研究也極興盛。大學雖尙有法科醫科，但如有名的巴黎大學及牛津大學竟尙以神學

爲主科。十二世紀後半在由基督教之監督長所監督的學校中，實施神學中心之教育。其他高僧教會學校也復如此。

在這樣惟以基督教義爲主的教育，自然沒有所謂科學的精神。反之，一切科學的研究，智識的追求，以及疑問的發生，却都要視爲罪惡；有違反禁例者，且由宗教裁判予以嚴罰。人們只須信仰祈禱，一切問題要由上帝的全能來解決。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初期教會之組織的機能已告終結，過去智識之貯藏已屬喪失，如今却變爲代表中世黑暗與保守的最迷頑思想之淵源了。

其他受基督教會支配的學校，有文法學校唱歌學校等。文法學校教拉丁語，唱歌學校教唱歌及讀書。十四世紀以後，有許多學校（附設於小寺），凡有僧侶二人同居之處，即以一人教文法學校程度，一人教唱歌學校程度即下級生。這種學校支配十四五世紀之初等教育；故雖至十五世紀即距今五百年前，基督教的精神仍不失爲一個教育的中心。

當時的女子教育，是在尼院學校學習音樂手

藝拉丁語等，畢業後在婦人之私室受遁世的隔離的修養，即依然不脫中世基督教的性質。

另一種支配階級的教育是武士教育。但這却是反抗基督教權的教育，不以養成僧侶這種勞動力爲目的，而以養成騎士這種勞動力爲目的。

自在日耳曼人間開始實現封建制度後，武士遂跟着諸侯以出現。預備一朝有事，可以替國王効忠。日耳曼人雖然受了基督教會的影響，信奉基督教；但以日耳曼人的蠻性，是不易屈服於厭世的教權的；何況自第十世紀的黑暗時代以後，查理大帝國已陷於分裂，基督教會又腐敗透頂，於是日耳曼人之現世的進取的‘野蠻性’，更不滿意於基督教之隱遁的教權。所謂武士的教育，遂跟着封建制度的發達而勃興。

就當時武士與君主的關係而言，是以密接的義務關係相結合的；就是君主對臣下有扶養與保護之責任，武士對君主有忠誠與服務之義務。又因日耳曼人尚有母系制的遺迹，對婦女保有尊敬之風（今日歐羅巴人之有尊重婦人的習慣，還是當時的遺風）。故武士教育的目的就在効忠主人與保護

婦女。所受學科爲騎馬，游泳，射術，~~聖術~~，狩獵，將棋，作詩之七藝，又注重練習交際，鼓舞名譽心，與基督教教育之性質正相反，且爲宗教的勢力所不及。祇不過因爲基督教對世俗的權威究竟確立已久，故雖在武士教育中，也要學習教義，並宣誓保護基督教而已。

然唯這種武士教育才真是封建階級本身所必要的教育。又因武士是一種榮譽，將貴族少年可以承受；有時平民有了特殊的武功，才可望得這種榮譽。

至於大學教育，是不由教會或國家之階級的支配所生的。在中世歐羅巴發生大學之前，高級的教育機關祇能從寺院的學校中見到；但這不是適應一般社會之要求，而祇爲養成僧侶的機關。自東方文明侵入西歐，回教徒的工商業爲世界的發達之後，教會的教育機關已不能適應現實的社會生活之要求，於是很自然地在各個文化中心地發生了應於社會需要之學術教育機關。這種因社會的統制所生之組織，雖然爲避免教會的迫害，不得不擺脫教會的統制；可是它決非寺院學校的繼承者，

反之却與教會取對立的態度。所以大學教育的性質，很與廣義的社會生產之目的相一致；大學所設學科，如醫學法學等，是全立於基督教教育之範圍外的，而且學者極為踴躍。

最後一種市民教育，即工商業者的教育。原來在封建領主的居城與教會的建築所在之處，便有專門的手工業者與交易物產的行商出現，且形成了常設的市場，終於發達為中世後期的新商業都市。特別自十字軍失敗以來，教皇的權威漸漸失墜，武士階級也趨衰落，而他方因恢復了對東方的交通，却有種種新知識輸入到西歐；結果，一面為上述獨立的大學之發達，同時即為各地都市之勃興。都市中之工商業者因在法律上未獲相當的保護，為相互扶助并促進職業計，特組織基爾特。所以基爾特的成立，是與當時的國家及教會取對立的地位，正與中世大學之得成為獨立的組織之社會的動因，同其性質。他們乃以一市的經費，設立一種特殊的學校，專教子弟以實際的知識。此種學校，對寺院學校而言，稱為市民學校。惟因僧侶的干涉，未能發達。其種類有習字學校，拉丁學校，而

基爾特教授即繼續至近代的徒弟制度，或可視為當時生活行動上較有組織的教育制度。

綜起來說，歐洲封建社會中的教育，表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教會支配的教育最占勢力。（二）農民大眾是農奴，介乎奴隸和自由人之間；他們和土地相連續，和土地一起買賣；他們過着季復季年復年的單調生活，在同一寂寞而污陋的村莊中，在同一寒冷而幽暗的茅舍中，食着同一的黑麵包與鹽肉；像這樣淒涼的農民生活，自然得不着什麼文化的潤澤；即使能識字讀書，也不過為接受基督教義的方便，好博得上帝的歡心，以祈求來世的酬報而已，於他們的實際生活可說全無好處。（三）所謂反教權的武士教育，乃是為封建貴族所特享的教育，也是為了封建貴族的利益的教育。（四）大學的發生雖當作獨立的社會集團，與教會立於對抗的地位，但也限於因宗教關係而受基督教迫害的一國知識分子，與當時的農民利益殊無多大關係；而且往後，有許多大學是以封建的貴族為創設者或後援者，自近代的民族國家發生，大學已處於國家的支配之下，而失去獨立的性質。（五）祇有市民教

育算是當時新興的工商階級對抗封建階級即支配階級的教育，然而僅在萌芽，其發達尙待後來。

這樣的教育，已經是階級性的教育，不復是全人類全社會的教育；換言之，這是變質了的教育，可以到處發現上述變質教育的特徵的。

現在再看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如何。

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更明確地可以說是貴族專有的教育，是重禮樂的教育，是養成支配人才的教育。

傳說中的庠，序，學等等，只是養老及教育貴族子弟的場所。

當封建制度成立以後，農民一方面耕分田，同時耕公田，婦子也都跟着做工。他們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的。

周禮一類的書，係漢人所偽託，固不足爲憑。但即據這種偽記，也可見受教育者仍是貴族。如周禮載：

“師氏，……以教國子弟，凡貴遊子弟學焉。大司樂，學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又如禮記文王世子也說：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這兒所說貴遊子弟，國子，諸子，乃至世子及學士，都是指諸侯卿大夫的子弟而言。

傳說中所謂學科是禮樂射御書數等；由“威儀三百，禮儀三千”的古語，可知當時教育的內容，只是道德教育，只是‘嚴尊卑別上下’的維持封建社會秩序的教育。

女子教育，據內則所述，大致如此：女子七歲不與男子同席，十歲不出門，學婉順服從的婦德，習蠶絲紡織等女工，又習酒醴，簋豆，烹飪，祭祖的禮節。十五始笄，二十始嫁。至於貴族女子，則有官宮宗室之教。而女子教育的重要科目，爲婦德，婦容，婦言，婦功。

但我們不能相信這是可靠的記載；因爲在驅役勞動之下，農夫及其婦子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更何有於女子教育？

當時教育的目的，是在養成治理人才。請看論語中說：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孔子答樊遲的話，更可顯然證明當時的教育和實際的生產勞動分了家：

“樊遲問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焉用稼！”

到了戰國時代，更有如孟子所說的：

“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而當時所謂勞力者的生活狀態，正如上引孟子所說“……救死唯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他們固然受不到教育，也正不需要這種‘食不飽，衣不暖’的裝飾教育。

由此可見周代及春秋戰國時代，即封建制度盛行及趨於分解時代的教育，早已是貴賤有別的不平等教育，早已是遠離社會勞動的教育。可是現在竟有人說“……中國國民在歷史上即爲平等”，“周時每值春初，村中人民，無論男女老幼自早即

往學校聽講，至晚方歸，並注重普及教育；”（註一），更有人相信周代教育是以‘養成完全人格’爲目的的教育，是‘以德化民的’平民教育，（註二），豈不是不可救藥的大錯誤？

到了漢朝，文帝始置博士，武帝則退百家，崇儒術；武帝既興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又令天下郡國立學校；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百人；宣帝又增博士弟子員至二百人；元帝好儒，設員千人；成帝時，增太學弟子至三千人；光武營造太學，立五經博士；質帝時游學者愈多，增至三萬餘人。這所謂博士弟子員乃至太學生等是什麼人？當然是以官僚貴族子弟居多；至於要“治官府，給繇役，……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賣田宅，鬻子孫……”（朝錯說）的農民子弟，顯然是無異的。

“東漢太學生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黃宗羲說）可見太學生治學的目的，不脫‘爲政’一途。

唐代太宗時，大興學校，立孔子廟堂於國學，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增學舍一千二百間，以養

天下的賢能。當時的學制，在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崇文館等六學二館，學科爲禮記，春秋，詩經，書經等，也有律學算學，入學者限於高官子弟及平民中的優秀者。地方依州縣而有定額的學生，凡地方官吏及平民都可入學，學科全以諸經爲準。

宋代的國子學，爲官僚子弟所獨有。明代的國子學，官民優秀子弟皆有。清代的宗學，太學，國子監，皆是官僚子弟。

漢以後有選舉及科舉制度。這有兩種作用；一是攷取官吏，且以羈縻士子；一是攝取社會勢力，藉以維持社會秩序。

漢初以賢良方正，孝廉及博士弟子三種取士，由郡國評定儒生的學行，以定去取。魏時改爲九品官人法，由郡邑的中正，按其人鄉評的高下，決定上上或上中上下等；再送至大中正用同樣方法攷核。其流弊成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到得隋初，改用詩賦策問取士。唐代科舉，士子不論貧富，都可自諸州縣受攷；當時一方面攷詩賦，一方面攷‘帖括’，都不是實際社會所需要。這種風氣到唐末兩宋而極盛。遂至“詩賦之弊，流於浮華；帖括

之弊，陷於記誦。”而行賄，挾卷，交通關節的情弊，已自唐代發生。北宋完全以經義策論取士；至明清兩代，更以四書五經的制藝爲攷試方法；這證明明清的社會仍然需要儒家的學說以維持社會的秩序。而儒家學說正是代表封建社會的意識的，所以更可證明明清的社會依然保存着封建社會的遺制。

至清代中葉而後，受了歐洲資本主義的影響，攷試方面曾設博學鴻詞及經濟特科等。至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有興學校，廢八股，攷試用時務策論等的新設施；一九〇一年更就各地書院改設各級學堂；但教科仍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爲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學藝爲輔。至一九〇五年完全廢除科舉；翌年更宣布教育宗旨爲忠君，尊孔，尙公，尙武，尙實；在是年所頒布的上諭中，更明白申明：

“學堂以中學爲主，西學爲輔；培養通才，首重德育；並以忠君，尊孔，尙武，尙實諸端定其標準。”

不僅清季的教育爲然，就是民國元年教育部

所公布的教育宗旨，還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民國四年袁世凱所頒布的教育宗旨則爲“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躁進；”而特別加重：

“凡一切邪說暴行，足以啓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若鷹鷂之逐鳥雀。”

就是到了最近，我們還可以時常聽到‘恢復古有道德’一類的話。小學校中竟還有沿用四書五經女兒經，百家姓，千字文，龍文鞭影等書爲課本的。（註三）

至於自宋以後私立的書院私塾，雖算是比較普及的民間教育機關，然一般平民之入學者仍然無多，而且‘課程’偏於經義。以科舉所定的程式爲準；尤其是私塾，所讀的不外三字經，神童詩，幼學瓊林及四書五經等，要皆爲傳授封建道德的書籍，極頂的成績就不過知道些‘忠孝節義’罷了。

要之，從中國自古以來的教育制度（包括學校及選舉）及教育精神看來，確乎到處脫離不掉封建的意味，一般平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教育內容注

重道德，即荀子所謂“儒者法先王，隆禮儀”；論語所謂“不好作亂而好犯上者鮮矣”；若用最近法令上的用語，則叫做“仍宗儒經”。這種教育的目的是在養成官僚和豪紳——便是‘士大夫’，以幫助封建階級去實行剝削，維持秩序。

封建勢力不肅清，教育上的封建觀念無法根絕。所以從事革命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參加掃除封建制度一切殘餘的鬥爭——自然要聯繫到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註一)中華出版舒新城編教育通論第十九頁及第五十一頁。

(註二)商務出版范壽康編教育史論周代的教育。

(註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民權日報載：“皖教廳昨通令各縣，取締小學沿用四書五經，其文曰：(上略)茲據本廳各督學報告，本省各小學照章採用審定之教科書者固多，而沿用四書，五經，女兒經，百家姓，千字文，龍文鞭影等書為課本者，亦所在多有。此等書本或文理深奧，不合小學教材之用；或意義頹舊，不合時代潮流；更有懸疑意義，偏重背誦者；若仍舊沿用，貽誤兒童，實非淺鮮。(下略)”

問 題

- 一。試述中世歐洲的教育對社會階級的關係。
- 二。基督教教育的性質如何？試批判中國現時的教會教育。
- 三。歐洲中世的大學起源是怎樣起源的？
- 四。中國史往往稱周代爲文物大備的朝代，你覺得可以置信嗎？中國國民在歷史上果是平等的嗎？
- 五。你的本鄉想必還有許多私塾，你可調查它們究竟教些什麼給兒童。
- 六。教育上的封建觀念是哪些？試舉出具體的實例。

第 七 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

資本主義社會的概觀。——與封建社會教育的比較。
——所謂新教育的特徵：——1, 勞動化。——2, 科學化。
——3, 社會化。——4, 中立化。——5, 國際化。——我們的批判。——兩大變質：——1, 獨占化。——2, 商品化。
——三大矛盾：——1, 個性化與商品化的。——2, 勞動與教育的。——3, 自由研究與支配思想的。——國風。

資本主義社會便是我們現在大家所生活着的社會——是就全世界來說。這一個社會也叫做資本家的社會，因為這兒的台柱子是資本家，而‘跑

龍套'則爲勞動者。這是兩大基本階級,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相對立的社會,也便是自有歷史以來階級鬥爭形勢最尖銳化的時代,從而更是歷史上要發生劇變,即將由階級社會趨於階級消滅而形成全人類社會的階段。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扼要地說,可舉三點:(一)是商品生產,(二)是少數資本家獨占生產手段,(三)是工銀勞動。這幾點的詳細說明,應讓諸本叢書中的新經濟學來擔任,這兒不多說了。

現在所要趕緊講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究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它的變質又到了個什麼地步。

最先我們可以說一說資本主義社會教育與封建社會教育的不同。因爲這兩個社會是相緊跟着的。

在前面第三節論“教育上的幾種曲解”時,我已經提起過了。第一,封建時代對庶民不施教育;資本主義時代要對全國民實施義務教育。第二,封建時代的教育,差不多只是道德教育;資本主義時代的教育却推廣範圍而以傳達日常生活上的知識

技能爲目的。自然，另外的差異還有不少可舉；但這二點是根本的，最重要的。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我在那兒也曾有過解釋。就是，第一點的理由，是以農業生產爲社會主要產業的封建時代，庶民沒有研究學問的必要；但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這種經濟組織的本身需要文字；故普及教育只爲了養成國民的勞動力，却不爲了國民自身的幸福。第二點的理由，是封建制度爲尊重禮儀的制度，故教育注重道德，好養成安分的良民；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方經濟組織的自身需要知識技能；他方爲了收攬勞動者的心，也有注重勞動教育的必要。

現在在這兒，自然無用多加說明；惟對於所以要傳授日常生活上必須的知識技能這一點，再可以補充幾句。那就因爲資本主義社會是露骨地榨取。絲毫沒有情感的社會；所以它所需要的是這方面的知能，却不是什麼道德。

且請你認識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面目：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已盡了一種最革命的任務。

“在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地方，已把封建的，主從的，牧歌的種種關係全破滅了。它已無情地把置人於‘天生的優越者’之下的封建束縛撕斷了。使人與人相結合的，除出赤裸裸的私利，除出冷酷的‘現錢交易’以外，再沒有別的遺留下來。它已把宗教的熱情，武士的血誠，世俗的人情之類的最神聖的渴仰心，完全溺死在冰樣冷的自我的打算中了。它已把各個人物的真價消滅在交換價值之中；建設起惟一的不識羞的自由——自由商業，來代替了永遠確保的無數的特許自由。質言之，它已創設了公然的，無恥的，直接的，殘忍的榨取以代替那用宗教的及政治的幻影掩蓋着的榨取。

‘資產階級已經從向來博得名譽及尊敬心的一切職業中剝奪了它的光輝。它已把醫生，律師，僧侶，詩人，學者一千人通統轉變成受雇於它的工銀勞動者。

“資產階級已經從家族裏撕破它的感情上的面幕，而把家族關係降為祇不過金錢的關

係。”(康茂尼斯特宣言)

你想！像這樣一副殘酷無情的面孔，難道還需要講究假仁假義的道德嗎？所以資本主義時代教育之重視‘日常生活上必須的知識技能’，其理由是十分明顯的。

在前面講教育的變質時，我舉出五個特徵，且已一一論到過了。那五個特徵，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觀察起來，特別來得恰當而顯著。這兒自不必再來引證。惟對於資本主義教育特別頌揚的論調，常常接觸到我們的耳鼓，着實使得不少的教育者及一般人發生迷信和錯誤的認識；這倒是不可不加解剖以闡明其真相的。

對資本主義社會教育頌揚的論調，就是對現代新教育頌揚的論調。這兒可以舉出主要的五說。

第一說是所謂勞動化，或是生活化。

如前所述，自社會分成階級，教育就與勞動分家，成為變質教育之一特徵。在封建社會的教育，就是這樣教育與勞動分家的教育。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尤其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我們却看到教育中逐漸摻入勞動的要素。固不必說在制度上

有所謂勤勞教育，實用教育乃至職業教育等等彰明昭著的設施；就是在教科內容上也不復告訴學者輕視勞動。於是就有教育者起而宣言：過去的舊教育是死讀書的，現代的新教育是在尊重勞動了；過去的舊教育是書本的，是遠離社會的，現代的新教育是實際的，是接近社會生活的了。於是更有所謂‘教育即生活論’，學校是社會文化的中心論，陸續出現。

但是實際是否如頌揚者所說呢？教育與勞動是否在現代新教育中已復合了呢？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是否真打成了一片呢？

關於這一點，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就不妨把勞動與教育這個問題從頭說起。

在原始共產社會中，人人有平等的勞動之義務，已如前述。這種義務，並不是可厭惡的義務；其實與其叫做義務，遠不如說是當然的事情。正猶食與眠，既不算是義務也不算是權利似的，勞動在他們看來，祇不過是必要的應有的事情罷了。教育是爲了‘保存種族’而行使之社會的事業。故在生存上同屬絕對必要的勞動與教育，自然是處於不可

分離的關係。在原始共產社會中，勞動與教育兩者，就是這樣地完全結合起來的。換言之，所謂教育，是把‘爲了生存應當如何勞動呢？’這件事，向年經人傳授，使之理會而已。

然自私有財產發生，榨取他人勞動的行爲實現之後，嫌惡勞動和賤視勞動的觀念就跟着發達。到了國家制度出現，階級支配關係成爲合法化的希臘羅馬時代，勞動之被視爲卑賤，就達於極點。試翻閱教育史最初的一頁。這裏面便記載着靠榨取他人的勞動以保證生活的支配階級之高傲的教育理想。他們說“不爲生活的手段以受教育，而爲使閑暇有意義以受教育。”——希臘語Schole 卽爲閑暇之意。他們的一生都是閑暇的時候。他們一方面以‘有教養的金冠’裝飾自己，認自己爲特殊的高貴的人類；他方面又使被支配者也抱有這種信念，而自甘居於下流。

如斯，教育與勞動遂分了家；‘教育’專屬於支配階級，‘勞動’專屬於被支配階級，有如第二節中所述。這種分離的唯一目的，便是榨取。那些布爾喬學者竟想以分業論的詐術來辯護這種分離，無

乃枉費心思。因為分離的理由，早在教育史的最初一頁有過最正直的供狀了。

還有一層，教育權永遠操於支配階級之手。他們終是不絕地本着教育與勞動的分離主義以進行。但是實施這種教育的結果在羅馬帝國內部，發生了賤視勞動的無數自由民，竟招致了為帝國瓦解大原因的生產力之減退。這可說是由教育與勞動分家所生的第一種結果。

在中世紀，為了復興生產力，由聖本尼狄克派的僧院主義，高唱起‘勞動神聖’的論調。但這種尊重勞動的呼聲，僅對於鞏固封建制度的基礎發生效力；這在教育史上是有記載可證的。而這種呼聲之為由蔑視勞動的支配階級向被支配階級而發，自可無待多言。試看基督教對被支配階級的說法：“人類的祖先亞當犯了罪，為上帝逐出愛甸園以來，人類就必須滿面流汗”勞動。”

向生產者的被支配階級實施愚民政策，灌注聽天由命的思想的結果，在生產技術之上，既無發明，也無進步。封建制度末期的農村衰落，自是必然之理。這可說是由教育與勞動分家所生的第二

種結果。

近世的資產階級怎樣對付勞動與教育的分離呢？由上所述，我們已知資產階級迫於生產組織自身的必要，不得不向勞動階級也施教育了。因之就有教育學者喊出新教育勞動化，實際化的頌詞來。不錯，從一方面看，這件事實確乎可以證明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先行制度。因為把勞動與教育重行結合，很可視為復歸於未發生支配關係以前勞動與教育不容分離的那個共產制度之預兆。本來搾取全靠欺騙。把教育從勞動分家，無非為了易於欺騙。如今給勞動者以教育，把教育與實際勞動相聯繫，是不僅使欺騙難以行使，還易引起對支配階級的反抗。這豈不是極大的冒險行為？是的，支配階級誠然心裏明白這是極大的冒險。所以他們想出一條妙計。那就是想一方面給與教育的最低限度，而在別方面搾取勞動的最大限度，藉為聯結教育與勞動的代價。實在資產階級的一切教育制度，都是要想用最小的耗費以得最大的成效的。你不聽見日本辦勞動教育者的公開供詞嗎？

然而有人‘雞毛當令箭’似地竟高喊教育勞動

化實際化！請你不要上當。實在我在這兒所稱教育與勞動的結合，祇不過是生產組織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文字讀寫，再不會超過這個程度了。故在原則上，實在依然不脫教育與勞動相分離的立場。因為這種分離是榨取的唯一必要條件。而且，資產階級還乘機利用，要藉所給與的文字，叫勞動階級皈依并尊敬資產階級，更努力使勞動階級不能見到除此以外的什麼東西。

這是所謂教育勞動化或社會化的真相！

第二說是所謂科學化。這是叫得震天價響的一個呼聲，或許你也是聽得很中意的。

但是如前面論“教育的效能”（第四節）時引用公樸君的一段文章中所述，這也是不恰當的。

在這兒，那些已說過的話，如科學的教育根本不能對無產階級發生影響；科學的方法縮小到幾乎無能的地步，當然不必再說以避重複。這兒所要說的，是另一方面的事情，是要追究到教育究竟是否科學化，與科學化到個什麼程度的問題。

我們看到進化了的近代國家，在它的獨占與帝國主義上，具有很科學的精密計算，企圖與方

法，而且已經着手實行；然若因此推想到在教化的獨占與帝國主義上，也能看出完備的科學理論與方法，那就不免失望了。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教化運動已經達到末路，換句話，就是科學的方法已經走到末路。特別是要處處以科學的自誇，以能率的自誇之金元帝國主義即美國之教化運動，只止於純粹百分之百的美國主義，且竟發生了猴子案，對教進化論者處罰；聖特啓州（Kentucky）的議會通過一個議案禁止用公款作教授進化論或達爾文主義的薪工（見辛克萊的 *The Goose-step* 第三五二面）；像這樣非科學的幼稚行動，豈不要笑死人！最反動，然而自稱已攝取了社會主義的要素即社會的科學的要素之莫索里尼的教化運動，竟於法西斯蒂憲法中規定“朝晚應該禮拜上帝”，試問這裏面有着什麼的科學方法？最近——一九二九年九月——日本帝國主義舉行所謂教化總動員運動，以闡明國體觀念，振作國民精神為主旨；它的實行方法，有（一）每朝必須向宮城遙拜；（二）朝晚必須禮拜神佛；（三）必須禁酒禁烟；（四）必須使用國產品等等。試問這兒又有什麼科學？

老實說一句：近代國家衰落的時代的教化（包括教育），是非科學的。

資產階級的科學早已‘壽終正寢’了。在現代，能繼承十八世紀以來科學的發達之系統者，只有無產階級的教化。起於十九世紀而及於二十世紀之初已經走上窮途的社會科學，惟靠無產階級的立場，才獲再生的機會，而因以說明近代資本主義組織的崩壞過程，要把社會的生存組織重建起來。在教化上，無論是方法，是內容，也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方面，才能有科學的成長。

本來，科學方法的把握，是資產階級引以自誇的特徵；然科學的方法一轉移到無產階級之手；資產階級就沒落在美國的百分之百主義與意大利及日本的禮拜神佛主義，這可決不單是教化的問題，而是與在資產階級的機構上科學的企圖已覺無能爲力這件事相關連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在百年前於自然科學的意識上建設自己的新組織時，寺院方面曾經竭力干涉，要從他們的教化中把科學排斥出去；到了現代，資產階級却處於寺院的地位，要竭力地從他們的教化中拒絕新興社會科學的研

究了。在百年前，資產階級爲謀本階級的發達，用全力要求科學，用全力排除寺院的支配，且把寺院的強制禮拜從各國家推翻了；然至現在，資產階級爲謀本階級支配權的永存，竟有如美國之禁止進化論，如意大利及日本之強制拜神，不惜在它的支配上及教化上，拚命地採用與自己的近代信念相矛盾的方法；這顯然是階級的機構自身已離了科學方法之支持的自白。試問近代國家的新教育，究竟在什麼地方是科學化了，又科學化到個什麼程度呢？

再具體地說，當資產階級初興，保有革命的實踐時，爲對抗封建貴族及教會計，曾高唱唯物論與無神論，也便是科學的；但至十九世紀後半，資產階級已中止了革命的實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便傾於觀念論的，神祕論的，頹唐趣味的意識形態，而指摘唯物論與無神論爲人類之恥辱，且更增加對被支配階級之意識的欺蒙之程度；換言之，即增加御用哲學化之程度。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極度破壞，經濟的恐慌，社會的危機，資本主義制度之運命的崩潰過程等等客觀的現實之前，資產

階級愈不得不感到絕望，懷疑，恐懼，與悲觀。於是什麼關亡徒啦，鬼照片啦，乃至精神文明啦，東方文化啦，弄得烏煙瘴氣一團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報上還載有神力可以療疾的新聞，錄原文如下，藉見實行百分之百主義美國人迷信之一斑：

“美聯社二十三日波斯敦電：近數星期來，忽喧傳麥爾敦之聖十字墳山內，有神力可以療治，愈者已有數百起。一時轟動全國，各地來觀者日在五萬人以上。因此紅衣主教奧康納，今日特下令禁止參觀，嗣後除殯葬外，任何人不准入內。”

這時期，在教育上，也就高唱抽象的精神的空疏而神祕的觀念，有如養成國民道德，促進世界和平，‘勞資協調’‘中正穩健’‘博大慈祥’‘孝弟忠信’等等都屬靜的抽象的觀念。最顯著的例，又莫如一九二八年檢舉共產黨後高唱‘思想善導’的日本教育當局，竟想以添設日本佛教史，東洋美術史，東洋倫理學，日本思想史，國民道德等大學講座及獎勵研究哲學，倫理，宗教，歷史等的所謂精神科學，謀普及唯心的思想，以排擊那為危險思想之根極

的唯物的思想。這真是近代政治之逆轉的的傾向，即所謂封建道德教育之一特徵了。

這樣看來，近代國家的教育，它的主要傾向只有是非科學的，見不到是科學的。若說教育學已成爲科學；教育調查，教育統計，智力測驗，職業選擇等等都是科學的方法；學習法教授法等等都根據於科學的研究；那麼我要請說者看看上面論“教育效能”一節中所述科學的教育之效用究有幾許。

僅僅在外表上塗上些‘科學的’的色彩，而骨子裏還是‘非科學的’的底子，是不能叫做科學化的。

第三說是所謂平民化，或民衆化與社會化。

說者的根據，在乎歐美各帝國主義國家，有普及教育，補習教育，成人教育，且逐漸取消雙軌制而採行全國民一律平等的國民教育；在中國最近也積極實施識字運動，民衆教育及勞農教育；這些都是一反乎封建時代的貴族特權教育，官僚養成教育，確可爲新時代教育之特色的。

然而我們早經知道現代——資本主義時代之所以實施普及教育，厲行社會教育，是如前段所述，出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本身的要求，起於資

產階級利益的企圖，並不是真要把教育權利普及於全人類；這個，我們已經有過正確的解剖，是不會再受欺騙的了。

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不僅沒有平民化或社會化；恰恰相反，它的專制化與獨占化，倒是事實昭然。

原來資本主義初期雖以自由競爭為必要；但一進入最高階段——也即最後階段——它却以獨占為必要。先是資本的集中，然後跟着發生所謂輿論製造之集中。除新聞，影片，無線電音，等等文明利器全為資本家所獨占，作思想支配的工具以外；學校，科學以及體育等的教育事業，也無不操在資本家手中。學校的定義，除為養成特殊勞動力的場所以外，更可說是觀念生產品的工場；而且後一定義較為特別恰當，特別受着重視。

現代教育專制化與獨占化的實例，除在第三節已說過一點，及在底下講美國教育一節將有詳細的敘述以外，這兒可以就帝國主義者之思想的支配如何貫徹於學校教育，略講幾句。

這種支配者思想之貫注，從教科內容及教育

旨趣上最易看出。如小學教科書，尤其是修身或公民科，其教材多重在養成勤儉，儲蓄，擁護私產，遵守國法，以及當兵納稅等等的德性。在高等教育上，最好舉日本的例：一九一八年日本政府所公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目的為“以教授國家所須要的學術之理論及應用，並攻究其蘊奧為目的；兼應留意於人格之陶冶，國家思想之涵養；”這裏，它所以要特提‘人格之陶冶’與‘國家思想之涵養’者，不是偶然的；其動因乃在當時的日本已走入資本主義沒落的階段，社會的矛盾鬥爭日趨激烈；支配階級所希望於大學者，不僅在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所必要的技術家與學者，更在產生肯意識地維持支配階級權力的那種‘人格陶冶’‘國家思想涵養’的人物。所以對於構成資本家的社會所必需之學問，如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獎勵研究，並且努力宣傳；同時對於它有不利的學問，揭破它的祕密的學說，則盡量壓迫，因此學生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與左傾教授，都要被解散排斥。其他如鼓勵競技運動，注重軍事訓練，一方面讓青年學生沒有多的工夫和心思去研究或參與左傾運動，他方面就

注入一種定型的——就是支配階級的——意識形態，所以也都成爲直接或間接灌輸支配者思想之手段。

當然，帝國主義者之思想支配不僅貫徹於學校教育，也且貫徹於新聞，雜誌，講演，圖書館，演劇，文學，娛樂等等一切的文化機關。帝國主義國家之有出版條例，教師檢定，教科書審查，電影檢閱等的辦法，也莫非爲了保證思想的支配。

但在教育上，學校究竟是最具體的表現，也是最有體系的，比較最長期的灌輸支配者思想的機關。所以我們若就資本主義社會的學校詳細觀察，詳細解剖，當益能發見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的真面目。因此，我敢不憚煩地把 N. Bucharin 同 E. Preobraschensky 合著的“資本家社會的學校”——在他們的“Das A. B. C. des Kommunismus”第十章中——完全譯載於此。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學校盡着三種主要的任務。就是，對年輕一代的勤勞者，教以對資本主義服從及尊敬之精神；對支配階級的青年，使成爲對於勞動民衆之‘有教養的’訓練者；由

於利用那增大技術及資本家的利潤之科學，以供奉資本主義的生產。

“第一種任務之遂行，正與在資產階級軍隊內一樣，是由先行造成適於資產階級的‘啓牖人民的將校’以完成的。爲了國民教育所製造的資產階級小學教師，須得學習相適應的訓練課程，以準備盡訓練者的功能。在學校課業上，只有爲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信任得過的教師才被採用。而且他們受着資本家政府的教育部長之監視；一切有害的分子，即社會主義的分子，皆從教師中間被毫不容情地驅逐出來。當作兵營的補充，服役於威廉二世的革命前的德國小學校，是表示資產階級及地主得學校的助力以養成忠實而且盲目的資本奴隸之好例。在資產階級小學校的課業，是依照那適於養成兒童馴服資本主義這個目的之一定綱領以教養的。一切教科書，也以適於這個目的的精神來編纂。爲了同樣的目的，要使人人相信資本家的社會秩序是自然的，永存的，在一切所能有的秩序中之最優良者，關於這

方面所寫成之一切資產階級的文獻，也殊有用。因此，學生於不知不覺之間，習成資產階級的心理，感染到對一切資產階級道德的激動與對財富聲名地位的崇拜，又沉溺於榮達主義的精神與個人幸福的追求。教會的牧師由於上帝的意旨——這個因資本與教會關係密接的結果，常成為資產階級的意旨——之教理，完成了資產階級的教師們的工作。

“第二個目的，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是由中等及高等教育對於勞動階級用有意識的抑壓以完成的。在中等學校，特別在高等學校中的教育，以勞動者所不能支出的那樣多額的費用為必要。這種教育，需要十年以上的歲月；由於這個理由，就使得為要贍養家族，不得不使兒童從極幼小的時候就到工廠及農場去，或者不得不使他留在家中工作的勞動者和農民，無從入學。中等學校及高等學校，事實上已化為資產階級青年的學校。在這裏面，支配階級的青年為代他們的父親就擯取者的地位，或是官吏，或是資本家國家的教師，受着

各種的準備。而且在這些學校中，它的課業，具有明顯的階級性。這在數學，技術及自然科學的領域上，雖不見十分觸目；但在規定學生的世界觀之社會科學上，就特別明白地表現出來。資本家的國民經濟學，是用着爲了‘絕滅馬克思’的一切方法以講述的。社會學及歷史，是用同樣純粹的資本家的精神以教授的。在其他方面也復一樣。要之，中等學校及高等學校，是把對資本家社會有用，爲維持資本家的榨取組織所必要的一切事項教於資本家子弟的場所。即令勞動者的子弟萬一得入學於高等學校——這是通常最有才能的——他們的大部分，由於資本家的學校設施，也要很巧妙地脫離他們生來的階級。他們更被注入着資本家的心理，又使勞動者的才能，終於變成爲壓迫他們的自己階級而被濫用。

“說到第三種任務之遂行，是由資本家的學校用如下的方法以完成的——就是在階級社會中，由於科學與勞動的隔離，科學不僅歸於支配階級所有，且成爲一定的少數人的職業。

科學的教授與科學的研究，都從勞動過程分離開來。爲利用科學的效果於生產起見，資本家社會就不得不創設自己的研究所，以促進在技術上利用科學的發見。此外，又不得不創設幾多工藝學校，便於維持生產，使與‘純粹科學’即隔離勞動的科學之效果有同一的水準。再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藝學校，不僅供給受技術的教育之人間，也供給勞動者階級之監督及管理者。更爲了商品流通過程的方便，設立商業學校，商業大學等等。”

這是有名的‘學校三大任務論’，係由唯物史觀的見地，觀察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學校教育的，也就是任何人皆得親眼目睹的事實。試問從這兒，還能看出一絲一毫的平民化與社會化的痕迹嗎？

本來“古來思想歷史之所表示，是精神的生產跟着物質的思想一起變質。支配一時代的思想終只是那時代支配階級的思想。”所以在資產階級支配的地方，學校教育之由資產階級的思想以訓練，自是最自然不過的事。這不管是封建社會或是資本主義社會，都沒有差別。不過在資本主義進到帝

國主義的階段，一切都要獨占，這種獨占的形態是要排除一切的異分子的。因之，在古代及中世的教化獨占，還容許非國家支配的教化自由存在，而不致有顯著的特別的衝突；可是到了近代，這種獨占已變成包辦一切，壟斷一切，竟不容許有不受國家支配的文化運動存在，從而文化上的鬭爭也便成為整個階級鬭爭中的一方面。

獨占程度愈加深，便愈益成為支配階級的所**有物**，於是所謂社會化或平民化就愈遠離事實了。

第四說是所謂中立化，或公平化。

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教育，本來沒有不是為支配階級的教育。這由上面一段的說明可以完全明白。尤其是資本家社會的教育，儘管在表面上好像反乎封建社會教育之只以愚魯，閉塞為事；但在骨子裏，只是為了製造對資產階級的忠實奴僕，忠實代理人以行的。不料現代資本家的教育家們口口聲聲地說現代的教育是完全超越政治與階級，而立公平的立場以行使。這個，我們必須加以糾正才是。

我們的糾正，不僅要從事實指出現代教育超

政治超階級爲說話，而且要根據唯物史觀闡明這些說話之所由來。

事實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之有階級的目的與政治的目的，是到處存在，不必多所引證的。只要看：在現代學校中，凡於支配階級有利益的，不管它是如何遠離真實，也要強制教授；反之，對支配階級利益相反或是成爲被支配階級的利益的，就要認爲‘邪說異端’而予以排斥。這不是極顯著的證據嗎？

伊里基說：

“資本家的國家，愈是文化的，就愈巧妙地說着學校超越政治爲全體社會服役的話以欺蒙人民。但是實際上，學校業已完全轉化爲資產階級的階級支配之手段。這是徹頭徹尾，由階級的資本家的精神所貫徹，而以對資本家供給忠勤的奴隸和開通的勞動者爲目的的。”

資本家社會的教育之竭力保持階級的目的，豈不是比看火還要明白？

但說是中立化，公平化，在某一點上，也未嘗不是真實。這一點就值得我們來研究。

這一點是什麼；就是商品化。

商品化與獨占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特徵。同時也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教化的特徵。

教化的獨占，即學校教育，新聞雜誌，體育娛樂等等的獨占，已如上段所述。

現在來講商品化。

商品化有許多特徵。這兒單舉一端，就是要標榜‘嚴正中立。’

為什麼資本主義的商品要有這種標榜呢？理由非常簡單。就只爲了易於推銷，易於賺錢。鞋店帽店所售的鞋帽，你想好不好分作這是自由主義的，那是保守主義的嗎？不行！絕對不行！恰恰相反，它們是大量的製造，公平的販賣，張三可以去買，李四也可以去買。這樣才是“畫一不二”，“童叟無欺(?)。”

貨品生產上如此，‘輿論生產’或‘觀念生產’上也然。

試拿資本家的新聞爲例。

新聞紙發生的動機，本由於社會中成立了相對的團體，這種相對的團體各爲了自己團體的利

益，要有所主張，於是利用新聞紙以爲傳布的工具，即成爲對立團體相競爭的手段。

但在一切東西都商品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新聞紙也不免跟着商品化。這一變化使得以前成爲各對立團體特殊要求之機關的新聞，一變而爲‘嚴正中立’的新聞。本來新聞紙的記載及主張，是具有代表特定的社會要求之性質；今日的新聞紙却不偏於某個社會層而要適應共通的普遍要求，換言之，即具了資本主義的商品之性質。

你試看上海報紙：有的沒有‘時評’，有的雖有‘時評’之名，實乃無關痛癢——不得罪任何方面——的空話。而在它們的廣告上，終可看到“議論公正”“記載翔實”一類的字樣。這也正猶一般醫藥書籍及化粧品的廣告上，登着百病可治，大衆可用及“誠人人必讀之書也”等字樣，其目的都在達到所謂popularity而已。

現在看教育這種‘觀念生產’，我們也可發見它的商品化的現象。

小學校不待言，彷彿是上海英租界的“穩快價廉，大衆可坐”的電車；它的招生廣告上，彷彿寫上

“不拘男女貴富，一律公平待遇”的字樣。雖然它的實質，誠有如上段學校任務論中所說，是‘專為謀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但外表上，的確擺出一副公平的形貌，富兒與窮兒出同樣的學費，讀同樣的課本，真是非凡的平等。

高等教育上，不作某一黨某一派的宣傳，甚至還不過問政治，無論教授學生都不許參與實際運動。為什麼要這樣做？因最高學府是學術研究機關，是超政治的，是超階級的！

而“尊重個性”的教育主張，也正是商場上“式樣新奇”“心裁別出”的要求之反映。

學系科目之五花八門，又是“門類繁多”“無美不備”之對照。

這樣商品化的教育，看起來真像是中立的，公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真是有異乎封建社會教育之‘舊式’與‘老套’。

然而這是可靠的中立與公平嗎？

總之乎商品化的新聞紙是由資本家出資辦的，而且是由少數資本家獨占的。這種商品化的教育豈不是全由資本家出錢創辦——因為公立的教

育機關是靠平民所納的稅維持的——却由資本家——在中國要加上軍閥地主豪紳，所霸占。其結果，正同商品之爲商品所有者的利益一樣，這種商品化的教育自然也只爲了教育機關所有者的利益。其事實，便有如上段學校任務論中所述。

何況這塊‘嚴正中立’的招牌，近來也快要除下了。這是因爲資本主義社會終於在它的組織之內部，即在它的生產組織，生產了和資本主義之獨占的支配相對立的勞動者之階級的支配，跟着勞動者組織化之進展而成爲二個相對的社會團體。於是同新聞紙之漸次恢復本來的性質一樣，教育也不免露出原形——赤裸裸的支配階級的工具——來了。

所以真真中立的公正的教育，在階級社會中決不能存在，除非又在布爾喬教育學者的嘴脣邊。

第五說是所謂國際化，特別是和平化。

論者謂近年來，鑒於戰爭爲禍之酷烈，有心世道的人士，羣起而作和平運動；在政治上便有如國際聯盟的組織，如非戰公約的訂立；以外又有國際法庭，裁軍會議等等；都是世界和平運動的具體表

現。

在教育上，更有世界教育會議，由美國全國教育會所發起，號召世界各地教育專家討論實現和平的方法。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日內瓦舉行第四次大會時，更議決了許多以國際親善為主腦的議案；據報紙所載，此項議決案之主要者，爲（一）依以國際為主腦之教育，促進國際間之諒解；（二）以關於教育正確最新之情報，供給各國之新聞書籍及其他出版物；（三）依國際的親善見解，取締電影；（四）以本於國際親善之世界史大要，列入各國一切學校之教程；（五）軍事教練之廢止。

歐洲大陸各國教育者對於美國的這個世界教育會議雖並不熱烈參加；然他們之愛好和平，殊不減於美國教育者，所以他們另行發起國際和平教育運動，於一九二七年在倫敦成立教育者團體之國際聯盟；同時在捷克首都舉行“由學校的和平運動”之大會，各國政府及和平主義之各團體皆派代表出席。前者規定“由教育上之協作及全民族之協作以引致世界和平；”“不要求爲政治的或社會的形諛之任何約束；”“引導萬國的兒童教育於全民

族相互之理解，是爲永久的和平之絕對條件。”後者則決議“排除好戰的排他的教材；”“由於兒童之國際的交換以涵養友愛心及聯帶觀念；”“由自然科學及他國之地理歷史教授等以理解并養成人我平等之觀念。”

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法國總理白里安居然還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演說，極言和平之重要，戰爭之禍害，並籲請世界婦女盡其能力，消弭戰爭，其法在教訓其兒童厭惡戰爭，寶愛和平，尊敬他國。（見全年九月六日上海民國日報）

同時在倫敦還新成立一個國際兒童通訊社，算是世界和平運動的新組織，由學校兒童每年與世界各國的兒童通訊一次，交換友誼入手。這兒且附錄英國兒童寄與世界各國兒童之一九二九年問訊如下：

“祝文一九二九年（以每年五月十八日爲期）
吾英國學校兒童寄此祝文及一切良好希望爲他國之男童女孩，祝君等之功課順利，遊戲快樂，願人人享受愉快之生涯，且聯合吾等，寄其問訊祝帖於世界任何之人。吾英國兒童不

知戰爭爲何物，惟吾等之父母知之。吾等祈禱國際聯盟會或能聯合各國之和平親愛精神；吾等希望將來一切之新發明助吾等格外互相諒解，不造戰艦，但造特別之艦爲吾等互相走訪謁見之用。吾等終身以和平爲志，永爲朋友，因吾等於此世界本屬於一大家庭也。以此祝帖爲和平之先驅開路者。此致各國及一切人等。”（見全年十一月六日上海時報）

以上所引世界和平運動，尤其是教育上的努力，我可告訴讀者，都是事實，都是鄭重其事地在進行的。

然而我更要告訴讀者，在這些事實的背後另有更真確的事實，也是我們所須認識的。

這些更真確的事實是什麼？

那是：國際聯盟是個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所霸持的分贖機關，是個欺騙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的工具。在它主持之下所舉行的裁軍預備會議，預備了多年還未見議出一個裁軍辦法；反之，它把蘇聯在一九二七年所提出完全即時廢止軍備案及一九二八年所提出裁減軍備案都推翻了。

非戰公約更是帝國主義國家互相掩蓋擴張軍備，藉以欺蒙工農 緩和衝突，更藉以聯合進攻蘇聯的陰謀詭計。非戰公約剛簽字，而美國議院竟通過大規模的造艦案，更是他們不打自招的供狀。

世界教育會議係在和平主義之下，得美國政府的同意而發起的，當一九二三年在舊金山舉行第一次大會時，就有一位美國富豪寄贈一百萬之美金，祝賀會議的成立。該會規定“對政治及宗教絕對中立”，但一九二五年在愛丁堡開第二次大會時，却有高僧前往祝福。

“由學校的和平運動”大會。是由那個國際聯盟半公式地主持之下舉行的，而且有政府代表出席。這種政府，不待言，是代表資本家的利益，又是正在積極擴張軍備的。

在白里安於國際聯盟演說和平之重要，並教訓兒童要厭惡戰爭之後；我們就在同月份的報紙上見到日本海軍定於明年度起採用少年航空兵，志願者以有高小畢業以上之學力，年齡十五歲至十七歲，身體強壯者為合格。（見九月三十日民國日報）

至於倫敦國際兒童通訊社，叫兒童“祈禱國際聯盟會或能聯合各國之和平親愛精神”，真適足成爲一種‘祈禱’，別無效用。說“英國兒童不知戰爭爲何物”，更是‘大言欺人’；英國兒童對於大砲軍艦軍用飛機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活躍情形（由影片上）之常識着實要高過我們中國的大人有許多倍。

我們要知道：今日的世界是個這樣的局面：國際軍國主義勢力有極大的發展，各國帝國主義都極力擴張軍備，實行軍隊改組，擴大軍隊的主要成分由農民轉到工人，竭力擴張軍隊的社會範圍，實行減短軍役年限，發展所謂‘隱藏的軍隊’，特別是青年和婦女軍國主義化的猛烈施行，及產業軍事化與軍事技術的發展和化學毒器的空前發明，使國際軍國主義勢力發展到異常龐大的規模。

特別在一九二九年，列強對戰爭的準備更形劇烈。美國在二月間通過大規模的海軍擴張計畫，限於一九三一年以前造成一萬噸的新式鐵甲巡洋艦十五艘，經費爲二萬七千四百萬金元。英國一九二九年的海軍預算增加到二萬八千萬金元，其中四千二百萬美金爲建造新艦的經費。法國添造戰

艦七萬五千噸，經費爲八萬八千萬佛郎。自從非戰公約簽字以後，帝國主義列強海軍擴張的競爭倒反更加劇烈。

再看現在空軍的力量，較上次世界大戰時已增加十二倍。戰爭一開始，英法美日意五國立即可以動員一萬三千到一萬五千臺的軍用飛機。法國一九二九年擴充軍用飛機的預算共計十一萬五千六百萬佛郎。英國對空軍的擴充更加努力，在新嘉坡設立大飛機站，造成南非與澳洲間，印度與伊拉克間的軍用飛機網。美國也通過八百萬金元的經費，建築容積六千五百萬立方米突的軍用飛機，並開始建立四個大的飛機停泊場。日本決定建造第二艘的大軍用飛機，巡行的面積可達六千公里。至於化學軍用品的發明，更可驚人；但有許多是祕密的，不易爲外間所和。

此外，列強又採用一切的方法，實行人民與產業的軍事化：戰前各國的軍役大都爲兩三年，現在普遍地縮短爲八個月或一年。在學校與社會團體中都加入軍事訓練，尤其是青年軍事化的加緊，成爲普遍的現象。還有些國家，如法國，波蘭，保加

利亞等，對婦女也施以軍事訓練。列強的後備軍，增加極快，至少有了二千萬人以上。

現在特別來講講兒童和青年的軍事化，因為這是和我們的教育直接有關的。

兒童和青年的軍事化，近來正在大規模地進行着，其目的就在青年當中建立一個有軍事或半軍事組織形式的後備軍，獲得許多能夠立刻動員起來應戰的青年。

軍事化的主要方法為：

(一)在官式或半官式的兒童組織裏面，給兒童以軍事的訓練和紀律；

(二)海陸軍的短期強迫徵兵；

(三)強迫的陸軍訓練(不是徵兵)；

(四)官式的或半官式的青年義勇隊的組織。

兒童的軍事訓練在大部分的帝國主義國家都盛行着。有些國家(如日本意大利)僅有政府的組織以訓練兒童；但大部分的國家是把學校兒童聯合起來授以軍事訓練。如英國各學校每週有一定的鐘點，從事於組織的遊戲和體育的訓練。有的國家組織學生軍，帶着極濃厚的軍事性質。至於童子

軍女先鋒隊等組織，各國政府都給以特別的便利，以便易於發展。他們又用資助和鼓勵的方法使兒童踴躍地加入這種組織。政府更組織軍營和旅行隊，派遣軍事指導員去指導他們的訓練工作。要之，用這一類方法使兒童軍事化的工作，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建立起來了。

在青年中，這種工作也很加緊。有些國家如日本意大利等都存在着政府的青年組織，以軍事訓練青年，且強制一切青年工人加入（如日本的青年訓練所）。

日本法國及其他許多歐洲的國家採用強迫軍事服務的方法（徵兵制），服務期限滿後，由常備軍退為後備軍，但每年仍須執行操演的義務。在奧人利亞，紐絲蘭等國，不施行徵兵制，却強迫在一定年齡之內的青年都受軍事訓練，這些青年每年須經過好幾次大操演和短期的營房和帳篷的生活。

在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和美國，沒有什麼強迫徵兵或強迫訓練的制度。然而這並不能證明在那裏的青年軍事化不緊張。英國有國家軍事服務的部分，名義上是志願的，事實上却須每年參加多

少次的大操演，並須經過兩星期的軍營生活。美國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學年度，有二百二十六個以上的學校實施軍事訓練；預備將校訓育團經費，由國會指撥了三百八十一萬八千餘元美金，受軍事教練的學生數達十二萬五千五百餘人。

此外每一個國家裏面還有幾十種由政府和本家資助，在各種託辭之下進行軍事訓練的青年組織。這些都明顯地反映着帝國主義是在發狂似地準備戰爭。

同時對於青年思想上的戰爭準備也有極迅速的發展。這個思想軍事化的過程，是用千百種方法，直接間接地去達到的。除了歷史地理及其他功課中充滿了惡毒的愛國主義之外，所有的學校都在竭力散佈資產階級準備戰爭的思想。講演愛國主義，陳列軍事地圖，引導全校學生去參觀軍事展覽會，組織‘優等’的兒童團體去遊覽戰艦，編製學生軍去參加陸軍演習，這些都只是許多方法中的幾個例子而已。供青年兒童閱覽的雜誌和影片都在宣傳愛國主義和準備戰爭。政府和資本家所資助的青年團體更用盡各種方法，進行持久的巧妙

的贊助戰爭的宣傳。

試問上述的世界教育會議及‘由學校的和平運動’大會，對於這樣準備戰爭的教育是不是提出抗議或做些反戰爭的宣傳呢？不是的，他們沒有提抗議，也沒有做反戰爭宣傳；他們只是跟着帝國主義者的意旨，一方面把這種擴大軍備的事實掩飾過去，他方面却高唱模糊的消極的和平主義的非戰論。因為反帝國主義勢力方面，正在大做反軍國主義及反大戰的鬥爭；帝國主義者深知有一極大部分的青年可用那樣的和平主義的非戰論去克服，却不會被一般贊助戰爭的宣傳所左右，更知道這般青年最易受革命團體的反戰爭的宣傳；所以近年來他們要更注意這部分青年，企圖利用和平主義的非戰論調，去制勝革命團體的反戰爭宣傳。

這種欺騙宣傳最高度的表示，是一九二八年在荷蘭所開的世界青年和平大會。幸而靠革命的青年團體的熱烈參加，打破了帝國主義者的希望——希望借這次會議進行反對革命團體的反戰爭宣傳。但我們必須承認在‘和平’的面幕之下，戰爭

的危機正在日日加緊；同時革命者反戰爭的任務自然也更嚴重。

在這個軍國主義勢力發展和大戰危險增長的時期中，我們的教育上的和平運動也恰好做得特別賣力，就不難窺見這種和平運動的妙用何在。

說現代教育國際化和平化，原是為現代教育生色；但是這種的國際和平論，不是引致真正的和平，却是助長殘酷的戰爭的。你們如果不信，請於不久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些在現時號召世界和平的教育團體，一定會得首先唱導‘擁護祖國’，勸青年踴躍從軍。你們等着，我決不撒謊！

好了，在布爾喬教育學者所頌揚的現代教育之功德，到了我們的眼睛裏，都成為欺人的大言了。我們承認現代教育確有比中世教育為有新穎之處，也有進步之處；但是我們更要承認這些新穎與進步正和現代貨品的新穎與進步相一致，並不是全社會全人類的利益，而是某種特殊階級的利益。我們還得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仍是變質的教育，凡是變質教育的特徵，它都是具有的。

不過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的變質，除出最先

所述五個特徵外，還要添上兩個特徵：就是獨占化與商品化。

這種獨占化是和資本主義進於獨占過程，自由主義國家進於帝國主義國家相適應的，故也可稱為教育上的‘帝國主義’；它和上代支配階級教化的獨占形態，尚容許被支配階級的教化並存者不同，而是絕對的排他，真可配得上“只此一家”的牌號的。這點，在前面已經說到；還有這種獨占化的事實也已講過了。

商品化的特徵，有大量生產，迅速製造，學術專利，‘公平交易’（上段所謂嚴正中立），用錢計值等多端；這兒爲了篇幅關係，姑留待底下論“教育與經濟”時再行細講。

可是有一點，必須在這節中說到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教育中的矛盾現象。這而且不是沒有趣味的，就寫給讀者看看。

這種教育的矛盾大致從三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個性發展與強制劃一的矛盾；（二）是‘啓發’與蒙蔽的矛盾；（三）是學術研究與思想專制的矛盾。

教育上重視個性，確是進步的特徵；雖然這種重視是商品生產上“花樣翻新”的要求之表現；但由此讓各個人所具的“奇才異能”有多多發展的機會，究是值得贊許的事。不過同時，班級制與學年制等強制畫一的辦法，使得學校真有如工廠之成為大量生產與大批製造的場所，也使使得教育形成爲市場而勞動的各部門之一系列，殊與個性發展的本能發生衝突。

另一方面，個性發展是自由競爭的生產組織中所要求的，因之個人主義，占有絕大地位；如資產階級文藝所視爲問題的，便只爲個人，只爲關於個人的鬥爭運命等等。而在共同必修課程，班級與學年制度之下，却有妨礙這種個性發展之虞；還有愛國主義與支配思想之宣傳與灌注，也是足以壓抑個人主義之成長的。

要之，這兒是顯然於個性發展及強制辦法之間現出矛盾；這種矛盾，換句話說，就是個性化與商品化的矛盾。

資產階級一方面需要民衆識字讀書，聰明伶俐；他方面却需要民衆遵守資產階級的法律，迷信

資本家社會爲最優美的社會秩序，而不讓他們懷疑或挾持敵意。正如本節開始所述，教育與勞動漸漸復合，却又畏懼勞動階級之因教育而引起反抗支配階級的意志，所以只好多方限制，務使勞動階級所受教育，不致成爲害死自己的毒藥。支配階級在這件事上正遇到一個難關；就是勞工（以及商人農民）教育，鑒於大勢，自然不容不辦；但是辦了，又不免覺得許多寒心。“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天下事，只許對自己有百利而無一弊，談何容易？可是現在的資產階級對於民衆教育這件事，真是感到苦惱已極。這便是‘啓發’與蒙蔽的矛盾，實際還是教育與勞動的矛盾。

第三種的矛盾是這樣的：學術研究以崇尚自由爲主，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因爲資產階級的‘天下’可說不是全從“馬上得來”，還靠要求科學，思想自由得來的。現在有許多大學教授或專門學者，尙斤斤以‘自由主義’自鳴得意，在日本還盛行着“大學自治”和“學問獨立”這樣尊嚴的名詞。然而因爲階級鬥爭趨於嚴重，到了個最後的生死關頭；最高學府的宮牆也漸被外面的呼喊所震撼。

了，於是左傾教授應聲而起，過激學生就要越牆而走。支配階級着了慌，只得不客氣，把大學教授解職，把大學生除名。以自由研究學術爲本分的學府竟不許研究社會科學，豈不又是一個矛盾？

更有一端，一方面獎勵學術研究，且有獎學金補助金等的規定；他方面却有所謂發明的特許或專利，把學術上的新利益禁止大衆的應用，甚至還有把發明出賣給大資本家的。怎樣出賣？是不是讓購者有權使用他的發明，且傳播於全球以裨益全人類？不是的，他是把壓抑這種發明的權利出賣，讓幾十年中不許人類應用！（見辛克萊的 *The Goose-step*, 三八〇面）

這個矛盾可不算小嗎？

文明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反而有摧殘文明，阻止進步的行爲，不是有點不可思議嗎？

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而有這些或那些的矛盾，並不是不可思議的。那是它的「運命」如此，我們等着看它的沒落吧！

“東方紅了！”……爲日本左傾教授之一的河上肇一次在演壇上剛開始說這句話，就被臨場監

視的警官喊令“中止！”我就借用他的話來中止這一節。

問 題

- 一．請你批評我的‘對新教育的批評’。
- 二．試舉‘輿論生產集中’之事實。
- 三．請批評中國教育上之‘教育社會化論’。
- 四．科學上不承認有‘上帝’，然而惟一出賣‘上帝’的基督教却表示歡迎科學。你覺得怎樣？
- 五．你讀了‘學校三大任務論’，有什麼意見？
- 六．試考查中國勞農教育及民衆教育的現狀，並說明這些教育對勞農大眾的影響。
- 七．中國高中以上學校正在實施軍事教育，你有什麼批評？
- 八．你知道現在有反世界大戰的鬥爭嗎？我們的教育家對於這種鬥爭取什麼態度？
- 九．你的教育學教師，對‘世界教育會議’發表些什麼意見？
- 十．你們學校中有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組織嗎？能自由開會研究嗎？

第 八 節

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

社會主義社會的概觀。——馬克思的教育觀：—— 1，
從實質上，—— 2，從哥達綱領批判上，—— 過渡期內教
育的性質：仍是階級的，但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
過渡期內教育的要項。——問題。

這該是“東方紅了”以後的話。

現在‘東方’未算血紅，還只一點曙光；我祇好
憑這點曙光同新興社會科學所指示的來寫一點。

社會主義社會是將繼資本主義社會而起的社
會組織；這一社會的特徵，便是一切生產手段歸

公，私有財產消滅，強制的權力機關即國家也告廢止。

摩爾根曾有一段描寫未來社會的文字，你們讀了當能想見一個大概：

“自從文明開始以來，財產之增加如此廣大，它的形態如此複雜，它的應用如此擴充，而它的管理爲了所有者的利益又如此巧妙，故它對於民衆已成爲難以支御的權力。人類的精神在它自身的創造物之前，迷惘地站着。然一個時代終要來臨，那時人類的理智將起而支配財產，且規定國家與國家所保護的財產之關係，以及所有者之權利與義務的限界。社會的利害絕對地居於個人的利害之上位，而且兩者必須引入於公正而調和的關係。如果同在過去時代一樣，進步當爲未來的法則的話，那麼單單貧富的追求並不是人類最後的運命。從文明發端以來所過去的時間，不過是人類生活過去持續期間之一斷片，且也是未來當到臨的年代之一斷片。社會的解體可有終止那以財產爲惟一最後目標的歷史進路

之希望，因這種樣的進路含有自己破壞的要素之故。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社會上的友愛，權利義務的平等，以及教育的普及，即爲經驗、理智、及知識所不斷地傾向着的下一較高階段的社會之前兆。它將是古氏族的自由平等及友愛在一個較高形態的復活。”（古代社會五五二頁）

但據唯物史觀的立場，這個未來的社會並不是從這個人或那個人的頭腦子裏空想出來的，而是循着社會進化的法則所必然地要到來的。例如現代的資本主義制度，便是歷史的必然之產物。資本主義制度決不是憑幾個天才想像力所設計的制度，乃是跟前時代的封建制度一樣，由於歷史的車輪之運轉而必然地展開了的。如斯，繼資本主義而起的未來社會，也決不是依靠天才之空想的設計，而是與資本主義自身的產生一樣，當爲由於歷史的車輪運轉在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必然地要展開在它的進路上的。我們所能爲力，而且必須爲力的事，不在空想作成如何的社會；是在預知必然地要來的社會，以謀歷史進化的車輪之圓滑敏活的運

轉。

那麼怎樣能夠預知未來的社會呢？這是由對現代社會之解剖分析，以見出其中的新社會之萌芽的。“新社會在舊社會的羽翼之下孵化着。”因此，馬克思就知道繼資本主義而起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的社會。

論社會進化要根據這樣的唯物史觀；論教育問題也要根據這樣的唯物史觀。

我們不能像空想的教育革命論者，徒然狂喊現代教育宣告破產，却提不出實際意見和實施方法。原來這批人是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咀咒黑暗的現社會，空想光明的未來世界，却全無科學的方法；其論教育，也認教育為與社會組織相分離的別個事業。這樣，怎會不走上錯誤的道路呢？

前面，我已由唯物史觀的立場，分析過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了。這種教育，“一言以蔽之”，只是為了資產階級自身的利益。

現在要問：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應當怎樣對付這種教育呢？這個，一方面有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教育運動；他方面則有在當世唯一

的社會主義國家即蘇聯的教育事業。但是這兩點我將留在底下來分別敘述，這兒願把馬克思自己關於教育的議論先來介紹。好在無產階級教育運動及蘇聯教育事業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思對於教育問題並沒有專門的系統的論文發表；這兒只能就他所說過的話，有關於教化者，彙集起來。

對於共產主義不認有個性的這種布爾喬的非難，他說：

“要之，你們非難我們要廢止你們的財產。正是如此；那正是我們所想做的。

“從勞動不復能轉成資本，貨幣或地租，不復能轉成得以獨占的社會力的瞬間起，就是從個人的財產不復能變形為資本家的財產的瞬間起，你們說，個性消失。

“所以你們必須供認：你們之所謂個性，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只不過是資本家財產所有者的。而這種人，誠然是必須被掃除的，要使之無能為力的。”（“Communist Manifesto”三十四頁）

對於共產主義要廢絕文化的非難，他說：

“對於共產主義在物質生產上的獲得方法與分配方法所施的一切攻擊，已被一樣地用於共產主義在精神生產上的獲得方法與分配方法了。正猶階級的財產之消滅，在資產階級看來，為生產本身之消滅；同樣，階級文化之消滅，在他們看來，也就是一切文化之消滅。

“這種文化，就是它的喪失為資產階級所痛悼的，對於大多數人，只是一種當作機械以運動的訓練罷了。”（同書三十五頁）

對於共產主義要破壞家族關係的非難，他說：

“你們以我們要廢止雙親對兒童之榨取而攻擊我們嗎？我們甘心承受這個罪名。

“但是，你們將說，我們破壞最神聖的家族關係，當我們廢止家庭教育而代以社會教育的時候。

“且看你們的教育！那豈不也是社會的。依你們施教育的社會條件，由於藉學校所行的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干涉以決定的嗎？共產主義

者不曾發明過在教育上的社會干涉；他們却祇謀改變這種干涉的性質，且謀使教育脫離支配階級的影響而已。

“當資產階級大言不慚地說到家族制度及教育，說到親子間的神聖關係時，若一想到因近代產業的結果，無產者的家族關係全被破壞，他們的孩兒都變成單純的商品與勞動機械，那才要叫我們作嘔呢。”（同書，三十六及三十七頁）

在最進步的國家，所得一般使行的舊種事項中，關係於教育者為：

“八、對一切人課以平等的勞動義務。編置產業軍隊，特別是對農業的。

“九、聯絡農業與工業；由於鄉村人口之更平均的分配，以逐漸廢止都市與鄉村間之差別。

“十、對一切兒童施行免費的公共教育。廢除現時形態的兒童工廠勞動。聯絡教育與工業生產，及其他。”（同書，四十二頁）

以上都是馬克思關於教育方面的思想；最後所舉第十項，更可表現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觀。讀者

試就（一）對一切人課以平等的勞動義務，（二）對一切兒童施以免費的公共教育，以及（三）結合工業生產與教育，（四）逐漸廢止都會與鄉村的分別等等，聯貫地沉思一下，當不難想見馬克思主義教育所實現的社會是個什麼模樣了。

此外，在哥達綱領批判上，我們也可見到馬克思的教育意見：

“到了共產社會之更高度的階段，即個人在分業下所受之奴隸的束縛消滅，從而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之對立消滅，勞動不復成為徒為生活的手段而其自身成為生活的第一欲求，還有跟着個人之多方面的發達而生產力也增大，共有財富的一切源泉十分豐富時，——這時候才開始超越狹隘的有產的法律的地平線——社會才能在它的旗幟上寫着“各盡其能，各取所需！”

試把這兒所寫“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之對立消滅時”以下的文字，和上節論資本主義社會教育中所講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情形對比一下，你將發生怎樣的感想？

以下‘’中文字係哥達綱領中的文字，馬克思即批評‘’中的文字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德國勞動黨要求以下諸項為國家之精神的及道德的基礎：

(一)由於國家之一般平等的國民教育。一般的義務教育。免費教育、’

“平等的國民教育？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在今日的社會中（而且在這兒是祇說到今日的社會），教育對於一切階級得視為平等的嗎？還是把上流階級的教育也強制地降低到小學程度的普通教育，使之不惟與工眾勞動者的，也且與農民的經濟關係得以適合呢？

“‘一般的義務教育。免費教育。’前者雖在德國也存在着，後者在瑞士及美國的初等教育上存在着。美國的有幾州，高等教育也可免費；但這在事實上，不過爲了上流階級由國庫支給他們的教育費而已。

“關於學校事項的條文，至少應該包含與小學校相聯絡的專門學校（理論的及實際的者）之要求。

“‘由於國家的國民教育’是必須斷然排斥的。由於一般的法律以規定小學校的財源，規定教員資格與教科目，以及如在美國所行的設視學員以監督此等法規的實施等事項，是與委任國家爲國民的教育者，完全各別的！倒是要把政府與教會所及於學校的勢力完全排除才是。在德意志帝國（而且在這兒即使用了我們是在說到一個‘未來國’這類空虛的遁辭，畢竟也屬枉然。一切未來國是個什麼樣兒，我們是早已看破了的。（註））恰恰相反，是有國家要由國民以受徹底教治的教育之必要的。

〔註〕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的前部分，指摘德意志帝國是與其他文明國同立於近代資本家社會之上，以及在德意志帝國內尙未能實現如瑞士及美國那樣的羅謨克拉西。更可注意者，爲馬克思開始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無產階級之革命的獨裁’之用語。

“‘幼年勞動之禁止！’但這兒要指出年齡的限度爲絕對的必要。

“幼年勞動之全部禁止，是大產業所不能容許的，從而這只成爲無效的敬虔的希望。

“又若可能的話，這件事的實行也是反動的。這是因爲視種種的年齡以嚴格規定勞動時間，更採用其他適切的兒童保護法，且從幼小時起就結合生產的勞動與教育，爲變革今日的社會之最有力的手段之故。”

從以上所集的馬克思的話中，尋出他的一貫的思想來，實不外是“教育與勞動的結合”“對一切兒童施行公共的免費的教育”“與小學校聯絡的專門學校（理論上及實際上的）”等的根本問題。讀者看到底下蘇聯的教育事業，就可知道馬克思的這種思想是怎樣地正在實現出來。

但是這樣的一個新社會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整個實現的；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勢須經過一個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就叫做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時期。在這個時期內還是有階級，有國家；不過它是要走向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而且是有意識的積極的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

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期內的教育，當然同資本家社會的教育一樣，也是階級的。所不同者，這時期的教育權跟政權在一起，不在資本家手中，而

在普羅列塔利亞手中。在資本家社會的教育，以養成資本家的忠實的奴僕爲目的；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下的教育，以養成無產階級的忠實鬥士，且由此以準備將來的無階級社會爲目的。還有，前者務必隱藏教育之階級性政治性，後者則公然宣言爲階級的政治的。

具有這種目的的教育，對於無產階級發生怎樣的結果呢？

在資本家社會中，雖也有工農出身的人受教育，但他們在資本家的教育影響之下，漸漸地隔離自己出身的階級，一旦做了官吏或其他智識階級的工作，就會自然地背叛自己原來的階級而取敵對的態度。這種事情，在資本家社會的教育制度下，並不希罕。而且資本家教育還是以這類事情當作主要的任務。

然而和這相反的普羅列塔利亞教育，却要提高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階級的意識，使他們結合到自己階級之前衛的意識的部分，藉以養成組織的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及農民之忠實的援助者及同志。現在蘇聯的教育就以這個作爲最重要的任務。

在這個專政時期內的教育要旨也有幾點可以說明。——大體見“Das ABC des Kommunismus”第十章學校與社會主義的七十七至八十七節。

第一，對於學校問題也將同對於其他一切領域一樣，不僅有創設的任務，也還有破壞的任務。就是：凡在布爾喬社會的學校組織上，所有一切使學校成為資產階級之階級支配工具的，要一律加以破壞。在布爾喬社會中，高等程度的學校都成為榨取者階級之所有；這些學校就該改組。布爾喬學校的教師，實施布爾喬的教育與欺蒙的工作；他們也要被不容情地從新學校中驅逐出去。在舊學校中，使用着根據布爾喬精神所編纂的教科書，採用了對布爾喬的階級利益有好處的教育法；這種種也將全從新學校中排除出去。

第二，在新的學校中，要利用學校為實施社會主義教育與啓蒙之工具。最先當力謀一切落後的勞苦民衆進於社會主義的意識之較高度的階段。布爾喬亞汜為了使勞動者奴隸化而利用學校；普羅列塔利亞特則要為了解放自己，為要根本剷除

存於勞動者意識中的奴隸根性之一切痕迹而利用學校。布爾喬亞汜收容普羅列塔利亞的兒童在自己學校中，灌輸布爾喬的精神；新學校的任務却要用普羅列塔利亞的精神教育布爾喬及小布爾喬的兒童。要之，社會主義的學校要在精神的領域，在入類的心理方面，履行變革布爾喬社會的任務，使成人的意識適於新的社會關係；特別要教育那些具有基於新社會的心理的青年。

第三，對於兒童的觀念將有大的變遷。在布爾喬社會中，大部分是把兒童認為兩親的所有物。當兩親說“我的兒女”時，這還不僅單單表示血族關係的存在，也含有對兒女有施教育權利的意味。然這個權利從社會主義的見地看來，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是因為各個個人，並不屬於他自身，而是屬於社會，屬於人類。只有社會存在的時候，一切個人才得生活，才得發展。所以兒童是屬於社會的——在社會中且靠社會的維護以生的——決不是屬於兩親的。關於兒童教育之最根本的權利也當屬於社會。由家庭教育以賦與兩親自身的偏狹性於兒女精神上的要求，從社會主義的立場，是

應該拒絕的。教育兒童的能力不像產生兒童的能力之普遍。在一百個母親中能盡教育家的任務者，恐至多不過一二人。故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要廢止家庭的教育而採用社會的教育。只有社會的教育，能把以最少的努力與手段，對下一代人類施以最有效果的教育之可能性給與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的教育，不僅從教育上的考慮認為必要，也且有巨大的經濟的利益。由於這種社會的教育之實現，不是將有數十萬數百萬的母親們可以爲了她們自身的文化的發展及生產而獲解放嗎？於是幼稚園，托兒所等等的教養機關，必須遍地設立，以便實施就學前的教育。

第四，到了八歲至十七歲——據現行蘇聯的規定——是一切兒童青年受平等而且免費的公共教育之時期。施行這種教育的學校應該是統一的勞動學校。

所謂統一，有以下各種意識：（一）廢止少男少女的分離教育；（二）廢止初等中等及高等這樣不完全調和的教育順序；（三）同樣也廢止把初等學校中等學校高等學校分爲普通學校專門學校或職

業學校以及階級別學校身分別學校的區別；(四)不僅一切學生得以學修，還該從最低的階段即幼稚園一直學修到最高的階段；(五)一般的教育與技術的教育爲一切學生所當受。

這種統一的學校不唯表示一切進步的教育家之理想，也表示爲社會主義社會或以這爲目標的社會唯一可能的學校型態。然布爾喬社會的教育家雖也抱持創設統一的學校之希望，而這種型態的學校實惟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才得實現。

還有，新的學校之當爲勞動學校，把教育與勞動實行結合，且依存勞動以行教育，也有幾個重要的理由。(一)是從教授本身的效果着想。兒童所最容易，最根本且最歡喜理解的，是不靠書本或教師的訓誡以學習，而是依自己之經驗以把握。課業與勞動的結合，雖如前述，已在進步的布爾喬學校中着手實行。然這個，在故意養成社會之寄生的要素，又由於不可超越的鴻溝將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強制分離的布爾喬社會性質內，是不能完成的。

(二)爲了兒童之肉體的發達，又爲了兒童能

力之全面的發展，勞動也是在所必要。據實際經驗所表示，在學校爲了勞動所費的時間，於獲得多種多樣的智識上，不惟極不妨礙兒童的進步，反而促進進步。

(三)勞動學校在社會主義的本身上更是直接必需的，因爲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公民，至少必須在大體上知道一切的職業。在這個社會中，勢將不復存在固執於自己的專門職業，化石化了的職業之人羣。即使是最有天才的學者，同時也須是個熟練的肉體勞動者。對於行將離去統一的勞動學校之學生，社會主義社會怕要進如下的忠告：“你沒有一定做教授的必要，但你有做一個有價值的生產者之義務。”從庭園中的遊戲開始，兒童就於不知不覺之中，當作遊戲的繼續而進於勞動。而且由於這樣的方法，從當初就不認勞動爲不愉快或爲懲罰，却認爲天賦才能之自然的獨立的表示。勞動至此就成爲和飲食同樣的欲求。惟這樣欲求，只有在社會主義學校中得以喚起，且得以發展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因爲技術之急速的進步，一定跟着發生在各產業部門間勞動力之巨大的而

且迅速的移動，在這時候，對於種種產業就有勞動力的分配編製之必要。而且這種事情，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勞動者，不僅要行於單一部門，更是要行於許多部門的。若在布爾喬社會，只有靠利用產業預備軍即經常的失業者大眾，才獲救濟這種狀態。至於社會主義社會，失業軍將不存在。缺乏勞動力的一切生產部門的預備，是可由其他部門的勞動者之能力以補充的。只有統一勞動學校，才得養成能實踐社會主義社會中種種機能的勞動者。

第五，青年從統一勞動學校中獲得為社會主義社會一切公民所必要的理論的及實踐的智識之總體。但學業決不至此為止。在一般的智識之外，尚須有專門的智識。最必要的科學範圍已擴大到非各個人所能全部把握的程度。所以自有專門精修之必要。統一勞動學校原不排斥專門的教育；而且在統一勞動學校的最後數年，學生已不可避免地要表現對這種或那種職業的傾向；為適應這種自然的要求，使有學習種種科學的基礎之可能起見，自必須在這時期施行帶有專門性的教育。

惟正式的專門教育，是應在十七歲以後開始的。至所以規定這個年齡的限制尚另有理由。在十七歲以前的勞動學校的青年，與其稱為勞動者，無甯稱為學生。學校中勞動行程之主要任務，不在價值的生產與國家財政的增大，而是在教育。至十七歲以後，學生就變為勞動者。他必須分担勞動的義務，必須參加為了人類社會的貨物的生產。他得先盡對社會的義務，而後才可受專門的教育。所以十七歲以後的青年，通常僅僅在勞動時間之外參加專門的課業。跟着技術的發達，勞動時間儘可縮至八小時七小時甚至六小時以下；故由這種方法，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成員儘有充分的時間供受專門教育之用。對有特殊才能的，或從社會方面證明為必要時，自可免除二三年間的勞動，或更縮短他們的勞動時間，好叫他們從事科學的研究及教育。

第六，在社會主義之下，專門或大學將具有如何性質，此刻尚不能作正確的預想。所可說的，學生將以勞動者為主，由此使技術與科學成為勞動階級的共有物，而教授與學生間的一切界限，也將消滅。

第七，除學校外，更有種種成人的教育機關及娛樂機關，如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廣播電話，劇場，音樂，影戲，旅行等等。不但普遍，而且完全公開，讓所有文化利器都變成大眾共有共享之物。更讓社會主義精神浸潤在大眾心裏。

原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能被視為直接所有者的財產，且為個人致富的手段。由才能所生的產物，在這個社會中是一種商品，可用各種價格出賣，甚至還被強制出賣；這類生產物因之只成為金錢最多者的所有物。有偉大的社會意義，從本質上言，還該是集體的創作物之天才的作品，儘可被美國的摩爾根這批人購買了去，又根據同樣的權利，儘可由這批人加以改造或竟毀滅——這在資本家社會的法律上講，誰也不能處罰他的。藝術品或手蹟之類，依私人的賣買，大都成為搾取階級的獨占物，一般平民連看的權利都沒有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要宣言一切藝術品，蒐集品和藏書等等為公有物；一切劇場及影片事業為國有。只有這樣，才得把此勞動大眾的血汗所造成的科學及藝術作品，重新送回真的所有者的

手中。

最後，在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期內，不僅學校有宣傳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整個政權的一切機構也不可負宣傳社會主義的任務。

這種國家宣傳之主要手段：（一）為印刷事業的國有，（二）為新聞及出版事業的獨占，（三）為大影片企業，劇場等等的國營，（四）為了勞動階級之廣泛的政治教育及一般教育，為了在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的基礎之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要盡量利用已成為國有的“精神生產”之諸種手段。

要之，社會主義之國家的宣傳，是絕滅一切布爾喬亞意識的痕迹之手段，是造成新的意識，新的思想，新的世界觀之強有力的武器。

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就寫到這兒為止。

問 題

- 一。社會主義社會何以必然地要到來？
- 二。空想的教育革命論者，其謬誤的根源何在？

- 三。過渡期內的階級教育何以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有不同？
- 四。在過渡期內，主要的教育工作爲哪幾項？
- 五。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兒童的地位將發生何種變革？因之，在教育上又將有何種變革？
- 六。那時候，勞動與教育的關係變成怎樣？
- 七。那時候，還會有上述幾種變質的教育嗎？爲什麼會沒有？
- 八。過渡期內，整個國家政權在文化上要執行何種任務？

第 九 節

教 育 與 經 濟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一般關係。——教育與經濟的相互作用。——教育商品化的幾種特徵。——資本主義末期的經濟運動與技術化運動。——問題。

根據唯物史觀的見解，社會的經濟構造是上層構造的基礎，即上層構造是依這種基礎而決定。

“從社會的政治的事象起，一直至哲學的事象止，包含一切上層構造的體系，在社會裏面，當作社會現象的連鎖中一個必要的環，而與該社會的經濟的基礎以及技術的體系相結

合。”(Bucharin 的史的唯物論)

這是說明經濟構造與上層構造的關係。不過這裏面可沒有前者爲最重要或後者爲不重要的意思。猶之乎左手同右手，或齒輪同發條，在它們中間，只有一種相互的關連，却毫沒有重要性的差異。說到重要，兩方都是“較爲重要”；所差異者不過是每種機構所遂行的機能罷了。

Bucharin 於此更有一段巧妙的說明：

“一切的差異都是機能性質的差異。生產管理與生產本身各有各的任務。那就是：生產管理用以排除軋轢，防止矛盾，組織并調整各個的勞動要素；換言之，就是使勞動有一定的‘秩序’在其他的領域也復如此。例如在人類中間的道德習慣及一切類似的規範，都是用以調整人類，使人類入於一定的範疇，使社會的構成部分不致瓦解的。科學是怎樣？科學也還是一樣。在這種勞動領域上，它（假使是自然科學）畢竟是用以表示生產過程的進路，提高它的效果，規制它的行程，建立它的秩序的。……‘好像生產管理從生產本身發生出來一樣，

哲學從科學裏面發生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哲學不是原初的，而是第二義的；不是原生的，而是派生的現象。但在他方面說，哲學在某種程度內可以支配科學；因為它對於科學已經給與了一種‘共通的觀點’或‘方法’。

“從這些例子中，大約可以充分理解區分物質的生產和上層構造的勞動之根本意義。因為這兩者的相互關係是存於觀念形態的勞動，一方面為派生的量同時又為規制的原理。在社會生活的總體有關的限度內，差異終是在於機能的差異的。”

要之，社會的經濟關係和生產力，由上層構造看來，雖則是現實的基礎；但是上層構造的本身，對於社會的經濟關係及生產力也有影響的作用；就是有時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達，有時也可以拘束經濟關係的發展。在種種社會現象的中間，不斷地有着一種相互作用的過程存在：原因變成結果，結果變成原因。

根據以上的說法，我們來看教育和經濟的關

係。

最先，教育這種上層構造自是依據經濟構造以成形，且跟隨經濟發展以變遷的。舉些淺例，經濟發展的落後民族，一定成為文化發展的落後民族；又如前述封建社會重禮儀，資本主義社會重知識，社會主義社會重教育與勞動的統一；都可為教育依存經濟的明證。乃至孔子所謂“富而後教”，孟子所謂“民唯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就這種意義上講，也不算沒有理由。

又如現行的班級教授法是十七世紀奧國人夸美尼斯(Comenius 1592—1670)所倡導的；但要等到十八世紀末英國產業革命以後才見一般採用。往後資本主義愈發達，資本的勢力也愈向各方面伸張。向來認為與經濟的勢力比較不生交涉的諸種文化現象，也漸次處於資本勢力之下。到了近時，新聞雜誌經營的企業化，學校的營業化，皆其顯著之例。新聞學校等事業本以人的要素占有優越的意味，如今却漸漸為設備及基金之類的經濟的要素所代興。

再有一個顯著的例，是產業合理化所及於教

育界的影響。如英國，由於教育的合理化，大大地削減經費裁減教員；其結果，許多小學被封閉，許多教員失了業。如日本，因實行產業合理化，使失業者增多，學校風潮遽起，入學難與就職難連年加甚。這種不得解決的諸矛盾，雖為合理化過程之必然的產物；然在帝國主義日本是非厲行合理化過程不可的。由是資本主義畢竟祇好走向沒落的路。

我們上面說過教育商品化的話，這兒試作較詳的說明。

教育商品化的第一個特徵，是拿金錢計值，例如說：受過初等教育值多少錢，受過中等教育又值多少錢。在社會上確是按受過教育的階段以定薪水的高下的。如日本的例，一九二八年四月畢業生就職者的初任平均俸給率，為大學畢業生，六十八元八角三分；專門學校畢業生，五十六元二角二分；中等學校畢業生，三十七元三角八分——據中央職業介紹事務局的調查。

我國上海某大公司的初任薪水標準為：西洋留學生二百元，日本留學生一百五十元，國內大學專門畢業生六十元，中學畢業生約三十元。

然更赤裸裸的，是以百分之百主義自豪的金元帝國主義，就是美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的波士頓教育週報（Journal of Education）上有一篇雜載，題爲教育值錢嗎？（Does Education Pay?）文中說波士頓大學的商業行政科主任洛德（E. W. Lord）對於這個問題得了明確的答復。據他研究的結果：未受中等教育訓練的人，要憑氣力賺錢，三十歲以後就漸漸不濟事了；他們的平均歲入最多不到一千二百元（美金，下同），一生（從十四歲到六十歲）也不過賺得四萬五千元。一個中學生在受教育的四年中最多不過耗費二千元，但在畢業後（十八歲）七年內就可彌補這筆費用而超過未受訓練者的最大歲入；他的最大歲入可達二千二百元，一生可賺七萬八千元，比前者多用二千元，而多賺三萬三千元。一個大學或專門學校學生雖然用錢較多，但從二十二歲畢業後到二十八歲，他的歲入就可與中學畢業生到四十歲的歲入相等；他的最大歲入可達六千元，一生可賺十五萬元，比中學畢業生多得七萬二千元。因此洛德說：四年的中等教育值三萬三千元，一張大學畢業文憑值七

萬二千元。

還有美國的許多大學及專門學校只不過是“職工學校”的性質。如 Cincinnati 大學竟讓學生上午讀書，下午都到工廠，百貨店及銀行中去。至如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老實在招生廣告上，自白它的如何能增進學生賺錢的能力。——見辛克萊的 The Goose-step，三三一至三三二頁。

這是專講效率的科學的美國人之教育價值論。但這種情形又豈祇美國如此呢？

第二個特徵是大量生產。用着班級制，按照排定了的課程，限期修畢。試問這和運轉幾架機器，依據一定模型，以製造大批的貨品者有何不同？尤其是在‘無政府的生產’一點上，特別相同。資本主義的生產，因為不計算社會的需要，社會的購買量，而是各個資本家競爭生產，以致發生生產過剩，引起恐慌，有多數勞動者失業等等的現象：這便叫做無政府的生產。同樣，在教育上，也復不計及畢業生的出路，而只管招收新生，一批一批地送往社會，於是發生就職難的現象：這也可以叫做‘無政府的生產。’例如日本，據一九二九年六月內

務省的調查，全國知識階級的失業者已上十萬人，據中央職業介紹事務局在是年十一月間的調查，各官私立大學及專門學校畢業生的就職率，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占畢業生總數百分之六十四又七；三年占百分之五十三又九；四年占百分之五十二；又採用報名數，在昭和二年占畢業生總數百分之六十八又三；三年占百分之五十四又二；四年僅占百分之四十六；由這種悲觀的數字之遞減，已暴露了現代教育制度的破產。一九二九年四月的畢業生尚有一萬人沒有‘銷路’，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又有二萬餘的新畢業者‘製造’出來，一起就有三萬人要實演職業爭奪戰，這不是一種‘恐慌’嗎？

第三個特徵是學校的工廠化。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有許多公私立的工廠，從事於商品的製造；同樣，又有許多公私立的學校，從事於精神的生產。它們雇用幾十萬或者幾百萬的教育勞動者，每日向幾百萬或幾千萬的學生，即教育勞動的原料或消費者，生產大量的觀念物。在資本家國家中這種大量的觀念生產物，正和在物質的生產上大量的資本家的商品同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

產上所不可缺少的一種要素。

從這種思想工廠中，爲幾百萬或幾千萬的消費者的日常消費所生產或者再生產的觀念生產物，究竟是具有怎樣品質的東西，則有如前面‘學校任務論’中所述，此地不必說了。

第四個特徵是上面已講過的所謂‘公平交易’，務求‘大衆可用’以廣招徠。

第五個特徵是對發明家的特許權。把發明完全看做商品，可用金錢買賣。當帝國主義列強經濟爭霸的現代，在經濟戰略上，竟實行發明考案的閉關政策。試看一九二七年各國的請求特許件數：

<u>美國</u>	87,545
<u>德國</u>	63,003
<u>英國</u>	35,469
<u>法國</u>	23,067
<u>日本</u>	12,607

又在日本及德國實施‘實用新案法’，在同一年度，計有：

<u>德國</u>	126,726
<u>日本</u>	49,222

的結果。特許愈多，就是專利愈多，也就是學術愈成爲私有物。至如前面所引美國大公司竟收買新發明，就把它掩滅下去，剝奪大衆享用的機會，更是惡毒已極。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做？是爲了一種新發明或許會影響到他們所獨占的機械營業；萬一落在別個獨立企業家的手中，也許會引起大公司一筆大損失的。所以他們用錢收買過來，就有權把它毀滅。於是一個大發明家竟由這種社會制度變成一種科學上的劫掠者。——見辛克萊的 *The Goose-step*, 三八〇頁。

第六個特徵是體育的營業化。在辛克萊的同書第三七一頁上，說一切大學皆有畢業生委員會，他們在外面獵取最上等的運動選手，調查各預備學校及別個大學的體育生活，并用種種手段把那些‘粗人’勸誘過來。金錢的使用雖說禁止，但沒有一個大學是不破壞這條禁令的。每逢比賽時出售門票，設有種種職員。有一個主持大學校際徑賽的學生爲了這點差使竟得到八百金元的報酬。哈佛大學的體育預算，每年在一百萬金元以上；而足球比賽就可抵償這項費用。第一等的教練員一年得

二萬金元的薪俸，畢業的管理員也可得高薪。

最近，即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國卡內基教育促進基金（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發表一種報告書，痛詆美國大學及專門學校的運動；因為今日的運動成為營業化，對運動員衆養津貼，足以降低學生的德性。各大學及專門學校當招收新生時，莫不利用種種名義以引誘各中學校的運動明星。如哈佛，普林斯登，哥倫比亞，本雪文義亞，紐約 等的所謂一流大學，皆用獎學金及其他名義，以補助選手的學費，并與以特別的優待。表中共列入一百三十個大學及專門學校，其中竟“沒有運動員不受津貼之證據。”又據全球（Cosmopolitan）雜誌的報告：一九二八年足球季中（即十一月），足球比賽的入場費，為美國所收入者總計達五千萬元美金；其中耶魯得一百萬，哈佛得四十二萬，普林斯頓得三十萬，米西干得六十二萬五千；普通的公司收入尚不及他們之多。

其實，爭奪運動選手的這種‘營業’，不獨美國盛行，就是日本也在所難免；還有我們中國，別的

雖趕不上人家，獨在優遇運動選手方面，怕並不落人後吧？

其他如‘個性發展’之爲近代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表現，也足爲商品化之一例。因爲商品自身表現如下的社會關係：（一）社會爲個人主義的經濟組織，而以私有財產主義爲原則；（二）在社會內廣行分業；這種分業不是一個產業的作業畫分，而是全部產業的各別專門化。

以上都是說明經濟勢力支配教育的情形。

現在試問教育是否也有影響經濟的時候呢？是有的。

拿科學爲例。上面剛剛說過自然科學是“用以表示生產過程的進路，提高它的效果，規制它的行程，建立它的秩序。”這就是科學對於生產力及經濟關係所生的影響。資本家社會要特別獎勵自然科學的研究，自然是爲了這種研究可有助於生產事業的發展。最近數年來所盛行的產業合理化，便是科學研究的產物。因機械力應用，分業應用及工廠工業的發達，固然促進各種產業教育的發達；而各種產業教育的發達，自也益能敏活支配生產的

行爲，改進技術的效用，而達到資本增殖的目的。

最近我們更得看到經濟運動竟需要精神運動的助力之實例。那就是上面已經提到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後所行的‘教化總動員’。這兒且作較詳的敘述及批評。據日本教育部長所發的訓令看來：

“我國遇着幾多的難關，所需補救的事項雖屬不少；但國民思想之動搖與財政經濟之窮迫，實爲最可憂慮。……打開這種難關，以期國運之隆昌，實爲目下的急務。察時弊之所由來，要以國民精神之弛緩爲最大原因；精神一旦弛緩，卽生浮華放縱之風，從而思想失其中正，生活招致放縱，以致有今日的世相。補救時難的方法……根本當在明徹國體觀念，振作國民精神，並謀改善經濟生活，培養國力。故有今日的教化動員。”

由此可見教化總動員之實踐的意義，實在財政經濟的問題上面。雖說“思想之動搖”“精神之弛緩”，也只爲了招致放縱的生活，不經濟的生活，非緊縮的生活，所以需要補救。所謂“明徹國體觀念，

振作國民精神”，實際還是爲了“改善經濟生活，培養國力。”像這樣起於經濟的動機之教化運動，他們所定的實行方法，却爲：

“東京市的教化總動員準備，定於十一月三日的明治節，在東京聯合青年團主持之下，舉行緊縮節約宣傳的大行進，以喇叭隊在先頭，吹奏緊縮進行曲。在全府市小學校的緊縮委員會方面，所定教化總動員的實行方法爲：每朝小學校授業開始以前，全體舉行遙拜式，盡力於尊崇皇室國體精神的發揚。又在市教育局方面，聯絡各影戲館，於開映影片之前，必須放映太陽國旗，并奏君之代的國歌。……東京聯合青年團又用團長名義發出教化動員會：一、每朝必向宮城遙拜；一、朝夕必須禮拜神佛；一、必須禁酒禁煙；一、必須使用國貨……”——十月九日東京朝日夕刊。

本來在封建國家的經濟，才需要節約消費以觀維持生產力有限定的軍國經濟；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是該使消費旺盛，藉以發達生產，求得“國運之隆昌”的。可是像日本的例，竟要以“宣

傳節約”“尊崇皇室”，“發揚國體觀念”及“禮拜神佛”爲手段以補救“財政經濟之窮迫”，這不是一件希奇的事嗎？

但細想起來，這並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希奇的事。在經濟運動上必要求助於精神運動，乃是資本主義末期才有的特徵。在資本主義初期，即十八九世紀的經濟學者及哲學者，力謀從經濟運動中排除精神運動。又不唯十八九世紀，任何時代也沒有經濟運動與精神運動有如今日資本主義沒落時代這樣緊相連結的。資本主義本來的目的是要爲了排斥精神主義的國家，建立經濟主義的國家，故竭力排斥精神運動，正猶力學不計算靈魂的重量似的，要從精神底下解放出來，作爲近代的經濟運動之出發點。即使當時有所謂精神運動，那也不外根據當時進化論者的‘精神’，以企圖從精神底下解放出來之精神運動而已。

可是到了資本主義末期，竟猛烈地開始恢復精神的運動者，乃是資本主義國家失了它的自由主義的構造，對外的和平的商業主義變爲軍國的帝國主義，對內的民主主義變爲法西斯主義之結果。

物質一元的資本主義，到了末期，已還原爲物質與精神的二元生活了。埋首於物質生活的人，理該拋棄精神主義於不顧；但爲了目下物質生活的動搖與不安，他們的恐怖心遂喚醒了遺傳的精神，竟想靠精神以救物質。他們雖由近代科學明知靠念佛祈禱是不能救遭難的船；但現實的船遭了難，遂禁不得嘴裏念出和近代知識相矛盾的‘阿彌陀佛’來了。

所以這是近代國家退化的象徵。它要和妨礙它的先輩事業的舊國家一樣，用精神運動來阻止新時代的出現。這種精神運動便是要妨礙人類經濟行動之進化的。但實際，這只是‘倒行逆施’；因爲現實世界斷沒有靠祈禱真能救難的。

問 題

- 一、教育商品化有幾種特徵？試就中國的教育事實舉出實例。
- 二、經濟勢力如何影響到教育？教育能不能脫離經濟的影響呢？
- 三、資本主義末期何以需要精神運動來補救

經濟的難關？

四．這種近代國家退化的現象，在最近我國
政教上也能找出例證嗎？

五．單靠教育能不能改進一國的經濟？

第 十 節

教 育 與 政 治

‘教育的政治化’。——歷史上從沒有過超越政治的教育。——近代政治支配教育的實例（日本）。——文化鬥爭為政治鬥爭的媒介。——政治教育及準備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問題。

現在再看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如何。

政治本身也是受制於經濟的；換言之，政治也是上層建築之一，以社會的經濟構造為現實基礎的。政治的本義是經濟之集約的表現，即為權力之活動。在一定社會中，有着相當於該社會的經濟關

係之政治關係(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資本家國家與勞動者),也便有着相應於經濟組織之政治組織即政治制度。

就教育言,它雖和政治同爲上層建築之一,但它更較爲第二義的,更較爲派生的。因爲它不僅由生產過程所決定,也由政治過程所決定。

正猶教育與經濟互有關係,教育與政治也是互相作用的。

先說政治支配教育的力量,在階級社會中,政治支配一般社會的精神的生活過程;教育當然不在例外。教育意義的變遷,便爲在社會階級關係的歷史變動期中所表現的形態;自有歷史,就沒有脫離過政治關係的教育。無論哪一種的教育制度,終只是由支配階級,且是爲支配階級的。

“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于政治者。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爲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蔡元培的新教育意見,見舒新城編近代

中國教育史料第四冊二六頁)。

這雖是蔡氏在民國元年所持的見解，到了此刻黨國時代，也許有了改變；但教育超軼政治的這種見解，委實不能不視為極普遍的一種見解，所以我們還有加以批判的必要。

其實，據我們在前面所述各節，教育沒有不隸屬於政治者。就是共和時代（大概是指法國革命後的市民國家時代）的教育，也決沒有超軼政治的。試即以法國為例。

“首先提倡教育政治化的是法國。

“法國在十八世紀的末年即發生改變，改為共和，……政體雖屢改，但教育方針幾乎是一貫的政治化。

“一七九一年法國第一次改為共和後的憲法中曾有下列的規定：‘國家應創設並組織一個為教育全國國民的制度，一切人類須受的知識應免費由公衆授之。全國應分布各級學校以供需求。學校中應有節日紀念法國革命，國民互相友愛之精神，及服從憲法國家及一切法律。’這恐是世界各國憲法中最早對於教育

一項有所規定的。……到一七九二年，制定宗教與教育分離，……一七九四——五年國會通過全國教育設施案。……

“拿破倫專政十六年，極力獎勵高中級教育，首創以大學爲全國教育行政總機關制……同時又宣布教育宗旨爲（一）宣揚羅馬教義；（二）忠於爲民謀利益之皇室及保障法國統一與憲法條文之拿破倫朝；（三）服從統一教育，產生爲教爲國爲家之國民教師團體（即大學）所規定之法令。”（莊澤宣西洋教育制度的演進及其背景二〇二——五頁。

這兒說法國爲首先提倡把教育政治化的一個國家，雖非事實——即在莊氏同書中也已經說過“德國有幾個小邦在十六七世紀已經定出全邦的教育制度”，“普魯士在一七一六年即有強迫教育法令之規定。”但以之證明“共和時代……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之未可置信，却儘夠充分了。

教育史上，記載八世紀時，就有查理大帝主張教育要養成愛國心，更命僧侶拉丁語而用本國語以講演。中國則自漢武帝（二千一百年前）退百

家，崇儒術；又制定選舉制以來，便一直施行隸屬於政治的教育，未嘗有時間斷。

又莊氏謂：

“至於英美的教育在十九世紀還沒有政治化，在教育普及方面，英美的速率更在法國之後。在教育行政方面英國直到二十世紀初年才設教育部，美國則至今無教育部。”（同書二〇八頁）

我覺得這話未免太拘於教育政治化的形式方面了。要知教育政治化這件事實，不在乎憲法上有無條文，不在乎行政上有無中央教育管理機關。只要在階級社會中，是支配階級所主宰所利用的教育，這種教育的‘宗旨’‘政策’，就沒有不和當時的政治關係相適應的。中國自漢以來的教育要尊孔子，宗儒經；日本自有歷史以來的教育要崇拜天皇，尊敬皇室。這些難道不可作為教育政治化的實例嗎？

即就十九世紀的英美教育而論，也未嘗沒有‘政治化’的形迹可尋。

例如自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有亞當斯密，邊沁，奧文等人提倡一般教育的必要。亞當斯

密在一七七六年的富國論中主張用僅少的費用以實施爲教育最根本部分的全民教育。邊沁於一八〇二年的刑法原理中主張教育應爲政府的行動，父兄忽視之處應由國家充實。奧文也於一八一二——一六六年所公布的社會新見中，主張從幼兒時代起就該有國民一般的初等教育，且以爲是好政府便不可不有最良的國家的教育組織。除出這種由國家辦理教育的主張以外，在政府——行使政治權力的機關——方面，於一八〇二年的工場法中，限制兒童勞動，並規定徒弟教育的義務，就可視爲國家的一般的教育之起源。一八三三年，議會通過撥二萬鎊補助內外學校協會及國民協會的學校；一八三九年增至三萬鎊。至一八七〇年，有名的福斯泰法案通過了。這個法案是今日教育組織的基礎；（一）強制地方教育稅；（二）各地設地方當局；（三）公布義務教育。……法令中更要求五歲至十三歲的兒童須就學，是年補助金達五十六萬二千鎊；雖是私立的宗派學校也受補助；由是小學教育全受政府的監督。一八九一年的法令，免除學費；一八九九年的法令，規定特殊教育。一八九九

年在中央政府設中央學務局，兼有中等教育視察權，愈可見到國家的教育統一之進步。

美國在十九世紀後半，各州也已有了公共教育制度及免除學費制的組織。

要之，有史以來的教育制度，本是支配階級所制定的教育制度；到了近代國家明白公布普及教育或公共教育的法令，且用國家款項去供給學校經費，是‘政治化’已達於正式公開的程度，怎好還說“沒有政治化”呢？

“我們公然宣言——所謂超越生活與政治的學校，只不過是欺蒙，虛偽。”

我們對於伊里基的這句話，是可以深信無疑的。

不過在近代國家，教育的政治化要比以前更周到，更嚴密，實是真情；尤其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支配階級的教育政策愈見其深刻而徹底。這兒特就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在內）詳為敘述，藉見教育政治化之一斑。

最近（一九二九年）日本的文化政策，是以準備帝國主義戰爭，資本主義合理化及反蘇聯政策這三大政治中心問題為根柢的。

先說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日本年來積極侵略滿蒙，擴張軍備，連續舉行海陸軍大演習，想見日本準備戰爭的猛烈。同時在文化方面我們就可看到以下的事實：（一）在中學以上學校強制軍事訓練；對勞動青年設置青年訓練所，厲行軍事教育；（二）對戰爭作科學的研究，力謀如何利用稀少的物質資料以得有效的活動；（三）宣傳戰爭思想，凡小說劇本等莫不被利用為宣傳工具；（四）集中一切資產階級的示威運動於戰爭準備，如在‘御大典’時動員全國的在鄉軍人與青年團等；并令學生參加軍事演習。

其次資本主義合理化，為連受歐戰後恐慌與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兩大打擊的日本最切實的問題。如銀行合併，小公司解散，大公司發展等等，皆為合理化的表現。國最近資源局所發表的方針，有（一）國民的智力體力之培養與社會服務之訓練；（二）關於科學工藝等的各種試驗研究之完備；（三）關於產業的發明考案之獎勵；（四）職業介紹機關之設備；（五）正當的國防觀念之普及徹底；（六）資源的軍需民需各方面之分配；（七）戰時的

資源統制及運用機關……各項。這種合理化之文化方面的表現，則有下述幾端：改正試驗制度，成為資產階級之智識獨占；普及合理化主義，成為社會改良主義者們的門面語；專門學校升格，把大學同專門學校的差異消滅；職業介紹所等施行勞動教育，以養成忠實的熟練工人，並形成永久的失業等等；其中以教育之合理化與特權勞動者之養成為最可注意。

其三，反蘇聯政策的表現，為檢舉共產黨，公布死刑勅令，并常宣傳國內的共產運動都與蘇聯有關。在文化上的表現，則有二方面：（一）是妨害蘇維埃文化的輸入，如禁止輸入影片，禁止劇團上陸，沒收普羅文化的書報等等；（二）是對蘇聯作直接的中傷與反宣傳，如竟欲否定俄國革命的本身以抹殺俄國革命的真意義；以外還發行許多反共產主義的出版物。

日本的資產階級，依照以上三種方針，實行它的反動文化政策。至此等文化政策經過何種機關以實行，可於下段述之。

為了反動政策所利用的機關，是非常井然有

序的。除出活用國家的機關之外，更利用其他一切的外廓組織。

所謂國家的行政機關，在內閣有資源局與獎勵局。前者謀全國經濟及文化之統制；後者給國家思想以物質的基礎。在內務省有神社局，警保局，衛生局，社會局；警保局之下，有榮養研究所，衛生試驗所及出版物檢閱；社會局之下有中央職業介紹事務局。工商省的特許局則為智識財產化與獨占之機關。文部省為文化行政機關，設有專門學務局，普通學務局，實業學務局，圖書館，宗教局，傳染病研究所，學士院，美術院等一切文化的統制機關。

在此等行政機關之下，另有直接的及間接的教化機關，皆為支配階級的利益而活動。

第一可舉者為布爾喬意識形態的最高機關即研究所。如大學，理化學研究所，榮養研究所，北里研究所，傳染病研究所等都是；以外有各種學會如工學會，工政會，日本社會學院等，也是統一專門家，與以布爾喬的目的，促進布爾喬的科學之進步之團體。

第二爲普及已經完成了的布爾喬科學或爲養成專門家的機關之各級學校。這在文化機關上可視爲最直接的在政府管轄之下，而爲官僚的支配階級所最煞費經營者。上級學校的任務，在產生政府機關適用的人物，社會的勞動過程上合格的指導者，卽爲國家的官吏，地方自治團體的公吏，學者，教師，技術者，醫生，律師，新聞記者等等；受上級教育的學生，大都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子弟，換句話說，上級學校是爲資產階級所獨占，實現了所有權卽教育權的希奇現象，而勞動者，貧農，無產市民的子弟便只好止於無智的奴隸之境地。下級學校是在義務教育名義之下對於貧苦大眾所施的教育，其任務全在準備兒童有做被擷取者的資格，以發達資產階級所希望的產業能率。現在日本全國學校共有四萬五千四百八十餘校，學生總數達一千一百七十九萬餘人。以外各青年訓練所，是一九二六年所開辦，在絕對專制主義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統一全體青年大眾的教育與組織，藉以提高勞動能力，并預備在‘緊急時’可供反動軍隊用的。至如大東文化協會這類組織，更是以

純粹的反動爲目的的。又爲統制担任此等教化的教師計，組有帝國教育會，國際教育協會，全國實業教育會，全國小學校女教員協會等。

第三，爲御用團體及屬於與此同種類的團體，則有在鄉軍人會，愛國婦人會（會員一百四十四萬），大日本聯合青年團，少年團日本聯盟，東京府女子青年團聯合（以上官辦），大日本國粹會，日本正義團，黑龍會，大統會，國粹會本部（以上暴力團體）日央乃木會，中央義士團，中央報德會等。

第四，爲號稱自治，不直接受政府指導的教化團體，則有自治的青年團，女子青年團，及少年團等；這三團體的會員全體有四百萬人（包含官辦青年團在內）。其他有科學智識普及會，日本世界語協會等。

第五，是所謂社會事業團體。最大的就是日本赤十字社，會員達二百萬人以上；以外有櫻楓會（以社會改造運動爲目的），弘濟會（救療），濟生會，兒童愛護會，輔成會（保護囚人）養育院等。又職業介紹所最近舉辦各種職業的補導會，講習會，也可歸入這類。社會事業中之特殊者，有公立的

圖書館。

第六，是產業團體同時兼行教化運動者；例如產業組合，不僅行使產業金融等的經濟事業，也盡消費組合的作用。如大日本農會及帝國農會，以改良農事爲目的，舉辦各種的農業講習會；它們當作欺瞞的教化機關之任務還大於本來的經濟機關之任務。

第七是所謂肉體文化，一切運動團體都屬之。這類團體有全國學生陸上競技聯盟，全日本陸上競技聯盟，大日本體育會，大日本水上競技聯盟，全國學生水上競技聯盟，大日本蹴球協會，國際漕艇俱樂部，日本庭球協會，日本軟球協會，東京府女學校體育聯盟，帝國競馬協會，明治神宮體育會，講道館，大日本武德會等等。這種競技運動的獎勵提倡，表面上固爲了增進體力，養成堅忍剛毅的精神；但實際上，另有三種用意：一是向世界表現日本帝國主義的威風；二是預備對外或對內發生‘緊急時’，有大批可供動員的人的資料；三是利用青年的好名心，爭勝心，使他們的心目都轉移到運動場上，以期與工場的農村的那種‘運動’不接

近，甚至隔離得很遠；再是藉此注入支配階級的思想型，而使他們無緣也無暇研究新興的社會科學。其中如講道館（會員數達二百二十三萬餘人）及武德會（會員達三萬九千餘人）更是富有封建意識，信奉武士道精神的組織，也就是新興勢力的敵手，東洋法西斯蒂的淵源。

第八是由藝術以行的教化。這方面的團體，與其說是以宣傳教化為目的，不若說是以謀文化的獨占為主旨。在繪畫方面，自帝國美術院以下，有國民美術協會，太平洋畫會，日本美術院等；邦樂（日本的國樂）方面有觀世會，寶生會，清元會，長唄研精會等；洋樂方面，有愛好家與專門家的各種團體；演劇方面，劇團本身大部加入資本家組織，歌舞伎及新派俳優組有東京俳優協會；文學方面，雖無特別的布爾喬的團體，但發表機關的大部分是資本化了的。

至如劇場，影片，音樂及廣播電話等的組織，自然不是公開的大眾的；如高價的入場券，長時間的表演，就非一般工農及市民所能享受。但另一方面，却也有廉價的短時的娛樂場所，專供大眾利

用；在那兒所表演的，都是些提倡軍國思想，崇拜天皇之內容，無一不是抹煞新興的階級意識的。

第九爲各種宗教團體。最與國教密接的宗教，也可稱爲國教，自皇太神宮以下，有明治神宮及各種官幣國幣的一聯神社；這些雖沒有直接的信徒，却是全國到處存在的；它的有力的宣傳機關就是學校。其次有神道，黑柱教，天理教等之所謂神道，信徒有一千六百五十七萬餘人。佛教有天台，真言，淨土，臨濟等十數宗，檀徒凡三千一百六十萬人，信徒凡八百五十四萬人。基督教分舊教新教等，有二十二萬信徒。

此等宗教不僅有神社，傳道所，寺院，教會等機關，更有各種的社會事業機關，教化機關與學校等。

最後可舉者爲當作布爾喬文化的宣傳研究機關之出版物。第一是新聞社，其次爲雜誌社，最後是出版業者。在資本萬能的時代，這些企業的經營者，當然是生產機關的所有者，政治上的支配者。他們所得動員的一般學者，文人，記者，因印刷技術的發達，愈可大規模地做民衆的精神支配的工

作。

全國書店中所堆積着的最流行的雜誌，若不是關於封建主義，皇室中心主義，軍國主義的；便是關於宗教戀愛，性慾而具有催眠的作用的。號稱自由主義的雜誌如中央公論及改造，實行其‘商品化’，簡直無所不包，故有時有顯左的言論，有時却現出極右的反動思想。幾家大報館如大版的朝日新聞社與每日新聞社，東京的報知新聞社等，也為實行‘商品化’起見，都標榜着‘階級的政治的中立’與‘社會的公正’；但實際上，都是與資產階級政黨有關係的。

由此可見日本的布爾喬文化之生產及宣傳機關，一切方面都有得存在。這兒所舉各項，雖不屬於同一範疇，也不屬於同一系列；但舉以表示文化與政治之如何巧為結合，是很可供我們了解的。

現在再要看日本支配階級通過這種組織，怎樣生產文化宣傳文化，及擁護文化。

先說布爾喬文化之生產。問資產階級能不能創造文化，這當然是可能的。如今資產階級不是正在繼續增加物質的及精神的富力嗎？不過可注意

的是這樣的三點：第一，生產文化者不是資產階級自身，而是智識勞動者；第二，布爾喬文化的生產逐漸由擴張再生產趨於單純再生產，由單純再生產趨於縮小再生產；而且第三，反動文化的生產決不增加何等的富。

在布爾喬社會，一個科學家有某種科學上的發見時，這種智識之富的自身，並不給科學家以何等利益。因為這種智識如果不參加生產關係，老實是沒有用處。然若科學家的研究費是出於資產階級的供給，那麼這種科學的效果也不為科學家所有。試看理化學研究所的‘關於職員所作成的發明，實用新案及意匠之規程：’

“第二條，職員在本所，職務上作成發明時，受特許之權利歸本所承繼。……

“第七條，職員在本所，職務上就特許法第三條第二號乃至第三號之事項作成得受特許之發明時，本所在物的發明上，專有製作，使用，販賣或傳布該物之權利；在方法的發明上，專有使用該方法及使用，販賣，或傳布依該方法所製作的物件之權利。……”

所以在這兒，就發生科學家（智識勞動者）與資產階級之階級的對立。資產階級就成為科學的榨取者。

從而在布爾喬社會中，文化的生產一定大受制限。資產階級當攻擊封建社會，表現革命的作用時，一切新產生的文化是他們的利益。但當資產階級喪失進步性，變為社會進步的障礙而反動化時，文化生產的範圍就非逐漸縮小不可。最近各種研究所的方針，大學的方針，或工政會工學會等的根本方針，就是全受資產階級的三大政策，即準備帝國主義戰爭，資本主義合理化與排斥無產階級文化以決定的。

這而且影響到資產階級的科學方法論，使之完全趨於末路。其結果，就表現為觀念論。伊里基曾由辯證法的唯物論之立場推論自然科學領域上，特別是物理學上最近的效果，有過這樣的話：

“近代物理學家的少數人，受了使舊理論崩壞的近年大發見之影響，受了特別有力地表示智識的相對性之新物理學的危機之影響，而且為了不知辯證法，就由相對論而達於觀念

論。今日之近代物理學的觀念論正和最近以前之近代生理學的觀念論同爲反動的，一時的。”

由此觀之，所謂反動文化者，並不是文化的擴張再生產，實在乃是逐漸縮小文化的領域。所謂反動文化政策，就不外是從社會奪去一切進步的文化之政策。反動文化的內容，爲過去文化的積集；外表雖似帶有新的形態，然實際不過在結合的方式上有點異樣罷了。

然則用怎樣的方法來宣傳普及呢？

由內容上觀察，則有露骨反動者，有帶自由主義的假面具者，更有套上社會主義的面幕者。在這兒，除資產階級與封建的殘餘勢力相勾結之外，社會民主主義也成爲布爾喬反動文化之一部。再從質上來看，資產階級簡直是到處利用的。如對文學，就從所謂高級文學起，——一直利用到浪花節，安來節之類。

最後說到布爾喬文化之擁護，則可“一言以蔽之”，即爲彈壓它的反對文化就是無產階級文化。第一由法律上看，是用治安警察法 治安維持死刑

法，出版法，新聞紙法等，以剝奪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出演，開映，展覽之自由；第二是利用暴力團體，實行殘酷的迫害；第三是消極的防衛，限制布爾喬文化之生產者，宣傳者；如高價的學費，由廢止試驗制度以優待布爾喬子弟，阻遏無產者子弟都是。

我們由以上所舉日本的例子，可知帝國主義的文化政策是怎樣地與一般政策緊相結合了。在文化所及的範圍內，無處不跟隨着政治的勢力；其緊密的程度直如形影之不容分離。如再有人說近代教育“得以超軼政治”，或者有人相信辦教育可以不問政治（有如陶知行的我們的信條，見中國教育改造——三——六頁），老實是不可通的。

然則教育也有影響政治的作用嗎？有的。這從對反動文化的鬥爭上就可以看出。

對反動文化的鬥爭（包括教育運動在內）有三點必須注意：

第一，這種文化鬥爭不能與政治鬥爭分離。這

不僅因為文化政策是由一般政策所決定，且因文化機關與政治機關是很巧妙地互相結合。如上所述的資產階級的文化組織，如系統地觀察時，對於一個一個的攻擊，結局必須轉變為對中央政治機構的攻擊；否則就不能獲得何等效果；但在這種見地之下，實行對一個一個的攻擊也就可以成為對於中央政治機構的攻擊。換言之，文化的鬥爭要與革命的——般的鬥爭相并動，然後這種文化鬥爭纔能成為確實有效的鬥爭。

第二，普羅列塔利亞的組織上，也應涉及一切的文化，如反對世界大戰，反對軍國主義，實行學校鬥爭，發達普羅的體育組織，藝術運動，出版事業，乃至創造普羅文化——其中最重要者為介紹新興科學等等；要由這種的文化鬥爭以達到政治變革的主要任務。

第三，所謂文化鬥爭不只是所謂文化上的鬥爭。在政治變革未完成的國家一切鬥爭都當視為動員大衆到政治鬥爭之媒介。伊里基曾重視政治變革之教育的意義，且論及在革命期中大衆意識之急速成長。故凡一切經濟的及政治的鬥爭之中，

皆當實行一種教育運動；在一切紀念節及反大戰反軍事演習反社會民主主義等的鬥爭中，所有宣傳鼓動之教育的意義，都是不可不有很高的評價的。

至如政治變革已完成的國家（如蘇聯），它仍需有政治的教育。除一般學校是為政治的以外，另有專對成人所施的政治教育，其目的便在準備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至於蘇維埃學校及黨的學校，也都為使蘇維埃國家的建設事業能更迅速地更正確地向前進行；換言之，便是利用教育來促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的。

問 題

- 一。試就中國教育史上，舉出教育政治化的實例。
- 二。中國勞農大眾在現階段中應受何種的教育？
- 三。文化鬥爭何以必須與一般的革命鬥爭相聯繫？
- 四。請注意報紙上及雜誌上所登載的教育言

第 十 一 節

教 師

教師在現階段的責任。——教師結社的必然性，可能性，等等。——蘇聯教育勞動者聯盟的組織和職能。——問題。

本節的內容，我將限於以下二點：就是教師的責任與教師的結社運動。

先說第一點教師的責任。

當社會變革的現階段中，教育者所負的使命自然非常重大。這並不是說他們有單獨救國或者建國的力量，是說他們在文化這個領域上確有盡

一部分革命任務的可能與必要。在“教育的效能，一節中，我已提到教育與政治的關係，說教育在革命前是用以鬥爭的，志在奪取政權的式器之一。在上節中，又剛剛說過文化鬥爭為政治鬭爭的媒介，為一切政治鬭爭及經濟鬥爭中所當中心地行使之鬥爭，且當充分地評價一切鼓動宣傳之教育的意義。這是教育者對教育工作應該最先具有的認識，也就成為對自身應有的準備。

其次，教育者（特別是小學教師）對為自己工作對象的兒童們，必須認出自己使命的所在。教育者所日夕與共的兒童，不是極大部分是屬於中小階級的子女嗎？他們是被壓迫者，他們要求一切的解放：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法律上，在社會上，乃至在教育上。究竟他們能獲得解放的門路，抑或依舊受支配勢力的屈服而不獲見天日，就視今日的教育者如何教育他們以決定。你們若教他們‘安分守己’，不要與聞一切鬭爭工作，那麼他們就得不到什麼益處——雖然實際的生活條件自能給他們以實際的政治教育；反之，你們若教他們明白當地的政治環境如何，當地的經濟情況如何，對他們本

身的利害關係如何，隨時隨地領導他們去接近實際，參與工作，那麼這種教育才是與他們生活有關的教育。

還有，教育者對於一般民衆也有應盡的責任。革命要靠民衆力量才會成功，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中國革命尚未成功，有待於民衆的運動者非常切迫。教育者於此，就不要拘於現在所見所處的那樣狹小的天地，要自認自己是通文化與民衆之間的一條大路。教育者決不該以幽禁在校門之內，研究研究學理，教教書本，以維持個人的生活，滿足個人的欲望算已盡職。教育者的人生觀教育觀是不局限於個人，而是公開於社會的。教育者負有社會的使命，他們應從講壇上解放，向着社會民衆走去，參加甚或領導社會民衆運動。今後的學校也不當僅僅是兒童們的學校，更不該再是‘閑人莫入’的學校，而當成為當地文化的中心點，為當地民衆吸取文化資料的源泉。它要做掃除文盲運動，它要做民衆政治訓練運動，它要利用種種革命紀念日做擴大的鼓動宣傳運動；它將是征伐迷信，破除舊習的大本營，它將是民衆娛樂，民衆集合的大會場。

故今後的教育者當是國民文化的宣導者，而學校是國民文化的燈塔。文化愈開明，同時政治鬥爭的工作當愈有成效。自然這樣的效果，據我們所已知道，是在這個布爾喬社會中很難如意地獲得的。但爲了困難而就束手，難道是覺悟的教育者所該有的態度嗎？

再有一層，當教師的，尤其是小學教師，大概出身於貧困社會層者爲多；特權階級富有階級的子弟，希望做小學校的先生而受師範教育的，似乎很少。只是這所謂師範教育，並不適合他們本身乃至未來待他們教育的小國民的需要，却反爲了支配階級的需要；故窮困階級出身的小學教師對窮困階級的小學兒童而說不爲窮困階級的話，真是天下的奇蹟。爲此，教育者和一般民衆的生活條件，在實際上是一致的。教育者幫助受苦難的民衆，謀苦難之解決，實際也就爲自己謀解除苦難。教育者明白了這一點，我想一定要對一般民衆更努力做一切實際的教育工作了。

兒童要受他們所不可不生活的事情的教育，民衆也要受他們所不可不生活的事情的教育，教

育者自身也要受他們所不可不生活的事情的教育。歸結起來說，他們全體都要爲解除壓迫，爲爭取自由而工作，而教育者却有準備自己與訓練兒童及民衆的責任。

但是教育者要盡這個責任，決不是單獨的分散的力量所能做到。他們該把自己這一集團的力量完全積聚起來，形成爲一種社會勢力，一方爲保障自己的利益，他方也爲盡力於社會變革的工作。於是教師的結社運動成爲當前的重要問題了。

以下就來說教師的結社運動。

中國教師之組成團體者，無論大中小學校，皆曾有過，如今仍有不少存在（如北平大學教職員工會）。他們爲爭加薪，爲反對不稱職的教育當局，爲保障自身地位，曾有過罷課及發宣言等的行動。不過據一九二九年九月間報載立法院起草工會法，却有第三條規定“國家行政……教育事業……各機關之職員及雇用員役不得援用本法組織工會。”那麼在國民政府治下教師的結社是變成問題了。因爲通常教師的結社，總不外“……以增進智識技能，……改善勞動條件及生活爲目的”（工會法第

一條)。

現在我們且不管這個，單想就教師的結社運動的性質及自覺有所論述，至於如何進行是要看教育勞動者的努力以定了。

第一，教師結社的意義。教師的結社運動，大體是和工會組織運動的性質相近的。這因教育者的生活有和一般勞動者的生活相接近之故。——這兒所指教育者以小學教師為主。試看低下的月薪，器械的作業，同一作業相重複的學校，不是和低下的工資，器械的作業，同一作業相重複的工場大致相似嗎？自然在教育者組織與勞動者組織之間，有不少的差異；只是教師結社有着結社上的許多必然性，是我們所當承認的。

第二，教師結社的必然性。教師的結社運動，就事實上言，在英德法美尤其在俄國，都是很顯然的。在理論上言，實又有以下幾種必要的前提條件：

(一)他們是支領薪水，而不是授與薪水的；即他們是屬於被支配階級而不是立於支配階級。但教育者究竟應立在哪一個階級之疑問，是人所常

有的。有些人彷彿這樣說：教育者是支配階級方面有意識地唱奏着的留聲機，又是具有所謂智識的特權的。是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東西都是商品化至少可用貨幣以計算。例如曹錕時代的賄選議員值五千元，日本政黨總裁的地位值五十萬圓，還有中立議員一人值十萬圓——一九二八年田中內閣時代的價格——等等，在這種樣的時代，的確沒有一種生產物不是於所有階級有利的。珠寶商人，時髦女郎，固然是爲所有者而存在；軍艦大炮之類，也全爲了他們而製造。又如無敵牌牙粉一類的東西，或可算是常人所需要的日用品；但它既是商品，至少在定價中有五成或者五成以上是要落在資本家的荷包裏的。再如食米，更有人相信是離了所有階級而獨立的；但在造米的人自身得不到食米的這種現象之前，定要說米不是所有階級方面的東西，到底未免有點說不過去。現在也許再有人說教育是中正的，恆久的，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而獨立的；這些話之不可信，是我們已在前面說得爛熟的了。所以在這個社會中，說一切人都是立在支配者方面，爲了支配者的利益，自然不算

過言。我們的教育者就也不能例外；何況我們在前面也曾說過：資本家社會的學校教師，實施資本家的教育與欺騙的工作。不過就他們的利害關係而論，畢竟是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同為受人的支配而生存的；因之他們就也和其他勞動者一樣終於脫離不掉被支配者的地位。

(二)還有視教育者為立於支配者方面的原因，是由教育者具有稱為知識的特權的緣故。但是這個特權並不見得因出售而獲大利，至多也不過換得一張許可狀，有可就教師職務的優先權而已。何況現時小學教師所得的薪水，老實有許多及不及熟練工人之所得，甚至連汽車夫或包車夫都不如。(註)不錯，以前這批人在生活費之上享有特權的時代也曾有過；但那已變成老話，現在則連溫飽都說不上了。

(註)據十八年九月間江蘇省立中等學校聯合會向政府社會

調查報告中說：小學教員月薪僅十餘元乃至三十餘元，終歲勤劬，至不足以養父母妻子；中學主任職員至少二十元，至多八十元，根據中大行政院規定預算，甲等中學之教務主任月薪八十元，不及行政機關一書記，授課每小時

月俸至多七元，一國文教員須教授學生三班，每週改卷一百三四十本，始可月得一百二十元，不及縣市政府之科員。

(三)教育者之不立於支配者方面，反而立於與工銀勞動者相等的地位，實因另有幾個相通之點。第一個相通之點便是所謂器械的作業。工廠勞動者對於自己的生產物絕對沒有選擇權，他們只須走入工廠主所有的工廠中，一天到晚為換得口糧而出賣勞動力。他們站在安置好了的器械之旁，順從着器械的命令，以製造某種的生產物。一旦被廠方開除，也不大可以爭論。

教員呢，他們先費了若干年月，為在自己的勞動力上增加某種的技術與熟練，到名叫師範學校的學習場去。學習期滿以後，變為熟練工了，受雇於名叫學校的工場——可不一定能受雇用。在那兒，設有現成的教科書，教材，教法等等的器械，要他對於國家所需要生產的人，施以技巧。如果他竟想對學生加上規定以外的思想與訓練時，就會得被這個學校工場驅逐出來。總之，在成為什麼也不得發見自己的‘器械人’一點上，可以看出工場勞動

者與教師間的一大共通點。

或者有人要說這樣的比法有點過分。他以為教育這種事情要比較自由得多，要比較有功效得多，怎好把它們排在一起？不錯，教育的對象既是活躍的人，當然要比以無生物為對象者多有生趣；不過從成為‘器械人’一點來看，我們敢說教育者實與工場勞動者沒有很大的差別。這所謂器械的意味，是在把個人的個性全然抹煞，不是說不動，而是說這種的動也只是器械的動。試舉最淺顯的一例，就是時間表。授課時間的長度是一定的，還有教科書與教材是一定的，教授法也幾乎是一定的，從教室的廣度以至每室容納學生數的多少大體也是一定的。在這個一定的時間內，教材的進度居然也是一定。所以有人說，在行畫一制的法國，某時至某時在授某課，可以看固定的表以知道。更有人說，把日本的學校，在某一時間內切斷了，試檢查這個切斷面，或者竟是終於同一個字音上面也未可知。試問這與造大小同樣的肥皂箱的情形差異了多少？要是你所造的箱與原形稍有出入，你的生活就會受到危機。三四年前美國某州的中學教師

向學生講進化論，竟引起了有趣味的所謂猴子案，卒被法庭判決罰金。日本東京府下的一個小學生，據說抱了社會主義的思想，認為這是主任教師的責任問題，就把他調往他處。大概這兩位教師，與造箱的工人把箱子略略造長了二三分的意味相同，故即被視為超軼常軌，要受處分了。

(四)教育者與工場勞動者相通的第二點，是兩者都是工銀勞動者。他們中誰也沒有生產手段，除單靠出賣勞動力以維持生活外，別無法想。教育者所接得的教員許可狀，也僅在國家所認為名叫學校的地方，得發揮它的效用而已。

以前具有‘師資’的人，尚可自己設塾，自己占有生產手段，甚至在他的加工品之上也稍稍可以塗上自己的色彩。但在現代，若不受雇於國家所經營的或資本家個人所創辦的學校，因以出賣為其教育技術的勞動力，就無由發見謀生之方法。假使任意發揮其勞動力，有如經營私塾一類的話，便會因不是學校工場，故待他加工的生產品不會多多的來。何況國家對於這樣的生產加工品是拒絕貼上修業或畢業的牌子的；所以他的加工，只好以無

意味(無銷路)而終。這就是說,教育者除受雇於國家的或國家所許可的學校之外,便沒有其他生產方法可被發見。

(五)所以教育者除出受雇於國家所經營的學校工場,依據國家所規定的器械以製造定型的出品以外,不能有其他的生活方法。這一點是與工銀勞動者在同一個範疇內的。正教員是熟練工,副教員是半熟練工,代用教員是不熟練工,女教員是女工,他們的種類就有這樣的相似。惟工場勞動者的工資以日給為原則,教師的則以月給為原則;教師的地位比較體面一點,俗語所謂‘長衫幫’的是。

再有一點,學校是國家所經營,而工場勞動者的大部分是在各個資本家所經營的工場內勞動。這裏似乎有點差別。但實際上這種可稱為官業勞動者的教師與在私人經營的工場中勞動的工人畢竟並無什麼大的差異點,實也不能發見有什麼大的差異點。

(六)由以上所述的教師生活看來,我們得以明白他們實有結社的可能性:

(1)教育者工作的場所是為稱作學校的多數

人的集合體。普通工會的組織以有多數人在同一產業，或同一職業上從事業務為必要。就我國的小學校言之，鄉村每校教師雖不過二三人，若在城市每校終有十人左右；倘把一個地方的教師聯合起來，人數就很可觀。故結社之可能性在人數方面講是很充分的。

(2)教育者除出當作俸給勞動者出賣勞動方以外，別無謀生之路，而且他們還是‘器械人’，他們能有被壓迫階級的意識，得立於被壓迫階級運動的先頭之理由便在於此。這一點，教育者和農民的比較時，還更和產業勞動者接近得多呢。

以上說明教師結社的必然性，已很詳細。但事實上這樣富有趣於結社運動之必然性的教育者，却常有避忌結社之傾向，這個原因又何在呢？現在就要論及此點，就是：

(3)教師結社的反撥性。原來教育者有他的特殊點，這種特殊點可舉三項：

(一)如上所述，教育者是有所謂教員許可狀這類的特權的。取得了這個特權，似乎生活的安定性較多一點，而且勞動時間也比較少一點，以外或

者還有年功加俸，養老金及其他優遇。他憑這個特權在學校工場找得一個位置，就不怕外界的經濟情況何似，不大會直接影響到他。所以定期的恐慌或不定期的恐慌到來時，雖有許多工場勞動的失業者徬徨無路，但於他們的工場是難得波及的。可是另一方面，當經濟界景況極好的時期，別人家雖可得意洋洋，他們却不免仍舊寒酸，或者更寂寥到不能與周圍並論。

這種見地，我們原知道並不足以說明教師生活的如何安定，如何優越，而且事實上還正處於相反對的地位。但這是另一問題。我在這兒所說明的，只在有了這種特權足以引起他們對於結社之障礙，也是一種事實罷了。

(二)妨礙教師結社的另一原因，是在他們的薪水，由國家或地方的官廳發給。他們結社後的要求對象常是官府而不是某個資本家，因之要求貫徹的困難與要求提出的遲疑就不免跟着發生。且因之結社的性質，易由經濟鬭爭的場面轉為政治鬥爭的場面。這是教師結社困難之處，但也為教師結社有意味之處。

(三)第三種結社之困難是由教員的意識使然的。教師所出生的社會階級(特指小學教師而言)以屬於中農,小商人,小職員等下級中流階級者爲多。故志願使自己的子女成爲教師的家庭,大都以安全第一主義——安分守己——爲生活信條的。他們以爲做‘人師’的人必得循規蹈矩,溫文爾雅才是。不幸(?)他們受訓練的機關,又是同無風帶一樣的師範學校。這種學校是惟一免除學費或減少膳費的學校。當我們的師範生剛從小學畢業出來,開始對社會懷有許多疑問的時候,就被迫而受‘爲人師’的教育,受一切教材教法早經安排好了只許你照樣模仿不許你多所主張的教育。在這種樣的官吏根性與教書匠根性之根柢中,就橫布着幾千年來相承不變的封建思想。尤其在封建興味尚多殘存的中國,這個官僚思想與隸屬思想越發見得跋扈。

除涵養着封建思想之外,再加上要做人師或要做人之模範一類的訓戒,就形成了儼然不可一世的教員根性。要使具有這種根性的人從事結社運動,就不是件容易事了。

這種封建思想的表現，是一切當嚴守主從關係，是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而行”，是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所謂不許“處士橫議”，用一個通行名詞，即所謂沒有“言論……等等自由。”

舉一個這種思想的實例，可於當代的教育雜誌見之。教育雜誌雖有多種，但其中論及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的，試問占有百分之幾？它的極大部分只限於狹小的號稱專業的教育範圍以內，從不敢‘逾越常軌’如在北洋軍閥時代，教育雜誌——其他雜誌也然——把“革命”二字視為禁物，務必多方避忌。這可以見得教師意識是如何的成為結社運動上的障礙了。（注意！這只是一般的說法，教師中之具有革命意識者，自也不少，便當視為例外）。

但綜合說來，教師結社到底是有可能性的。試看下文：

第四，教師結社的可能性。我們從教師的任務上着想，從社會的趨勢上着想，便可見出上述的反撥性，將如風前殘燭，經不得微風一吹；而教師結社的可能性自將猛力展開。

上文已說過在現階段中教育者應盡的責任。

現在再就教育者之根本的社會的任務說明幾句。教育者之根本的社會的任務是在培養人間。既是培養人間，就有確立培養目標的必要。而這個目標却惟由正確地認清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才得確立。

我們所欲培養的人間，應當是能適應當代及最近將來社會的人間，同時又不可不為具有實現能力的人間。但在現實的社會裏，我們見有許多缺陷；每個教育者就得先自具備改造這許多缺陷的信念與力量，就得先使自己具備洞察社會害惡的識見與實行改造的熱情。

如何能獲得這一識見，如何能發揮這一實行力，是個實際的重要問題。但是就在這裏，有教師團結的必要，有教師結社的意義。

在現代職業中，要像教育者那樣居於有洞察時代的聰明與努力求其實現的地位之職業者，殊不多得。為他們工作對象的兒童與少年，又是要啄破現代社會之殼而走入新時代之選手。故說培養這種人間的教育者是最因循姑息的社會層，實是非常的矛盾。

覺悟到這個新使命的教育者，究該取怎樣的態度呢？最先他們當知道現代社會之歷史的職分，要用銳眼觀察在社會各階層間所行社會的事實，然後當把握住當作社會進化必然的歸結之未來社會。其次他們該注意的，是要這一種的觀察與把握在自己的生活上翻譯出來，并要把它影響到兒童身上。

但在這樣做的時候，自然有很多困難發生：第一是研究上的，第二是實踐上的。要解決這些困難，便意見有借助多數之力的必要。教師有了結社集會，便得集思廣益，便得努力實行。等到形成了教育者多數的意志以後，自可發生社會的力量。故教師的組織是在發揮教育的本質上所最必要的。覺悟的教育者必須從事於教師的組織運動才是正路。

以上是就教師的根本任務上，看出教師結社的可能性。如今再來看社會的趨勢。

凡在被支配者方面的人，都須有一種組織作為他們力量的集中點。他們要藉組織之力以發揮他們的‘正義。’教育者既是社會的動物，自也易有

這種或那種的團體。如在各地的教育會就是一例。不過這種團體不一定能反映教育者大眾的意志，故真正覺悟的教育者該組織能實現教育者真正使命的團體才是。

第五，教師團體的組織。這樣，從理想方面看來，或僅由必然性看來，教師組織的實現似乎甚為容易。但從現實方面看來，也頗有因反撥性的作用而阻礙結社運動之進行的。我們於此見出教師組織的特殊性，且認為是從事結社運動者所當考慮之重要點。如今且講教師團體應如何組織。

教師團體與工會農會最大的差異，在乎教師的雇傭關係較為多樣複雜。如就工會言，其雇主為工場主；就農會言，其雇主為地主。雖因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要定出法規以阻礙運動，從而發生總同盟罷工的現象，激成二大基本階級在政治上相對抗的形勢；然而第一義的經濟鬥爭，終是以工場主或地主為對象的。

但在教師方面，其雇傭關係是極有複雜性的。因法令上的種種規定，一般教師實受校長，市鄉，省縣乃至國家幾個階段之支配。其中最與日常生

活有直接關係者爲學校，而最有大關係者爲國家。故教育者的對象畢竟不像一個資本家或一個地主那樣的有獨立性與特殊性，而是有連帶性與普遍性的。

凡在國家管轄的小學校裏（無論是國立、省立、縣立或市鄉立）的教師，都是沒有特殊性的。他們領取相似的薪水，辦理相似的事情。祇要國家的法令不變，任何一個學校皆不能做別致的事情，得特多的薪水。雖因城鄉或因通商大埠與窮鄉僻壤，在待遇上有差別，但終不會各校特殊，至少是一個地方相共通的。至於工作上的限制，那就無分於城鄉或其他了。

這樣具有單一的事業與組織之小學校教師的組織，也當爲廣範圍內相統一的一個大團體才好。在初期，把有組織的可能性者先行發起，又與已成的組織聯絡，逐漸併成一體，或當作支部組織以實現單一的集團。次由地方的結爲縣的聯合，由縣的結爲省的聯合；最後進於全國的單一的組織，具有統制的力量。這個中央統制的事情雖非易辦；但提倡的理由實也另有所在。那就是如前段所述，教師

的意識今尚有許多是封建的。這批教師抱着爲教育而教育的空想，不敢作這種或那種的要求者甚多。如有多數人能團結一致，以羣力發動就足以發揮效用，且可以矯正教師的意識。惟因大眾是在地方的，故運動也當在地方進行；只是這個運動不要當作各個地方的運動，而要當作全體中的一部分的運動：這是要認清楚的。

至於教師組織的單位，應爲學校，因教師的一半生活是在學校中過的。惟如前述，教師的行動，往往是在一地方相共通的，如要求加薪等的運動，非聯合一市或一學區的全體教師不可。故其次應有地方的組織，集中當地的教師大眾以作地方集團的運動。以後則爲各縣的聯合乃至各省的聯合。

第六，教師結社運動的方面。就中國現狀言，教育者組織運動上所當注意之點似有三方面：（一）在思想上，要取批判的態度，把封建的思想，改良主義的思想澈底掃除；（二）在政治上，要爭得諸種自由，以解除權威的壓迫；（三）在經濟上，要保證生活的安定，以求日常生活的人間化。要之，教育者的運動目標，可說是在爭取澈底的民主主

義，獲得批判的自由與生活的安定。

爲供讀者參攷起見，特在這兒講些蘇聯教師的社會地位和他們的組織。

蘇聯的教師是被視爲政治上，社會上及智識上真正活動的分子的。這在鄉村爲更甚。在那裏，有時候教師差不多是惟一的智識上的領袖，也就是真正的領袖。如在某鄉村，教師是村蘇維埃代表之一，是文化委員會的主席，是合作社的活動分子，是農民新聞的通信員，是廣播電話的指導者，而且還要輪值爲官吏。在另一鄉村，他管理農事的宣傳，組織模範的田園，由一組農民耕種。像這樣的例子到處都是。可見蘇聯的教師才是實實在在能盡教育上根本的社會的任務之教師。

蘇聯教育勞動者聯盟 (Educational Workers' Union of U. S. S. R.) 擁有八十萬會員，爲全世界最大最有力量的教師組織。它的會員資格除出各種教師以外，還包含校醫，圖書館員，鄉村俱樂部職員，以及一切凡與教育有關的工作人員。它是蘇聯全國二十三個大產業組合之一，且當作勞動階級運動中的一部分以活動。試看聯盟中央執行委

員會所宣布的綱領，可以知道：

“雖然我們在聯盟中組成爲一個實體，但我們不是一羣孤立的勞動者。我們是蘇聯勞動階級整個的一部分。由我們的聯盟所提起的一切問題都是從一個見解以攷慮的——那就是我們的目標是整個勞動階級的最後的目標。”

聯盟的工作是和教育人民委員會（這是行政機關）保持密切的關係的；一切教育上的法制在未批准之前皆由聯盟加以審慎的攷慮；聯盟舉行常年大會時，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委員要出席報告，答復質問。

教育勞動者聯盟有兩大職能：一是對教師的，一是對社會的。前者是用集體的方法以保衛它的會員（在薪水及待遇方面），提高職業上及文化上的標準。後者是由提高教育的標準及改進社會的組織以提高本地方的文化水準。

教育勞動者在每個主要中心地都有一個俱樂部。這些俱樂部同由別個工會組織的俱樂部一樣，是教師組合的文化工作及社會活動之根據地。它歸各地方的教師組合的委員會所管理。委員會選

出一個管理員專門負責辦事，給以薪水。每個俱樂部至少終有一個講演廳（是經常使用的），圖書館，會餐室，教室，遊戲室，以及經常籌備運動會及旅行會的通告部。

（關於蘇聯教育勞動者的組織，最好請參看尼林著的蘇俄的教育第十章）。

問 題

- 一、教師在現階段的革命工作中，應有何種的自覺？
- 二、小學教師對於兒童及民衆應怎樣實施和他們生活有關的教育？
- 三、教師如真得不到團結權，或者未能自由行使結社集會的權利，試問教師們該取什麼態度，採什麼行動？
- 四、在教師結社上有何種必然性？又有何種的阻礙？應當怎樣去克服這種阻礙？
- 五、試批評中國現時的教師結社運動，並討論結社上的困難及實現負有革命使命的教師組織之方法。

第十二節

學 生

從政治的立場上論學生。——中國最近學生生活狀況——學生的悲哀。——學生運動的復興。——對學生運動的錯誤見解與幻想。——學生運動的任務與綱領。——蘇聯的學生組織。——問題。

在教育書上論及學生，原是“教育通論”一類的書所常有的。但我在本書上要論及學生之動機，不在乎純粹教育的立場，而在於現階段中中國學生所處的地位，即可說是政治的立場。

本來所謂學生，還不是受教育者的全體。在就

學年齡之前和學校畢業之後，社會對於一般兒童及一般成人都該多方地不斷地設施教育；用教育上的成語來說，對前者要行就學前教育或幼稚教育，對後者要行成人教育或民衆教育。這因為教育的場所不限於學校，故受教育的人也不限於在校求學的學生。不過就現狀言，在校求學的學生實為受教育者的主體，而且學校也一向作為教育之最普汎的表現。從而本書論學生，也只以在校求學的學生為限，那些該受就學前教育的和畢業後教育的受教育者都要暫置不論。

根據我們對教育的見解——教育是政治的，階級的；又根據 learning by doing（行以求知）的原則，學生之當參加政治工作實是不容疑問的。學生應做政治運動也就成為本論的出發點，成為以下一切論述的前提。

讓我們先看一看目下中國學生的處境如何。我只據報紙所披露的寫在下面：

第一，學生的負擔過重。義務教育本該免費，甚至還該供給學用品等；但是中國有許多初級小學是收學費的。供給不起學費的家庭，就只好不送

子女入學了。師範學校在十年前還免除學膳費，近來也不能如此優待了。受大學教育的也同聲嘆息負擔之過重；試讀國立中央大學各院學生會代表會的陳述：

“……同學因經濟困難，請求罷學者日見增加，而學費負擔又較國內各大學爲獨多。年來首都生活費用日高，個人消耗日大，窮苦同學幾無讀書之機會，勉強支持者亦備受經濟之壓迫，無心弦誦。……在學校方面似亦甚悉同學之痛苦，曾規定貸金辦法，然以基金未籌，徒有具文，迄未實現。十七年度又有免費學額之設，然名額過少，且純以成績爲標準；經濟富裕者得教授證明，即可全部免費；而家境清貧，確爲好學者，反有向隅之嘆。……”（見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上海時報）

由此可見雖是受大學教育的小資產階級以上的學生也感到經濟壓迫的苦況；而如有名無實的免費學額，更只有粉飾耳目的作用罷了。

第二，升學的機會太少。據江蘇省立中等學校聯合會向政府社會表白宣言中說：

“……小學亟須推廣，而初中照現在情形已須推廣七倍以上，高中至少須推廣三倍。近年省立中學每屆招生難擠不堪，甚有轉輾說項求爲旁聽生者。夫國民不知教育，故立法以強迫之，多方以獎進之，今國民出費求學，而宮牆萬仞，不得其門而入，率其子女，旁皇道左。事之可哀，孰逾於此。……”

又據中校聯會調查十八年度上學期各校招生狀況，總計投攷生一萬二千九百十三人，而被錄取者僅三千七百六十八人；可見錄取率只不過百分之三十五。這還是就有財力升學者而言；至小學或初中畢業因無力升學而不投考的，自然不算在內。

大學的錄取率，我們雖得不到統計，但依事實推測，當然不會把志願升學且有能力升學的中學畢業生完全錄取的。

出了錢還沒地方讀書，這怎不是令人氣短的現象！

第三，因兵禍天災以致失學者甚多。上海民國日報載有（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一日的西安通訊，

說陝省教育年來以受種種影響，致教育事業日漸蕭條，而失學青年幾不可以數計；學生方面因災荒過重，家庭經濟艱難，以致休學者頗多，其有力求學者每縣亦不過七八人。中報也載西安方面之各中級以上學校，因本年旱災奇重，於五月間即提前放假，暑假期滿，本可早日開學，但因（一）經費無着，（二）教育界本身暗鬥甚烈，兼有局部的政潮，遂致將開學日期一再遷延。

這還只就陝西一省而論，其他如河南山西等處也都發生災害；而且‘兵連禍結’，迄十八年年底猶未終結。在這種情勢之下，教育經費無着，學生家庭經濟衰落，青年求學的機會又哪得不被剝奪？

其他因教費拖欠，或校費太少，教職員或學生為要求發欠要求增款而停課的事實，幾乎遍於全國各地。大學生中學生乃至小學生都要為此受到拋荒學業的損失，這果是誰的責任？

第四，因專業不專，設備不備所生的弊害極顯。試再引中大各院學生會代表會的陳述：

“……各院教授多係兼職，其不兼職者又多濫竽充數，除上課外，絕不踏入圖書館或研究

室，教授既無研究之精神，同學自寡讀書之興趣，馴致學校變爲市場，講義化爲商品。……”

又說：

“……本校年來因經費困難，以致圖書儀器無法添設，優良教授不得聘請，同學因家境貧困請求免費者皆不可得，而行政費用竟每年消去五十餘萬元，教育效率因而減少。揆厥原因，全由冗員過多，職員薪水太高之故。……本校辦公各處，冗員充斥，按月支薪，無所事事。……”

以研究高深學術爲職能的大學，且是位於首都爲世人觀瞻所繫的中央大學，尙有這樣官場化的惡習彰明昭著地存在，不將令一般熱心教育的，尤其是‘教育救國者’爲之‘長太息’嗎？

其實教師的不專業，圖書儀器的不完備，又豈祇國立中央大學爲然。讀我書者，請就各自所在地的學校一加攷察，還不是到處一樣嗎？

第五，沒有研究的自由，發表的自由，集會的自由。各校學生有自動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然而常被禁止；有自動出版刊物的，然而常被檢閱查

禁；有自動爲反抗帝國主義而行動的，然而更被絕對壓迫。

第六，很少就業的機會。無論是中學畢業生或大學畢業生，出了學校，被送往社會這個勞動市場，你想有多少能找着出路？可惜我這兒又沒有什麼可引用的資料，來證實謀生之非常困難。但我可以告訴讀者，你如常在上海或本地的報紙上留意，某機關招攷職員幾人，應攷者多少人；你就不難發見這裏邊競爭的猛烈，簡直會叫你喫驚不置。我彷彿記得上海臨時法院招攷錄事（？）數人，照時間報名應攷者達幾百人。花了一二千乃至二三千元的求學費，好容易拿到一張畢業文憑，然而尙難見容於社會，竟等於不兌現的支票，又豈不要令人失望灰心？

這種就職難的現象如何，原因何在，當你們在學校求學期中，教育者是不告訴你們的，教育書上也是不講到的。至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自然更非你們所知了。你們受的教育，竟是這樣不中用的東西，你們所花費的幾千元金錢，十數年光陰，不都是‘蝕本生意’嗎？

你們讀過了本書前面的各節，一定知道你們現在所受教育的性質；你們也許就是正在嘗着失學或失業的苦味的青年，那麼你們預備怎樣幹呢？

你們是青年，你們除上面所述各種苦況之外，或者更受着其他的苦況也未可知。譬如戀愛問題啦，家庭問題啦，健康問題啦，人生觀問題啦，這些都是每個現代中國青年所不大避免得掉的切身問題。你們的教師曾對這些問題，向你們解說過指導過沒有呢？你們所生活着的社會曾向你們有過同情和援助沒有呢？怕你要罵一聲“這個無情的社會，冷心的社會”或“百不管的教師，自欺欺人的教師”嗎？說到教師，自然有好多是熱心的，勇敢的，聰明的，爲你所認爲指針明星的；但是這種教師不是會得常常不安於位，或者也只能很微婉地向你陳述嗎？歸根，你將怨社會，恨社會，痛責社會，或者不願偷生在這個齷齪的社會中竟去投江自盡了吧？這確是個足致青年於死地的社會，是有識的怎能不爲你們洒一掬同情之淚呢？

然而這樣的消極，這樣的對惡劣環境屈服，到底不是每個有志氣的青年所應走的路。請看，我們

的從五四以來奮然躍起，成爲一個儼然的社會勢力的學生羣衆，不管中間曾經過多少波折，但到現在，到一九二九年，不是又在活躍起來了嗎？這種學生羣衆日益左傾，日益革命化的形勢，是在全國範圍之內——甚至還及於留日本的學生——都表現得非常之顯明的。只有這樣的日益左傾日益革命化的學生羣衆的鬭爭，才是青年學生解決上述種種問題的出路。這是積極的，向惡劣社會奮鬥的，而且是惟一正確能有成效的出路。

在這個鬭爭的形勢中，我們可以指出以下幾個主要的特徵：

（一）是反帝國主義的復興。中國的反帝運動自一九二七年以來，的確經過一個暫時消沉的時期；但從一九二九年起，已逐漸復興了，青年學生在這個鬭爭中都有熱烈的參加。

（二）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發達。新興社會科學是革命理論上的武器，是社會變革的意識上的準備；上海各書店競出社會叢學科書，即爲學生羣衆思想逐漸轉變的反映。

這種學生羣衆鬭爭形勢的左傾，其原因又在

那裏呢？這有三點可說：

(一)由於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英美日各帝國主義更積極的剝削中國人民，以致平民生活日益惡劣，小資產階級也日益破產。

(二)由於天災人禍的連年不斷，以致“民不聊生”，社會各階層的衝突矛盾日益緊張。

(三)由於學生本身生活的不安定，受不着教育的好處，都要嘗失學失業的苦味，這只好逼着他們走上革命化的一路。

年來頗有人認為中國學生的革命作用已經消失，故無須再做學生運動；或者只知進行少數人的運動，而不知站在廣大學生羣衆的利益上以發展一切學生的鬭爭。其實這都是錯誤的傾向，只看現在學生運動的日益左傾便可知道。在現在形勢之下，應該把這些錯誤傾向嚴厲糾正才行。

不過同時我們也不要幻想做統一的學生運動。社會各階層的衝突，已引起學生羣衆中間的階級分化。有一部分的學生却另有組織，是須我們用鬥爭力量去克服的。所以今後學生運動的任務，是在站於廣大學生羣衆的利益上以發展學生羣衆的

鬭爭，不在從各種政黨派別分立的學生羣衆中去謀學生組織的統一。

目前學生羣衆鬭爭的任務，應有下列幾端：

(一)要擴大反對帝國主義運動，指出近年來中國民衆所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尤其要注意反世界大戰的宣傳。

(二)要反對國內軍閥戰爭，指出軍閥制度現仍存在；軍閥戰爭不息，苛捐雜稅不可避免，平民生計也就無法安定。

(三)要力爭思想言論出版研究集會結社的自由，要能自由參加政治集會，發展青年團體，辦理壁報，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討論會等等。

(四)要力爭增加教育經費，使學校各項教育設備臻於完備，反對軍閥官僚以任何名義減少或挪移教育經費。

(五)要力爭參加校務選擇教師的自由，要求在學校中充分獲得民主的訓練，尤其要反對犧牲學生利益，以學校經費與教職員地位，供校長或官廳私人的利用。

(六)要力圖擴大平民教育，提高一般工農的

文化水平線。

關於學生組織的實例，最好又莫如參攷蘇聯的學生組織。你們要知詳細，可向民智書局買本杜佐周譯的蘇俄的教育，那書的第九章就是講學生組織的。還有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的新俄學生日記（林語堂張友松合譯）和新俄大學生日記（江紹原譯），講到少年先鋒隊和共產青年團的情況，也可供你們明瞭蘇聯青年學生的生活。這兒，祇能約略說一點。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學生間的一切組織是常要受國家禁止的。現在，學生組織却為教育制度中一個主要部分了。各級學生要從各種學生組織中去學習怎樣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蘇聯的學生組織，主要的有四種：（一）是專為處理學生活動的，有如運動，出版，維持學生紀律及參加學校行政等；（二）是管理及幫助學業的；（三）是經濟組織，或為合作社，或為工會；（四）是政治組織，或在少年先鋒隊或在共產青年團。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富有經驗且深知兒童在社會活

動上有參加到何種程度的學校當局幫助着組織起來。

所以雖說是學生間的組織，仍視學生的能力如何。受教者的組織能力薄弱時，教育者方面的指導程度要加強；到高等專門學校的程度，是行完全的學生自治的。不過要知道任何一個學校，總是有一個或數個的學生組織的。今據蘇俄的教育的著者尼林的報告，稍爲具體地敘述如下。在統一勞動學校的初年級，選舉有整頓全級責任的級書記（不叫做級長，是有意義的）。爲自治生活的全部。年級增高，自治生活也擴大範圍。在一級分爲數班的統一勞動學校二三年程度時，即由各班選出代表一名，組成學級執行委員會。在後期社會教育時代的兒童（十二歲至十五歲或十七歲），大約各班選出委員三名；這三名委員分爲學級委員，文化委員，衛生委員，各各分担職務，以謀自治的實現。關於規律的取締，是學生自治的重要部分。但肉體的制裁業已廢除。職業學校及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各因職業別編成校內工會，與校外的工會相聯絡。日常生活的規律，皆由所屬工會維持。高等專門學校

的學生因多爲工會所介紹，故在求學時代得校外工會的經濟援助者不少；但無論受援助與否，對於校內工會都須繳納收入百分之一以充會費。

其次就學生在學校管理上的地位言，上自高等專門學校，下至農村小學，沒有學生不參加學校管理的。這不外爲使學校是爲學生而設這一原則能徹底實行而已。學校管理的機關有二：一爲決議機關，一爲執行機關。決議機關由教師，學生，學生的保護者、有關係的工會，有關係的政治團體（黨與國）及學校專屬勞動者（門房，書記以及工人等）工會的代表而成，在每年舉行一次至四次的學校委員大會中，決議種種的根本方針。至於執行機關，大概爲由教師及學生所選五名至七名的執行委員會，這就是實際管理學校的。

但學生的組織，不祇如上所述純粹爲學校生活的，他們更有一種政治的組織。視年齡及能力，或加入少年先鋒隊，或成爲青年共產團員。在上級學校中也有共產黨員。學生的全部雖不屬於此等政治團體，但黨員及團員在同年同學中，大都是有領導的作用。統一勞動學校的紀律問題，常由少年

先鋒隊來處分。他們立於青年共產黨員或共產黨員指導之下，雖是少年，也要對於共產主義社會之建設爲獻身的努力，比較別個少年更富於道德的勇氣，他們且以此自誇。——請看新俄學生日記的結語：“我們的先鋒隊萬歲！”是何等的豪壯！

關於先鋒隊與共產青年團的情形，我更願引用美國人 Lucy L. W. Wilson 所著新俄的新學校 (New Schools in New Russia) 第十一章“青年運動”中所述者節譯如下。

少年先鋒隊(Pioneers)隊員，在一九二二年有四千人；一九二三年有二十萬人；一九二五年有一百萬人。實際上，從七歲到十三歲在城市學校的全部兒童以及鄉村學校中陸續增加的兒童都屬於這個組織。差不多無論何處，你終可以看到他們背着旗幟，有時穿着各式的制服，更常用紅的頭巾紅的領帶作爲他們唯一的符號，在工作着，進行着，快跑着，歌唱着。到了夏天，就往外露宿，受年長的共產青年團員的保護，圍着營火，渴望地聽受關於列寧少年時代及關於十月革命的故事。他們學習直接地去認識這個自然界。他們學習清潔整齊操練

的方法。在這些地方，他們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童子軍是相像的。另外，他們須受共產青年團的直接支配，受政治上的教訓，以期日後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作參加的準備。

共產青年團（Comsomol）員的年齡自十四歲至二十三歲。許多在中級學校的學生，無論是城市的或鄉村的，屬於這個團體。

當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在波蘭等處的兒童革命運動，是非常顯著的。幾千兒童組成爲“小組”（Little Band），占有了劇場及其他大衆集會場所，散發傳單，甚至參加防禦戰。當然，他們是被壓迫解散的。不過，這類經驗却大有助於革命後共產青年團的迅速發展。

共產青年團員在蘇聯教育進步上所盡的功能已很偉大而重要。農民青年學校的發動，可說全由他們開始；就是工廠學校的發達，他們也大有貢獻。Pistrak（蘇聯教育領袖之一）甚至於說：“沒有共產青年團的協助，任何種目下蘇維埃學校的創成都不可能。”由這可見蘇聯青年學生之如何努力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工作了。

但是這種學生組織，是富有教育上的原理的。我們學教育的人，不要以為這些只是政治的產物而不是教育的產物；更不要以為普通教育書上不講到學生組織，就認為在上面的敘述都是別有用意；如果這樣想，你就錯了，你真是做了布爾喬教育學的盲從者了。試節述尼林的報告（原書一一四頁以下）：

蘇聯的教育者現正研究學生組織，和他們研究教育學上別的任何問題一樣。Kharkov 教育部的教育研究主任 Zaloojny 述他們在這一方面能做的實驗工作和研究工作說：

“兒童研究已由當作個體的兒童轉移到當作社團成員之一的兒童上來了。這就使得兒童問題的探討上有完全改變態度的必要。”

在庫爾普斯卡雅 (Krupskaya, 列寧夫人) 寫給少年先鋒隊的文書中說：

“生活在正當情境中的正常兒童，要把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明確的目的，集體的生活，是兒童發展上的主要條件。”

這個關於學生組織的教育原理，在俄羅斯共和國國家教育會議之科學的教育部更有詳細的敘述：

“一、有產階級以養成和順的絕無思想變更既存秩序之主要組織的市民定爲學校的目的。這個目的決定課業的性質及學校內部的構造。……

“在這種樣的學校裏，教師對於學級及對於學生是一個絕對的主人。另外加上懲罰和其他規則的一個系統，——獎賞也在內，其目的只在幫助教師以達到所欲得的目的。兒童們都在他們的掌握中。他可以加重課業；他可以驅逐兒童出校；兒童們把他看做敵人要打他。他們反抗他的規則，故意地破壞它，且爲這個目的而組成團體。教師是國家權力的代表，兒童們反抗他就無異反抗國家的秩序。這一種的鬥爭團結學生們的大團體，減損當局的威權，阻礙教育目的的實現，鼓勵不滿的精神，助長敵意。

“在這種學校裏面，學生自治的採用以消除師

生間的鬥爭爲目的，藉以提高教師的威信，使兒童自己負有監督的責任，執行教師的決議，到底不過是強制兒童屈服於教員的一種手段。……

“二。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共和政體建立得很鞏固的國家——美國，瑞士——我們常可以在學校內看到另一種型態的自治制。突然地或逐漸地，把那和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共和國相像的一個制度，連同它的附屬物：選舉，法廷，甚至監獄，介紹到學校裏面（如美國的 George Junior Republic）。學童們，特別是青年們在這種制度下頗能享受一點行動的自由。這樣的學生自治是以養成忠於布爾喬亞共和國的市民爲目的的。

“三。在我們爲學校提出的目的與布爾喬亞國家所提出的目的中間所有的分別，對於學生自治的形式和目的上發生一種決定的勢力。

“四。我們的學校的目的是如此：養成人類社會的有用分子，愉快，強壯，能勞動，具有活潑的社會本能，慣於組織的活動，理解他在自然

和社會裏面的地位，知道怎樣與時勢的進展相聯絡，能堅定地防衛勞動階級的理想，又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有力的建設者。

“五. 在我們的學校裏面，自治不是便於管理學生的一種手段，也不是為研究制度的運用的一種實際方法。這多是學童藉以學習善為生活及善為勞動的一種手段。

“六. 學生生活的內容越豐富，學生自治越徹底。集體工作更是偉大無比的組織力量。除非在集體工作表顯出全部學生生活的活氣的學校，自治制就不能好好地發展，且形成為最合理最有益的形態。

“九. 在它的已在發展的形態底下，學生自治必須包含教育團體及社會活動的聯合，這在實際上擁有經濟的娛樂的藝術的學生工作，以及學生的互助事業。學生在一切場合都要有代表在學校委員會中。

“十. 自治的全部工作必須要由學童與教師協力處理。教師的職責在積極輔助學生自治。但是教師要讓學生們完全獨立，不可用他的權

威強制他們。(自蘇聯教育勞動者同盟所印行法令的一冊複寫本)。”——見尼林的蘇俄的教育第九章。

學生自治是有這樣學理上的根據的。今後新的教育學書上必須講到學生自治組織才不算有缺陷；今後新的學生生活上也必須有這樣的學生自治組織才算完成。

問 題

- 一、學生為什麼應該參加政治鬥爭？
- 二、青年學生所受的生活苦況，究有多少種，請學生們自己和革命的教育者過細研究一下。
- 三、青年學生們應該準備怎樣為自己的生路而鬥爭？
- 四、你曾參加過何種學生運動？有什麼經驗？如未曾參加過，準備怎樣去參加？
- 五、你對現時的學生運動有什麼感想？什麼意見？

第十三節

勞動階級的教育運動

勞動教育與勞動運動。——支配階級的勞動教育與勞動階級的獨立勞動教育。——英國勞動教育的分派：——右傾的：勞動者教育協會與拉斯金大學。——左傾的：平民同盟與勞動者大學。——德國勞動階級教育的理論與實際。——美國的勞動學校。——問題。

如前所述，在階級社會中，往往有兩種教育權的存在：一種是支配階級的教育制度，一種是被支配階級的教育行動；到了近代國家的時代，因階級對立關係的愈趨嚴重，於是以前可以並存不悖的

兩種教育，至此遂成爲互相對抗的兩種教育，甚至還不免互相火併。譬如美國大學中，不許有人宣傳社會主義；在校教授違反此例，要受解職的處分；校外學者前往講演，要受‘擋駕’的待遇。（詳見辛克萊的 *The Goose-step*。）又譬如在日本，政府當局視學生研究社會科學爲‘赤化’，要把研究會解散，要把指導的教授解職，要把研究的學生開除；又不許工農自行建設學校，如一九二六年新潟縣北浦原郡木崎村的農民，鑑於公立小學校都是資本主義教育的機關，特令所有兒童一律罷課退出，另建無產農民小學，實施全不遵照小學校令的教育；可是創辦不久，就被封閉。

不過在歐美，正猶共產黨可爲合法的存在似的，勞動階級獨立進行的教育運動居然也得稍稍公開。而且勞動階級的這種教育運動，不祇是一種實質的行動的，却已進爲有組織的制度化的。至於這種教育運動的性質，自然是反資本主義的，也就是反支配階級的，故與現代社會的正式教育制度不免發生衝突，更難免受當局的壓迫。

本節將就英國德國及美國的勞動階級獨立的

教育運動加以敘述。至於俄國的，那已成為國家正式的惟一的教育制度，與以上三國的不同，我將專立一節來介紹。——所以不同的緣故，自然是爲了俄國的勞動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

在分別敘述之前，我當對於這種教育運動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及要加上‘獨立’兩字的理由說明幾句。

勞動階級的教育運動是跟着勞動階級整個的運動來的。自資本主義確立以後，創出了所謂工銀奴隸之一新的社會集團，此等工銀奴隸的人數因產業資本的蓄積而益增多，且生活愈陷於窮困；更因恐慌與戰爭時有失業并喪失生命之危險。這樣，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中，自十九世紀初年以後，即產生了憧憬於未來的和平與幸福之新社會而欲試行其理想的設計者；如法國的聖西蒙，傅立葉及英國的勞勃脫奧文三人，實爲空想的社會主義之先驅。其他尚有無政府主義思想，以及許多取材於社會問題的文藝作品，是爲這時代的特徵。然人類社會的進化，勢將突破資本主義的制限以發展。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成長，更必然地要脫離布爾喬亞泥

之觀念的支配，而產生自己的社會思想，給他們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以理論。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即爲由國際勞動階級運動的發展所產生之指導的理論。如今我們所要講的勞動階級教育運動，也就是這樣的勞動階級運動的產物。故論勞動階級教育的起源是差不多與勞動階級運動（勞動問題）的起源同時的。

還有，這種勞動階級的教育，是與今日資本家所給於勞動者的勞動教育根本不同的。勞動階級教育乃是勞動階級獨立的教育，是有“教育上的階級鬥爭”的意味的。這種教育的目的是“從支配階級的教育統制底下解放出勞動者來。勞動階級的教育和普通在大學及一般學校所施的教育，根本差異。在現在學校所施的教育，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即以讚美競爭，造成優秀的個人爲目的。而勞動階級的教育却是社會主義的。它將崇尚協同，產生社會上，及產業上優秀的集團。因此，勞動教育的學校要脫離所謂舊學校的傳統與思想；”（盧那查爾斯基語）而以自己階級的使命爲依歸。我稱這個爲‘獨立’的勞動教育，就爲了這個緣故。不過我

們還得注意一個要點：不特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有它們的勞動教育；就在勞動運動的陣營中，爲了左右的派別不同，也有性質不同的勞動教育：有真爲勞動階級的利益的，有並不真爲勞動階級的利益的；前者立於階級鬭爭的立場上，揭舉獨立的勞動階級教育，以學習在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上所必要的社會科學與運動理論爲宗旨；後者則是一般的成人教育的性質，以人格的修養，特種技術的傳授爲目的，且特別標出與任何黨派無關係。本來，勞動階級教育跟着勞動階級運動的發生以發生，又跟着勞動階級運動的進展以進展的；到了階級鬭爭形勢逐漸尖銳化的時期，勞動運動內部發生分化，由是勞動教育也發生分化，自是當然之事。我們觀察勞動教育，應該對這種情形深加注意，庶不致走入歧途。

現在就進而敘述英國的勞動階級教育。

因爲英國是產業革命的發源地，勞動運動比其他任何國家爲早，從而勞動階級的教育運動也開始得早；不僅如此，連勞動教育的分派也特別來

得複雜。

英國最初的勞動教育，起於十九世紀之初，即在一八二三年，創立工藝學院（Mechanics' Institute），至一八五〇年，已有五百以上的學院數，注重化學及力學的系統研究，並隨時授木工土工金工染工等工匠所時常應用的科學原理。但是這種教育運動並不是勞動者的獨立教育，而是在上流階級恩情主義之下所發達的。至一八四二年在謝斐爾特（Sheffield）所創設的人民大學（People's College），才算是英國勞動者獨立教育運動之先驅；因為它的經濟獨立，不受政府及慈善團體的扶助。不過就是這個學校，嚴格說來，還不能算是有階級覺悟的；因為它只授希臘語，拉丁語，論理學，公民教育等，其目的只在救救‘知識’的貧乏而已；再看它的成績，大學畢業生有做市議員者，有做市參事者，有做法院推事者，甚至還供給市政府一個最有能力的市長；這可見它並不是為養成勞動運動的人才而設的。

這時候，合作社的勞動教育運動逐漸發達，在一八五四年即有與這種運動相關聯的勞動者大學

(Working Men's College) 成立，自後在別處也創立多處，但迄今祇有在勒司特 (Leicester) 市的與在倫敦市的繼續存在。這種大學的旨趣却頗奇特，既不是想把勞動者提高為中流階級，也不是想對勞動者注入階級意識，却只是把全體師生看作‘同伴’ (Fellows)，似乎要打破階級的界限似的。所以這只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勞動教育。

這樣，一方面新大學陸續出現。他方面大學擴充運動 (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 也開始盛行。自一八七三年劍橋大學發動以後，倫敦大學、牛津大學等等相繼加入；至一八八〇年前後，這個擴充運動達於頂點。終於因勞動者沒有管理權的結果，遂逐漸衰落了。至十九世紀之終，成人教育運動對於一般勞動者教育頗有影響。這兒我要舉出一個拉斯金大學 (Ruskin College)，它創於一八九九年，係美國人服魯曼夫婦 (Walter Vroman) 在牛津所捐資設立的成年勞動者的寄宿大學。設二年課程，以實施不偏於一黨一派，有貢獻於民主的勞動階級運動的社會科學之教育為目的。後來服魯曼歸國，大學由牛津大學方面的人及

少數工會幹部所成的評議會管理，受工會經濟援助的學生也由工會派送。但至一九〇九年內部發生分裂，另行產生中央勞動大學，這事容在下面再述。

入於本世紀之初，英國勞動教育上最堪注目的，當爲一九〇三年由曼斯布立治（Albert Mansbridge）所主持的勞動者教育協會（The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簡稱 W. E. A.）。它在各地設立支部，甚至連澳洲加拿大都有同樣組織。協會運動中之最力者，是所謂大學導師班運動（Tutorial Classes Movement）；自一九〇八年由該會與牛津大學合組委員會開始第一次導師班以來，英國所有大學均起而與該會合作，至一九一九年止，學級數達於八千。據說“自此項運動以後，一方大學得深入工人隊裏，替大多數民衆効勞；他方佔全國人口七分之六的工人將入大學門牆，以與學者共同研究。當時美國報紙之代表工會者宣言：‘我們初時以攻擊牛津大學起首，現在我們已知錯了，只好以自己引咎結局’。”（見教育雜誌二十一卷八號，雷賓南的英國成人教育運動之起源與發

展)然而這種教育運動在勞動運動上的所以沒有價值,也正爲了這樣的效果。

現在再講勞動者教育協會。它成立於一九〇三年在牛津所舉行的勞動者及教育者的代表會議中,這個會議是爲了覺得勞動者有與大學相接觸之必要而開的。在大戰中,協會的活動停止,但至戰後,活動的範圍大爲擴張。現在算是英國最大的勞動教育機關。這個協會爲由勞動階級,與教育有關的諸團體及個人所成的聯合組織,各地設支部,由各地方團體的代表六名及他團體的代表一名構成中央評議會以統一各支部。協會的目的,在喚起勞動者對於教育的要求而使之滿足;在對於國家的教育制度主張理想的改革;在對於學校以外的成人教育供給種種的便利等等。主要的事業,爲指導管理大學導師班聯合委員會,三年制與大學同程度的導師班,一年修業科,研究團,暑期學校,中央圖書館,婦女班等,并出版月刊雜誌公道 (The Highway) 及供勞動者用的書籍。這個協會對於政治,表示與任何黨派無關;對於其他團體,除爲了完成目的的必要上,須與教育部,地方教育當

局，大學及其他教育團體，工會，合作社，政治團體等協作以外，不受此等諸團體的牽制。正因為這個緣故，它就不配成為真正有意義的獨立勞動者教育運動，它就只好成為英國右傾的勞動者教育機關。（左傾的是平民同盟，見下。）我們看底下所述受平民同盟指導的勞動大學和屬於協會系統的拉斯金大學之差別，就可知道兩種教育機關性質之不同。協會在一九二一年的支部數為三百十七，加入團體數為二千八百九十六，會員數為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人。

上文說拉斯金大學於一九〇九年內部發生分裂，這是為了以下的理由。在該校求學的學生中有許多是曾受過工會訓練的，他們一因學校的管理幾乎全為牛津大學派所把持，有輕視學生要求之處；再因大學的教育方針簡直是舊有資本家大學的延長，有作為牛津大學附屬物的傾向；三因廣汎的教育殊與勞動者的解放運動無大效用；於是不滿的空氣，鬱積在學生中間。大學中急進的學生及舊學生遂於一九〇八年十月組織為獨立勞動階級教育機關的平民同盟（見下），翌年更以同盟罷課

對抗學校，且終於分離出來，自行設立中央勞動大學。這一大學，後來由牛津移於倫敦，改稱勞動大學（The Labour College，見下）以至於今。勞動大學依據平民同盟之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方針，為左傾的；其後的拉斯金大學處於不偏不黨以勞動者成人教育為目的的勞動者教育協會之指導下面，遂成為右傾的了。然至一九二五年英國工會大會時，決議把拉斯金大學與勞動大學同置於英國工會總評議會的教育委員會管理之下。

現在來說勞動大學。它是以中央勞動大學為前身的，受標榜馬克思主義的獨立勞動教育之平民同盟的指導，實施勞動運動的歷史任務上所用的手段方法之啓蒙教育；最顯然的，又莫如該大學所揭櫫的以下各項：

（一）本大學創立的基礎在於確認勞資利害的衝突。

（二）本大學以授實利性質之教育，反對資本家階級的觀念及理說，將擁護及宣傳勞動階級的利益所必要的訓練授於勞動者為目的。

（三）當使勞動者團體，即工會，社會主義者

及消費合作社等的代表管理本大學。

以後該大學又發宣言：

“這個大學是由於對勞動者團體爲完成他們的產業的政治的事業而供給適當的知識之目的以設立的。……勞動階級教育必須離開一切教育之傳統的當局而獨立。……它必須採用過激派的形式……最有用於社會科學的進步之階級，最有用於這一階級的科學之形式。”

由這可見勞動大學實爲‘獨立的勞動階級教育’(Independent Working Class Education)。

這個大學在大戰中自也受着打擊。然各地方的學級不僅依然繼續，反而非常擴大。自創立以來，由南威爾斯礦工聯合會及全國鐵道職工會兩左傾工會的共同管理以經營；至一九二五年，却以工會大會的決議，把它和拉斯金大學一起移歸工會總評議會的教育委員會管理。大學的課程定爲二年；除設夜間及日間的特別講座以外，又設通信教授。屬於大學系統的地方勞動大學現在全國共有一千另四十八處，共有學生二萬五千另七十七

名，受全國勞動大學評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College）的統制。

最後說平民同盟（The Plebs League），它是如前所述，於一九〇八年十月由牛津的拉斯金大學學生及舊學生中的急進分子，為反對該大學的教育方針，脫離出來，而以“為了勞動者利益的勞動者教育”為目的所組織之團體。在英國，它與上述的勞動者教育協會成為勞動者教育機關的兩大陣營；它的特徵，在反於協會所抱之不偏不黨的立場，而奉馬克思主義為基調，即以第一，承認階級鬥爭的事實；第二，排斥與資本主義的文化相妥協；第三，教育上不能有不偏的態度為信條；且進而“為使現在勞動者的地位向上，促進獨立勞動階級的教育之興味，努力於工銀奴隸之廢止”。組織是以會員為單位，每月繳納會費二先令作為中央基金，各地方設立支部；主要事業有編定研究社會科學的學級（由工會，工會評議會及各地勞動團體維持），發行月刊機關雜誌“Plebs”及平民同盟的出版物，及指導勞動大學及有同樣教育方針的地方教育機關。現有會員數約二千名（大部分是工

人)，雜誌發行數達六千份。

要之，目下英國的 Proletcult（無產階級的教化）運動上的有力團體，便只有平民同盟及勞動大學。

其次說到德國的獨立勞動階級教育運動。

德國的社會革命運動家很能理解獨立勞動階級教育之必要，且正在努力於發見可以正確應用之原理。

當一九一八年夏舉行全俄無產階級文化會議時，德國方面曾有人前往參加，以後即經常與莫斯科及列寧格勒保持嚴密的關係。他們為完成無產階級文化計畫起見，特開會議；雖則是第一次的會議，但會議的理想大有可觀，其要點如次：

（一）德國的階級鬥爭逐漸強大，無產階級的力量必須向一切方面動員。勞動者由此得以對反革命取得勝利。

（二）出版，學校，幻燈，教育，文學——一切稱為文化的集團的東西，都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軍械庫。又不過是使勞動者之革命的衝動歸於

消沉的催眠藥。畢竟是受資產階級的人生觀之支配的——雖在勞動者的組織團體中尚且如此。

(三)無產階級必須製造對資產階級叛逆所必要的武器。必須組織反於資產階級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無產者成功之日，才是人民的人生觀可以脫離資本主義的毒氣之影響而獨立之日。

(四)無產階級為期望成功起見，他們必須從自己的見地，放慮一切職業的政治的生活之問題。加以資本家的影響，正在從無數方面謀間斷革命。故為正確地使用力量計，準備的教育工作實是最本質的工作。

(五)社會的革命不祇包含經濟學上的新方法，也不僅包含共產主義組織及無產階級專政而已。實在乃在預期新文化的建設。乃在孕育由無產階級播種而當發展為人類最初的一般文化之文化建設。——這種文化的曙光已經出現了。這種文化——經發生，教育，倫理，藝術，科學以及公私生活的一切將都革命化無疑，無產階級的

這種新文化建設的第一項工作，是在集中創造的勢力以期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之統一及傳播。

(六)德國以有集中的無產階級的文化集團爲必要。而且這必須是由勞動者支配的。換言之，要使得在計畫獨立勞動階級教育上所結合的一切團體力量統一起來，協作起來。

因之，就有由勞動者支配的集團之必要。

以上是講德國理論方面的概觀。現在且看它的實際方面如何。

原來德國人是有能的實踐家，同時又是充實的理論家。他們的理論既創立，實際自然也要跟着發達的。在柏林，有着名叫蘇維埃或者路德彭特的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的前身是出版所，以後逐漸生長，而且它的活動性是教育的。它有一個組織在職業團體之上名叫蘇維埃學校的學校，它又發行布爾塞維主義的教科書。該校的教育不在使勞動者獲得‘一般的知識’，而在使他們具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關於德國的，因爲資料無多，只好至此爲止。

最後試看美國的獨立勞動階級教育運動。

(一)一九〇六年在紐約成立的蘭特社會科學學校(The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要算是美國最初的勞動者學校。最初，它同英國的拉斯金大學一樣。由個人維持；(係由蘭特夫人出資倡辦)現在則靠學費及販賣印刷等品以維持。主要學科為歷史，政治，經濟等的社會科學。對於英語及演說(Public Speaking)也極注意。教科書視移民的種類分為好幾種國語。但這個學校，是受社會黨支配的學校，比起英國的勞動大學來，就很缺少階級意識，階級鬥爭之精神——雖說它的基礎也立於反資本主義上面。如司谷脫·尼林(Scott Nearing, 即上舉蘇俄的教育的著者)，當初曾與這個學校有關係；但後來據說爲了‘過左’把他趕走了。由此也可推知該校內容的一般。

據該校的文書中所述：

“蘭特社會科學學校是社會主義者及勞動運動之自治的教育機關。今年(一九二九年)已是第二十三年。它渡過幾度可以認為致命的危機，又常遇反動，分裂，及經濟的缺乏等等。

但由於它的理想之勝利，在未至沒有存在的必要以前，是要繼續它的工作的。

“蘭特學校斷不是偏狹的宗派主義。它不致把既成的信仰裝入學生的腦中，却欲引出他們所求的知識，特別要導出他們自身的思想。”

看了這樣的旨趣，足見該校確不是爲階級鬥爭的教育機關；即不算是妥協的，終不免是自由主義的。

該校的課程，自然也置重於勞動者的訓練。但於正式之外，更收許多的聽講生，也是想見該校之缺少嚴重性。

再據該校校報，略記一九二九年的課程如下。

課程分爲研究課程(Study Course)與聽演課程(Lecture Course)二大類。研究課程又分爲英語課程及英語以外的課程。茲將英語科以外的科目開列於下：

- 一、美國的工會主義
- 二、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本質
- 三、美國社會史
- 四、晚近的社會學

五.演說法

六.近代文學的鑑賞

七.馬克思主義要領

八.研究法

又講演科目如下：

一.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二.人類行動的研究

三.各國民的音樂

四.我們所住的世界

五.社會心理的要素

六.個性的心理

七.民族及民族問題

八.勞動與法律

九.勞動與社會立法

一〇.何謂教育？

一一.當作世界強國的美國

一二.哲學與社會思想

一三.論集——社會主義與實踐淺說

一四.俄國文學中的巨子

一五.六個美國作家

一六.近代世界文學的傾向，
像這種題目，就不免是很蕪雜的。

一九二九年在 Training Course 註冊的學生
有一百另七名，其中工會會員占五十八名。

該校又有通信教授。研究的結果印成小冊子
以發表，每年且發行美國勞動年鑑，此外更進行無
產者用的出版業。

(二)一九一一年，在紐約又設立一個近代學
校 (Modern School)。最初開校時僅有一個教師
與一個學生；一切設施用法蘭西斯哥赫勒的教育
原理以管理。至一九一六年，遷於紐傑西。是為兒
童教育及自由主義訓練的寄宿舍學校。同時，據說
還是富有無產者的精神的。它的教育方法受‘新心
理學’ (New Psychology) 的發見之影響，極有進
步。男女共學，心的訓練與手的訓練又互相結合。
發刊一種月刊雜誌 The Modern School，即由兒
童之手印刷成功的。但這個自然算不得純粹無產
階級文化運動的學校。

(三)一九一八年，紐約有三十個工會合組勞
動者教育協會，維持費全由工會担任。本雪文義亞

州的工會於一九二〇年設立自己的教育機關(Department of Education)。波士頓的中央勞動同盟，於大戰後組織商業組合大學，全由勞動者維持。還有紐約的幾所學校發行協作教育 (Cooperative Education) 的月刊雜誌及協作(Cooperation)的週刊。

(四)社會研究學校(The 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設於紐約，但詳情不得而知。這兒祇舉一九二九年春季的學程如下：

- 一. 個人心理學
- 二. 近代科學與宗教
- 三. 現代美國的思想
- 四. 俄國之革命的演劇
- 五. 人口問題
- 六. 社會與個人
- 七. 智能與心理測驗

該校入學不設制限。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科生也有加入者，故在布爾喬的意味上言，似是程度頗高的。

(五)惟一的勞動學校，就現在言，實只有在紐

紐約的勞動者學校(The Workers' School)。它不像上述各學校之‘自由’，却是在美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指導之下，以最嚴格的精神，努力於馬克思主義之宣傳的。它設於該黨紐約地方本部的五樓上，今年是它創立的第七年。

該校不僅在紐約，即在波士頓等處也設有支部，當作全國的機關，在“階級鬥爭爲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這個標語之下積極研究。他們不僅把學校作爲養成投身於勞動運動的人物之機關，且更說“學校自身是運動的一部分。該校之具有真摯的態度，也可於該校章程中在 The Workers School 之下注入 Training for Class struggle 一語見之。學生數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僅有六十人；然至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度已增至一千三百人。

據該校章程，課程分爲八大類，每類之下再設細目，共計七十三項。這兒僅舉它的大別：

- 一. 英語，演說法，新聞學等
- 二. 一般歷史（其中包括中國革命，俄國革命史等）
- 三. 美國史（包含馬克思昂格爾所見之美國，

帝國主義發達等等)

四. 工會主義 (工會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美國勞動運動的問題等等)

五. 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等)

六. 馬克思主義論 (共產主義之基礎, 列寧主義, 史的唯物論等)

七. 美國勞動階級之特殊問題

八. 文學

此外, 每星期日下午八時起, 有公開講演 (Open Forum), 有“美國勞動運動的指導者所主持之時事問題討論。”

又據最近消息, 一九二九年九月新學期開始, 課程中之最可注目者爲新設拉丁美洲各國的勞動問題研究科, 其主旨在調查美國帝國主義對於南美諸國的活動, 并研究對付的鬥爭方法; 講師有莫爾 (I. A. Moore) 及司各脫尼林等。

問 題

一. 勞動教育可分幾派?

二. 怎樣才是真正的勞動教育?

三、試以階級的立場，批判中國現時的勞動教育。

四、中國有沒有公開進行獨立勞動階級教育之可能？

五、要怎樣使勞動教育與整個勞動運動發生良好的關係？

第十四節

教育勞動者的國際組織

兩種性質的教育國際：資產階級的國際和平教育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解放運動。——教員團體的國際事務局。——教育者國際的成立。——教育協會的世界聯盟。——教育勞動者國際。——英國教員勞動同盟。——問題。

說起國際教育運動來，名義上雖有好幾種，但本質上却可別為兩類：一是標榜着和平公正，而實際是染有極濃厚的資本家色彩的；一是老實不客氣地，豎起教育勞動的運動的旗幟，公然說是為無

產階級而鬥爭的。

前者可稱為國際和平教育運動，後者則有專名叫做‘教育勞動者國際’。

現在先把幾種教育國際運動約略敘述，然後專來介紹‘教育勞動者國際’的內容。

(一)教員團體的‘國際事務局’

各國教員間最初的國際接觸，還是由十九世紀的末期起於瑞士（自1872年至1874年間）比利時（1880年），法蘭西（1885年至1890年間）的。當一九〇八年在比利時的里耳舉行世界博覽會時，比利時的‘男女教員總同盟’即在該國不魯塞爾舉行國際的‘國民教育大會’，並決議創設男女教員團體的國際常設事務局。

至世界大戰為止，這個‘男女教員同盟’之‘國際事務局’差不多沒有什麼作為。僅有一項成績可說，那就是於比利時的‘教員同盟’之外，加上‘英國國民教育聯盟’，‘納得蘭教員協會’，‘德國教員同盟’，‘法國教員同盟’等，總計有了約三十九萬的會員。它在戰前的狂暴時代，已受到當局的壓迫；到了大戰發生，更被包圍在大虐殺所毒害的空氣

中，後來英國的‘國民教育聯盟’曾向在比利時的書記長克奴特建議，謀於戰前的基礎上重組事務局；但克奴特以‘我們不欲與德意志的奴輩共席’答之。於是英國就轉向到金元共和國即美國方面去；因為美國正想在資本主義之道德的經濟的擁護之下，有組織教育世界聯盟（即現在的世界教育會議）的計畫。

克奴特嗣後在各地的同盟年報中，發表關於教員國際團結的記事，且欲藉國際聯盟——當時德國尚未加入——之力，重行組織，但這引起了中部歐洲全體教員的憤慨，由是‘國際事務局’遂趨於全無活動的狀態中。

（二）‘教育者國際’的成立

大戰的鐵拳震動了教育界。他們中的一部分困住在最卑怯的沉默裏；但有另一部分却激昂地起而抗爭。當在戰勝國方面的和平主義者的運動家等為戰勝的威力所恐懼時，在中歐的工農教育勃起，曾從國家及宗教之權威內教育方針下解放了教員們（然教員們到後來有參加無產大眾運動的，也有不表同情的）。其中在國家主義國芬蘭，匈

牙利，捷克斯拉伐亞，特別是保加利亞及法西主義國意大利與西班牙等地方，有一部分教員對於他們政府的搾取，虛偽，奴隸化的行爲，不絕地起而反抗，也不絕地受罰金，投獄，放逐，虐害，溺死，鎗斃，絞刑等的處分。

然在民主國中，也有靠軍國的勝利之福而阻止革命的潮流者。如民主國法蘭西即其一例。法國教員的國際運動原是很早就有；且在戰前爲學校無宗教的鬥爭，曾得勝利；但如今却對帝國主義的政府表示忠順。

不過仍有極少數的熱心者，根據戰前鬥爭的經驗及歐洲大戰亂的經驗，越發猛烈地成爲革命的力量。

在戰爭期內，法國的‘教員聯盟’曾祕密地或公開地作反對戰爭運動。它的機關雜誌解放學校，在法蘭西一般雜誌中，實是最勇敢地抗議戰爭的唯一雜誌。但這些爲和平主義運動而加入組織的男女教員，先後被捕下獄，至戰後更受迫害，失去了地位。

‘教員聯盟’受着反戰爭的至高理想與在戰前

已成為革命的現實主義之組合主義的刺激，遂於一九一九年喊出關於建設教員國際之呼聲。在特爾開教員大會時（一九一九年四月）有名的思想家安諾特爾法郎士曾作如下的演說，教員國際即應用之以宣傳於世界。

“燒去！燒去教訓一切憎惡的書！我希望，從衷心裏希望萬國的教員委員會立刻加入勞動者之國際，共同製定世界共通的教育課目，把產生世界和平及人類共同精神的理想之種子播於年輕者之魂，把這件事的可能性攷慮一下。……只有勞動者的團結，才能招致和平於地上。”

這個大會告終時，馬泰比戈女士作成建設教育者國際的底子，并起草一般運動計畫，即作為決議案。到第二年，在有意大利‘教員協會’的委員瑞納塔女士出席的波特大會（一九二〇年八月）中，就成立了‘教育者國際’。選出白里亞爾及維德可克為書記。數月之後，即成立六國的支部：法，德，意大利，匈牙利（亡命在捷克斯拉伐亞的），納得蘭，西班牙；以後盧克森堡，比利時，葡萄牙，俄羅斯，

蘇格蘭，日本及中國皆有人參加。至維德可克之被選爲書記，是因他爲世界語學者的緣故。

所以‘教育者國際’是從反對戰爭及爲戰爭要因的現社會制度之呼聲中產出的。

恰巧在美國方面，這時候也有一個思想家，是對美帝國主義的鬥士，他喊出全世界教育家之國際的團結爲歷史的必要。這是極有興味的事情。也是不難理解的偶然的符合。他就是阿普頓辛克萊；在他的名著鵝之子（The Goslings）的結論上，他向男女教員們喊着：

“教育家是勞動者，是有用的勞動者。所以教育者之鬥爭場，是在一切共階級的兄弟們之傍。世界的教育勞動者聯合起來！諸君由此不會喪失鎖以外的任何東西，反之却可把全世界變爲是你們的。”

‘教育勞動者’自創立以來，不絕地暴露了潛在於學校及其他一切方面的軍國主義。對於教育勞動者的要求與權利，是和其他被壓迫階級的要求與權利相聯結的。它向着兩條路線進行：即對於兒童的反對戰爭的和平教育及全世界教員團體在決

定的鬥爭上的組合運動。

(三)教育協會的世界聯盟（舊金山的國際和平教育運動）

在歐洲的和平論，到戰後全歸沉默，或者也祇在愈趨尖銳化的階級鬥級之中發爲胆小的嘆息罷了。布爾喬的社會秩序固極怕教育者之參加鬥爭而且爲有目的的運動；然歐洲的支配階級也沒有力量足以造成陷‘教育勞動者國際’於解散的直接環境。不過在戰後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美國資本主義，在不絕地注視着世界的情勢。卽在教育方面，它也承認有援助歐洲復活過來的資本主義之必要。於是美國的全國教育會便在美國政府擁護之下，以和平主義爲招牌，欲謀教育會之世界的聯合。它用了美國式的宣傳，向全世界的教育界發出在舊金山召集‘世界教育會議’創立大會之請帖。美國某大官豪卽刻捐助一百萬金元，以祝福於這個新的國際會議。這個慈善家的寵賜，正好用以表明舊金山的教育聯盟之特性。換言之，它只是帝國主義的產物；見了教育勞動者國際那麼樣勇敢的運動而衷心感到恐怖的支配階級，就想在和平教育

的美名之下，來軟化牽制乃至破碎無產階級的教育者運動，藉以更永久地維持國際的資本主義。

此會對於中國日本印度等國家，頗有幾分影響。因‘有色人種’的教員們，很順從於他們的帝國主義的支配，又很容易爲威爾遜式的甘言蜜語所吸引。然歐洲的教育家，因爲曾經目睹戰爭的慘禍，親受戰爭的苦味，却沒有參加。他們或從受過創傷的排外主義厭視這種和平主義，或者熱心革命把它當作虛偽而加以排斥。一九二五年在英國愛丁堡所開的第二次世界教育會議雖算鬧到歐洲舞台上來，但終也不曾收到什麼效果。

照所定的規則，該會是‘超越政治宗教的’；但實際上這個世界會議是當作英美資本主義的教育手段以表現的。當愛丁堡大會時，不是有一位高級牧師前往祝福嗎？

第三次大會，原定在瑞典的首都斯德荷姆舉行，但到底沒有成功，只好重渡大西洋，改在加拿大的南部多倫多地方開幕（一九二七年）。好不容易到了一九二九年，才算在國際聯盟的所在地日內瓦開成了它的第四次大會。

上文說過歐洲支配階級沒有力量破壞教育勞動者國際的話；但到近年來，它可已從歐洲和和平主義教育家中找到了援助者。他們對教育勞動者國際競爭，意欲把它解體，絕氣。

(四)教員協會的國際聯盟（倫敦的國際和平教育運動）

一九二六年六月，由法國的國民教育協會發起，以法德間之教育學上的相互理解為基礎，和德國尚未加入組合組織的教育團體共同建設了和平主義者團體組織之第一步。是年九月，又和尚未加入組合組織的英國國民教員聯盟，在巴黎的國際智識協作學會舉行會議，因此得到國際聯盟的援助。至十一月，英國加入智識協作學會。最後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得法，英，德，荷蘭，瑞典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各國之參加，在倫敦舉行教員協會國際聯盟創立大會。同時在捷克斯洛伐亞的首都普拉哥，舉行‘由學校和平運動’的大會，受日內瓦的國際聯盟半公式的保護，有十八國的代表四百人出席，其中大多數為學校教師，也有各國和平主義團體的代表參加。

如稱舊的國際和平教育運動爲‘舊金山的國際和平教育運動’，那麼對於這個新的不妨稱爲‘倫敦的國際和平教育運動’。這個新的和平主義教育家國際，當然是和教育者國際之爲階級的，爲普羅列塔利亞的大不相同。試看它的規約就可知道：‘本會惟以教育上之協作爲目的，企圖由人類共同勞動以引致世界和平’（第一條）；‘本會對於政治或對於社會形式，不要求何種強制的約束’（第二條）；‘本會確信對於各國民間相互了解的各國兒童教育，是爲獲得永久和平所必要的前提’（第三條），

大戰後八年，歐洲資本主義恢復戰前的基礎，徹底地壓迫革命運動，而且世界帝國主義重新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新的和平主義者的教員們，遂將其靜默的呼聲廣播各處，開始走向國際組織的第一步。這般柔順有如羔羊的教育家們竟是妄想用兒童教育與教育者在教育學上的協作以招致和平，而在政治的社會的鬥爭之外的中立道上苟且偷生。

立於鬥爭的立場，團結一切傾向的無產教育

家大衆所成教育勞動者國際却要對這種粉飾一時耳目的和平主義作戰，且道破了和平主義者之危險的幻想，有如在它對於‘由於學校的和平’運動所發的公開信中所說：

“無論是兒童或是教師，都不能給世界以和平。只有武裝工作者的鐵拳才能給世界以和平。”

（以上國際教育運動小史，係根據法國教員聯盟評議員 M. Boulbor 的原著，譯文大體得自友人公樸君供給。）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在一切的社會生活都塗上着階級對立色彩的現代，就是國際教育運動也不能不保有階級的色彩。事實上所表示的，不正是這個樣子嗎？兩者性質的差異，在於國際和平教育運動務必隱藏它的本來面目，而教育勞動者國際並不諱言爲階級的。現在且進而更詳細地介紹後者的發展史和它的規約。

（一）教育勞動者國際的發展史（自波特大會至來比錫大會）

教育勞動者國際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波特地

方的法蘭西教員聯盟大會之中萌芽，已如上述。在這個大會中，只有一位外國代表，就是意大利的瑞納塔女士出席。最初的二位書記維德可克及白里亞爾勇敢活動，於階級鬥爭的共同戰線的反戰爭教育的基礎上，作成教育者國際之規約，並設法創立各國支部。

在巴黎（一九二二年八月）開正式的成立大會。大會中有五國的支部代表及由他國來的個人出席。在這二年間，教育者國際之成長，是多靠法國活動分子的努力的。

在不魯塞（一九二四年八月）大會中，承認四個新支部（比利時，葡萄牙，保加利亞，蘇聯）加入。這次因代表國家之多，開始成為堂堂的大會。由於新加入支部，特別是比利時支部的影響，教育者國際不惟採用了階級鬥爭及反對戰爭的學校鬥爭之基礎，且也採用了勞動組合的基礎，擴大活動範圍以及於教員權利及利益之防衛擁護，作成更明晰更強固的新規定；且把教育者國際改稱為教育勞動者國際。一九二四年之不魯塞大會，是表示教育國際的生命的一個新階段，它由是漸漸地脫

離幼稚時期，迅速發育，而完成爲國際的組織。

巴黎及不魯塞大會（一九二五年八月）。爲了法蘭西政府拒絕蘇聯代表入國，所以大會雖在巴黎開會而終於在不魯塞閉會。這次大會中，有七國代表及十五國的個人出席者到會。書記之報告，足以證明這個國際已經做了全世界的活動。非洲及亞洲也由法國殖民地（北非洲及安南）的土人教師代表；北美南美荷領印度及中國等之聯絡也由此開始。在這個國際的共同空氣中，通過了支持全世界工會統一戰線運動的議案（加盟國中，英國的教員爲阿姆斯特丹系，蘇聯的教員爲赤色職工國際系）。又一致通過久經爭論的資本主義學校階級性的‘階級教育’之問題，決議要把在階級的教育，即反資本主義的旗幟底下的一切教育機關統一起來，在運動上畫了一個新階段。同時在這個教育者國際後援之下，派遣英國由二組男女教員所成的教育視察委員團，（一爲英國教員勞動同盟，一爲全國女教員聯盟）前往蘇聯，使他們報告蘇聯的教育狀況（按他們的報告已於一九二九年出版，題爲 Schools Teachers and Schools in Soviet Russia）

在維也納(一九二六年八月),教育勞動者國際由大衆的集會,喚起奧地利被壓迫階級的共鳴,把政府拒絕入國的蘇聯代表歡迎進來;并由屬於阿姆斯特丹系的二位代表克萊曼(盧克森堡)及彼德斯(比利時)批判政府所取分裂大會幹部的陰謀。彼德斯且親自歡迎蘇聯代表,聲明‘只有這個,才是教育國際內部統一性之象徵’。‘學校與道德’‘學校與宗教’‘對於排外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鬥爭’等的議題,都有熱烈的討論,并作成有力的決議。這次大會中,全歐各國都有代表,非洲,亞洲,美國也有代表,事實上確是世界的大會了。

維也納大會後,教育勞動者國際之成長益形進展。一九二七年春,蘇格蘭的社會主義者教育者協會,五月東亞某國一部分的教員團體也參加了。

這樣,教育勞動者國際已在十國設有活潑的支部,此外由個人會員所成的集團,殆遍於世界各國。現在會員總數約有八十萬人。

在來比錫(一九二八年四月),教育勞動者國際舉行‘教育日’;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及全世界各地所屬團體派來的代表等,由於這個大衆的集會將

教育勞動者國際及‘教育日’的目的宣示於德國來比錫的勞動者大眾。

大會在階級鬥爭的前提下，討論兒童及教育者的問題，和平及學校的問題。并招請和平主義的或自由主義的教育家，謀和他們公開的討論那種‘穩和’的對帝國主義協作的所謂宗教的，政治的，社會的‘中立’主義。

‘教育日’於四月十日開始，依照以下的日程舉行了三日。

四月九日晚 公開大眾集會

四月十日 無產兒童境遇問題

報告——

物質的境遇……費綏爾（柏林）

心理的境遇……狄林克（來比錫）

法律的地位……吉里阿克斯（希臘）

在遠東的情形……下大木博士（東京）

四月十一日 關於教育的目的

報告——

學校與國家……修爾琴（莫斯科）

學校與宗教……福里杜修密德（柏林）

學校與社會……辟斯脫拉克 (莫斯科)

其他……雷特格勞 (英吉利)

雷特那斯 (比利時)

四月十二日 大會準備分科會

上午 大會參加者分爲三組

A. 學校制度的組織

報告——

埃台脫荷美斯 (漢堡)

品格微支 (莫斯科)

B. 教程及教育法

報告——

留辟斯 (西班牙)

羅斯蓋爾 (來比錫)

雪茲克 (莫斯科)

C. 學生訓練

報告——

維爾斐德博士 (柏林)

富萊納 (法國)

摩爾 (英國)

晚 大會參加者集於一堂，發表上午各分

科會所承認的大綱。

四月十三日 教育國際大會，各國支部代表於此討論教育勞動者國際的一般運動方針。

(注意)十日至十二日爲‘教育日’而非大會。規定教育勞動者國際及其支部的態度與行動之決議並不在此舉行。‘教育日’只是‘研究日’。在這期間由各人發表意見，相與討論比較；意見未能結束時，另外交給研究委員。

大會以外，並開教科書手工品學校資料等之國際展覽會。

特別可注意者爲由維也納方面有馬克思·阿特拉博士參加，做一個關於‘教育目的’的報告。還有維也納勞動大學主任維克多·西推爾也來參加。

在教育學者及教員大衆之間，這次來比錫大會實大生影響與期待。納得蘭教育聯盟(是未加入教育勞動者國際而屬於阿姆斯特丹系的 Syndicate)派遣二人，斯干狄那維亞，奧地利等處，以及南北美洲都有人參加。知名的教育學者及專門

研究家之外，屬於教育聯盟，常與無產兒童及成人有密切關係的教育者多來與會。討論又是科學的具有社會的實際的性質。

要之在來比錫所舉行的這次大會實爲教育史上空前的事件。因爲與勞動階級一起從事鬥爭的教育者大衆，以國際的計畫，在這個國際的組織中，討論教育問題上之普羅列塔利亞的意義與工作的方向。

在這次大會中，決議發告全世界教育勞動者書。大會開過後當由總書記署名發出。茲特譯述如下：

“親愛的同志諸君：

“教育勞動者巴黎國際第五次大會已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來比錫舉行過了。

“舊金山國際（W. F. E. A. 按即世界教育會議）的大會，是由各國的國王及教會，教育部長的代表致開會詞的；歐羅巴和平主義者教育國際的大會，是用普魯士教育總長派喀爾先寫好了的演說宣告開會，各代表的旅費是完全由各國政府支付的。七月間舉行的第二國際的一切費用是由羅

馬尼亞政府支付的。反之，我們的第五次大會，和從來我們的大會一樣，却不能不遭遇到資產階級所躬自建立的許多障礙。

“德國政府對於蘇維埃代表拒絕護照的保證，更禁止我們總書記在公共會場中的演說。法國當局也拒絕二個法國代表護照的簽字。尚有許多國的代表們，爲了一種簡單的理由——就是他們一旦離去故國，他們將不往來比錫而往最接近的牢獄中去——竟不得出席大會。

“然不管有這樣多的障礙，我們已能開成我們的大會及教育大會。大會已全部承認執行委員會的各項活動。

“我們很滿足地可以說：由執行委員會所採用的關於統一問題之立場實大有助於 E. W. I.（按即教育勞動者國際之簡稱）之發展與強大化，以及關係之擴大與會員的無產階級意識之發展的。

“在最近二年間，E. W. I. 已得與其他無產者及半無產者的組織如在鄉軍人國際，無產者自由思想家國際，反帝國主義聯盟等相接觸。

“其間實現了向東洋及拉丁美洲活動的以前

的決議。大會承認烏拉瓜，及蘇格蘭的新支部之加入。

“E. W. I.在法國國民組合內改革主義者聯盟之主要部分中，已逐漸增加了同情者的人數。（一九二七年在巴黎的國民組合大會中，E. W. I. 在一〇一票中得了三七票。）

“新執行委員會爲了同樣的統一，實現鞏固的地位，不忽略它的終極目的，力謀使教育勞動者從事於日常實際要求之鬥爭。爲完成這種目的，不能不繼續採用共同委員會的制度。

“國際關於各要求事項的綱領——這是在維也納大會所採用，置基礎於教育勞動者的鬥爭上的——當形成爲將來鬥爭之基礎。工銀增加及勞動條件改善之口號，同過去一樣，仍爲我們鬥爭之重要部分。

“特別的注意應向着青年教師及在帝國主義束縛下的各國教育勞動者。一般的是 E. W. I. 特別的是它的各別門，是和男女教師之特質的及法律的地位平等之鬭爭有關係的。在 E. W. I. 執委所設的各集團中活動的特別部門，與在中央執委

中活動的部門，不可不參加這個鬥爭。

“關於青年教師間深刻的失業，有作以下鬥爭的必要，即由國庫補助失業者，撥給供他們繼續研究的獎學金，從失業者中選出充當短期教師的俸給要在公共教育預算案中增加。

“因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進攻，在學校內意識體系上的進攻，在學校內軍國主義的強大化，以及戰爭準備的逐漸發展，而宣言自己為反帝國主義者，反法西斯蒂，反排外主義者組織的 E. W. I.，勢將益受資產階級的迫害。各支部必須在自己隊伍中結集勢力，并向教育大眾中擴張勢力。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與對於學校內的帝國主義的意識體系之鬥爭必須擴大。

“由此種見地，對戰爭犧牲者無產國際及反帝國主義者聯盟益發增大正確的關係，實為必要。

“我們必須和對教師的迫害，政治的意見之排除，對具有進步的意見者之誹謗逮捕，對於教師的各種組織之破壞，作決定的鬥爭。強固 E. W. I. 的協同基金，實為重要。

“在資產階級與有關係的限度內，尙有更狡猾

的鬥爭方法被利用着。即爲‘由學校的和平實現’之再三講演，教育勞動者的特殊和平主義者國際——爲舊金山國際與歐羅巴和平主義者國際——之組織，也都是它的支持。

“我們要對抗虛偽的和平主義，斷然宣言無產者的反帝國主義，只有戰勝資本主義才能使戰爭成爲不可能。我們要求教育勞動者要與普羅列塔利亞特結合，爲反對資本主義而鬥爭。鑒於不絕的軍器增大與陸海軍強大化所生的危險，我們的大會歡迎日內瓦會議中蘇聯代表的軍備全廢的提議。

“現在的資產階級利用一切宗教的勢力以援助對於學校的進攻。僧侶反動之手益伸入學校中來。

“我們要與教會的影響戰，要防衛學校使不受它們的支配，要防止給宗教學校以資金，又要一般的與尊僧主義戰。

“在這個鬥爭上，我們所該重視的，是要與無產者自由思想家的組織保持密切的聯絡。

“在一九二六年的維也納大會中，我們滿場一

致，宣言對於統一問題的確定的立場。因之由阿姆斯特丹所設立的教育勞動者之職業的書記局，實和我們關於統一的地位相對抗，我們對它須取否定的態度。

“形勢的複雜化與鬥爭的困難要求我們須的確地把我們的注意向着教育勞動者大眾，第一是向着初等教育的教師。

“我們要能給 E. W. I. 以工作發展與深刻化的可能性，只有結集自己階級的勢力，由無產者的訓練統一大眾纔會成功。

總書記”

(二)教育勞動者國際的規約（一九二四年八月不魯塞大會所決定）

(1) 緒論

一. 在資本主義支配的國家，科學僅許極少數人獲得，而成為商品化。勞動大眾自然被排除在應有獲得在管理國家及教育上所必要知識之可能性的‘人’的部類之外。

二. 資本主義社會的學校只顧慮到所有階級的利益——一方以養成有指導資本家社會能力的

特權者層，使它的機構的機能強固，使它的權力受人尊敬爲目的；他方則以使最大多數的民衆止於智的奴隸狀態，成爲資本主義盲目的工具爲目的。

三。在這種社會中，男女教員不惟不得爲青年優秀教育之擔當者；即他們自身也要阿諛資本家社會，陷於知的屈從，轉化爲奉伺資本家及其國家的官僚的僕從，微薪的傭人。

四。教育勞動者要從這種悲慘的境遇——不惟在物質上，也在精神上——解放出來，須與學校自身從資本主義的奴隸化的狀態解放，轉化爲人類全類文化的工場相結合。只有社會革命纔能創出自由的學校，自由的教育家，同時也具有解放勞動大衆的能力。只有勞動階級才對於現在教育方法的變革抱着真實而不變的興味。

五。所以教育勞動者的改善物質的及精神的境遇之鬥爭，決不能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獲得什麼特權的鬥爭形態之下所能成就，只有與有組織的勞動階級協作，在變革社會的積極鬥爭形態之下纔有效果。

六。因之教育者之鬥爭決不爲了獲得單單經

濟的利益及狹隘的職業的利益以行。它當是對學校內資本主義意識體系之鬥爭，對頌揚排外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之鬥爭，對學校宗教化之戰爭，及不問人種國民性而促進勞動者大眾的連帶性之鬥爭。

(2) 教育勞動者國際(巴黎)

七. 爲使改善教育勞動者之物質的及智的境遇之鬥爭有效起見，應由實際活動的教育勞動者所成的各國團體結爲國際的組織。

八. 這個國際的組織，是在一九二〇——二二年存在的教育者國際，今後稱爲教育勞動者國際(巴黎)。

(3) 教育勞動者國際的任務

其任務如下：

九. a. 編成加盟各國團體的鬥爭行動之統一及指導，與關於戰略及戰術的方針書。

b. 在有未採用上述綱領的教育者組織存在之國，務必於同一職業團體之間喚起階級意識，設法使其加入國際。

c. 蒐集并發表關於各國教育者之物質的智

的及法律的境遇之材料，關於各國的學校政策及學校改良運動之資料，藉明資本主義在它所支配的一切國家內把學校及教育者化爲奴隸，專爲了自己利益而榨取他們之事實。

d. 研究無宗教，單一制勞動學校問題。

e. 發行會報，舉行各種會議，討論，修學旅行等，以促進各國教育者的相互聯絡，又當謀意見交換之組織化。

f. 國際的連帶性當由贊助在特別困難環境下鬥爭的各種團體及個人之國際教育者之活動組織，以益形強固。

g. 當與一切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階級的組織相結合，實行對帝國主義及一切戰爭危機的鬥爭，及對國際的法西主義的鬥爭。

(4) 加盟的條件

一〇. 採用如下的主旨或有合於此種主旨的規約及活動的各國團體，得加入教育勞動者國際：

a. 爲解放勞動階級的階級鬥爭。

b. 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及對全世界法西主義之鬥爭。

c. 國際的訓練之承認及採用。

一一. 在未有支部的國家, 承認上述主旨的個人得加入為會員。他們須在各本國執行宣傳的事業。

(5) 教育勞動者國際的機關

一二. 教育勞動者國際有三個機關:

a. 國際大會

b. 執行委員會

c. 總務書記局

一三. 大會

a. 大會為教育勞動者國際之最高機關, 每年開會。

b. 大會確定國際之一般的方針, 決定總務書記局之所在地, 並從各國支部所選的候補名簿中, 任命其人員及其他執行委員會之人員。

c. 大會選任三名會計監查委員, 其任務在監督組織之支出, 向大會提出報告。

d. 大會無特別決定時, 由執行委員會決定下屆大會的場所及時日。

e. 臨時大會得經執行委員會之決定, 由總

務書記局召集之，或得由加盟支部三分之一以上的提議召集之。

f. 各支部在大會中有一票至若干票之表決權：

一千人以下會員的支部	一票
自一千人至一萬人	二票
一萬人以上	三票

g. 單獨會員得出席大會，發表意見（無表決權）。

一四. 執行委員會

a. 執行委員會共十一人，三人由書記局，八人經詮考委員提議，由大會選出之。

b. 執行委員會在大會至大會期間，指導國際之事業，對大會負責。

c. 執行委員會每年開會二次以上。

d. 大會為執行委員會選出候補員七人。

一五. 總務書記局

a. 總務書記局由總務書記一人，書記二人或三人構成。

b. 總務書記局根據大會及執行委員會之決

議，指導國際之一切事業。

它每月發行用三種國語(德，法及英)的機關誌一次，代表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

(6)會費

一六.會費由加盟支部徵集，每月送交總務書記局。

(7)鬥爭及互助的國際基金

一七.爲使教育勞動者之物質的，智的及法律的境遇改善之鬥爭及其他對於以教育者爲目標的攻擊之鬥爭有效地繼續起見，執行委員會根據細則，設立互助及鬥爭之國際基金，在總務書記局的管理之外。

(8)會報

一八.教育勞動者國際每月用三種國語(德法英)發行會報。

一九.各支部從執行委員會中指定適當的人員担任與總務書記局聯絡之責。每二月提出報告於總務書記局及自己的執行委員會。遇緊急時，作特別報告。

(9)由國際的除名

二〇. 不實行大會決議, 或不奉行總務書記局指令之支部, 由執行委員會之決議除名。除名須有執行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

二一. 國際之決議不為各國的支部機關所採用時, 國際訴於各該支部之會員, 使在必要時, 開一國大會以謀當面問題之解決。惟有在一國大會關於該問題已發表其自己的意見之後, 執行委員會纔得除名。

二二. 執行委員會也得將單獨會員除名。

二三. 對於兩者的除名 (一國支部或單獨會員), 次屆大會得是認或否認執行委員會的決議。

注意: 第十四條之a及b項, 為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之巴黎——不魯塞大會所變更。第一三條d與第一六條, 為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之維也納大會所變更。上記規約是由此等變更而受訂正, 自一九二六年起有效。

書記局所在地為: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de l' Enseignement

L. Vernochet, 8 Avenue mathurin-Moreau,

Paris XIX.

我們看了上述教育勞動者國際的規約，可知它曝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的職能，而且謀教育者自身之物質的精神的向上。但它並不是想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拾得一點物質的精神的利益之唾餘，它是要與一般勞動階級的運動合作，以期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從而對於爲了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而侍候帝國主義之愛國主義竭力反對；又說明真正的和平不是可以放在兒童的雙肩上的，惟靠勞動階級的國際聯結以保證，惟靠勞動階級的世界勝利以實現的。

最後我要說到教育勞動者國際的一個有力的支部，就是英國教員勞動同盟 (Teachers' Labour League)。

教員勞動同盟於一九二三年之初設在倫敦。以後每年十二月開大會，當初不過是一個小規模的地方團體，今則成長爲全國的組織，其重要益形增大。在初期，它的活動限於首府近傍。至一九二五年之終，已於蘭卡甸地方占有確固的地盤，如今

在全國各地有二十二個支部。惟因經濟上之困難等等，組織的急速發展未能盡如所望，仍有勢力未及之地域。

據同盟的規約看來，同盟的目的在使男女教員從事於變革社會的鬥爭。其實現方法如下：(a)地方的，全國的，及國際的和其他男女勞動者共作政治運動；(b)已存在的許多男女教員團體，應設法統一為教化勞動者組合，以加入工會大會 (T. U. C.)；更設法將男女教員為國際的組織；(c)發展將來教育制度之原則及機構；(d)喚起公眾對於在家庭學校及其他處所浪費教育勞力的許多條件之注意；(e)教育勞動者及一般勞動者之市民的及政治的權利之完全獲得及擁護；(f)從本國的各種教化設施中，盡力排斥帝國主義的教育等等。

同盟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大會上，通過成為巴黎的教育勞動者國際之支部。這個決議竟使當時保守黨的議員們在議會中向教育總長發出關於教育國際之質問。從此以後，同盟之國際的事業大規模地實行起來。現在，同盟和大英帝國內各地的教育團體及美國其他使用英語範圍內的教員運

動有密切的接觸，又和教育勞動者國際繼續不絕的聯絡。同盟事業的這一部分，因惹起全世界之注意與有力的反響，故極值得注意。

在一九二六年時，同盟在國際的戰線上，實踐了兩種重大的事務：其一爲經教育國際的介紹，派二組教育視察團前往蘇俄（見前），共有十六名同盟員參加。又其一爲送執行委員八人出席於維也納的教育國際大會充代表。代表經後來執行委員會的確認作成如下的決定：（一）本同盟在國際內部具有重要的職能；（二）本同盟之加入國際，是對雙方之組織與以重大價值的。

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派七名代表參加來比錫的教育國際大會，及其‘教育日’。

該同盟自一九二七年的第六次大會以來，即採用世界語爲公用通信語，並計劃世界語運動之發展，及與用世界語的各國勞動者團體及教育團體相提攜。又在大會中決議將以前所試行的教員交換更擴大規模，成爲真正國際的交換；又爲謀他國教員往外國旅行之便利，特與教育國際聯絡 委任執行委員會以期其實現。

當一九二六年英國煤礦工總罷工時，同盟的各地方支部及各同盟員，大爲活動以援助罷工團，曾得許多可注目之效果。在募集罷工基金之外，本同盟又得成爲推動比他自身更大的團體的原動力。是年十一月，發刊同盟月刊機關紙教育勞動者（The Educational Worker）。以後定期發行，今已成爲政治上及教育上有力的武器。

（按教育勞動者國際的本名，是世界語的 La Internacio de Eduklaboristoj；翻譯英語爲 Education Workers' International，法語爲 Internationale de Travailleurs de l'Enseignement，德語爲 International der Bildungsarbeitler。）

問



- 一。教育者的國際運動，在本質上有兩種不同的組織，它們的根源各如何？
- 二。教育上所唱導的世界和平或國際親善具有何種作用？
- 三。由教育上唱導和平，果能實現和平否？爲

第十五節

美國的教育

特講美國教育的理由。——辛克萊研究美國教育的兩本書：“The Goose-step”與“The Goslings”——哥倫比亞大學的財閥教育。——哈佛大學的“自由主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武裝教育”。——普通教育的一般情況。——全國教育會的偉大作用。——問題。

我們在前面第三節中，已經講過集中化的資本所及於學校及科學的影響，曾就歐美的學校教育及科學研究等為例。又在前面第七節中，講過現代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除出一般的教育

變質之外，更具有獨占化與商品化的二大特徵，且已有過約略的說明。

現在在這一節裏，特地專來講美國的教育，作爲解剖現代教育的一個標本。這有二種原因：一是爲了美國的學校教育所受於資本主義的影響最爲顯著；二是爲了美國的學校教育正爲我們中國目下教育界所竭力摹擬崇拜的標的。

我爲貪圖便利起見，就拿辛克萊的著書做根據，順着原書的次序節譯如下。讀者要知道辛克萊的兩種著作，實在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現時中國各大學的教育科所研究的一般師範學校的教育教科書所傳授的，雖不說是整個兒，也竟有大半就是辛克萊所描寫的那些‘精彩’。我們的教育家，大都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師範科習得那些‘精彩’的教育家，正想拿它來改造中國的教育，教訓中國的青年，——看最近出版的由美國留學生及臭過一點美國風味的大學畢業生所作的學生指南可以知道。——這決不是件可以忽略過的事情，乃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事情。

讀者疑我的話爲說得已甚嗎？決不！請你跟我

來看一看美國的教育把戲的真相，就不免要大喫一驚了。

我們先來看美國的高等教育，這是在“The Goose-step”(一九二三年出版)一書中講得非常赤裸裸的。

辛克萊稱呼美國爲 Plutocratic empire (財閥帝國)，在那裏有君主，有公子，有貴族。那裏的主要脚色，便是摩爾根 (J. P. Morgan 財產最多，是君主)；George F. Baker (紐約第一國家銀行行長，全世界第二位富翁)；洛克菲勒 (William Rockefeller，與摩爾根齊稱)；George M. Reynolds，芝加哥大陸國家銀行行長，爲美洲第二大銀行) 等等。

美國的一切便操縱於“連環董事團”(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之手；紐約的三家大銀行——摩爾根銀行，第一國家銀行，國家城市銀行——及兩家在他們支配下的信託公司——The Guaranty 及 The Equitable —— 就經過連環董事團之手以控制全國的經濟。

人會死，而這種財閥是永生的。因此，連環董

事圖就需有一種教育制度，以便互續財閥的生存，而且他們已把這種制度弄成很周密的了。在有一所很大的大學裏，摩爾根是一個終身董事；大學的校長是某一個摩爾根生命保險公司的董事。假使大學校長寫好一本書，告訴美國人要盡忠於財閥，這本書就可在一家摩爾根做董事的書店出版，而那印書的紙可在一家有摩爾根的人做董事的國際造紙公司中去買。那造紙地方的學校督學是摩爾根的大學畢業的，那兒所採用的教科書是以摩爾根做董事的書店發行，是由摩爾根所有的大學教育主任所寫，是由摩爾根的大學校長所辦教育雜誌所賞讚，更由摩爾根所有的新聞紙及雜誌主筆所推獎的。教育局的督學將把那些入學大學暑期學校的教員升級，且將鼓勵中學生升入那所大學。每年一回，他將出席全國教育會（見下）大會，選舉一個摩爾根大學的畢業生，兼為摩爾根教會的會員，摩爾根新聞紙及雜誌的讀者，……的一個人做會長。又當共和黨（摩爾根是個股東）指定摩爾根大學的校長為美國副總統候選人時，摩爾根的主教將為之祝福，摩爾根的新聞紙將為之宣傳，而摩爾

根的督學將請學校兒童參加野叙 (Picnic)，讓他們聽那位候選副總統在留聲機中的競爭演說，且由摩爾根的選舉委員會供給茶點，茶點的款由摩爾根的大學校長做董事的生命保險公司支付，而這個公司是有各地督學，校長們的保險費的。

這便是連環董事團的制度，這也便是財閥帝國的那一部分號稱美國教育的制度。辛克萊不僅描寫這副骨骼而已，還進而解剖它的神經，腦髓，血肉，毛髮與牙爪。

美國財閥帝國的大本營在紐約，因之財閥教育的大本營也在紐約。這個大本營不是別的，就是養成一大批中國教育巨子的哥倫比亞大學。它是摩爾根家的一所輝煌壯麗的大學，是一所純粹奉財閥政治為理想的大學，它的教育專家主持全國的中小學及大學教育；它的財閥理想的生產正和汽車及臘腸的生產，成為一樣確定的一樣組織化標準化的產業。

這所大學的財產在七千五百萬元美金以上，每年收入在七百萬元美金以上。財產的大部分是投資於證券及公債，受連環董事的監察。據辛克萊

所得表列該校投資的冊子，竟厚至二十頁以上，所有美國重要的鐵路及工業皆有該校的股份。所以他說在美國境內，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他所消磨的每一點鐘是不納貢金給哥倫比亞大學的。

這一個摩爾根家的大學由一個董事部經營。這些董事都具有絕對權力，不對任何人負責，也沒有任何人得更動他們。誰是些董事呢？最可注意的是這裏邊只有一個教育者，那就是大學的校長，是個當然董事。其中沒有一個是學者，是和學問發生姻緣的。一個工程師，一個醫生，一個主教；十個是公司的法律顧問，八個乃是銀行家，鐵路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商人及製造家等，董事會主席 William Barclay Parsons 是個隧道工程師，許多家公司的董事。最年輕的董事 Marcellus Hartley Dodge 是二十六歲時當選的，他在哥校為學生時已任 Equitable 生命保險公司的董事，是洛克菲勒的女婿。

總而言之，在煤礦托拉斯，鋼鐵托拉斯，鐵路托拉斯做董事以伺候摩爾根公司的，也就是在美國教育行政機關及各級學校中服役的。不僅哥倫

比亞大學的董事不能和紐約中央鐵道或 Remington 軍器公司的董事有別；就是哈佛大學和 Lee Higginson 公司的；本雪文義大學和聯合煤氣改進公司的；璧珠堡大學和合衆國鋼鐵公司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和 Hydro-Electric Power 托拉斯的；密納梭達大學和 Ore 托拉斯的；他們的董事名單也都是一致。

又據司各脫尼林的研究，在美國有五百以上的大學及專門學校中，共有董事2,470人。其中商人208，製造業者106，資本家112，包大工者6，土地所有者32，保險業者26，公司職員115，銀行家202，經理人15，出版家18，這樣財閥的一團共計903人。醫生111，律師514，教育者125，牧師353，著作家8，編輯者43，科學家70，社會事業家13，審判官32，這樣高等專門職業的一團總計1,269人。另外有休職的商人94，賣貨者3，農人123，管家的46，工匠3，圖書館員2，總計271人。若把律師不列入專門職業而列入他們的大主顧即商業及財政階級中，那麼那一階級共有1,414人，即占總數百分之五十八。在州立大學中，商人階級在776人中占477人，便有百分

之六十一。而這裏，還未把休職商人算在內，其實他們的財閥性決不減於在職商人；也沒有把許多醫生，牧師，編輯者及教育者算在內，其實他們的財閥性也正和銀行家一樣富足。

現在中國有許多大學，正在積極模仿美國先進之例，組織校董會，請商界名人加入，這裏雖有自動被動之別，然而在教育上所發生的影響當是一樣‘精彩’的。

我們攷查過摩爾根家的大學董事部，現在就得攷查由這個董事部所選任的大學校長到底具有多少的財閥性。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大名叫做勃特婁（Nicholas Murray Butler）。他的父親是個工匠，這本不算壞事；可是他引為羞辱，要想法掩飾。連環董事給他造一所官舍，值三十萬餘元美金，說是為了供教育用途，所以免去徵稅，但據 Cattell 教授宣言，勃特婁是用以“供社會活動及政治陰謀的”。據一般傳說，勃特婁還領受董事們及其他富人的禮物。他又熱中於政治上的榮譽，嘗為競選美國副總統而作出極其卑污的勾當。這樣的一個人，在教育

行政上又表現些什麼呢？

他統治大學像一個極專制的君主，不許有人稍加干涉。若有人表示干涉的形迹，他非把那個人驅逐出校不止。所謂教授會只不過一齣滑稽戲罷了，因為它只有顧問的權力，而他却大權獨攬，可以為所欲為。他利用董事高居教授之上，一切行動皆由董事們執行，至於他對董事們說些什麼是沒有人能知道的。教授在董事部方面是完全沒有地位的。

教授們的授課，只許按照規定好的辦法。就算是個天才音樂家，當規定的時間一到，他也須丟棄正在全心全意從事的製譜工作而出席報告。就算你是個大詩人，富有感動學生的能力，但要禁止你在非規定時間內授課，而且要禁止你講到有趣味的功課。倘使你任意行動，你是會被趕出校門的。計在他任職的二十年內，他已排斥二十多過教授了。

著名的經濟學家Beard也是被勃特要趕跑的，曾有一句話說：“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地位比一個手工業者的還低”。

據一個著名的美國科學家告訴辛克萊說，在十年來，沒有一個卓著的學者被哥大請去，也沒有一個從哥大產生出來。據他說：美國大學教員的薪水實在太低；凡是第一等的人才，他終沒有不能轉向別種業務上以得更多的金錢的。倘若他依然做着教員，那是爲了他愛做教員，是願望從別種形式上——在國人的尊敬上得到他的報酬。但如果他覺得他沒有地位沒有權力，如果他看到自己和同事們受着商人的威嚇侮辱；如果他知道全世界並不重視他的意見，且認他是供商人玩弄的傀儡，那麼學術生活的尊嚴就掃地了，除出少量的金錢報酬以外不復有什麼遺留了。

在連環校長統治下的哥倫比亞大學在學術上的地位，由該校心理學教授 J. Mc Keen Cattell 所作一篇美國科學家的統計研究一文中可以想見。在一千個美國科學領袖中，從哥倫比亞大學得博士學位者爲三十八人，然從約翰霍布金大學得學位者有102人；在哥倫比亞求學過的爲78人，然在哈佛求學過的爲237人。一九〇五年，哥倫比亞的教授在一千科學領袖中居60人，然哈佛有66，耶魯

有26；至一九一〇年哥倫比亞居48，減少了12人，然哈佛有79人，增了13，耶魯有38，增了12。就一千科學領袖與有關係的大學言，哈佛方面有22人占得最初一千人中的地位；芝加哥方面有13人；而在哥倫比亞方面，雖然教授人數特多，却只有8人。反之，後來失去領袖地位者，哈佛占6人，芝加哥占3人，可是哥倫比亞占了12人，比任何別個美國大學都要多！這是學術專制的成績！爲我國教育界聞名已久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竟是如此庸俗，毋乃令我國教育領袖短氣掃興嗎？

更有一種表，是表現每個大學所占著名科學家人數及該大學全體教授人數間的比率的。這樣，大約在哈佛，每七個教授中有一個屬於最初一千的科學領袖；在芝加哥，則每六人中有一個；在約翰霍布金，每五人中有一人；在克拉克，每二人中有一人——可是在哥倫比亞，要每十三人才有一人！就著名科學家與學生人數的比率言，大約在約翰霍布金，每二十一個學生得一個科學家；然在哥倫比亞，是每九十六個學生得一個科學家。就建築物及土地的價值上之關係言，大約麻省理工大

學每五萬三千元美金的價值有一個著名科學家，而哥倫比亞須每二十五萬九千元美金才有一個。再說到收入上的關係，大約約翰霍爾金每一萬元美金的收入有一個著名科學家，而哥倫比亞須每四萬五千元美金才有一個。辛克萊說：雖然在美國的一切大學都是財閥性的，但其間自有深淺的不同；而如上述的數字却是真確地告訴我們財閥政策的作用，它摧毀了智慧的生活，把一個偉大的學術機關轉成爲無靈魂的磚瓦與灰泥。

哥倫比亞的教授總計約有一千五百人；但算得上有創造力與人格的不過四五人。其中杜威要居一個；他是美國最先進的教育家，倘若連他也走開了，那定會演出一場可恐的騷動來。勃特婁知道杜威是不干與大學內部的政策的，當他發見教授的放逐，監察委員會沒有實力時，連委員的職務也婉辭了。

看 Goodnow 教授的例，更可知道財閥統治之如何剷除獨創與能力。Goodnow 在哥倫比亞擔任行政法，當 Burgess 教授離職時，他由教授會的推選，可以任爲哥校重要講座之一的 Ruggles 教

授資格。勃特婁也允許教授會，各部有自行推選之權；但對於 Goodnow，他覺得不高興，因為 Goodnow 曾印行過一本書，說到美國現行的憲法並不是將終古如斯的；他認為這是危險思想。所以董事部也不徵求政治學教授會的同意，就丟開 Goodnow，而另外指定了一個連環董事繼任！

再看看 James McKeen Cattell 教授的例。他在哥倫比亞任教授二十六年。他是世界上任何大學中第一個心理學教授，是四種重要科學雜誌的編輯。但他反對勃特婁的政策，有如任命一個不稱職的人在他一門功課內任教授，因為那個人送了他值十萬元美金的禮物。勃特婁想強迫 Cattell 辭職不成，遂禁止他使用六間教室，及一間由他自己籌款興建的心理學實驗室。以後他雖辭了主任之職，還不免發表反對當局的議論，終於被董事們開除走了。Cattell 曾描寫勃特婁說：“他把大學作一家百貨店來經營，對教授會擺出主人的架子，對董事部則是奉命唯謹的廝役。”

勃特婁利用他的地位，濫贈獎章給國內外的人。如一九一二年他把參議員 Underwood 捧為

民主主義的領袖，意欲使威爾遜不能被指名爲民主黨的候選總統。一九二二年，他又贈送榮譽給一個聖公會牧師，一個比利時男爵，一個葡萄牙子爵，一個中國公使，及一個波蘭軍閥的信徒 Pa-derewski。

勃特婁利用豪富董事的錢，造起畢業生會的一架機器，出版畢業生刊物爲他捧場。他又造起教授會的一架機器，是由那些對他表示同意，凡在哥倫比亞勢力所及之處——這是遍於財閥帝國版圖內一切學校組織的——奉行他的意旨的人所成的。

勃特婁又是哥倫比亞教育科的主任。他規定了這一科的方針，要把它成爲製造“教育專家”的機器，叫這批專家視人生爲掙錢的戰場，辦學校同經營工廠一樣。

這位校長的勢力遍於各地，全國督學的同盟，全國教育會（見下）的政客，勾結着各地商會及職業的愛國家，一致排斥教育上的自由主義，一致拒絕人類活動中的新思想。這兒單舉一例：北達科太人民謀將兒童的教育權取回，把他們一州的學

制自由化；當這時候，就有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行政教授 George D. Strayer（按這位先生的大名，在中國教育界中也頗有人知道）。向北達科太的州教育委員會演說，攻擊新提議的計畫，却另外替他們預備好了一個綱領。只要是站在特權階級的利益上，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雖去干涉政治也不算是侵犯學規的。

辛克萊論哥倫比亞大學的末段說。

“所有這些財富，所有這些莊嚴——在它裏面只是愚蠢與死滅！你看到有幾百萬元美金用於教育，不覺大喜，以為這就是進步；但所有這幾百萬所能買到的是——愚蠢與死滅！試看勃特婁保管了一千萬美金的和平基金，却用以寫一部戰爭史！一年用五十萬美金替人類謀和平，而且當現在這個在歷史上最嚴重的時期，勃特婁却雇一個人去作一種戰爭的歷史！

“我說的話，就是哥倫比亞的學制是消滅新思想，排斥創造的傾向的，你若以為言過其實。那麼請你聽一聽我們的這位財閥校長自己對

教育學科所下的定律：‘一世代的责任是在把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制度，無損傷地，傳遞給下一世代’。只消這樣！叫人類永遠一直同向來一樣，世界無窮，阿們！發見新理，征服自然，不是人人的責任嗎？鼓勵我們，叫我們不停滯於歷史所遺留的野蠻狀態，不是人人的責任嗎？救濟商業上的無政府，所用人類的集體力以建設生活，不是破壞生活，不是人人的事業嗎？做這些工作不是人的事業，我們所以要進大學是爲了求知我們的祖先，變成爲同他們一樣的人——盲目本能的可憐的犧牲”。

哥倫比亞大學說過了，再來說一個也爲我國人所聞名已久的哈佛大學，那在美國算是文化程度極優秀的大學。

可是說來奇怪，這個哈佛仍離不掉摩爾根家的支配。老摩爾根做了一生的哥倫比亞董事，小摩爾根却做了哈佛的董事（他是1889年畢業於哈佛的）。波士頓的大銀行Lee, Higginson & Company 就與紐約的 J. P. Morgan & Company 是一體的。

所以若稱紐約的哥倫比亞爲摩爾根家的大學，就可稱波士頓的哈佛爲 Lee-Higginson 的大學。哈佛的財產在一九一七年上三千四百萬元美金；受 Morgan-Lee-Higginson 董事團的支配，自然有大部分是投資於 Morgan-Lee-Higginson 的各種企業的。

哈佛大學有一種傳統，叫做“Liberalism”（自由主義）及尊重學問。但這些都是‘口說’罷了。愛默遜（Emerson）曾說：哈佛大學在哈佛大學內是沒有主張的；只有 State Street（按是大公司所在之地）才有全權。思想的自由是被忌視的。所有青年都被造成爲老弱的公民；不是預言者，不是詩人，却被禁止說話，禁止呼吸，否則就得被趕走。

也有人說哈佛大學的教授不致爲了有主張而被放逐。這也許是事實。一個理由是爲了哈佛的任用教師是非常慎重的；當一個新教師進來時，他就處於一種微妙而有力的講禮貌的空氣之下。它不像哥倫比亞之冷酷無情；它是參合了學問的及社會的性質，含有友誼的要素的。但是這裏邊仍然富有財閥支配的作用。有一天，Lee Higginson 公

司中的職員用電話對哈佛校長勞惠爾(Lowe!)說：“我們用了某某的錢設置這個教席，而某某年輕教師竟對工人講演，在報上登他的名，這只好使得？”當下勞惠爾就很客氣地請那位年輕教師走路了。

也有人說哈佛的自由主義的名聲，是由校長勞惠爾肯收容被他校放逐的教授得來的。這原是事實。但要知道這裏邊也正有着微妙的作用，而且是煞費苦心的。大概說起來，他所收容的人是得罪了某地方的財閥，却無損於“State Street”的。或是他侵犯了宗教上的律條，而這在哈佛是無關係的。

至於哈佛在用人之先，如何細心地攷查那個人的行爲，辛克萊曾舉出 Smith 教授以爲例，他是受過那種嚴密的試驗的。當斯密士在本地被任爲公用委員會時，查得本地煤氣公司有欺騙市民的事實；這事實在報上登了出來，於是他就被學校的董事們開除職務，因爲有幾位董事是和煤氣公司有關的。後來斯密士的朋友把這件事情告訴勞惠爾校長，勞惠爾調查之下，知道他是個非常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就請他去說話。談話的內容，據斯密士事後告訴人的，是如次：

“聽說你在本城有些什麼不樂意的事情”，勞惠爾說。

“不錯，有着很多”，斯密士回答。

“我倒不大清楚，”勞惠爾說，“是和什麼煤氣公司有關的不是？”

“正是，”斯密士回答。

“那僅僅是關於煤氣的嗎？同電氣是毫無關係的嗎？”

“啊，同電氣是絕無關係的。”

“你是確實知道電燈公司不包括在內的嗎？”

“確實的。它們是兩家不同的事業。”

“我明白了”，勞惠爾說，隨即講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原來斯密士不知道這番談話的作用。他所攻擊的是該城的煤氣公司，並不是該城的愛狄生電氣公司；那家電氣公司剛巧是勢力及於全美國的電氣托拉斯的一部分。哈佛則和這個電氣托拉斯極有關係；斯密士單單攻擊煤氣公司而不連帶到電氣公司，那麼人家不用煤氣勢非用電氣不可，所以勞惠爾校長聽了很為得意。果然，不出數天哈佛

請斯密士的聘書發出了！

一九一八年夏天，美國軍隊侵入北俄羅斯的 Archangel 及東西伯利亞的 Vladivostok，殺害了許多居民。這件事情是美國民衆史上的大污點，受許多思想家的指斥的。當時更有住在紐約的五個俄國兒童印發傳單，請求美國人不要那樣妄殺無辜。爲此，他們就被捕下獄，一個被虐待死了，活着的四個判處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徒刑。

對於這個非法的審判，有許多人提出抗議；其中有一位是哈佛法律學校的教授 Zechariah Chafee，他著論駁斥，并把這篇論文收容在“Freedom of Speech”的書中。更有其他教授共同聯名提出請求書，要把這件案子從寬辦理。這樣一來，却激起了連環董事團的大怒，就有一位哈佛畢業生而在紐約執律師業的 Austin G. Fox 起草抗議書給哈佛的監察部，同時簽名者有二十個著名律師，都是哈佛出身。監察部把這件事委給“查驗法律學校委員會”去辦，結果舉行了審問式的“會議”，那位 Fox 却用不可靠的宣傳資料作爲攻擊法律學校教授的口實。在“會議”中校長勞惠爾的態度是“一只

保護着雛鷄以防禦老 Fox 的母鷄。”只因這是哈佛內部的‘家醜’，所以外邊新聞紙上沒有登載，除出一家不在波士頓財閥範圍內的。

由這可見波士頓財閥力量之大，然也證明新聞禁止登載的結果，反使流言到處皆是。或者這在擁護哈佛的人看來，把新聞不登是正所以維護學問自由的原則嗎？

在這個例子上，即在紐約 Wall Street 的律師們向哈佛進攻時，就算他們也是哈佛出身，勞惠爾還不免要迴護現在的哈佛教授一點。然一旦到了他自己的財閥被人進攻時，換句話，不是 Wall Street 而是 State Street 求他援助時，他的態度就大變了。

這兒就可舉 Morris Llewellyn Cooke 的經驗為例。他在五年間曾繼續擔任哈佛商業研究院的講師。後來預備了兩種講演關於美國城市的公用問題的，本在許多大學中講過，哈佛也就請他來，并且允許可以自由“討論公用事業上的實際情形。”

可是教到第二年，竟被解約了。解約的理由，

據說爲了他違反學術的道德，把講演大綱登在報紙上。但是美國大學中並沒有這種的“學術習慣”。

那麼究竟爲了什麼？辛克萊從他所發表的大綱中，找得了有幾段話是說及愛狄生電氣公司的不名譽的，是說及哈佛大學電氣工程教授的虛偽的“Valuation work”（估價）的。解約的真正理由原來是在這些事情上。大學校長受了連環董事的雇用，請他們的“顧問工程師”及“估價專家”來任課，藉以增高公用事業的價值，推廣公司的營業；倘有人來說破其中的祕密，做大學校長的怎好不嚴爲處罰呢？

更有一個例子。哈佛於不經意之中，居然請了年輕的著作家 Harold J. Laski 教政治學。Laski 對於近代的資本主義所具的觀念並不是正統派，却以爲還該改進。他把這個問題向學生提起，這就引起了 State Street 上的大震動。當時哈佛正在舉行募捐運動，有許多人函致該校，若不把 Laski 解職，他們就不捐錢。另一方面却有一個芝加哥律師來信說，他的兒子以前對功課並不注意，自從受 Laski 的影響，他竟發憤用功；所以他要捐助一萬

五千元以彌補損失。這個爭論後來鬧到波士頓的報紙上來，校長勞惠爾竟站在 Laski 一邊；說沒有一個哈佛的教授是爲了主張應該被逐的。

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勞惠爾著有一本解釋英國憲法的書，在英國頗有名聲；他又受到牛津大學的學位，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個大使，在英國的人民確乎是相信言論自由的，且在事實上，表現他們的信仰；而 Laski 呢，恰好是個曼徹斯特人，他的家族又和英國現在的統治者有關係。并且 Laski 還是個能文的人，不是容易爲敵的。假使 Laski 回國去了，聲明他爲了不信仰近代國家被勞惠爾校長的大學裏開除出來，這不是會使得勞惠爾在英國的名聲墮地嗎？所以要是 Laski 是個德國人或是俄國人，那麼光景將不是這個樣子了。

號稱有自由主義傳統的，是崇尚學問尊威的哈佛大學，它的真面目原來和金權政治的模範大學哥倫比亞並不差得多少。這不使你十分失望嗎？

美國著名的大學還有許許多多，在這兒當然不能一一講到，以下只就在西美的一個著名大學

就是加利福尼亞說一說。

主持這個大學的有 Crocker, 是紐約 Equitable 信託公司的經理……; 有 Mortimer Fleishhacker, 是舊金山最大的銀行家……, 另外還有七人。他們除霸占州政府, 大學及自己的銀行鐵路以外, 還支配許多煤氣電氣公司, 以及新發達的水力事業等等。

可是除此以外, 他們更有一個獨立的警備委員會, 叫做改進美國聯合會 (Better America Federation), 它的性質是富豪的“黑手”(Black Hand)黨, 是恐怖主義者的組織。這一團體攷查在阿利福尼亞任何機關中辦事的人, 若不是百分之百的資本家就把他列入黑表(Black list)中。它威嚇公共機關的職員, 在報上毀謗他們; 它攻擊工人辦事處, 逮捕工會組織員; 而管理阿利福尼亞的一切學校, 連州立大學在內, 也是它許多事業中之一項。

它之如何壓迫大學教授, 可於Haldeman的報告中見到。他說: “我們注視着有急進傾向的學生。我們收到各方面的報告, 關於具有急進主張的教師及學生的。

所以這是一個偵探機關。阿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如稍有嫌疑，他就被記入黑表，不能升職，甚至即被逐出。被逐的教員要在別處求職，也受禁阻。大學畢業生雖有優良成績，也不能獲得教師職業，因為大學的介紹機關是在黑手黨支配之下的。

大學教授的活動範圍以教室為限，絕不許參加“課外活動”，尤其不得接近新聞紙。

校長 Barrows 是位軍國主義信徒，曾跟美國軍隊往西伯利亞，與俄國白黨將軍謝米諾夫非常要好，謝米諾夫在美國時他曾竭力替他宣傳。該校學生必須受兩年的軍事訓練，每年五十五小時。校內最好的地點，被他闢作運動場；有一位教授反抗他的野蠻舉動，憤而辭職。但他公然宣言：大規模大學的一種利益是在有豐富的資料，可以從中挑選運動選手。所以別個大學的‘古典’或是荷馬，而加利福尼亞的‘古典’却只是斯坦福與加利福尼亞兩大學的足球比賽，大學校際的徑賽，太平洋岸的網球雙打。

他絕不許學生們接觸新思想。學生們所最普遍沾染的心理都是統治階級的心理。就算是勞動

階級出身的學生，也要竭力摹仿爲紳士。曾有一個大學生說：“我以爲有組織的工人是該殺的”。所以他們很急切地要得到破壞罷工的經驗，而他們的“軍人校長”自然把這個大學傳統努力宣揚。當電氣工人罷工時，軍官應方面果然用了大學生的力量把罷工打擊下去。後來海員罷工也由大學生代行海員職務。

同時，那個黑手黨自然不絕地監視着大學。當他們得到某人有些微不穩當的思想時，如是學生，就給他落第；如是教師，就給他立刻滾蛋。因此有點獨立思想的教授就到別處去任課，只有那些阿諛的愚蠢的才保得住飯碗。其結果，大學生的地位自然低下了。

關於美國高等教育的內幕姑且說至這兒爲止。

現在總結幾句：這些大學校或是專門學校都是受支配於財閥，校長和教授都要爲了財閥的利益以“守法奉公”；教育的目的，是教學生做資本家的奴隸。在南美各都市，更以三K黨的勢力爲特別偉大。如 Oklahoma 大學的董事部就不許教員

反對三K黨。因為董事部長是三黨K員，副校長是三K黨員，還有三分之二的教授也是三K黨員，這些三K黨員便是專做撲滅貧農運動的工作的。

以下就要根據辛克萊的“The Goslings”(一九二四年出版)來講美國的普通教育即中小學教育。

在這兒，辛克萊重言申明：主宰政治的及產業的勢力，也就是經營一般學校的勢力；這一個不可目睹的政府摧毀了工會，也就摧毀了學校教師的協會。這兩件工作是一件工作。

他先從南加利福尼亞的黑手黨說起，說它支配了教育局，統制了一切學校，威逼教師，它所希望造就的學生是一批專替資本家効忠的人。

然後說到為美國大城之一的勞斯安極立斯(Los Angeles)的教育。那兒的教育是受泰晤士(Times)報館的支配的。所有教育行政機關的人物都與泰晤士的利益有關。試聽這批人物的教育意見：“我們並不要你(按指教師)帶着意見來，我們祇要你服從命令”。有一批教員前往教育局有所

聲訴，却被教育局員大聲指斥：“不要到這兒來陳述意見，我們所要求你們做的是遵照我們所吩咐的話。”

在討論會上，一位教育局員說明教育的定義：“在促進人類心智的開發”。當有一位軍官出身的教育委員不待他說完，就暴躁起來，大聲喊着：“教育嗎？我可告訴你教育是什麼！教育把一羣兒童關在一間房子裏教他們一課書，聽他們背誦這課書，記下分數，到了年底算他們的成績。那就是教育，就是我們在勞斯安極立斯所將有的教育，可再不是別的。”

另有一位教育行政人員是個商人，他發表他的教育要旨，說學校是工廠，兒童是原料，要同餅乾臘腸一樣，按照一定的大小式樣成為貨色。在他看來，教師就是傭人或是幫手，他們的職務和在別個工廠中的一樣——服從命令，只管自己的事情，且須尊敬上司。萬一教師竟敢抱持自己的意見，或者竟敢要求加薪，那麼他們就要受到南加利福尼亞的黑手黨所施於工會的辦法——被捕下獄。

上面說過的那個 Better America Federation

曾在報紙上大登其主張！

“教員必須遠離政治及產業的討論。教員正在被視為國家的守護者。教師，同兵士一樣要對國家盡其最先的且是唯一的忠誠。”

勞斯安極立斯的中學教員曾預備向教育局請求組織一個“教師顧問委員會”，以便和局長及助手商量關於兒童幸福及學校的事情。像這樣的組織在美國別的城市中是存在的。他們想這種提議終該被接受吧。那裏知道黑手黨的手段會得那麼樣厲害。某一天的泰晤士報上突然登出一則驚奇的新聞，說是在勞斯安極立斯的教員中間有一種陰謀要組織“教師蘇維埃！”這樣一來，黑手黨就派人向城市俱樂部及婦女城市俱樂部去指摘“教師蘇維埃”的罪惡。商會決議組織調查團，並邀教師來對質。他們用着教訓頑童的調子質問教師，且假造許多事實，不容教師答辯。嗣後泰晤士報還不絕地“聲罪致討”，自然那個教員們所想提議的委員會是沒法實現的了。

在這種學制之下，教員的升級自然全靠情面。雖然定有什麼攷查辦法，那不過是一種門面罷了。

只要有當地的財閥，直接或間接的介紹，他是毫無問題可以安然升職的。

同時，要學校宣傳資本家的功德，却是一件教育局及學校當局的重任。如某次，教育局發出通告，要各學校舉行“商會週”。它嚴重吩咐：“五年級以下的兒童要寫一封信給他們的父親或保護人，說及當地商會的某種事業，或者說及商會工作對於城市的恩惠”；此外各級的教師須“利用本地商會的功能，活動或成績作為作文及演說的資料。郵箱中都要放着小冊子，是敘述本地商會的事業的。校長和教師必須積極協力工作。”

如學校中發見急進一點的教師，就要舉行一種恐怖運動。某一中學校長曾受教育局員的勸告，說是他若把幾個被控有自由思想的教員解職他就可升級。當校長說他們都是良教師時，那位教育局員就說：“你不能找到一些他們品行上的缺點嗎？”

黑手黨更利用學生做偵探，這是由 Better America Federation 的會長 Harry Haldeman 親口說的。他在一次宴會上，向大眾演說：在本州以及全國的各學校及大學校中，已都有了訪查員，他

的職務在偵察教員，教授或學生所說的話，報告到協會的各總機關中。假若被報告出來的言論有不合於協會的，就要設法把那些教員或教授解職。若是學生，也將給他們看到錯誤的所在。假使他們堅執不改，那就要進一步不許他們有噉飯之地。

要之，這批黑手黨支配着教育局，支配着督學，支配着教師，支配着學生；甚至還支配着父母。勞斯安極立斯有一個父母教師聯合會，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父母到學校裏來，和教師討論兒童們的幸福。但是這個機關現在已經落在黑手黨手中。黑手黨特地費了錢請有名的婦人到會；另有些婦人是泰晤士雇用的；他們的作用便在替黑手黨與泰晤士說好話，吹牛皮，讓一般兒童的父母相信他們。假若你是贊助泰晤士報的，那麼你可立刻變成一位有名的太太；你的照片將印在報上，你的言論將刊在報上，你的名譽將一日勝似一日地傳播四方。

爲要阻止父母們有提議有權力起見，他們特把會章修改，規定“不得干涉教育局的行政”；所以如有人需要發表意見，他們祇消聲明一句“這是教育局的行政”就行！又爲阻止教員們有發言機會起

見，他們終是把會議在上課時間舉行。有一位教員任職已差不多達三十年，可是從沒有一次能出席於學校的這種會議。在這種聯合會的會議上代表學校的就只有校長及幾個職員。教員出了三分之一的會費，可是沒有發言的權利！

至於那些替黑手黨經營這個學校機械的人，他們之防止新思想，自不待言，因此他們禁止中學圖書館所購“Nation”及“New Republic”兩種雜誌。反之，對於資本家有利的書，他們却要推獎之惟恐不力。如那個 Better America Federation 特地挑選一本“Vanishing Landmarks”做各校宣傳愛國主義的教本。這本書是做過財政部長的 Leslie Shaw 著的，他是個推崇美國憲法為特權階級的防禦物的脚色。“只有社會主義者，準社會主義者及布爾雪維克，才要求民主主義，”他是這樣宣言的；他又說資本家應有組織，惟一的危險是始於工會組成的時候。他還指斥婦女選舉權的修正，說這是革命運動的一部分。所以那個協會費了二萬元美金來印刷這部書分給每一個學校教師。他們要求初等學校一律採用本書為教科書——這還

算是在婦女已有選舉權達二十年的一個州呢！據一個教員說，“對婦女投票”的口號是要改作對兒童撒謊”了。

該會又發行一本教科書叫做“Back to the Republic,”痛罵創制權及複決權爲對祖先叛逆。出版者稱本書爲“當代名著”，且分發給每位教師，試摘錄其中幾句“民主主義之於政府，正猶自由戀愛之於家庭。……民主主義之於政府，正猶饕餮之於個人。……民主主義之於政府，正猶酩酊之於個人。……民主主義之於政府，正猶器聲之於音樂。……民主主義之於政府，正猶癡狂之於思想，”等等。請注意，這是用在教科書中的！教員們都被要求着強制兒童去熟讀去背誦！

在黑手黨統治下的兒童變成何等樣的人呢？據許多教員異口同聲地說：他們什麼都會，只是讀書除外。有一個中學是官家子入學的。那兒便只有金錢是萬能；學生的理想是在如何用錢，他們的標準是值多少。校門口有整排的汽車，那些馳車的少年個個是社交能手，他們在學校白相，也在女子身上白相。

體育競技和“集會”算是學校頂大的事情。他們一起來到大會堂裏，練習歡呼，歡呼領袖告訴他們：“再喊得響一點。現在讓我們給選手隊歡呼。”他們從大會堂裏出來，大家情緒緊張，再也不耐煩讀什麼書了。售書舖中有輕氣球的玩具出售，大家就買一個來放。等到他們拿着輕氣球剛剛在教室內坐定，又聽見“消防練習”的召集了。倘使沒有這些玩意兒，這些年輕人就要拿粉盒子來在鼻子上抹粉，在嘴唇上塗脂；這時候，可憐的教師正想放些什麼東西在他們蠢笨的頭腦中。

教員們有什麼法子對付這樣一個局面呢？惟一的方法，就只有把功課變成有趣味些，只好講些輕鬆的題目，這或許會喚醒學生的獨創力，引導他們的思想。這個法子原不算壞，可是做教員的還得提防着不冒危險。有一個女生曾要做一篇論文，做叫“The Social Motive in American Literature”。這是很好的題目，但是被校長先生禁止了。

一九二一年時黑手黨想由州議會規定一個條文，要學校驅逐“任何教員，他是在學校中向兒童表示輕視美國憲法中的任何一條的，或是在口頭上

向學生發任何種議論，或向學生分發寫的或印的意見，贊成對美國憲法的任何一條作任何的修改的。”美國憲法之得修正，是憲法自身規定了的，而且在歷史上已經正式合法地修過不止十九回了！但是黑手黨竟要禁止學校教師有這種合法的意見，原來他們是怕教師向學生討論到童工問題啊！

更有一件希奇的事。勞斯安極立斯有着一個團體叫做青年工人同盟，是共產黨員的教育機關；他們要舉行一次辯論會，關於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但找不到一個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只好從自己的演說員中間指定一個，在他本人當然是不大情願的。這時候，有三個少年，一個是中學生，兩個是剛畢業的，出席於這次辯論會，他們認為這個對資本主義的辯護並不充分，於是他們立了起來，說他們能說得更好些，結果決定再開一次辯論會。青年工人同盟租好了會場，三個學生也費了大半個暑假在預備他們的辯論。距開會以前的二三天，青年工人同盟就散發傳單給各中學校，故意指說那三個學生是“一個中學校演說會的三位代表。”馬上那一個中學生就得到校長的通知，決不許他參

加。校長解釋這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而是教育局長的命令。原來教育局長已曉得了這件事情。

教育局長是什麼人的？是商人製造家協會（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

以上是南加利福尼亞的教育情形。但是辛克萊說，“南加利福尼亞正和工業美國的其餘部分完全一樣，”無論是舊金山，是西雅圖，是聖路易斯，是芝加哥，乃至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等等地方，“我們都將看到支配商業及政治的財閥政治，而且我們將見到就是這個同一的集團，通常還是這個同一的人物，是在支配教育。他們用不用黑手黨的方法是惟一的而且純粹的要看一個問題以決定——就是奴隸階級要想反抗到什麼程度。假使奴隸階級不作反抗，那麼治者階級是不採用酷烈手段的。假使奴隸階級企圖反抗，那麼就得採用酷烈手段以便鎮壓。”

因為如此，關於美國其他地方的普通教育，不再寫下去了。惟尚有一項必須略加說明，就是全國的教育機關。

美國各地教育內容之非凡相似，自不是偶然

的事，那裏一定有着中心的統制，標準的機構以管理全國的學校系統。那是這樣的在市鎮鄉的地方機器是郡的機器之一部；許多郡的機器是州的機器之一部；而許多州的機器又被全國教育會所聯絡所協助所標準化，以外再加上屬於中央內務部的教育司，與洛克菲勒普通教育部（Rockefeller General Education Board），卡內基教育促進基金（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幫助。

在美國學制之上，郡的督學必須是個學校的政客，也差不多必須是個政治上的政客。這個行政機關是由督學的助手，書記，校長以及別的許多委任人員組成的，他們皆須仰承他的意旨；那些受他指揮的教員也率領着一羣的教員奉行他的政策。爲得表示教員的自尊心起見，且使他們自以爲對教育有所作爲起見，把他們組織爲團體或俱樂部，而所有這些都是附屬於全國教育會的，但在實際上是受制於當地的教育行政機關的。所以這些教育組織之於教育界，正猶黃色工會之於勞動界一式。在極大部分，這些教員組織的職員是督學

校長以及其他支配階級的人物。在一小部分，他們是教員，接受支配者方面的革命的。只有幾個例子上，少數教員敢於反抗命令，實行自己的組織，但那些領袖是要常受威嚇，迫害，毀謗，拒絕升遷的。

州教育局的督學要與當地的政客及當地的財界名流相提攜。不管他是被委任的，或是被選出的，都沒有差別，因為就令是選舉也必先經指名，而這種指名之權是在當地政治機構方面的。贊助指名的人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中有的土地投機者，不是有土地要出售，便是想購買某處校地以便大賺其錢。有的是包工者，要建造學校建築物以獲利。有的是教科書經售人，他們是一切督學的心腹朋友，捐了錢選舉他們，却要靠他們取四十倍的利益。這些書賈甚至還是教員的經理，足以左右教員之用舍升降——那就看教員是否照顧他的生意而定。

此外自然有銀行家，他們需要支配學校經費，及教員經費；教員積儲金錢，存入銀行，銀行家却用以兌現或供政治活動。更有些資本家，他們需要

童工，就巴望強迫教育制取消或者漠視。再有各式各樣的大商業宣傳的機關——如全國製造業者協會，就需要兒童被訓練為工廠中及店鋪中的奴隸；有 American Legion 及軍閥們，要兒童服兵役，富有愛國思想；有新聞紙，援助一切的反動，且懲罰那些不順從的人。這個是美國全境——祇除出極少的幾郡，那裏的人民因工農運動已得自己支配的——的郡督學及郡教育局所處的地位。

其次，州督學及州教育局的情形也復無異，不過規模較大一點罷了。州的這架教育機器有更多的錢，州督學能受更高的薪水，所以他也是更敏捷更細到的政客。他參加州的徒黨，他的辦公處是一間吸着雪茄煙坐着消閑的官僚的宿舍。他和土地投機者及書店相聯絡；他是為他們所有的，且把他們所需的教育授給人民。人民往往是滿意於這種教育的——因為他們看不到也想不到還有什麼別種的教育。敬虔的美國農民被教着唱一種說到“古代宗教”的讚美歌。今日的兒童却在受古代的教育。普通的美國人都被教着相信公共學校是和教會差不多的神聖，且相信公共學校的教育者一定

是具有高貴心腸及公正態度的人。

現在我們要講到美國學校的金字塔了。那就是全國教育會。請容我先引用一段別的文字。

“美國各州教育行政制度雖各不同，而中央復無教育部，然全國教育界有一強力之聯絡機關，即全國教育會（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簡稱 N. E. A.）是。會員有大學教授，教育司長，局長，及其他行政人員，中小學教員，熱心教育事業者等等，凡數十萬人，分組甚多，時有會議，有調查，有報告，有宣傳，有主張，影響於全國之教育頗大，其建議每為各州所採納而施行之。”（見商務印書館出版莊澤宣編各國教育比較論二十五頁）

具有這樣勢力的全國教育會究竟屬於何種人所有，爲了何種人的利益呢？

在前面我們已知道這個教育會是世界教育會議的發起者，是‘舊金山國際和平教育運動’的主持者。它究竟是怎樣一件怪物呢？

它是美國教育者的專業組織，擁有無限大的特權與勢力在教育界上。它對各地的學校是大有影響的，決不因爲間接而稍減其作用。凡是它所做

的，是規定教育界的標準，在它的公開或秘密的會議上決定下來。

該會現有（一九二四年）十二萬五千會員，每個普通會員要納會費二元（美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會員是尋常的平凡的中小學教師，他們是以大工廠中日給勞動者的職能為職能的——生產財富，供給他們的上司消費。N. E. A. 號稱是一個‘民主的’組織，然而這種‘民主的’性質與我們所想像的大不相同，這容在底下再述。N. E. A. 歡迎新會員，事實上，新會員是非常急需的——舉行‘徵求會員’運動，各校的特權即被建立在具有入 N. E. A. 的會員資格。有些學校甚至強制教員必須加入 N. E. A. 為會員。一九二二年九月號的全國教育會雜誌上，很光榮地引用密西根奧拿威督學的話：“將來密西根，奧拿威的教員契約，要訂定教師必須為州教育會及全國教育會的會員。”在米蘇里的聖約瑟在請求教員位置的空白單上注上如下的兩項：“是否 N. E. A. 的會員？若不是的，本年是否要加入？”

做會員的能從 N. E. A. 得到什麼好處？說來

也許你不相信。會員只有‘抬驕’的作用的。底下我們就要解剖 N. E. A. 的本色。

N. E. A. 是成立在國內戰爭以前，在有這樣頗不算短少的歲月中，它一竟便是支配階級方面的所有物。在過去幾十年中，沒有一個中小學教師曾被選為職員。直到最近，才偶而有幾個老資格的教員當選以粉飾一時的門面。這曾經過了許多年的奮鬥，才使 N. E. A. 能垂念到教員的生活狀況及工作狀況，或承認薪水，年金等可作為合法的問題以討論。這曾經過了一度的革命才使 N. E. A. 在一九〇三年指定一個薪水及年金的委員會。這還是一直到了一九一一年才搜集了關於這些問題的實在資料。由這可見 N. E. A. 之並不為了一般教師的利益了。

到了一九一七年，發生了俄國的革命，於是美國的督學先生們認識了不把下屬階級完全控制住之危險。他們決定要把 N. E. A. 的小學教師壓伏下去。怎樣壓伏呢？就是利用所謂民主主義以資威嚇。你要知道全國教育會是個公共機關，照法該由會員來主持會務。任何一個教育者繳了四元美金

就可做特別會員，每年可以出席大會，有選舉及被選舉權。但是 N. E. A. 可不是這樣。

原來在 N. E. A. 的大會中，將有兩種特別會員出席，一種是由全國各地赴會的，其中百分之九十屬於學校支配者方面的人物。他們得了公家或所屬團體的資助，出席是他們的職業。另一種是住在大會舉行地方的會員，這裏有百分之九十是實在授課的教師。只有他們才是不需多大費用而能出席的教師，也是代表不能出席的教師大眾的。

因此，在大會中就開始可以注意到為現代主要現象的階級鬥爭。一邊是受資遣的有勢力的督學及校長們；一邊是極尋常的教師。無論那個大城市裏無產者往往占居大多數。他們也許不注意什麼，不發表什麼意見；不過說不定從旁的地方譬如紐約，芝加哥會有幾個過激派前來出席，在大會中提出問題，向一般中小教師宣傳，且勸誘他們投自己階級的票。

這樣的事情就是為 N. E. A. 的教育雇主所深惡所深懼的。所以在一九一八年的冬季大會——督學部的大西洋城市會議中，他們議定了一項計

畫。就是把 N. E. A. 改成為代表制，以代替在常年大會中由特別會員選任委員的辦法；各市鎮及郡的會員選代表到州的機關，再由當地的及州的代表選代表到全國大會。自然，在這幾層的選舉中，學校支配者方面是有把握使自己的政客當選的。這樣一來，當大會在某地舉行時，本地的教師將祇能舉代表出席，不復有當作特別會員投票的權利了；而派代表的方法，又是每一百個教師選一個代表，若有五百個以上的會員時，一個代表就代替了五百個會員。所以大會中的教師，不是每個教師有一票，而是每個教師只有一票的百分之一，或許是一票的五百分之一！這樣，N. E. A. 就穩穩當當地操在督學們的手中了！

這是一種怎樣性質的民主主義啊！

我們從一九二一年在 Des Moines 舉行的大會中便可看出 N. E. A. 的本色。這次出席代表的成分曾有詳細的統計數字可睹。計大會共有 553 代表有投票權；其中：州督學，33人；郡督學，21人；城市督學，104人；大學校及師範校長，28人；中學校長34人；小學校長，54人；視學員，23人；（按美國

的視學員，猶之乎我國的視學或督學；而美國的督學是州郡的教育行政長官）。這樣在雇主方面的便共有297人，已是大多數了，若再注意：統計表中列有14個混雜的，46個不分類的，6個教育雜誌編輯，2個書店經理；這些數目自然也可加到297上面。

現在再看教師方面的代表：特殊教師，8人；大學校及師範學校教師34人；中學校教師，65人；小學校教師81人。總數爲188人，還包括大學校教師在內。試拿這個數目與上面的297衡量一下！在實際上，學校教師的人數比起支配者方面來成爲十或十五對一之比；但在這個全國的代表團體上，他們只占百分之三十九，而支配者方面却占百分之六十一。這算是美國最大教育組織的“民主主義”！

這一個全國教育會現在就完全成爲資本家的所有物了。它是一架政治機器，由資本家所經營，爲了資本家的利益以盡某部分的職務的。正像在別個任何大工廠中，工人們都是被剝奪了權力的，但在另一方面却被恭維着爲自由的公民。在歷次的大會中，你可聽到許多頌揚平民主義的話，同時却處處提防那些教師有發言的機會。一切權力在

一個小組的手中；他們在每個委員會中都派人參加。他們定好了計畫，到時強制通過。

每年到會的教師是無能為力的。因為他們大都是生手，沒有經驗，一切任憑所謂當然代表——歷任會長，終身董事，執行委員，州督學等等——在那裏擺佈。

一九二三年大會時有位 Miss Flara Menze 被任為審查委員會委員。她去到 Oakland 旅館中找開會的地方，找了許久工夫才找到，可是遲了十五分鐘，已經散會了，她找不到一個人。後來知道委員會是在十五分鐘內開了的。一九二一年大會時，他們指定一個委員會，修改關於初等教育的事項；這個委員會却成於大學校長及教授，州督學，中央教育司長——及一個小學教師。他們要對初等教育上最重要的事項定出 N. E. A. 的政策，却祇放上一個對兒童有實際經驗的人在委員會中！

要之，美國的全國教育會只是大資本家的所有物，是爲了大資本家的利益而活動的。因之，它在波士頓開大會，就受波士頓商會的歡迎；在奧克蘭開大會，就受奧克蘭商會的歡迎。它無論到那

裏，終受着大資本家覬覦的歡迎。原來它和大資本家是這樣利害相關的。辛克萊說：“自有公共學校制度的第一天起，它的最厲害的敵人就是組織化的商業主義，這不算是過言。我知道有些商界的個人，眼光遠大，相信學校，而且爲學校盡力；但是商界的組織，剝削者的階級集團却要盡他們的力量所及以阻礙公共學校的創設，因爲他們曉得教育下層階級是準備推翻工銀奴隸制。”——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社會的普及教育，雖似趨於教育與勞動的一致，但資本家實在害怕這樣的傾向；現在從辛克萊的這句話，更有着事實的確證了。

資本家所需要於兒童的，是兒童們的勞動。有人要在州議會中提議禁止工廠雇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但是資本家說，兒童求學到十四歲，已不中用了，兒童讀了什麼文學歷史音樂，就不願意做工了。資本家要求學校的手工訓練祇要訓練兒童的手就行；他們也願意慷慨輸捐，讓學校來訓練他們的工人，以便獲得廉價的熟練勞動，好用以破壞罷工。資本家要求把學校系統分成兩種，用着不同的

建築物，經費及教師；且不需要在兩種學制之間有協作，其目的便在這個計畫實現時，他們可以把職業學校竭力滋養長大，而把普通的文化學校餓死。更有些資本家向議會提議用公款辦理職業訓練，但須在雇主支配之下，不許學校當局干涉。他們所需要的教育就只是於他們的利益有關的教育——學習商品生產的技術，培植破壞罷工的人材；除此以外，都是多事，都該取消！

好了，美國教育上的‘商品化’的徵象要說原還可以寫上幾萬乃至幾十萬字，但不寫也儘夠了，儘夠讓我們明白這種教育的真相了。你覺得這是人類的教育嗎？這是值得我們中國模仿的嗎？教育哲學是教育實際的指導也是教育實際的反映。美國教育實狀如此，美國教育的理論還不妨供我們應用嗎？請讀者注意中國現時教育上的主張，教育界領袖的言論，我們要提防這一種‘帝國主義的侵略’！

問 題

一、試調查在全國教育行政機關任職及大學

教科或高中師範任職的留美學生有多少人。

二。試批評這批留美學生所發表的教育言論。

三。你還相信美國教育尚有可供我們模仿之點嗎？請列舉出來。

四。從本節，能知道美國教育有何種特色？

五。試調查美國在華所設的教育機關，及其影響。

第十六節

蘇聯的教育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教育。——教育的理論根據。——
教育的組織概況。——文化事業建設費。——“十年間的
文化發達”。——蘇聯中央對教育的決議。——問題。

關於蘇聯教育的理論及設施，在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一節中，是已大體提起過的了。現在在剛探究過美國教育之後，接着就來探究蘇聯的教育，我相信這一定是會給讀者以一種新感想的。

蘇聯的教師組織與學生組織，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這一節自然祇就前面未曾說到的補足一

點。更因關於蘇聯教育的專著，中國已有幾種譯本，要知詳細，自可從那些書籍中去參攷，所以本節的敘述也只提綱挈領地舉出幾個要點爲止。

● 最先我們要認清楚蘇聯是勞動階級統治的國家，它的教育也就是勞動階級的教育，這和資產階級統治的美國，它的教育爲資產階級的教育者，恰巧相反。兩者都是階級的教育，不過蘇聯不諱言是階級的，而資本主義國如美國等，則要多方掩飾這種階級的作用。

蘇聯的終局理想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生活組織，由此以產生共產主義的社會。

在這種理想進程中蘇聯教育的當前目標可說是在養成蘇維埃的公民，就是具有勞動者的心理和觀念的人們，能自己活動，自己信任，且爲這些理想而積極鬥爭者，靠他們這批人來建設並防衛俄國的社會主義，贊助世界上其他部分的勞動者去戰勝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實現這些目標所採用的方法，又有幾個原則：第一，教育是建築在勞動或肉體勞動的基礎上的。學習的方法是經由實際的工作以行。“勞動成爲一切教育所圍繞運轉的樞紐”，有如 Pinkovitch 教

授所說。生活和生計都有賴於勞動。因此學校及別的教育機關都和四周人民的生活及工業的生產緊相聯絡。在學校和工廠，礦區和農場，城市和鄉村，俄國和世界其他部分之間，都有着互助及相互關係。教師和學生最先要研究本地本縣的工人農民的勞動及生活，然後及於一省，一共和國，更及於全蘇聯及全世界。

第二，自入校前教育（Pre-school）起，課程皆建築在一個三層的基礎上。（1）各個人四圍的自然現象；（2）人們對自然合作或反抗以支配它利用它的勞動；（3）由於勞動所生的社會特徵，及在這三種範疇間的關係或聯絡。（這種關係在俄國通稱為‘綜合原理’。）由這樣求得的知識是統一的，不是許多教科的羅雜。

第三，在各種集體的活動中，兒童和教師都要像勞動者一樣的參與。男女同學是各級學校一律通行的。這種集體地勞動的能力需要從開始就形成兒童對於生活之社會主義者的態度，且浸潤於共產主義的理想。這就是說，兒童對於本國及他國的政治情形必須有清楚的瞭解，這是一種科學的

(現實的)世界的人生觀，而不是局於國家的人生觀。最後，他們還必須從最早的學校年齡起能應用這種知識以和他們四周的伴侶一起勞動，且反抗反勞動階級或非社會的行為。

蘇維埃的教師要能運用各種方法以鼓勵最高度的自動力，「獨創力和制裁力，並發展每個兒童天賦的能量。這種教師無異是個嚮導，是個顧問，謀在學課上及學校行政上引導兒童入於自由的境地，藉以培養蘇維埃公民所必須的性質。雪茲基 (Shatsky) 說，“凡為兒童所把握之有價值的觀念都該推進到為兒童所能接近的狀態。”顯然地根於強迫，服從，及試驗的學校空氣和方法，天然不適於社會主義進程上的鬥士及建築者。為一切真正社會主義者的觀念之世界觀念，需要教師能從科學的唯物的見地去批判宗教，國家主義，愛國排外主義以及感傷的理想主義，藉以掃除宗教的國家的感傷的種種成見及執迷之心理，俄國的教育者給學生一個根本的經濟需要之清楚觀念，這種經濟的需要決定現代階級社會的發展，以及在它的廢址上建立一個真正人類的公正的社會之種種勢

力。因此，蘇維埃的教育就要灌輸對全世界一切勞動者之團結的意識，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以及人種差別如何；又要準備為大家的勞動階級的觀念而鬥爭，且注意於合理地有系統地建設全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能量。

事實上，這種觀念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及仇視共產主義者的大敵；但在這個過渡時期中，俄國的階級教育實在已盡其接近全體人類的能事了。美國的教育是為少數資本家的利益；而蘇聯的教育却為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農大眾的利益。那才是民主主義的，是為全體體的啓蒙而準備着的。愈是窮苦的兒童，愈得到較好的機會。教育權跟着所有權走的變態，在這兒是完全消滅的了。自然，蘇聯現在的教育還不是個百分之百的充分或推廣，但它的當局正在急切地謀做到這一地步；在五年計畫完成的一年（一九三三年），便可見蘇聯文化的光芒一定更要照耀於大地了。

以上是蘇維埃教育的理論根據，現在再說一點教育組織的概況。

（一）教育行政

在教育範圍內，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都有完全的自治權。依據蘇聯的憲法，中央當局祇有‘規定教育管理上的普通原則’之職權。

因之，中央教育委員的權限只在支配各加盟共和國預算的比例；與中央工會執行委員會及共產黨，共產青年團，各合作社的中央執行機關協作，所有這些機關都是和教育人民委員會相聯絡以推廣教育活動的；同時經過蘇聯的國家科學會議——係由教師中委任的專家委員會，經教育勞動者聯盟批准的——起草課程綱要，規定普通教育方針。

各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是由該共和國的蘇維埃大會選出，對大會的執行委員會負責的。各教育局由各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議委任。各大城市及各縣省區的蘇維埃都有它的教育機關。這種組織的目的在吸收廣大的勞動者參與教育行政，且因蘇維埃與工會，合作社及政治團體間之關係密切，這種目的已能有效地實現。

(二)學制大要

1. 入校前教育 (Pre-school Education)。收

容自三歲至七歲或八歲的兒童在幼稚園及育兒院中。更幼的兒童當母親從事工作時，被寄在托兒所中，按時由母親喂乳。

2. 統一勞動學校(Unified Labour School)。這種學校的意義和重要已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一節中說過了。它是整個學校制度的基礎，以社會教育為根基，對由八歲至十五歲或十七歲的兒童所施的。它分為兩級，第一級施於八歲至十一歲或十二歲的兒童，第二級施於十一二歲以上的兒童。到十四歲或十五歲，許多聰穎的兒童開始受專門的訓練，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升入工廠學校或工業學校或農業學校，或職業學校的。這類學校的目的在訓練熟練的工人，專門家及指導人材，以應正在發展中的工業和農業的需要。

3. 高等學校及大學校。到十七歲左右，能力相當的青年勞動者就修習大學的課程。

4. 對孤苦兒的教養。蘇聯因經過大戰，內亂及飢饉的災禍，孤苦兒童幾乎遍地皆是。蘇聯當局對於這批兒童負起積極教養的責任，到近年已大見減少了。

5. 成人教育。沙皇俄國所遺留的文盲成爲蘇維埃教育事業最重要的一部分。勞動者對文盲鬥爭所用的武器是：(a) 文盲學校，(b) 政治教育學校，這是蘇維埃教育的特色；(c) 勞動者大學(Rabfa)，設置第二級課程，以應受環境限制未能正式入高等學校或大學校的工農的需要。

6. 少數民族。俄國內部有許多少數民族，各自有其語言。但在俄皇時代，是禁止使用非俄羅斯語的。革命以後，一百多個民族都獲得了教育事業的完全自主權，於是有了各種語言書寫的書本刊行出來，它們的文化自當隨之生長。

7. 博物館及美術教育館。委員會管理科學院，博物院及美術陳列館。這些設置的應爲公共教育上的重要部分，是人類文化供人類享用的開端。

8. 國立出版所。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惟一的出版機關，各個教師及教師組織在生產各級教育所應用的教科書上是直接參加的。這顯與書賈的教科出版所迥不相同。

9. 軍隊教育。蘇聯的紅軍是一個巨大的教育機關，兵士中的文盲很快地就消滅了。兵士所受的

教育，其目的不在造成軍閥及國家主義的觀念，而在訓練良好的革命防衛者。蘇聯的兵士有政治上的權利，且得自由參加社會生活。

10. 影戲場和劇場。教育當局對於影片，無線電音，及劇場都取得管理權，且都是由國家經營的。蘇聯的影片由教育當局審查，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用警察檢閱。有許多學校已設置無線電俱樂部及兒童劇場，用具大都由兒童自造。更有特殊的兒童劇場，專為兒童而設。

11. 教師訓練。有兩種師資訓練機關：一是專門學校，訓練初級教師的；一是大學的教育學院，訓練高級教師的。學生們普通都在自己區域內從事社會活動，學程都是四年。

12. 視學員。視學員係由教育當局同教育勞動者聯盟，從教師中委任。他們對教員不能施行壓迫，不過被教師看為熟練的專家和友愛的指導者。這與美國視學之屬於雇主方面者不同，他們是和教師屬於同一個教育勞動者聯盟的。

從上舉蘇聯的教育組織看來，它是包括學校教育，劇場，電影，藝術，出版等等文化事業統統在

內的。我們前面講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時知道它的思想支配不僅行於學校教育，更貫徹於新聞，雜誌，講演，圖書館，演劇，影片，體育等一切文化機關。原來這是無足怪的。蘇聯尙是階級的國家，它還在厲行階級鬥爭，教育事業仍然離不掉它的階級鬥爭的作用。我們只要能分辨兩種支配階級性質之不同，自也能看出兩種階級教育不同之所在了。

由上面二段簡要的敘述，對於蘇聯教育的要旨當已能明瞭。我們知道蘇聯自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以來，到如今已經足足的站了十二年；它的社會主義建設正着着進行，年年有勝利的決算。從一九二八年度起，更確定經濟發展的五年計畫，同時在文化事業設施上也有很精密很具體的規畫，我且把蘇俄共和國經濟五年計畫中文化事業的國家預算，用數字介紹如下：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文化事業建設費
(單位百萬羅布)

文化事業建設部門	年 度	經 費		
		投資額	其 他	合 計
國 民 教 育	1928—9	165.4	751.8	917.2

	1932—3	432.2	1782.5	2214.7
	五年間	1597.4	6311.8	7909.2
國民健康事業	1928—9	74.0	411.9	435.9
	1932—3	181.0	702.8	833.8
	五年間	628.0	2766.0	3394.0
社會政策設施	1928—9	0.6	63.2	83.8
	1932—3	3.2	127.7	130.7
	五年間	10.9	478.7	489.6
合 計	1928—9	240.0	1226.9	1466.9
	1932—3	616.4	2612.8	3229.2
	五年間	2236.3	9556.5	11792.8

又據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蘇聯財政委員布婁哈諾夫的聲明，蘇聯的軍事預算大為削減，計海陸軍預算不過占總額百分之九以下；但帝國主義國家的陸海軍預算常在百分之四十；收入方面共有一百十四萬萬羅布（去年度為八十萬萬羅布），其中有七十萬萬羅布用於經濟；二十四萬萬羅布用於文化及社會事業。

蘇聯的這種計畫是與布爾喬亞國家欺騙的社會政策，等於不兌現支票的，大不相同。這是由於蘇

聯的政治機構，與布爾喬國家的，在本質上大有差別的緣故。

未來的姑留待將來再說。這兒爲結束本文計，特將一九二八年度以前，即蘇聯成立十周年間的文化事業，開出一篇總賬，讓我們窺見雖在那麼樣受苦受難的十年中，但是文化事業的發展直用着可驚的速度，且竟收着可驚的效果。這一篇總賬就蘇俄教育人民委員長盧那查爾斯基 (Lunatscharsky) (註) 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周年紀念慶祝會中報告的“十年間的文化發達”。另有中央對於這個報告的決議案，現在一併附錄於下。

“十年間的文化發達”

這個報告的題目，過去十年來的文化發展，是一個範圍極廣的題目，決不能在人民教育的標題之下詳細敘述到的。

政治經濟與教育是不能分離的

伊里基說政治的成就只有靠提高大眾的文化程度才能獲得；這句話是對的。在他的論協作的文章中，他這樣地寫着：

“蘇維埃政權一經確立，凡我們所需要的，

便是大眾間的文化，以期實現社會主義。”

這種的處置問題的方法便須相當的注重一國文化的發展。

我們對於經濟及文化之努力，（賴可夫Rykov同志的報告曾經說到。）是到處可以見到的。但是這種努力不是對於現在階段的我們的經濟及文化發展所特有的。這種努力即在十月革命的開始時已經有了。我們學校的組織，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及一九一九年中，有大範圍的推廣，我們目睹着大學校數的開始發展。這種在十月革命的初期中普通學校及專門學校數目的增加，實足以表明我們對於教育的願望與努力，不過這和我們的物質可能性太不相應了。這樣繼續到一九二一年為止。在那時候，我們覺得沒有方法能使我們實現我們的願望，而且有許多學校不得不重行關門。

在一九二三年，蘇俄境（R. S. F. S. R.）內的人民教育的基礎確立了。在蘇聯境內的別的共和國因為他們的教育委員的設置遲了一點，所以基礎的確立，也稍稍遲了一點。在一九二三年，在教育領域上的地位已經強固地恢復過來。民衆對於

教育的熱誠一年發達一年，而實現這種努力的物質基礎也趨於愈益鞏固了。

總之，聯邦的人民，是正在渴望一種普通的初等教育，故像在宣言中所宣布的，（譯者按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發表宣言，告蘇聯全體工人，貧農，及紅軍與各國無產階級及世界被壓迫民族，宣言中有一段這樣說：“七，‘在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度國家預算為同目的所規定的總數以上，撥給一千五百萬羅布為建造在鄉村工廠及工作區域的學校之用。’”當舉行十月革命十周紀念的時機，由聯邦政府撥給一千五百萬羅布為學校用，一定能受人民特殊的歡迎。但人民還在同樣地要求設立更多的中等學校。民衆的標語是：‘給我們學校！’。

我們觀察到人民對於教育的急迫要求。這個急迫要求正在推動着百萬的勞動者和農民。

驅除文盲運動；教育

中央統計局（Statistic Central Administration）所發表的最近資料，證明我們國內消滅文盲的運動有不可抗的進步。在一九二〇年，在蘇俄的

歐洲部分，從一千個男女中，有三百五十五人是能讀能寫的；到了今日，這個數目已經增到四百四十五。在過去五年中，我們可以得到約百分之二十八至二十九的一般進步的成績。

婦女在讀書寫字的知識上，是比男子落後，但當過去五年間，男子學習讀寫的人數雖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婦女的人數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這種數字是指蘇俄而言，其他共和國是在例外的。

在這種根本的知識之基礎上，有一種多方面的建設正在起來。這就是各種的高級蘇維埃學校，工業學校，專門學校。

另一方面的努力是設立讀書處(Reading huts)圖書館，和俱樂部，用政治的啓蒙以推廣各種類的人民教育。我們更利用科學以作成新的科學問題，以傳布所獲得的知識，以應用於實際的事業。此外還有藝術，正在設法使之接近民衆，以便促進社會主義的實現。

教育的財政基礎

在一九一三年，由國家及地方預算所撥給人民教育的總數是二七六，一百萬戰前羅布。在一九

二五年至二六年度，由國家及地方預算及由交通人民委員項下(供運輸事業的教育用)所支出供教育用的總數，達三〇二，六百萬戰前羅布。在剛過去的一年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由上述同種預算中所支出人民教育經費，達三九六，二百萬戰前羅布。

在一九一三年，在國家預算總額中，教育費占百分之七，七六；在一九二六年度，占百分之一〇，八八；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占百分之一〇，六三。

本年的預算雖尚未完全編竣，但蘇聯的人民教育費，無論是絕對的與相對的，一定要有增加。

對每一人民所支出的教育費如下：一九一三年為二羅布八可比，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度為三羅布八十六可比；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為四羅布七十九可比。

初等教育，第一級

在戰前，一九一四年，學校總數約在一〇四，〇〇〇所以上。剛在十月革命之後，當教育機關積極增加的時期，初等學校總數多至一一四，〇〇

○。在一九二三年，學校數低至八七，五〇〇；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增加至一〇八，〇〇〇，比一九一四年多百分之三，六。在一九一四年，學生人數為七，二百萬；當學校組織急速擴充的時期有九，二百萬。最後在去年，有九，九百萬，在第一級的初等學校內。

目下，有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的兒童入學。蘇維埃政府業已決定這樣的偉大工作，即推廣學校組織，直到一九三三年，全部學齡兒童都能入學為止。

就性質上說，我們的學校仍有許多地方要改進的；經費不充足，設備不完全，教師的教育常不圓滿。

但四年學程的學校最近可以有急速的進步。新的計劃正在各處提出；在這一點上一定可有許多成就。

我們學校的教育制度，已受來蘇聯參觀的外國教育專家及學者的盛大的贊許。這種由遠離共產主義的外國人所表現的贊許，證明蘇維埃學校是世界主要的教育實驗室。

以各民族語教授爲基礎的學校改組

在人民教育上最重要的要素，是爲了重視各民族語(National Language) (譯者按蘇聯國內包含許多不同的民族，他們所用的語言各不相同。)把所有學校一律改組，初等學校的第一級，強迫實施這個改組計劃，即使文化程度絕低的各民族。這個用國語教授的學校改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爲在戰前，絕對沒有過這種學校或者僅是極可憐的。但不管有多少困難，進步終能獲得的。

譬如在烏克蘭，用國語教授的學校數每年增加，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這類學校的數目占全部學校的百分之六十六；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占百分之七十七；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占百分之七十九以上。同樣，用國語教授的學校數的增加，在聯邦的其他共和國也能看到。

學齡前兒童的教育

從十月革命以來，在蘇聯的學齡前兒童的教育，已有了卓著的進步。

學校前期 (Pre-School) 的教育機關的大推廣在革命以後即可看出。在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度，有

四七二三幼稚園與托兒所(Nurseries)，收容二四五，〇〇〇以上的兒童。當這種機關停止接受國家的補助而專靠地方財政的時候，他們的數目曾經暫時減少；但在近幾年間，已經重行增加了。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有一一三九幼稚園與托兒所；第二年度就增至一三六四，而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便有一六二九。收容兒童的人數也與之俱增。

近幾年來兒童遊戲場所的增設，特別顯著。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爲一五〇〇，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就有四〇〇〇。在眼前有二〇〇，〇〇〇兒童是在這些遊戲場中消遣他們的時光的。

對孤苦貧乏(Destitution)的鬭爭

對兒童間孤苦貧乏的鬭爭正在用各種方法實行。這種不幸事現在逐漸消滅。無家的和無人看養的兒童的數目正在減少，而生活在用國費支持的兒童之家的人數也復如此。兒童們現能享受較好的生活，且從事於生產過程，有似青年工人。

鄉村於減少無家兒童的人數上，已做不少工作，有許多這類兒童已被養育在他們自己的家庭裏。

中等學校

中等學校 (Middle Grade School) 的大缺點，在它們的組織沒有十分的擴張。它們所收容已經過第一級學校的兒童不過十分之一。但 蘇維埃聯邦 已經超脫了資產社會秩序所留下的不幸的遺跡，也是一件事實。故當一九二三年時，入學於中等學校的學生數早比一九一四年的為多；到現在在這類學校內的兒童的人數已比戰前多過百分之四了。

說到中等教育有一件事必須指出的，就是這類學校所採用的制度。在蘇俄 (R. S. F. S. R.) 的，是和在烏克蘭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有根本的不同。在蘇俄 有兩種學校：五年學程的中等學校，七年學程的中等學校。而在烏克蘭 僅有一種一律七年學程的中等學校。另有三年學程的稱為專業 (Profession) 的學校附屬於此，專業學校之上為專門學校 (College)。

兩種制度的中等學校的存在，自然是不大合宜的。但無論那一種制度還得維持一些時候，為的要出經驗來證明那一種制度最能促進全國發展的

利益。

青農的學校

在蘇維埃聯邦中，有一種特殊形式的中等學校，便是爲‘青年農民’ (Young Peasants) 的學校。這類學校所授的教育在使青年農民成爲一個有協作 (Cooperative) 的智識的有教育者。

下列的資料可以表示農民青年學校的發展。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這類學校數凡二二九，學生數凡二〇,〇〇〇以上；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度，學校數增至四九一，學生數增至三六,〇〇〇以上；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學校數凡六八六，學生數近五〇,〇〇〇。

工廠學校

工廠學校 (Factory Schools) 是可列入中等學校的。

我們時常聽見有人說，既然全國工業化發達的結果，可以減輕合格的勞動者之工作僅至於管理機器，所以工廠學校已經是過多了。這個見地是錯的，工廠學校是有各種繼續發展的可能的。但這須由推廣這類學校組織，竭力增多學生人數以實

現。可是在一九二三至二四年度在蘇維埃聯邦內僅有七八九工廠學校。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可有一六七八。在這期內學生數由六〇,〇〇〇增至一一〇,〇〇〇。

職業教育

全國的工業化使得職業教育成為我們文化上最重要部門之一。這裏必須有一種密切的協作，一方面是經濟和代表經濟的人民委員，他方面是教育人民委員。

但這兩者中間的協作在實際上還未曾實現，爲了這個原故，所以對於組織專業(Profession)教育所做的工作尙未能充分滿意。特別是低級的專業學校在不利的狀態中。這類學校僅有二三所，而且還不大適合實際的需要。可見仍是沙皇(Tsar)的俄羅斯的遺產。但低級專業學校是養成一國合格的勞動者所必需的，這種勞動者正是非常缺少。有的省分，因爲缺少鐵匠，馬鞍匠，細木匠等，已發出許多怨言。

工藝學校

工藝學校(Technical school)的組織，和專業

學校的組織一樣，已爲我們從舊俄羅斯取過來，加以擴充了。但學校的數目，及其內容未能適應我們聯邦各地方的性質和它們的組織要求。近正計劃最近的將來開設許多新的工業學校；這於改進這方面的事項上當有很多用處。

工藝學校組織的推廣及學生人數的增加都是極大，自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度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工藝學校數已由五八五增至一〇一七，即差不多已加倍；學生人數也由七〇,〇〇〇增至一八〇,〇〇〇，即增多二倍半以上。

專門學校與勞動者預備大學

沙皇俄羅斯在這裏遺留給我們一種遺產，是需要大大的改造的。教授的綱要以及專門學校的制度都須改變，尤其是國家已需要盡高等學校無產化的極重要的責任。

在日下，專門學校已顯然成爲勞動者和農民的專門學校，這大半是由勞動者預備大學（Workers' faculties）而起，勞動者預備大學是一種預備大學，預備把俊秀的青年勞動者和農民送入專門學校中。

現在正在設想種種方法，以改進勞動者預備大學的教授，使不因生產而妨害勞動者的學生。因此，教育人民委員規畫夜間的教授。

我們的工作不在增設專門學校，而在改進它們所授的知識。在我國急須增設專門學校的時期已經完了，嗣後所需要的是選擇最好的專門學校和改進教授的時期。現在專門學校的組織包容了比戰前專門學校更多一六〇,〇〇〇的學生。

以下的數字可以表示入學學生所屬的社會出身。就一九二四年比較起來，勞動者入學於專門學校的比例已自百分之一〇增至百分之二五以上，農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二，至百分之二六，雖是綱要(Syllabus)所定的要求提高，但黨員 (Party Members) 及青年勞動者報名專門學校的百分比已經大有增進。(現在的)學生比往年的學生不同的所在，是對於他們所研究的功課發生深切的興趣。教授人員方面正漸漸地謀適合於近代的教授條件及青年的活動。年輕的受科學的教育法的教師正在培養以便代老式的教授担任工作。

政治教育

教育人民委員的機關，無論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皆正在用熱誠注力於政治教育（Political Enlightenment）這方面。

這方面的第一步工作是消滅成人中的文盲（Illiteracy）。驅除文盲中心機關（Centres）的一個大組織已經組成。這一種中心機關的數目在一九二一年為四一,〇〇〇，到現在差不多有四七,〇〇〇，學生的數目也已由一百萬增至一百五十萬，在過去七年中，已約有七百萬入受讀書寫字的教授。

一般人都能積極的參加廢除文盲的鬭爭。現在這個團體，‘消除文盲！’（Away With Illiteracy!）約包括有二七,〇〇〇小組（Nuclei）共有一,二百萬的男子與女子，其中約百分之六十五在鄉村，百分之三十五在城市。

普通教育機關（學校托兒所等）也必須列入政治教育之內。在一九二一年這種機關有七八〇，而現在則有八六六，學生數約有一〇〇,〇〇〇。與此並行的即為推廣勞動者大學的組織。目下我們有三十一個勞動者大學，有七八六八個學生，他同

時還在做工。

除出上述的普通教育機關之外，尚有一種卓著的工作由男女勞動者所做的，就在鄉間讀書處擔任教授，這一種青年勞動者所教的讀書處有二二.〇〇〇處。

勞動者俱樂部的活動，能引導勞動大眾到俱樂部來，消遣他們的閑暇時間。有時候覺得俱樂部的功能，在教授及組織的活動上過度一點，設置了過多的功課，因此使許多勞動者對俱樂部望而却步，實因他們工作之後，已感疲乏，再也不能用心之故。故這等俱樂部必須成為真正供勞動者休息和感官上娛樂之所。婦女在這個工作上必須占主要的地位，她們在這方面已是證明為最好的組織者和領袖了。

在政治教育的陣綫上，最近已發見一個強有力的友軍，就是無線電話(Radio)。不過四年以前，還只有少數人能明白無線電話的意義；大部分人對於美國來的報告還當作神仙故事似的，——如說無線電話可隨時放送，音樂演奏與講演等可隨時聽到。但到今日，差不多城市中的每一人家都已

裝置無線電話機了。現有四十七個放送局差不多可供給全聯邦人民的四分之一。

電影也已有同等速率的發展。

在革命前，百分之七十五的影片是來自外國的，其餘百分之二十五是很沒有價值的作品。現在我們的出產和性質已到了高等的程度，外國的影片是漸漸的排除了。

出 版

我們文化的進步，從我們出版業方面所表示者，也甚顯著，我們發行了五五六種報紙，它們出版的總數達八百萬份。這是大大的超過了戰前新聞紙銷行的標準了。和戰前的時候比較起來，對於民衆所發生的影響已經是無限增加了。

科學事業的出版也有同等的進步。科學事業的出版數，也足以表示人民對於科學書的興趣的增加。一九一〇年，算是這種出版業最興盛的一年，有新的出版書籍四六四種，但今年分類的新出版物共有九四五種。

科 學

科學於社會主義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據蘇

維埃聯邦科學院幹事 (Secretar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S. F. Oldenburg 說，蘇聯科學事業的進步是與一九二〇年設置‘科學家物質地位改進中央委員會’同時起的。從那時候起，科學已能向着系統化的方面發展，科學家的工作，不僅在專門學校及科學研究機關裏，很有一部分是在國家機關裏，即從組織聯邦經濟設計委員會 (Comission for Planned Economics of the Union) 開始的。由此他們能磅礴的大有貢獻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進步。

在我們的科學上發達馬克思主義是一件頂重要的工作。這裏我們就必須注重出版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發展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學及新聞事業，另一方面還須使各方面重要的科學家及全部科學研究機關能把握馬克思主義見地的原則。

由革命所建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學院，便占第一個位置，譬如馬克思恩格斯學院 (Marx-Engels Institute)。它由 Ryazanov 同志主持，在它的組織及科學勞動上，實可稱為世界上科學的馬克思主

義的主要機關。

其他如共產主義名學院 (Communist Academy) 列寧學院 (Lenin Institute) 及許許多多別的科學研究機關，也做了許多工作，在努力不懈地灌輸馬克思主義者的原理到各種科學研究的部門中。

蘇維埃聯邦科學院的活動在日下這個時期已有龐大的發展。

藝 術

民衆、黨及政府當局正在開始注意於藝術。我們已能在一方面看到創造的藝術的活動之一般增進，在他方面看到在藝術上表現我們的觀念形態之趨勢。一個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學已經發生，在這兒已有些驚人的優美的例子，值得在我們的文學史上占一個永久的地位的。

我們的戲院，即在革命後最困難的時期中還是好好兒被保護的，已經獲得新力量的感應，所以到了現在，無論在管理上在表演上，都無疑的是世界上頂好的。現有一種強烈的傾向要在我們的劇場裏表演真實的生活，有一種衝動要參與到文化

發展的潮流中來。

剛在革命之後，我們的畫家及雕刻家因脫離了以前保護人的影響，未免有點惱亂。在最初一個時期，大部分未來派畫家走到我們這邊來，但是不能產生革命的無產階級在當時所希冀的作品。直到最近，畫家及雕刻家才確定了為民衆的這條正路。美術家，他能適合人民實際的需要而有成就的，無論是用刷子或用鑿子，皆覺得自己的作品已為民衆所感激地接受了。

音樂的藝術也成就了偉大的進步。

民族文化

在沙皇統治時期，強迫一切民族使用俄羅斯語；十月革命宣布各小民族的言語及方言有絕對平等的權利。現在在各民族落後區域的兒童，正在入學於學校，有許多工作是為傳布民族文學，訓練婦女做公共蘇維埃事業而做的。

人類社會必須在諧和的改造的根據上才能成立，我們最先便要保證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根據各民族權利平等的民族文化的發展。

下 一 代

我們文化發展的最重要中樞之一是共產青年同盟 (Young Communist League)，它的發達同時即表示全聯邦文化的龐大發達。

這一代固然差不多是爲我們最活動的協作者 (Collaborator) 所有；但下一代是要屬於我們先鋒組織 (Pioneer Organizations) 的少年所有；他們的時代正在繼續着這一時代。這兒正有一支有力的同盟軍在發展，他們是成功者，我們可以毫無恐懼地把建設人類新社會的大事業交給他們。

■ * ■

西歐諸國的全部文化發展是爲適於個人利益的滿足；然我們的文化是向着全人類文化進步及改進生活標準的目標而進行的。

我們最好要知道這個區別，假使我們到外國去參觀。當我們從一個富有的外國回到我們窮苦的蘇維埃聯邦的時候，我們覺着一種深切的愉快的感覺，便是工作的愉快，在我們本國的我們自己主義的愉快。(熱誠的鼓掌)。

對於盧那却爾斯基報告的決議案

自偉大的十月革命解放勞動階級及農民脫離沙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壓迫，且建設經濟的社會主義組織之基礎以來，已經十年了。這個偉大的革命尚有更遠大的影響及於大多數民衆的文化與教育之根本的改造。

從前人民的教育完全操於有產階級之手，沙的帝國是一個人民的大監獄。殘酷的 Russifi-Caton 是沙皇統治的主要方法之一。受這種大力量壓迫的人民是被剝奪了一切文化發達的可能性的。各民族甚至被禁止設立他們本地語言教授的初等學校，文化落後的國家處於最不幸的地位，它們是長在最黑暗的精神狀態，而且缺乏文化，因之得用異常野蠻的方法去榨取他們，分裂他們。但十月革命對於這一切宣告終結，且把促進大衆的文化作爲最先目標之一種。

已經奪取政權的我國勞動階級進而證明負荷新的人類進步的責任是真理。無產階級一面推求增高文化與智識的方法，同時即用熱誠努力於蘇維埃聯邦全體勞動者及一切民族的發展與開明。

由十月革命所產生的偉大的文化革命，將有

成功的結果，因為它是以在城市和鄉村的幾百萬勞動者之活動與創造力為根據的。這是完全由於十月革命，使我們的國家得從野蠻的過去的骸骨自行解放，能主持文化的進步，且開闢建設社會主義之路。

世界上沒有別個國家能像蘇維埃聯邦那樣宣告男女完全平等。且那樣熱誠地一致地堅持這個原則的。

蘇維埃聯邦在保護母性及兒童方面，占歐洲第一個位置。

在反抗封建主義的革命的鬥爭時期，資產階級被捲入於反抗為封建秩序根本支柱之一的宗教的鬥爭中，且常企圖把文化從宗教解放出來的問題放在最前線；但在跟着來的一個時期中，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開始，資產階級反轉依靠宗教，且與牧師結成聯盟。只有在蘇維埃聯邦，它宣言每個人民有信仰的自由，繼續地努力擴清成人的心理，特別是新興時代人的心理，使脫離宗教的偏見。這裏蘇維埃聯邦在反抗宗教的鬥爭中，除採用徹底的教導（Enlightenment）方法之外，沒有別の方

法，我們廣大的國家的文化發展，從宗教的監獄裏解放出來，是第一種完全根據實在科學的基礎的人類文化。

只有在蘇維埃聯邦中，我們發見一致的完全的遵守人民平等的原理。屬於蘇維埃聯邦的人民是平等的，他們的民族文化的發展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幫助而得繼續。他們是被組織在一個人民的自由團體中。

蘇維埃聯邦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很滿意的觀察到，就是感謝勞動者及農民的大部分民衆的努力，在十月革命以後的十年之終，能夠在提高蘇聯勞動民衆及各民族的文化與教育上，獲得勝利的結果。人民的普通初等教育已大有進步；驅除成人文盲的工作正在勇猛地繼續着。學校的組織已大加擴充；所起草的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度的計畫，能使我們實現普通學校教育的普及。各種樣式的中等學校繼續的需要為國家養成半熟練的勞動，且把已經預備好的及對社會有用的青年送到專門學校中去。政治教育的工作是得了俱樂部，圖書館，讀書室，人民集會所(Peoples' Buildings)，劇場，電

影，無線電，勞動者大學的夜學校等，密切的組織的幫助而進行的，且普及到勞動階級及農民的大部分人。

十月革命本身規定了掃除城市與鄉村人民間的文化差別的工作，現在蘇維埃聯邦正在努力不懶地做這工作。

對於創設勞動者康健的勞動及生活條件的工作，也正在大大地努力，其結果於傳染病的減少，死亡率的降低，特別是嬰兒死亡的大為減少中見之。

落後民族的文化發展正在急速進行，有比例地提高我們聯邦的集體的文化水準。

一切文化工作的實施是根據於奉行勞動者解放的主義，及依共產主義的精神訓練新時代人的根本觀念。

蘇維埃的出版物和資產階級的大不相同，後者是專供剝削及欺騙民衆的有力工具，前者是為勞動者服役，并告訴他們以真正的真理。

蘇維埃新聞紙深入於國家最偏僻的處所，用各民族的語言印行，銷數遠勝於戰前。幾萬的勞動者與農民通信員向這種報紙投稿，所以它能和實

際的人民大眾有極實際的接觸。

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已使蘇維埃政權負起創造勞動者及農民的智識者的非常繁複的工作，這種智識者在資格上並不劣於我國以前的智識者，或資產階級國家的專門家，但同時仍與勞動階級有最密切的接觸，且具有極透澈的革命意識的。在這兒，我們也已得了大的成功：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幾十萬的勞動者和農民以及他們的兒童能以接受他們在最高智識上的享受，這是要感謝我們的勞動者預備大學及專門學校的。

革命已經證明能使國家的科學力量有最大限度的效用，其結果不惟已有一種遠超過革命前標準的科學的創造的成績，而且證明科學對於生活的具體需要和在蘇聯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上是最能完全的適應。最大的成就是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內。在社會科學方面，資產階級否定這個原則——科學的馬克思方法——基石；但在蘇聯，由列寧的教訓，已能使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根本原則應用到公衆生活上最多樣的部分，馬克思主義者思想的第一個真正地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蘇維埃聯邦已經想盡各種方法來保護過去的藝術寶藏，且使這種種能完全接近於勞動大眾。

另一種工作是發達新文學，遊戲場，促進繪畫與雕刻，音樂與電影，且使它們能再生產革命的實體，又能滿足我們大創作時代的要求。這裏藝術不復成為富人的專有品，而是愈成為勞動階級所共有。能利用藝術以促進國民文化，或覺醒蘇聯一切民族的創造力，乃是十月革命以後才有的事。

在蘇維埃聯邦過去十年間文化進步上所得的大成功，大半是賴民衆組織，如各工會，共產青年同盟，各協作社，及各志願團體等等的努力。

這些是蘇維埃組織十年的成績，雖然在這十年的起初五年是內戰，饑饉，傳染病，及一切損失的艱難時期，可是仍有這種成就。

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比較過去十年間蘇聯人民的文化發展上，認為這是它的責任，就是代表國家勞動階級，致謝於那些做教育及文化的工作者，他們在最艱困的幾年中已能忠實於他們的使命，且已找出和無產階級友好的共同工作之路，以廓清過去時代最後的骸骨。

蘇維埃聯邦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一方面固然能滿意於國家一般的文化的進步，但他方面鑒於革命的高等目標及人民對教育的要求，故以爲所已得到的那些東西決不算是充分。蘇維埃聯邦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因此有注重繼續的不懈的做提高國家文化的工作的必要，且委託蘇維埃聯邦政府要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促進這個目標的實現：把這當作聯邦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協作活動的主要工作之一。在現在當跨上蘇維埃革命第二個十年的門閥的時候，中委會以爲必須把文化進步的整個主張視爲國家改造的統一社會主義計劃上所不能分離的一個要素，也當視爲國家工業化的工作上所不能分離的一部分，一段落。

蘇聯中委會重視由十月革命所宣布的各個民族有獨立的國民文化發展的權利，一種規定蘇維埃聯邦憲法中的權利，且宣言一切人民的國民文化的發展，還要繼續接受未來的蘇維埃政權的贊助。

依據以上所述，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

一、確實地系統地強固蘇維埃聯邦內社會的

及文化的工作之物質的基礎，這樣可使這種工作發展的速度不致落後於國家一般經濟發展的速度。

二、把下列那種工作列入蘇維埃聯邦的政府，及聯邦內各共和國與自治共和國的政府之最重要的當前工作：設立普通初等教育，消滅成人中之文盲，消滅兒童的貧乏孤苦，增進人民健康的工作與生活的環境的計劃，訓練人民健康的習慣與衛生，大規模的專業教育，援助勞動者大學的夜學校及勞動者學程，收容勞動者及農民的廣大羣衆到專門學校，改進高等教育機關使擔任對蘇維埃國家有價值的事業。

三、用毅力進行提高文化落後諸國的文化程度的工作。

四、繼續做提高城市及鄉村勞動婦女的文化程度的更嚴重的工作。

五、繼續做有系統地改進從事文化及科學工作的一切勞動者之物質地位的工作。

六、繼續做更增進藝術文化且使它容易接近於勞動大衆（劇場，電影，音樂，繪畫）的工作。

七、爲使一切文化發展的趨勢合於社會主義起見，我們必須：

(甲)用集團主義及國際勞動者團結的精神進行文化、教育及訓練的工作。

(乙)繼續我們的努力，引導勞動者及農民的廣大羣衆，以及他們的公共團體組織，參加建設的工作。

(丙)擴大在發展社會主義工業上所須的合格勞動者的隊伍(Cadres)及鄉村趨於社會主義的指導。

(丁)繼續做養成蘇維埃聯邦人民間勞動者和農民的知識者的新隊伍的工作，且從這等人中間引出爲科學事業及研究所需要的最高級合格的工作者。

如果蘇維埃聯邦的勞動階級跟從這條路且用在內戰中及在經濟衰敗時期奮鬥的同樣能力來專注於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主張，再加上俄國勞動農民的幫助，那麼在爭取我國最後的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勝利上是會成功的。

(註)按蘇俄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契爾斯基已於一九二九年

九月間辭職，由布模諾夫繼任。盧氏另被任命為在蘇聯中央執行管理之下的各科學研究所管理委員會議長。

問 題

- 一。蘇維埃教育的根本目標及當前任務是什麼？
- 二。蘇維埃教育的理論根據有那幾項？
- 三。蘇聯的教育行政和別的什麼機關相聯絡？為什麼要這樣？
- 四。試比較美國教育和蘇維埃教育之不同。
- 五。蘇維埃俄國的兒童及青年，和別國的兒童及青年比較起來有何不同？

參 考 書

李浩吾著：教育史 A B C（世界書局）

島爲男著：階級文化與教育之革命（日文）

森戶辰男著：作爲鬥爭手段之學校教育（日文）

仲宗根源和著：教育讀本（日文）

仲宗根源和著：勞農露西亞新教育之研究（日文）

志垣寬著：蘇俄新教育行（日文）

藏原惟人著：新俄文化之研究（日文）

藏原惟人著：蘇維埃聯邦之教育（日文）

• Ognyov：Diary of a Communist Schoolboy,
1928.（中譯本新俄學生日記，林語堂張友松）

合譯，春潮書局出版。

Ognyov: Diary of a Communist Undergraduate
1929. (中譯本新俄大學生日記，江紹源譯，春潮書局出版。)

Upton Sinclair: The Goose-step, 1923.

Upton Sinclair: The Goslings, 1924.

E. & C. Paul: Creative Revolution, A Study of
Communist Ergatocracy.

E. & C. Paul: Proletcult (Proletarian Culture)

Lucy L. W. Wilson: New Schools in New Russia
1928.

Scott Nearing: Education in Soviet Russia,
1926. (中譯本有三種：商務書館出版許崇清
譯的蘇俄之教育，價太貴；民智書局出版杜佐周
譯的蘇俄的教育；北新書局出版潘梓年譯
的蘇俄的教育。)

W. T. Goode: Schools Teachers and Scholars in
Soviet Russia, 1929. (中譯本蘇聯的活教育，
王西微譯，華通書局出版。)

Earl August Wittfogel: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22.

L. Trotsky: Problems of Life.

Stalin, Bucharin 著作集：社會主義建設之鬥爭
(日文)

Stalin, Bucharin 著作集：無產者革命與文化。

K. Kautsky: Ethics 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中譯本有郭夢良的人生哲學與
唯物史觀，商務書館出版；董亦湘的倫理與
唯物史觀，新文化書社寄售。)

Bogdanow: Die Entwicklungsformen der Gesellschaft Und die Wissenschaft (中譯本有施存統陳望道合譯的社會意識學大綱，大江書鋪出版；薩孟武譯的社會主義社會學，新生命書局出版。)

Bogdanow: A Short Course of Economic Science
(中譯本有施存統的經濟科學大綱，大江書鋪
出版。)

若俊譯：觀念形態論 (南強書局)

柳島生譯：世界史綱

蔡和森譯：社會進化史 (民智書局)

Karl Marx & Frederick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Karl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 B. C. of Communism.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中譯本有許楚生的唯物史觀與哲學，北新書局出版。)

I. Stal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eninism.

N.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中譯本有國家與革命)

F.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中譯本有李膺揚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F. Engels: Socialism, Utopiaun and Scientifico (中譯本包含在林超真的宗教哲學社會主義，滬濱書店出版。)

Plekhanov: Les questions Fondamentales du Marxisme (中譯本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問題。)

A. Bernard: Role et méthode de l'enseignement Leniniste.

Karl Marx: Selected Essays (中譯本有李一氓的馬克思論文選譯，滄濱書店出版。)

Nathan Miller: The Child in Primitive Society. Educational Worker (英國教員勞動同盟的機關雜誌)。

Teachers' International (巴黎出版的雜誌，有英文版法文版。)

プロレタリア科學 (日文的月刊)。

以下爲再版時添入：

山下德治著：新興俄國之教育 (日文，已由李浩吾譯出。)

Albert P. Pinkevitch: The New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 (已由李浩吾譯出，書名蘇維埃共和國的新教育。)